



北京文博
季刊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季刊
2026

第1期 总第1期
创刊号

ISSN 2097-8057
CN 10-2085/K

北京文博

◎ 北京古代城市的规划初论——兼论古代城市考古研究的『四层法』
◎ 元大都金水河与皇城北墙——北京历史地理札记
◎ 通州路县故城J13古木井及陶罐与陶文研究

◎ 追本溯源，寻根究底——从北京建城3040年说起
◎ 历史回响与时代新篇——从琉璃河遗址谈起
◎ 古都城市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伟大变革——实施『老城整体保护』的重大意义

北京市文物局 主管
北京市文物局综合事务中心 主办

2026年第1期 总第1期 创刊号



定价：48.00元 / 期

ISSN 2097-8057
CN 10-2085/K

北京文博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季刊
2026

第1期 总第1期
创刊号

北京市文物局
北京市文物局综合事务中心
主管
主办

学术委员会(顾问)

吕济民 李伯谦 孔繁峙 舒小峰 王世仁 齐 心
马希桂 靳枫毅 郭小凌 李建平 张 杰 张大玉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张立新
副 主 任 白 杰 刘洪昌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文大 马保春 王得宝 石 磊 龙霄飞 叶 楠
朱万章 汤羽扬 祁庆国 孙 永 孙冬虎 李文君
肖 鹏 吴国盛 吴文涛 宋向光 张 勃 张 健
张 涛 张中华 张宝秀 张洪刚 张景秋 陈建立
陈喜波 岳升阳 房小可 赵海英 赵瑞廷 赵庆聪
郝志群 侯 霞 袁广阔 徐运红 徐良高 高寿仙
郭京宁 黄小钰 崔剑锋 韩 更 韩建业 戴 俭

主 编 张宝秀
副 主 编 祁庆国 吴文涛 张洪刚 孙 莉
编辑部主任 韩建识 张晶晶
编 辑 高智伟 侯海洋 高丽丽 张中仁

主 管 北京市文物局
主办单位 北京市文物局综合事务中心
编辑出版 《北京文博》编辑部
电 话 010-55533065
电子邮箱 bjwb1995@126.com
投稿平台 https://www.scicloudcenter.com/BCRAM/login/index
地 址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南三街211号院1号楼
邮 编 101118
装帧设计 气和宇宙
印 刷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发 行 北京市文物局综合事务中心
发行范围 公开
出版日期 2026年3月28日
定 价 人民币48元/期

版权声明

《北京文博》由北京市文物局综合事务中心主办，凡向本编辑部投稿，均视为同意在北京市文物局网站和期刊数据库等平台传播及发行，所付稿酬包含网络出版稿酬。版权归本刊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使用。文责由作者自负。

《北京文博》征稿启事

《北京文博》是由北京市文物局主管、北京市文物局综合事务中心主办的学术期刊，以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和舆论导向，刊发北京地区文物和博物馆研究成果，搭建学术交流平台，传播文化遗产知识，推动我国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办刊宗旨。刊物于2026年正式创刊，刊期为季刊。

本刊的选题范围从北京老城、北京中心城区、北京市域到京津冀的文物、考古、博物馆等历史文化遗产领域的有关新问题、新发现、新观点、新趋势的研究性文章。此外，我们欢迎广大作者惠赐书评，选题范围限于近年出版的关于京津冀地区文物、考古和博物馆等领域最新研究成果。同时，我们设有译介国外相关学术成果的栏目，欢迎大家惠赐相关文章。

来稿要求：

- 稿件文字精练，字数5000—10000字，做到主题鲜明、结构合理、论据可靠、逻辑清晰。
- 来稿请作者提供中英文标题、摘要、关键词。摘要字数300字左右，关键词5个左右。
- 标题的层次：一级标题用“一、二、……”来标识，二级标题用“（一）（二）……”来标识，三级标题用“1. 2. ……”来标识，四级标题用“（1）（2）……”来标识。标题行和每段正文首行均空二格。各级标题末尾均不加标点。
- 稿件的文字、标点、年代、数字等书写方式均以国家新闻出版署有关规定为准。
- 使用图、表应简洁清晰，图和表中的文字请设定为可修改状态，图片资料要求清晰，JPEG格式，大小不小于3M，分辨率达到300×300DPI以上，图、表请注明名称、来源（置于图题之后，不另出注）。如因作者标注不明而引起的版权纠纷，责任由作者自行负责。每张图表按照图一、图二……表一、表二……的顺序标注。图题位于图片（照片）下方，表题位于表格上方，并在正文中以（图一）或（表一）等的顺序依次标明。
- 文章注释为尾注，格式为“作者（编者、译者）+著作名称+出版单位+出版年+页码”，按①②③依次标注。朝代用〔 〕，国别用〔 〕。引用的期刊，只标注到某年某期，不提供具体页数。

例：

- ①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95页。
- ②孙秉根：《西安隋唐墓葬的形制》，《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51页。
- ③张弛：《大汶口文化对良渚文化及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影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报（第八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4～22页。
-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民和县胡李家遗址的发掘》，《考古》2001年第1期。
- ⑤张弛：《龙山—二里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文物》2017年第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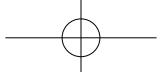
7. 来稿须具有原创性，未公开发表过；文中引用部分，均须做出明确标注或得到许可，如有侵犯他人著作权问题，后果由作者负责。

8. 投稿请上传至本刊的投稿平台 (https://www.scicloudcenter.com/BCRAM/login/index)；或投至本编辑部临时邮箱：bjwb1995@126.com。本刊实行专家盲审制度，稿件正文中不宜出现个人信息。

9. 来稿请注明作者单位、联系方式及确切通信地址。请勿一稿多投，并请自留底稿，无论采用与否，恕不退还。如在3个月内未得到本刊的用稿通知，请自行处理。稿件一经刊发即按照本刊付酬标准支付稿酬。同时本刊有权在网络媒体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传播本刊全文。

热忱欢迎各位专家、学者同仁赐稿。

《北京文博》编辑部



目次

2026 年第 1 期 总第 1 期

特稿

- 8 追本溯源，寻根究底
——从北京建城 3040 年说起 侯仁之
- 10 历史回响与时代新篇
——从琉璃河遗址谈起 齐心
- 14 古都城市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伟大变革
——实施“老城整体保护”的重大意义 孔繁峙

史地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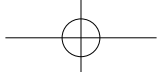
- 21 三十余年来（1995—2025）北京建城起源及相关问题研究述评 王新迎 郝志群
- 30 确定北京城市之源的历史地理依据 孙冬虎
- 37 永定河古河道与蓟城 岳升阳
- 45 从辽南京到金中都
——再谈北京“建都之始” 吴文涛
- 53 民族交融视阈下金中都的建成 周峰 白鷗
- 62 元大都金水河与皇城北墙
——北京历史地理札记 唐晓峰
- 67 元英宗校勘大藏经有关史事考 舒小峰
- 78 民国时期正阳门议改“共和门”之始末 郭豹

考古研究

- 88 北京古代城市的规划初论
——兼论古代城市考古研究的“四层法” 郭京宁
- 96 北京的商文明
——刘家河墓葬的多元文化因素分析 袁广阔

文物研究

- 102 平谷刘家河商墓出土铜盘内壁纹饰研究 戴征
- 108 琉璃河奭器组铭“燕侯宫”初探 陈光鑫
- 115 通州路县故城 J13 古木井及陶罐与陶文研究 陈平 孙劭



CONTENTS

No.1, 2026

INVITED CONTRIBUTIONS

- 8 Tracing Origins and Uncovering Roots: Commemorating the 3040th Anniversary of Beijing’s Founding *Hou Renzhi*
- 10 Historical Echoes and New Chapters of the Era: Insights from the Liulihe Site *Qi Xin*
- 14 The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apitals: The Significance of Implementing “Holistic Conservation of the Old City” *Kong Fanzhi*

HISTORICAL GEOGRAPH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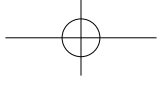
- 21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the Origin and Related Issues of Beijing’s Urban Construction over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1995—2025) *Wang Xinying Xi Zhiquan*
- 30 The Determination of Beijing’s Urban Origi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Sun Donghu*
- 37 The Ancient Course of the Yongding River and Ji City *Yue Shengyang*
- 45 From Liao Nanjing to Jin Zhongdu: Revisiting the “Founding of the Capital” in Beijing *Wu Wentao*
- 53 The Construction of Jin Zhongd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nic Integration *Zhou Feng Bai Yao*
- 62 The Jinshui River and the Northern Wall of the Imperial City in Yuan Dadu: Notes o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Beijing *Tang Xiaofeng*
- 67 A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Facts Concerning the Revision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Canon by Emperor Yingzong of the Yuan Dynasty *Shu Xiaofeng*
- 78 The Proposal to Rename Zhengyangmen as “Gonghemmen (Gate of the Republic)”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A Historical Account *Guo Bao*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

- 88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Planning of Ancient Cities in Beijing: On the “Four-Level Method” in Ancient Urban Area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Guo Jingning*
- 96 Shang Civilization in Beijing: Research on the Multi-ethnic Characteristics of Liujiahe Cemetery *Yuan Guangkuo*

RESEARCH ON CULTURAL RELICS

- 102 Study on the Inner Wall Decorations of the Bronze Plates Unearthed in the Shang Dynasty Tombs at Liujiahe, Pinggu District *Ji Zheng*
- 108 A Preliminary Research of the Yanhou Palace in the Huan’s Bronzes Group Inscriptions of the Liulihe Site *Chen Guangxin*
- 115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J13 Ancient Timber Well, Ceramic Jars and Pottery Inscriptions at the Luxian Ancient City Site, Tongzhou *Chen Ping Sun Meng*



发刊词

擦亮历史文化金名片 谱写文博事业新篇章

弹指一挥间,《北京文博》已走过三十年的风雨历程。三十年来,《北京文博》始终秉持服务首都文博事业的使命与担当,以集刊形式刊发了大量反映北京地区文物、博物馆、考古、文物保护与利用等领域新发现、新成果的文章,为文博工作者和文物爱好者搭建了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极大促进了首都文博事业的发展。

进入新时代,《北京文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市委宣传部的指导和市文物局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紧张筹备,2026年2月,《北京文博》期刊正式取得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复,以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和舆论导向,刊发北京地区文物和博物馆研究成果,搭建学术交流平台,传播文化遗产知识,推动我国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办刊宗旨,为各年龄段文博学术研究者提供交流分享机会,树立文博领域学术前沿品牌,使之成为后备领军人才的培育园地和团结社会力量服务首都文博事业发展的综合性学术期刊。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首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指出: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北京作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3000多年建城史、870多年建都史,拥有8处世界文化遗产、丰富的地上地下文物资源,博物馆数量居全国城市之首。我们要坚持整体保护与活态传承相统一,不断擦亮北京历史文化金名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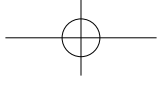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十四五”时期,北京市文物系统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文物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攻坚克难、久久为功,推动全市文物工作实现全方位提升、历史性跨越,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取得一系列显著成就。“十五五”时期,北京将立足首都“四个中心”城市战略定位,统筹文物保护利用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好北京中轴线及老城、三条文化带等文化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推动北京历史文化溯源工程,推进琉璃河遗址申遗,实施云居寺塔及石经研究性保护重点工程,以首善标准建设博物馆之城,深化国际交流与文明互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北京文博》由集刊迈向正式期刊,既是自身发展的重要跨越,也是服务新时代首都发展和推动新时代首都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所系。我们将秉持办刊宗旨,立足北京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面向全国、面向世界,聚焦文物保护、考古发现、博物馆建设、文化遗产传承利用等重点领域,努力把期刊建设成为展示首都文博发展、汇聚学术科研成果、传播历史文化知识、凝聚文物保护力量的重要平台。

值此期刊创设之际,我们热忱欢迎国内外专家学者惠赐佳作,分享具有创新性、学术性和建设性的研究成果,共同推动学术进步和首都文博事业发展,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贡献科研力量。

张立新

北京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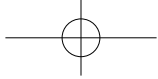


寄语

加强文博基础工作
促进文博科学研究
把北京文博办成北
京文物工作者的学术
阵地

朱熿
九五五月

1995年，北京市文物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朱熿于离休之际寄语《北京文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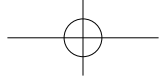
寄语

立足北京，
探源寻脉。
以文博之光，
照古都历史。

朱熿

二〇二六年

2026年，101岁的朱熿同志欣闻期刊创立，再度为《北京文博》创刊号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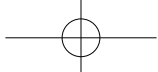
寄语

祝贺北京文博创刊

三千年燕赵照日月
八百载中都续春秋

丙午年夏月 齐心

90岁文博专家、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长齐心为《北京文博》创刊号题词



寄语

新刊《北京文博》——书写北京文博事业发展新图景

祝愿新刊《北京文博》，在紧密围绕首都文化中心建设、发布党和国家文物方针政策、刊载北京文博工作前沿研究成果、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作出新的历史性贡献！

孔繁峙

北京市文物局原党组书记、局长

祝贺《北京文博》杂志发行。杂志的出版，对于宣传和推动北京文博事业的成就和发展，将会起到很大作用。祝杂志越办越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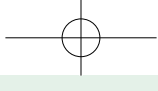
马希桂

首都博物馆原馆长

祝《北京文博》在新的起点上，以专业立刊，以文化聚力，为弘扬首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作出更大的贡献。

赵福生

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特稿

追本溯源，寻根究底 ——从北京建城 3040 年说起

Tracing Origins and Uncovering Roots: Commemorating the 3040 th Anniversary of Beijing's Founding

侯仁之

Hou Renzhi

事有源，物有本。追本溯源，寻根究底，从而引发了人类文化继往开来的灿烂光辉。

今年北京正在进行建城3040年的纪念活动。作为举世瞩目的历史文化名城，这就是一个令人深感兴趣的问题。

《礼记·乐记》有明文记载说：“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史记·周本纪》也有记载：“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帝尧之后于蓟。”或称“黄帝之后”、或称“帝尧之后”，说辞不一，而所指都属“先圣王”之后，以有别于当时的异族。至于蓟之得名，则来源于“蓟丘”。最早说明这一事实的，乃是北魏时代的地理学家酈道元。他在其名著《水经注》一书中说：“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这段记载，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明确指出蓟丘在“今城内西北隅”，当是身临其境、目验为证的描述。第二，以鲁之初封在曲阜和齐之初封在营丘为例，进一步说明古代平原上的城邑，每以一处名曰“阜”或“丘”的高地，作为建城的依据。这一地理特点的说明至为重要，显示了酈道元作为我国古代杰出的地理学家是有其独到之处的。不仅如此，酈道元还曾进一步根据他所见到的蓟城近郊的一个湖泊，作了如下的描述：

湖有二源，水俱出县西北，平地导源流注西湖。湖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盖燕之旧池也。绿水澄澹，川亭望远，亦为游瞩之胜所也。湖水东流为洗马沟，侧城南门东注。其水又东入漂水。

从地理上来看，这段描写更加值得注意。酈道元所看到的这个自古以来的天然湖泊，因为地处蓟城西北郊外，所以又称西湖。西湖的下游有一条小河东流，叫作洗马沟。洗马沟的下游又紧傍蓟城南门外南流，下注漂水，也就是当时永定河的古道。

酈道元的这段记述，为我们追本溯源探求古代北京城址的变迁，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依据。可惜的是他所见到的蓟城南门以及城内西北隅的蓟丘，都已荡然无存。可是他所记述的西湖与洗马沟中上游的一段河道，却保留下来。这就是今天广安门外的莲花池与莲花河。只是莲花池年久淤积已经缩小，莲花河的下游已经改道。可是经过考古学家的实地勘探，已经在古老的蓟城故址上，把最后兴建起来的最大的一座大城，予以复原，这就是北京城建都之始的金朝中都城。中都城的兴建，从东西南三面扩大了旧日的城址，有计划地把莲花河的中游圈入城中，并且开渠引水，在宫城的西墙外，开辟了一处风景佳丽的皇家园林，根据历史的传统，取外太液池，也叫同乐园。然后又从太液池开渠引水东入宫城，汇为小湖，取名鱼藻池。至于莲花河的下



游，则绕经宫城的南门外，转向东南，穿过城下水闸，流出城外。

沿流溯源，寻根至此，这就为今天北京城的规划建设，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来龙去脉。例如为纪念北京建城3040年而落成的“辽金城垣博物馆”，就是在上述水闸的遗址上兴建起来的。这座博物馆的命名，辽金并称，因为金朝中都城的直接前身，就是辽朝的南京城，不过其城址远较金城为小。过去习惯上总是把辽南京城作为北京建都之始，号称辽金元明清五朝建都之地，实际上辽南京城只是一个陪都而已，不过其过渡性的意义也是不可忽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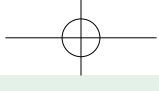
至于金中都宫城之内的鱼藻池，残留至今，曾被改称青年湖，现在也正在开发为一个有历史意义的风景点。然而更重要的是正在大规模兴建中、并将于年内完工的北京现代化的铁路交通枢纽——

西客站。这西客站的选址，经过地理特点的考虑，最后就确定在莲花池的东北岸边。如果善加规划，可望为莲花池取得更为丰沛的水源，并进一步开发其水上风光。这既有利于西客站附近的自然美景，又大有益于附近地区小气候的改善。还希望号称“再造京门”的这一重大工程，将有利于促进莲花河沿河地区的重新规划和建设，因为这一地区现在已经完全包括在西南三环路以内，也就是北京城最早兴起的地方。

以上就是从北京城的“寻根”所引发出来的对于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种未来的憧憬和殷切的希望。

1995年5月15日于北京大学燕南园

转载于《寻根》杂志1995年第5期



历史回响与时代新篇

——从琉璃河遗址谈起

Historical Echoes and New Chapters of the Era: Insights from the Liulihe Site

齐心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 (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Qi Xin [Beijing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Beijing Institute of Cultural Heritage)]

摘要：文章回顾了1995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确定北京建城时间的相关情况，琉璃河遗址发掘以来数十年的考古历程，以及该遗址重要出土文物在增强民族自豪感、推动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琉璃河遗址 西周燕都 北京建城

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识码：**B

Abstract : It recounts the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the 1995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ymposium that determined the founding date of Beijing, the decades-long archaeological process since the excavation of the Liulihe Site began, and the irreplaceable role of significant artifacts unearthed at the site in enhancing national pride and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Keywords : Liulihe Site; Yan Capital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Founding of Beij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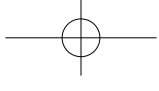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近年来，琉璃河燕都遗址的考古工作也快速发展，成果迭出；科学的发现与发掘使考古工作未来可期，琉璃河燕都遗址在北京经济、文化和城市建设发展中越来越重要。

—

北京建城时间是严谨的科学问题，为此，1995年，北京举办了“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

术研讨会”。有一百多名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汇集了天文、地理、历史、气象学多方面专家，有国内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专家学者，还有英国牛津大学罗森、美国芝加哥大学夏含夷、日本池田末利等国际知名学者。经与会者综合分析，细致考证，相互对照，权威严谨地确定了北京建城的准确年份。根据史籍记载的天象和天文科学分析，《史记》记载周武王十一年灭纣，封召公奭于北燕。史料又载武王伐纣时有哈雷彗星出现。按彗星76年出现一次规律推算，确认武王十一年即公元前1045年，即封燕之年。据2022年正式发布的最新成果《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周武王伐纣之年为公元前1046年，与1995年的推断相差一年。

2021年，考古发现进一步证明燕都建城的历史，新发现的青铜卣的器盖内壁和器身内底部铸有



相同的铭文：“太保墉匱，延宛匱侯宮，太保賜作册奭貝……”大意为，太保在匱筑城，随后在匱侯宮进行宴飨，并赏赐作册奭貝。“太保”即“召公”，由此可知召公亲自来过琉璃河遗址，并在此筑城。铭文实证了北京3000余年的建城史，在世界城市史研究上具有独特价值。通过碳-14测年，也测出了出土“太保墉匱”铭文铜器的M1902号墓葬年代最大概率区间为公元前1045年至公元前1010年，为北京3000多年建城史提供了确凿的科学依据。

琉璃河畔，肇始了华夏北疆雄都。这里承载着厚重历史文化的遗址，它不仅是北京城市文明的源头，也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博大精深的生动见证。3000多年前燕召公和他的子孙在此筑城立国，燕都的巍峨城垣自此崛起于华北平原，成为周室屏藩、北疆重镇。青铜器上镌刻的铭文斑驳如史册，燕都遗址的夯土层叠似年轮，诉说着这座城市从方国都邑到天下中枢的壮阔历程。

二

琉璃河遗址的发现充满了传奇色彩。1945年，中国银行经理吴良才在前往琉璃河水泥厂商谈贷款事宜途中，偶然发现董家林村地面上散落的大量陶片。出于对考古的浓厚兴趣，他将这些陶片收集起来，交给了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的苏秉琦先生，琉璃河遗址的神秘一角由此被揭开。

1962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学生与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合作在刘李店、董家林等地试掘，并发表了琉璃河遗址首篇考古调查简报，正式提出董家林遗址为西周遗址的认识。此后，从20世纪70年代起，琉璃河遗址迎来了多次大规模考古发掘。1973—1977年，北京市文物管理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房山县共同组建的琉璃河考古队，发掘了西周墓葬61座、车马坑5座，根据出土铜器等证据，基本确定琉璃河遗址为西周早期燕都的性质。19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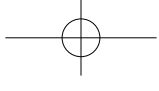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1986年，考古队进一步发掘了300余座西周墓葬与车马坑，对墓葬进行了更细致的分期。

1986年11月29日，琉璃河遗址在M1193号大墓发现两件完整青铜器——铜鬲和铜盃。这两件器物内壁和器盖上的43字铭文，讲述了“燕”国最早的由来，其中“令克侯于匱”成为打开遗址历史的钥匙。这两件珍贵的文物，即“克鬲”和“克盃”，被列为国宝级文物，它们的发现确凿地证实了琉璃河遗址为西周燕国的始封地，也将北京建城的历史推至西周初年。

2019年以来，在聚落考古和城市考古理念的指导下，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今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联合多家单位重启琉璃河遗址考古工作。此次考古取得了重大突破，首次明确了琉璃河遗址外城墙和外城壕的存在。外城墙位于北城墙以北约350米处，与内城北城墙方向一致；外城壕北段位于外城墙以北三至五米开外，东段折向东南。根据外城壕位置推测，城址规模可达百万平方米。碳-14测年显示，外城壕使用于西周早期，西周中期前被废弃。外城的发现，突破了对西周燕都城市复杂性的传统认知，为探索早期国家形态与都城制度提供了关键线索。

从出土的大量文物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燕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带有“匱侯”铭文的青铜器，不仅展示了燕国贵族的身份和地位，也反映了当时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这些青铜器上的纹饰和造型，融合了中原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元素，体现了燕国在文化融合方面的积极探索。此外，琉璃河遗址还出土了众多精美的陶器、玉器、骨器等，这些文物从不同角度展现了燕国的社会生活、经济发展和宗教信仰，为研究西周时期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琉璃河遗址已经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随着对琉璃河遗址研究的不断深入，燕国文化研究逐步发展，近年来取得了多项成果。这



些成果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于燕国历史文化的认识，也为北京的城市建设和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和文化支撑。

三

琉璃河遗址作为西周燕国的始封地，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周武王灭商后，实行分封制，封召公奭于北燕。燕国作为周王朝北疆唯一的姬姓诸侯国，肩负着稳定北部边疆、融合多元文化的重要使命。周王朝的礼乐制度和科技文明从中原传至边地，以此实现了华北地区、燕山南北的“华夏化”。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中原地区与东北、蒙古草原等地交流的重要枢纽，在促进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百代兴替，铸就中华文明坐标。从燕都蓟城到幽州要塞，从辽南京、金中都的胡汉交融，到元大都“大汗之城”的万国来朝，北京始终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鲜活见证。明清紫禁城的金瓦映照《永乐大典》的智慧之光，五四运动的呐喊激荡出民族觉醒的春雷。这座城市将“和合”二字写入基因，长城烽燧与运河帆影在此交汇，胡同烟火与殿堂钟鼓在此共鸣。

燕国历经800多年的发展，传承三四十代，曾几度兴衰。在战国时期，燕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其影响力不断扩大。燕国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兴衰荣辱，见证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变迁。琉璃河遗址的发现和研究，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燕国的历史，感受那个时代，3000多年前的北京的风云变幻，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北京从边塞封国到华夏之都，其发展之路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历程的生动写照。琉璃河遗址就是一部华夏文明史。

琉璃河遗址作为北京建城的肇始，其当代价值不可估量。它激发了人们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深刻感受到自己民族历史的悠久和

文化的深厚底蕴。当我们站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看着那些历经千年的城墙遗址、墓葬和文物，仿佛能够穿越时空，回到那个金戈铁马、文化交融的时代，亲身感受燕国的辉煌与沧桑。这种对历史的触摸和感悟，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和平与繁荣，也更加坚定了我们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决心。

在城市建设方面，琉璃河遗址为北京提供了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发展思路。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琉璃河遗址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充分挖掘和利用琉璃河遗址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仅可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还能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琉璃河遗址未来将历史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相结合，既可以宣传历史文化，又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使北京在现代化进程中，既能展现出现代都市的繁华与活力，又能保留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成为一座古今交融、独具魅力的世界城市。

1985年，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应邀参加在华盛顿举办的北京经济贸易展销会。其中的“北京历史文物展”选取约37件历代精品，这是一场意义非凡的文化交流活动。以琉璃河遗址硕大的莒鼎、精美的伯矩鬲为主的燕国文物远赴美国展览，让琉璃河遗址出土的燕国文物登上了国际舞台。这个展览会如同一座桥梁，架起了中美文化交流的通道。一件件珍贵的文物，如同一个个带着远古余音的使者，讲述着源远流长的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众多美国民众和学者被中国古代文物的精美和深厚文化内涵所吸引。他们通过这些文物，直观地感受到了中国3000多年前的高超工艺水平和独特文化魅力。展出文物中的青铜器、玉器、陶器、城砖等，每一件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艺术价值。青铜器上精美的纹饰、复杂的造型，展现了西周时期青铜铸造工艺的巅峰水准；玉器的温润光泽和细腻雕刻，体现了中国古代对玉石文化的崇尚和精湛技艺；陶器则以其质朴

的风格和独特的器型，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审美情趣。展览受到参观者的高度赞赏，纷纷驻足留影，赞叹北京历史的悠久。华盛顿市市长出席并致辞，华盛顿邮报报道了展览的盛况。

燕都遗址出土文物多次参展重大文化活动，促进了文化交流，让世界对中国古代文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它向世界证明，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

2025年5月，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在视察北京琉璃河遗址时指出，琉璃河遗址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要坚持考古先行，加快遗址博物馆新馆、考古工作站建设，高标准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完善交通规划组织。要做好琉璃河遗址申遗前期工作，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琉璃河遗址又开启了考古、保护、建设的新篇章。

纪念北京建城，其意义不仅在于对燕国历史文化的一次追溯与回望，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次传承和弘扬。让更多的人了解琉璃河遗址，

了解燕国历史，了解古都北京3000多年的辉煌与壮阔，让古老的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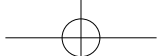
从西周燕都到人民首都，3000多年的年轮里沉淀着中华文明最深邃的密码，古都的文化赋能民族复兴。青铜器铭刻“克商受命”，今日的我们一定会不辱使命，不负韶华，书写人类文明新篇章。让我们以“堇鼎”为樽，斟满三千年的月光，敬这座永远年轻的城市：燕山托日月，疏河放光辉。

城之源颂

燕都三千载，悠悠岁月长。
疏河寻旧迹，遗址诉沧桑。
召公封国立，燕地起华章。
城垣绵延远，探方现铜光。
车马坑中卧，鼎彝映冷霜。
铭文说正史，先辈永流芳。

文化传千古，研读绽新香。
兴衰多少事，世代话永昌。
煌煌三千载，豪情共举觞。
新人辈辈出，华夏谱新章。

齐心写于2025年8月



古都城市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伟大变革 ——实施“老城整体保护”的重大意义

**The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apitals:
The Significance of Implementing “Holistic Conservation of the Old City”**

孔繁峙 (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

Kong Fanzhi (Beijing Culture Relics Protection Associ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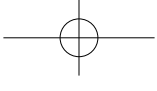
摘要: 老城整体保护,是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视察北京作出的重要指示,特别是实施的建新城、保老城等一系列举措,彻底解决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存在的首都城市建设与老城保护之间的矛盾,为老城整体保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使首都城市的发展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深入探讨并全面准确把握老城整体保护的涵义及目标任务,客观认识并准确判断在落实老城整体保护过程中所面临的难点问题,以新的价值观念推进老城整体保护的落实,是当前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年—2035年)》从构成老城整体价值的宏观角度,制定了保护老城历史格局、传统空间等多项详细的保护内容,是全面落实老城整体保护的重要措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要凸显北京历史文化的整体价值,强化‘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的城市特色”。

关键词: 老城整体保护 首都城市发展 北京老城 北京历史文化

中图分类号: TU984.114 **文献标识码:** A

Abstract : The comprehensive preservation of the old city represents a major historic decision made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during his inspection of Beijing in 2014. In particular, the implementation of measures such as developing new urban areas while preserving the old city has fully resolved the long-standing conflict between capital urban construction and old city preservation that existed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s has provided unprecedented historical opportunities for intact old city preservation and has significantly transformed the capital's urban development model. A critical task for current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development is to conduct in-depth exploration and achieve a comprehensive and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ecise meaning and objectives of old city preservation, to objectively recognize and accurately assess the challenges posed in implementing old city preservation, and to adva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old city preservation through new value concepts. “The Regulatory Detailed Plan for the Core Functional Zone of the Capital (Block Level) (2018–2035)” formulates numerous detailed protection measures, including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historical layout and traditional spatial patterns of the old city,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that constitutes the overall value of the old city. This plan represents a crucial measure for comprehensively implementing the holistic protection of the old cit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pointed out that “Beijing is a world-renowned ancient capital, and its ric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is a golden calling card”, “It is essential to highlight the overall value of Beijing's history and culture, thereby strengthening the city's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capital elegance, ancient capital charm, and contemporary style’”.

Keywords : Holistic Conservation of the Old City; Capital City Development; Beijing Old City; Beijing History and Culture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并作出老城整体保护的历史性重要指示，彻底改变了长期以来北京老城的发展方式，实现了从开发建设向全面保护的转变，使古老的北京城从此走向保护传承的发展轨道。

一、实施“老城整体保护”决策的历史背景

具有3000多年建城史和870多年建都史的北京，是我国古代城市历史发展的集大成者。北京老城规划理念严格遵循《周礼·考工记》的都城规制，与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秦咸阳城、汉长安城、隋唐长安城、北宋汴梁城都有着文化上的传承关系。整座城市的规划布局处处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与精深，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精神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完美结合。其城市整体规划气势恢宏、整齐对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和谐之美，具有无与伦比的文化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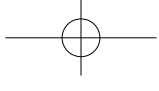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特殊国情决定了首都城市发展的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北京作为国家首都的确立，为古老的北京城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但同时也产生了首都城市如何建设和古都城市如何延续的新问题，就在首都城市如何发展的关键时刻，梁思成先生首先发出了保护老城的呼声，提出了老城保护利用的方案，引起了社会关注，这也是老城保护的一次历史性机遇。从现在看，当年没有采纳梁先生的方案，并不是方案本身不好，只是当年没有实现的条件。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面临着一穷二白、百废待兴、民生艰难的局面和国外封锁的国际环境，在国家经济和物质条件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不可能拿出巨额资金和巨大的人力、财力为保护老城而另建一座新城，只能是利用现有条件对原有老城进行改造和利用，这种方式是由当时特殊的国情决定的。尽管受到当时国内条件和国际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当年梁思成的方案没有实

施，但他对老城的保护利用方式却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使公众了解了古城的历史文化价值；他的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老城历史文化保护理论，极大提升了公众对老城保护的认识，由此拉开了新中国首都城市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和老城保护的时代序幕。在以后多年开展的城市大型工程建设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来自社会各界保护老城和保护古都传统文化的呼声。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确立，开启了老城保护与发展的新时代。1982年国务院公布北京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决定，首次明确了北京老城的文化性质，彻底改变了老城的文化属性、城市功能及发展目标，使老城从被改造、使用的旧城，转变为要加以保护及传承的历史文化名城，极大提升了老城的文化价值和保护价值。1982年以来历次的《北京市总体规划》及2002年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都将老城保护放在核心位置，并制定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在文化遗产保护上，北京市开展并完成了三次文物普查，确定了老城内要保存的四合院、名人故居、会馆等历史文化资源共有11类，各类文物保护单位多达千余处，极大丰富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内涵^①。

为使首都城市建设发展与名城保护的古都风貌相协调，自1982年以来，北京市制定了一系列名城保护措施，如制定公布了名城保护的建筑高度控制方案，确定了老城内不同区域的建筑高度，规定以故宫和中轴线为中心，皇城东西两侧向外延伸的建筑高度分别从6米、12米、18米、24米阶梯式增高，到老城边缘城墙内侧是45米的建筑高度，力图在城市建设中尽可能地保护好古都传统风貌。

为处理好首都城市建设、老城改造与名城保护的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各区政府部门主导的危旧房改造工程，在老城内的各类居民生活区域，曾先后探索实施过“危房改造模式”“老城有机更新模式”“危改带开发模式”等改善人居生



活环境的老城改造工程，努力探索首都城市发展与老城保护利用的有机融合。

北京老城保护在城市现代化建设和城市更新改造过程中面临多重挑战。一方面，新建大型建筑、商业设施和交通干道的现代化建设，使老城传统格局、城市肌理的完整性受到影响；另一方面，老城长期存在建筑老化、基础设施不足、生活配套欠缺、道路难以适应现代交通等问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老旧房屋改造使传统街巷和历史风貌发生改变。

此外，胡同四合院作为北京老城历史文化价值和城市记忆的重要载体，虽然保存较为集中，但也面临年久失修、结构老化以及人口增加导致的私搭乱建等现实困境；在危房改造和房地产开发推动下，部分历史街区被改建为现代楼房小区。据统计，截至2007年，北京老城住宅总面积约2450万平方米，其中12～30米高的住宅面积约1036万平方米，占总建筑面积的42%，其余则以1～3层的低层住宅为主。在老城内，12～30米高的居住用地已经占总居住用地面积的27%^②，这反映出老城空间形态在现代居住建设中发生了变化与更新。因此，北京老城的发展变迁需要在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完善城市功能与延续历史格局之间寻求协调与审慎的平衡路径。

二、老城整体保护的重大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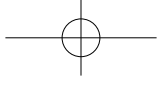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并对老城整体保护作出重要指示，使首都城市的发展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由此开展的一系列疏解城市功能、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重大举措，特别是建新城、保老城的实施，对新形势下首都城市的建设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老城整体保护的实施，终结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延续至今的北京老城保护与建设的历史争议。关于老城如何建设、如何保护以及如何处理建设与保

护的关系这项课题，堪称提出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社会参与度最高的研究探讨课题，贯穿于首都城市建设发展的整个过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至2014年，相关争论长达65年。因此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老城保护与发展的理论探索，也是一场难分高下的保护与建设的论战。直至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视察北京以后，才有了最终的结论，明确要实施老城整体保护。现在我们总结以往老城建设与保护的整个过程，既是对历史的回顾，也是对名城保护学术理论的反思。如果把这段长达60多年的历程作为这项课题的一个完整过程来审视的话，那么老城保护与建设这一课题的开篇，无疑是当年梁思成先生提出的北京城保护利用方案；而课题的终结则是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为老城保护与建设这一跨世纪的课题作出了历史性结论，使老城的发展方向最终回到了保护的轨道，并从此开启了一个新的老城保护发展方式。

老城整体保护的实施，开辟了首都城市建设与老城整体保护发展的千年大计。习近平总书记作出老城整体保护的重要指示，彻底消除了建设与保护这一长期存在的矛盾，重新确立了首都城市的发展方式，实施了新城建设与老城保护不同区域发展的新模式。今后新城将体现城市建设，展现首都城市的高度现代化；而老城将体现城市保护，展示古都城市的传统文化特色。因此我们说实施老城整体保护，是首都发展和名城保护的千年大计，具有里程碑意义。

老城整体保护的实施，延续了中华传承的千年文脉。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作出老城整体保护的重要指示，是因为老城不但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具有无与伦比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而且北京还代表了民族文化的延续与传承。北京老城就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如果老城不在了，没了载体，那么延续多年的民族传统就会中断，文化就失去了传承，整个中华文化也将黯然失色。可以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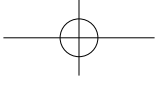
想，假如埃及失去了金字塔，那么会怎样？那国家的历史将被腰斩，民族的辉煌将失去支撑，整个国家也将失去世界的看点，后果不堪设想，值得深思警醒。由此可见，一个历史城市的消失，就意味着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中断，我们保护老城的意义就在于此。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老城整体保护的重要指示，彻底消除了现代城市建设对老城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冲击，确立了新形势下首都城市的老城保护与新城建设的发展方式。

实施老城整体保护，需要全面、完整、准确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时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站位很高，尤其是对北京老城保护的讲话非常深刻。其中关于历史文化的阐述，突破了文物保护利用多年形成的传统观念，超越了以往对古都文化的认识高度，讲话的历史观点与境界，也彻底刷新了专业人员对老城历史文化价值的认识程度。而且是首次从民族文化遗产的高度来阐释保护老城传统文化的重大意义，尤其是对老城整体保护的指示，终止了对老城的拆除及老城内新的建设工程，彻底扭转了多年以来对老城改造建设的发展方式，使老城的文化传统和古都特色得以延续。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老城整体保护作出的重要指示。首先要正确理解老城整体保护的准确含义。当前，在对老城整体保护的准确理解上，存在不同的认识和观点：一是认为老城整体保护的“整体”，应是保护老城建设现状的整体，保护目前新北京和老城共存的整体；二是认为老城整体保护的“整体”，应是保护历史上原有老城的“整体”；三是认为老城整体保护的“整体”，就是保护具有当今新北京功能和古都历史格局的老城整体。而在保护方式上，也存在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全市实施的北京历史名城的保护方式，可以代替老城整体保护，因为老城是名城的一部分，名城保护的核心内容就是对老城的保护；还有人认为实施的北京名城保护

就等同于老城整体保护，认为保护名城就是保护老城等不同观点。我们应该看到，名城保护同老城保护是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同的含义。历史名城保护总体要求包含：保护、使用、建设和发展等综合性内容，名城保护早在1982年就开始在全国实施。而老城整体保护，是在历史名城保护实施了30年后的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老城保护所作出的重要指示。可以看出北京老城整体保护是有特定含义的，具有与名城保护不同和更为严格的内在要求。因此名城保护不能替代老城整体保护，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老城整体保护重要指示，就是新形势下超越北京名城保护的更高层次的保护形式。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老城整体保护重要指示，是今后全市发展的新任务与新目标，要求我们对以往的认识和观念要实现一个现代化转换，树立一个新的老城保护的价值标准。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城市一定会有不同程度的时代变化。在此前提下，对老城整体保护正确理解应是，既不是对老城现状的全面保留，也不是原样恢复历史上的北京城，而是重构老城的历史特色，恢复构成老城核心内容的传统要素。北京老城体现的是一套完整的古都城市历史价值体系，老城的建筑布局、空间结构、景观色调和市井民俗都从不同角度共同体现古都历史文化的整体性。其中完整的城市历史格局只是价值体系的一部分，尽管其承载并延续了古都历史文化的重要内涵和信息，是不可缺少的，但并不是唯一的，而是由古都城市多种历史元素构成。这样我们对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老城整体保护重要指示的正确理解应是保护和恢复构成古都城市的历史价值体系和古都传统的核心内容。因此，实施老城整体保护，是一项比历史名城保护更为艰巨的系统性工程。特别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北京城已经不是历史上完整的老城，而是一座在老城基础上建设了60多年的传统与现代并存的首都城市“新北京”，原



有的历史城市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这样一座现代首都城市与历史古都城市并存的城市环境下实施老城整体保护，面临诸多问题。

北京老城保护面临城市更新发展和传统风貌延续方面的挑战。近现代以来的城市建设，已使传统意义上的城墙、城门、牌楼、传统商业店铺等代表性历史建筑和空间标志逐步减少。随着现代建筑规模不断扩大，老城内现代建筑面积已超过历史传统建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老城原有的历史景观。因此，如何在现代城市发展中保留老城可识别的城市肌理、历史格局、文化标志和传统风貌，已成为整体保护工作中需要重点协调的问题。

三、实施老城整体保护的主要措施

2020年国务院正式批复的《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年—2035年)》(以下简称《核心区控规》)^③，明确规定了老城整体保护的重点是，从宏观上保护好老城传统的历史格局、空间形态、景观视廊、城市风貌以及古都特有的平缓开阔、壮美有序、古今交融、庄重大气的整体风貌特色。

(一)《核心区控规》规定的老城整体保护措施

保护老城承载传统营城理念的历史传统格局，其中两轴统领、四重城廓、六海八水、九坛八庙、棋盘路网是老城空间格局的重要特征，是构成老城整体形态的重要载体，加强格局保护是老城整体保护最首要的任务。

保护老城平缓开阔的整体传统空间形态，平缓开阔的空间形态是北京老城的另一重要传统特征，通过加强城市建筑高度管控，维持老城整体空间形态特征，要对核心区实施最严格的建筑高度管控，详细划定原貌、多层、中高层三类建筑高度管控分区，整体营造平缓开阔的城市空间形态，烘托中轴

线、长安街对老城整体空间秩序的统领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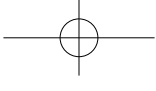
保护老城承载历史意境的传统景观视廊。营造和恢复老城传统特色景观视廊，保护多维感知城市的景观意象。围绕看城市、看山水、看历史、看风景主题，划定36条战略级景观视廊并对视廊内建筑体量、建筑高度、第五立面等实施综合管控，形成眺望视线通畅、观赏对象清晰的景观效果，营造与自然山水和谐相融、与历史文化交相辉映、具有高度可识别性的城市景观形态。

保护构成老城风貌基调的传统古都风韵。通过加强对老城建筑风貌、街巷风貌管控，高水平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恢复和保持老城核心区古都风韵的传统基调，划定古都风貌保护区、古都风貌协调区和现代风貌控制区三类风貌区，分区实施对建筑风貌与街巷风貌的差异化管控与引导，充分体现对传统风貌的保护与尊重，形成古今交融、庄重大气的整体风貌。

为全面落实老城整体保护，《核心区控规》确定了多项保护措施：

(1)严格落实“老城不能再拆”的要求。以更严格的措施、更常态化的制度落实老城不能再拆的要求，实现应保尽保，最大限度留住老城的历史印迹。

(2)不断扩展老城传统建筑的保护类型和保护内容。《核心区控规》在城市总体规划提出的世界文化遗产、不可移动文物、历史文化街区、特色地区、地下文物埋藏区、历史建筑等九类文化遗产保护对象基础上，突出核心区文化遗产特色，将传统胡同、历史街巷、传统地名、历史名园、革命史迹、老字号等纳入核心区保护对象，以更加完整地诠释老城核心价值。进一步明确了核心区内保护对象包括：世界文化遗产；国家级、市级、区级三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尚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地下文物埋藏区；历史建筑(含优秀近现代建筑、挂牌保护院落、名人旧居、工业遗产等)；历史文化街区和特色地区；传统胡同、历史街巷和



传统地名；历史河湖水系和水文化遗产；城址遗存；历史名园和古树名木；革命史迹；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多达11类老城保护内容。

(3) 持续扩大老城传统区域的保护面积。在北京市政府公布的三批历史文化街区的基础上，通过风貌协调区提级、已有历史文化街区扩片、其他成片传统平房区增补的方式扩大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最大限度地保护具有一定历史价值的成片区域，持续扩大老城内整体保护区域占比。历史文化街区占核心区总面积的比重由现状22%提高到26%左右，即占老城面积的38%左右，以增加和扩展老城保护的面积。

(4) 建立老城文化遗产项目登录制度。通过保护好老城的各类历史文化资源，加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全面普查，鼓励主动申报与社会推荐，建立健全遗产登录保护的常态化机制。通过普查挖掘潜在历史资源，规范并完善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等历史文化遗产的认定标准与审查程序，分批公布遗产名录，并制定配套保护管理办法。

(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规定的老城整体保护重点工作

2017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明确规定了落实老城整体保护的十项重点工作^④，要着重保护老城中轴线、明清北京城“凸”字形城廓、明清皇城、历史河湖水系、老城原有棋盘式道路网骨架和街巷胡同格局、胡同四合院传统建筑形态、分区严格控制建筑高度、景观视廊和街道对景、传统建筑色彩和形态特征以及古树名木。

(1) 构建完整的中轴线保护体系。中轴线贯穿北京老城并串联着外城、内城、皇城和宫城，成为北京城市发展中最重要基准。要保护好构成中轴线人类文化遗产的价值要素和物质载体；要保护好中轴线的真实性与完整性，要构建完整的中轴线保护体系，认真落实中轴线核心遗产区和建控区的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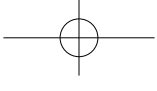
护规定，在保护好核心遗产点的同时，更要保护好中轴线周边更大范围内轴线对称的城市传统格局；保护好以中轴线走向为基础而规划形成的严整城市道路和平缓开阔的城市空间；保护好中轴线周边划定的大范围的风貌缓冲区，以保护和体现中轴线周边城市环境的完整性与真实性。

(2) 保护明清北京城“凸”字形城廓。明清北京城“凸”字形城廓，是北京老城的重要标志和老城的外层轮廓，也是老城整体保护的界限和范围，保护和展示现存的城墙残迹、城墙遗址和遗迹，采取以城墙残迹、标识和意向性展示等多种方式，保护和展现北京老城“凸”字形城墙轮廓的重要历史文化节点，以彰显北京老城整体保护的外围标识与轮廓，从而达到老城规划布局和城市结构完整性的效果。

(3) 整体保护明清皇城的历史格局。明清皇城是北京老城的核心建筑，也是古都历史城市的建筑精华，代表了中华民族传统建筑的最高水平，是北京老城整体保护的核心内容。要严格执行《北京皇城保护规划》，加大保护和整治力度，完整真实保持以故宫为核心，以皇家宫殿、衙署、坛庙建筑群、皇家园林为主体，以四合院为衬托的历史风貌、规划布局和建筑风格。

(4) 保护并恢复老城传统的河湖水系。历史上的河湖水系，是古都历史城市生活的重要设施和特殊的自然人文景观，由历史上多条河湖形成的“六海映日月，八水绕京华”传统意境，已成为老城重要的历史人文景观。为保护展示古都城市这一特有的文化景观，为市民提供有历史感的滨水开放空间，重点保护和恢复北海、中海、南海、西海、后海、什刹海和通惠河(含玉河)、北护城河、南护城河、筒子河、金水河、前三门护城河、长河、莲花河等老城历史上的“六海、八水”水系及传统空间。

(5) 保护老城传统的道路和街巷格局。老城原有棋盘式道路网骨架和街巷胡同格局，是老城整体



保护的重要内容。城市规划明确规定，老城内严禁建设宽广的现代化市政道路，着重保护老城内1000余条现存胡同的传统形态及胡同名称。实施胡同微空间改善计划，保持和恢复胡同传统特色及有文化内涵的公共空间，恢复具有老北京味的街巷胡同景观。

(6)保护和恢复老城传统的街区建筑形态。由传统胡同四合院构成的历史街区，是老城最具特色的传统建筑 and 历史文化资源，包含着传统居住、传统商业、历史文化、民族风情、近代建筑等多种文化内涵，对老城核心区内具有历史价值的地区，将规划纳入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名单，通过腾退、恢复性修建，做到应保尽保，最大限度地保护和延续胡同四合院的文化价值的历史信息。要将什刹海—南锣鼓巷、雍和宫—国子监、东四南、白塔寺—西四、东交民巷、琉璃厂—大栅栏—前门东等13片具有突出历史和文化价值的重点地段作为文化精华区，强化对历史街区的文化展示与传承。进一步挖掘有文化底蕴、有活力的历史场所，重新唤起对老北京的文化记忆，保持历史文化街区古都城市生活的延续性。

(7)保护老城传统的城市空间。分区域严格控制城市建筑高度，保持老城平缓开阔的传统空间形态，以故宫、皇城、六海为老城传统空间的中心区域，按原貌保护区及低层、多层、中高层三个限制建设分区，严格控制新建建筑高度。历史文化街区和文物按原貌保护区严格控制，风貌协调区和其他成片传统平房区参照原貌保护区要求进行控制，其余区域以多层限制建设区控制为主，东西二环路沿线部分区域按中高层限制建设区控制。

(8)保护老城历史上重要景观视廊和街道对景。其中重点是恢复“银锭观山”景观视廊(2021年已恢复)，保护景山万春亭、北海白塔、正阳门城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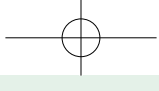
和箭楼、妙应寺白塔、钟鼓楼、德胜门箭楼、天坛祈年殿、永定门等地标建筑之间的景观视廊。保护朝阜路北海大桥东望故宫西北角楼、陟山门街东望景山万春亭等街道对景。严禁在景观视廊和街道对景保护范围内，插建对景观保护有影响的建筑。

(9)保护老城传统建筑色彩和形态特征。恢复和保持老城历史延续的传统色调，以大片青灰色房屋和浓荫绿树为基调，烘托金黄琉璃瓦的皇宫及绿、蓝琉璃瓦的王府、坛庙。新建建筑的形态与色彩应与老城整体风貌相协调。加强老城第五立面管控，以传统坡屋顶形式为主，平屋顶形式的现代建筑应进行平改坡或开展屋顶绿化。

(10)保护老城内的古树名木及大树。保持和延续老城特有的街道胡同绿化和院落绿化，保护古树名木及大树，因地制宜增加绿化空间，突出绿树掩映的传统城市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老城整体保护”的重要指示已经过去十余年了，但这仍然是一个值得社会各界深入研究探索的全新的保护概念，更是一个新形势下推进首都文化中心建设的全新历史文化保护工程。如何在改造建设了60多年的城市上实施老城整体保护，在国内以及国际上没有这方面的借鉴，更没有在一个有“新北京”的老城上如何实施“老城整体保护”的经验，但是中轴线的成功申遗以及实施的文化遗产整体保护管理方式，将为老城整体保护提供重要的依据和有益的借鉴。因中轴线处于整个老城的核心部位，又是老城历史建筑的精华区域和首都城市现代功能的核心区，整个中轴线遗产区域的保护利用方式，可以视为老城保护的缩小版，总结和借鉴中轴线保护利用的成功经验对推动老城整体保护有着重要的意义。

(下转36页)



史地研究

三十余年来（1995—2025）北京建城起源及相关问题研究述评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the Origin and Related Issues of Beijing's Urban Construction over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1995 — 2025)

王新迎(首都博物馆) 郝志群(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Wang Xinying (Capital Museum) Xi Zhiqun (School of History,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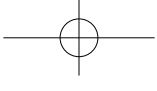
摘要：对北京建城起源的探讨及相关活动主要始于1994年至1995年间，其后遂成为北京史研究的关注热点。目前学界主要存在“蓟城起源说”与“燕都起源说”两种观点，并由此衍生出对建城年代的三种不同认识：分别以西周分封蓟国、召公封燕年代为建城之始，以及建城早于西周蓟、燕分封。在早期蓟城方位研究中，因缺乏春秋战国以前的考古实证，研究多集中于北京老城西南及石景山古城等区域的推测。与此同时，琉璃河遗址的考古发现为燕国始封都城提供了重要实证，推动对其性质、营建布局及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多角度研究。本文主要针对1995年至2025年间有关北京建城起源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进行梳理并提出三点初步思考，强调应回归西周背景，厘清“建城”概念，辨析“褒封”与“封”的实质，并区分城区肇始与建城肇端，以深化对北京早期城市起源的认识。

关键词：北京建城起源 西周分封 蓟城 燕都 琉璃河遗址

中图分类号：K 291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 Discussions and related research on the origins of early urban formation can be traced back to 1994 and 1995 and have since become a key focus in the study of Beijing's history. Currentl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olds two main viewpoints: the "Ji City Origin Theory" and the "Yan Capital Origin Theory". These have further led to thre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the city's founding era: taking the enfeoffments of the Ji State, the enfeoffment of the Yan State by the Duke of Shao during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urban construction, or urban construction preceding the Western Zhou enfeoffments of both Ji and Yan. In the study of the location of early Ji City, due to a lack of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predat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s, research has largely focused on conjectures regarding areas such as the southwest of Beijing's old city and the ancient city in Shijingshan. Meanwhil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t the Liulihe Site have provided crucial evidence for the initial enfeoffed capital of the Yan State, promoting research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on its nature, construction layout, and social culture. This paper mainly sorts out the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Beijing's city construction and related issues from 1995 to 2025, and proposes three preliminary considerations which emphasizes the need to return to the Western Zhou context, clarify the concept of "urban construction", distinguish the essence of "baofeng (commendatory enfeoffment)" and "feng (enfeoffment)", and differentiate between the origin of urban areas and the origin of urban construction, so a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arly urban origins of Beijing.

Keywords : Origin of Beijing's Urban Construction; Western Zhou Enfeoffments; Ji City; Yan Capital; Liulihe Site



1994年11月25日，史学界、文物界、考古界专家侯仁之、赵光贤、单士元、张亚初、齐心、王巍等专家教授齐聚房山论证北京建城年代^①，专家们结合房山区琉璃河发掘出土的西周墓葬、古代遗址及青铜器的铭文，并借助天文科学以及史籍记载的天象为依据，从哈雷彗星出现的客观规律进行科学分析确认青铜器铭文记载的燕始封之年——武王十一年，即公元前1045年，这一年也是蓟的始封之年。以此推算，1995年为北京建城3040年。关于北京城始建是“建城”“建成”“建立”或“建都”的几种提法，经专家们论证后认为，采用“建城”的说法更为确切^②。1995年1月，北京市政府依据上述专家学者的意见，将北京建城定为3040周年，随后隆重举行了一系列大型纪念活动。8月21日，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举行开馆仪式，同时“纪念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就北京的建城年代和地点，燕文化的起源、内涵、特点、范围、文化重心点和研究的理论方法以及燕国史的有关问题展开研讨。12月，宣武区（现为西城区）人民政府在广安门立交桥东北侧的滨河公园内设立“蓟城纪念柱”，纪念柱正面上方镌有柱铭：“北京城区，肇始斯地。其时惟周，其名曰蓟。”柱前立有石碑，正面为侯仁之所撰《北京建城记》。

1995年至今，三十余年间关于北京建城起源的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涉及考古发现、历史文献、地理环境等多学科及交叉研究，可谓观点出新，成果颇丰，值得做一阶段性的回顾与梳理，以期对今后北京建城起源及相关问题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北京建城起源的不同观点

关于北京建城起源，目前学界基于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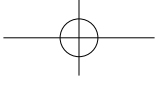
（一）蓟城起源说

以历史地理学研究者为主，如侯仁之、韩光辉、唐晓峰、朱祖希、孙冬虎等，基于文献记载考证，认为北京城的起源为蓟城，不能因考古发掘未能发现其代表性遗址和文化遗物而否定早期蓟城的存在。

首先提出此观点的是侯仁之先生，他着重分析了古代蓟城的地理特征，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武王伐纣分封的蓟、燕诸侯国，它们完全具备了城市的功能，因此可以认为是建城的开始。蓟国在北京的原始聚落上建立，其位置应在今广安门以西至莲花池之间。燕国在蓟国附近，大约在西周末季或东周初年燕国兼并了蓟国，并且迁都到蓟城。蓟是北京最初见于记载的名称，“现在的北京以蓟为最初的起点”^③。

不少学者分析了蓟、燕的关系，从蓟国、燕国空间位置和燕都蓟城的继承关系的角度提出，北京城的起源更应该是蓟城而非燕都（琉璃河遗址）。

唐晓峰认为周初在今北京地区分封蓟、燕二国，蓟在北，燕在南，两国各自建有都城，北京地区城市发展的历史即由此二城开始，“蓟城是北京城市历史地理本质的代表者，是严格意义的今北京城的前身”^④。韩光辉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燕都蓟城是古代蓟国都城蓟的延续与发展，而不是燕都燕城即琉璃河古城的延续和发展^⑤。孙冬虎认为“1962年在董家林发现了西周时期的燕都遗址，但北京城的起源只能从被燕国‘鸠占鹊巢’的蓟城算起”^⑥。2024年，孙冬虎又连续发表两篇文章，从学理、事理和历史逻辑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以往观点^⑦。王光镐认为，蓟、燕两个封国的建立，代表了北京建城史的开始，但是“无论是时间、空间还是发展脉络，召公奭的琉璃河古燕都和‘黄帝后人’的‘蓟’都不可同日而语，而事关北京城起源的，只有一个‘蓟’”^⑧。朱祖希则强调北京肇始乃是永定河畔的蓟城，而不是在琉璃河洪冲积扇平原



上成长的原属于河北省的琉璃河董家林^⑨。

此外,陈平、岳升阳、许伟、谢肃等学者也持相同观点。总之,他们认为蓟城处于北京城历史演变逻辑的最前端,北京城是在蓟城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二)燕都起源说

随着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燕都遗址的发现,许多考察北京城起源问题的学者的注意力遂转移到了这里。随着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的深入,考古方面的学者认为关于蓟城的位置尚未有定论,尤其是春秋战国之前的遗存未曾被发现,西周时期的蓟城在何处尚存疑问。因此,琉璃河遗址是目前已发现的人为规划所形成的北京最早的城市,为北京城之源,官方媒体和一些考古方面的学者持此观点。

1995年《北京日报》曾有多篇有关北京建城3040年的报道,“西周燕都遗址是北京建城3040年的考古发掘地。……后经专家研究与论证,北京地区建城始于三千年前的西周初年,并确认周武王十一年为公元前1045年,因此今年恰逢北京建城3040年”^⑩;“西周燕国都城是北京地区历史上第一座城市,距今已有3000多年”^⑪。在1995年举办的“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齐心也提出:琉璃河遗址为西周燕都已经得到一致看法,把北京建城的历史推到了3000年前的西周初年^⑫。

随着新世纪琉璃河考古的新发现,考古、城市规划 and 遗产管理等方面的学者越来越强调琉璃河遗址对北京建城史的重要意义。

赵福生明确表示,迄今为止北京发现最早的城市遗址就是房山琉璃河地区的西周燕都遗址,燕都城始建于何年也就是北京建城的起源年代^⑬。刘立早认为西周初期周武王对燕国的分封,是北京城市历史发展上的一个重要起点,它标志着北京作

为地域性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形成^⑭。刘健、王晶、汪瑀、王茜、廖正昕等城市规划与考古学者认为从目前已有的考古发现来看,琉璃河遗址是人为规划所形成的北京最早的城市,可称之为北京城市建设原点^⑮。王冬冬等也持此观点,认为琉璃河遗址实证了北京作为西周早期诸侯国的地位,将北京城市史上溯至3000余年前,确定了“北京城市之源”的地位^⑯。郭京宁以最新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为依据在《光明日报》发表题为《琉璃河遗址:这里是最早的北京城实证》的署名文章^⑰。

二、北京建城之始研究

正是基于上述北京建城起源的不同意见,学界对北京建城年代也持有不同观点。

(一)以西周分封蓟国年代为北京建城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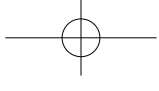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西周分封蓟国在武王伐纣灭商之年,即周武王十一年,但不同学者对此年的公元纪年推断有不同观点。

赵光贤考证这一年为公元前1045年,学界基本认可这一论断,因而侯仁之先生提出蓟城始建于公元前1045年,官方也采用此说法定为北京建城之始,此观点基本为北京史学界所接受。曲英杰则认为黄帝后裔受周武王褒封为周武王十一年“岁在鹑火”,应为公元前1105年,这应为蓟城(北京)建城之始^⑱。而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中,认为公元前1046年为武王克商之年^⑲。

(二)以西周召公封燕年代为北京建城之始

不同学者对召公封燕的年代持有不同意见,一部分认为在周武王时期,一部分认为在周成王时期。

齐心认为周武王十一年灭纣封召公于北燕,采用赵光贤的结论,据此确认北京建城之下限,即



北京建城至迟在公元前1045年^②。但也有学者^③认为武王克殷之后不久便有疾而终，三监之乱时，王子禄父北奔继续叛乱，所以至成王时期，派召公征伐并拓展北疆分封燕国。赵福生认为以夏商周断代工程《夏商周年表》为依据，北京建城的历史应追溯到西周成王元年，即公元前1042年^④，杨玉生^⑤也持此观点。

2025年，最新考古数据通过对琉璃河M1902墓主的骨骼、牙齿样品及墓内各类动植物遗存分别进行取样和碳-14年代测定，计算得到墓葬形成年代的最大概率区间为公元前1045年至公元前1010年，结合墓内随葬青铜器“太保墉燕”的铭文，这一年代结果让我们对燕国始封年代及燕都建城历史的认识更进一步^⑥。

（三）北京建城应早于西周分封蓟、燕

韩光辉不赞同将武王克商封黄帝之后于蓟的年代作为蓟城建城之始的论点，也不赞同至公元1995年为蓟城建城3040年的结论。他认为，蓟城的早期历史至少还应上溯到商代蓟都时期，自古老的蓟都开始，北京建城的历史亦已上溯到3000年前^⑦。

陈平认为武王灭纣与封召公于燕之年并不完全等于北京建城或建都之年。今日北京市范围内在商代早就建成了燕亳与蓟邑两座城，要说建都这两座城也分别是商代燕、蓟两国的都城。召公封燕与召公之子实际代就封于燕可能并不同步，后者可能要滞后到成王初年^⑧。

三、关于早期蓟城方位的相关研究

基于蓟城为北京城起源的认知判断，早期蓟城（春秋战国以前）没有考古实证，它的方位究竟在哪里是个迷踪，学术界一直孜孜不倦地从各种蛛丝马迹上作出推测，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北京老城西南区域

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推测早期蓟城大体位置在今天北京老城西南区域，细分之下也有各自的不同见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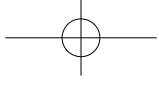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以侯仁之、尹钧科、岳升阳、邓辉等历史地理学者为主，认为早期蓟城的位置与永定河上古渡口有关。他们从复原3000多年前北京小平原上的地理条件入手，从南北往来的交通道路形势着眼，揭示了古永定河上以卢沟桥所处位置为代表的古渡口与北京城原始聚落——蓟城的形成关系极大。北京城的最早前身蓟城位于蓟丘之下，在今日北京城区的西南广安门附近。因为这里地势较高可避洪水，西南距永定河渡口仅30里，附近又有西湖（今莲花池前身）作为水源，具备建立大型居民点的优越条件^⑨。但后来的考古挖掘证明白云观一带古城遗址的年代晚于东汉。

于德源、富丽等并不认同蓟城产生的地理条件是永定河古渡口的观点，他们认为原始的城市应该是由最初的原始聚落中产生，应该是位于河流沿岸、大山之下，“新石器时代的原始蓟城应该位于今北京东部包括平谷区在内的沟河流域一带；而商、西周早期的蓟城应该位于今北京西部、永定河以东一带”^⑩。

随着宣武门、和平门等地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发现大量战国古瓦井、战国至秦汉的墓葬和燕式饕餮纹半瓦当等实物资料，学界推测东周时期的蓟城可能位于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为大部分学人所接受。

陈平对北京白云观出土战国陶罐上的陶文“𪛗”字作出考释，认为此字即“蓟”，从而证明战国燕国的上都蓟城，以至于上溯到西周、商代的蓟城，就在白云观以西的土丘“蓟丘”附近^⑪；随后他进一步提出前期蓟城与后期蓟城曾共有过同一座城门——开阳门的判断^⑫。

近年来历史地理、水文地质方面的学者通过工



程勘探等科技手段,对早期蓟城方位的推断才有了新的解释。

岳升阳等对广安门内的广义大厦工程地层剖面进行的古地貌复原研究,根据工程勘察的钻孔数据,提出广安门地区是北京最早的城址古蓟城所在地^⑧。随后,他们又选取古高粱河沿线的典型剖面,用碳-14、光释光、热释光等测年方式,结合地貌学、考古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确定古河道的年代,以此近似地复原古高粱河的演变和分布特征,认为古蓟城的选址与古高粱河密切相关,古蓟城选址于古高粱河与古漂水故道之间的高地之上,是古高粱河要津上的城池^⑨。此外,岳升阳又通过出土遗迹考证战国至西汉时期蓟城的位置,他认为战国至西汉蓟城范围大于后期蓟城,大致东起南新华街,西至广安门外铁路西,南抵南横街一线附近,北达新文化街南^⑩。

(二)北京老城西南和石景山古城地区

赵其昌根据考古发掘报告和文献研究,给出了三种推测设想:一是京西八宝山以西略北地区;二是京西南,外城以西地区;三是在后期蓟城南。以三个设想相互比较,则第二个可能性较大,第一个次之,第三个最小^⑪。而鲁晓帆对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的一方唐代高元表墓志考释,认为该墓志记载墓主人的逝地与葬地给我们今天确定古燕国“蓟城”方位,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依据,他认为今石景山区的古城以西、模式口以东一带,就是历史上古燕国都城“蓟城”的原始地^⑫。

韩光辉认为西周蓟都及春秋战国燕都均位于宣武门、和平门及白云观东西一线的南北两侧,而西周蓟都可能有陪都存在,当在蓟都西北,即人们常说的广安门以西、八宝山至石景山以北地区,蓟人以此作为避开并抵御山戎南下侵掠的缓冲设施。“西周蓟都小城就位于广安门外护城河一线东西两侧;而燕国迁都于蓟,则在此基础上向北向东开拓,形

成一个东西长南北宽的大城”^⑬,它的形制可参见战国时期规划建设燕下都武阳城,其规模面积约为武阳城的三分之二。

(三)其他地区

刘元章、李文贤、王树芳等则根据数千个钻孔及地铁施工的地层资料,发现莲花桥地铁站以北区域地下2米处埋藏有一基岩小丘,南北长约365米,前沿高出古永定河一级阶地面约8米,结合相关古文献,认为此丘便是蓟丘,西周初期至东汉末期的蓟城应位于前面的莲花池湖面区域^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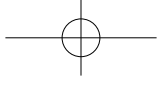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四、燕国始封都城(琉璃河遗址)的考古发现及多角度研究

1995年至今,琉璃河遗址又经历了两个阶段的考古挖掘,首先是1995年秋至1997年,对城址进行发掘;其次是2019年至2021年,对城址区和墓葬区开展了新阶段的考古工作,取得重大成果。2021年琉璃河遗址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2022年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正式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2024年底琉璃河遗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25年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琉璃河遗址在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环境考古、科技考古等多个领域取得了研究成果,2019年有学人做过相关研究综述^⑮,对于燕国始封都城的研究更加深入具体,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核心问题:

(一)性质确认与分封实证

考证琉璃河遗址西周燕都城市性质和召公封燕的细节,尤其是围绕董家林古城的始建和使用年代作进一步探讨,关乎北京建城史和燕国都城迁徙的推断。



1995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写的《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③,系统公布了1973—1977年在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开展的考古成果,从遗址的面积、古城址的时代、大型墓的存在及带有“匱侯”铭文青铜礼器的发现等研究分析,明确提出琉璃河遗址曾是西周燕国始封地和早期都城。通过对M1193大墓出土克罍、克盃等青铜器铭文研究,揭示了首任燕侯为召公奭之子“克”,而非召公本人。同年,李伯谦提出董家林古城跨越商周两代、西周燕都是商时晏国政治中心的自然延续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古城只能是“召公封燕”后西周初年燕国建造的都城,始建年代为西周早期^④,殷玮璋、裴明相等学者也赞同此观点。

即使董家林古城确定为兴建於西周早期或者初年,但它仍与武王伐纣、召公封燕于公元前何年之间有着模糊不清的距离。例如根据新出土的三片西周卜甲,赵福生认为年代上不早于也不会太晚于成王时期,也有助于判断西周燕国的建城时间及夏商周断代^⑤。曹定云认为三片西周卜甲不是燕国本国的占卜之物,而是召公为“成周”占卜取名时的遗物,是召公到达燕国后所遗留的,以此也可以证明召公曾到燕国卜选城址^⑥。最新考古发现,在M1902墓出土一件青铜卣,卣中铭文可辨识:“太保墉匱,延宛匱侯宫,太保赐作册奭贝,用作父辛宝尊彝。庚。”雷兴山认为,铭文中的“墉”字是筑城之意,证实召公亲自来过琉璃河遗址并在此筑都^⑦,这也成为目前北京建城史最早的出土文献。

至于董家林古城何时废弃使用,则关乎燕国迁都蓟城的推断,这也是燕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赵福生等根据琉璃河遗址周代遗存的存在状况,认为董家林古城彻底废弃于西周末年是合适的,但作为都城的废止年代是否为西周末年尚难论断^⑧。陈平认为燕国初都董家林古城的废弃年代最晚不晚于西周晚期,甚至推测最早可以早到西周的中期或中、晚期之际^⑨。在此推断基础上,陈平、唐晓峰^⑩

等学者认为燕国始封于琉璃河城址之后不久,便乘其强势灭掉了北方的近邻蓟国,并将都城迁到蓟城,而不是如王玲^⑪、于德源^⑫、韩嘉谷^⑬等学者认为的在春秋或战国时期将燕都迁往蓟城。最新考古发现证明,作为诸侯国都城使用年代是从西周初至中期。

(二)都城营建与功能布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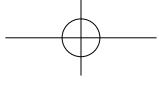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更加清晰地证实了西周燕都的城市规模、城墙结构、功能分区(宫殿、祭祀、手工业、居住、墓葬),为了解西周诸侯国都城的规划建设提供了重要实例。

首次明确了外城墙和外城壕的存在,根据外城壕位置推测,城址规模可达100万平方米,这种内城和外城的城市布局更加清晰,能够与周原的城址布局相互印证。郭京宁认为西周燕都建设外城墙和外城壕,也许是为了防御军事进攻或自然灾害,这种营城理念说明古代城市的聚落功能也会随着城墙的扩建而不断丰富^⑭。王晶认为周原遗址的城市方向与琉璃河遗址相同,反映了分封制下西周王朝有力的国家统治和边疆治理^⑮。

在琉璃河遗址内城中心偏北,新发现一座约2300平方米的大型建筑基址,是迄今西周封国中规模最大的建筑基址。此外,在内城范围内还新发现了10口直径均在15米以上的大型夯土水井,前所未见,王晶认为建筑与大型夯土井的组合,可以视为一个城市单元的标识性要素,帮助我们进一步厘清西周燕都的布局。王巍表示这么深的夯土井功能上也有可能是“凌阴”建筑,即类似现代的冰箱^⑯。

(三)西周燕国社会与文化

结合考古发现(墓葬等级、规模、随葬品差异等)与出土重器铭文、文献记载,学界梳理分析了诸如西周燕国早期世系、社会等级分层、多元文化特征等问题。



关于燕国早期世系,传世文献记载语焉不详,曲英杰^⑤、任伟^⑥、朱凤瀚^⑦、李宝军^⑧、曹斌等^⑨利用青铜器铭文材料,把召公家族与周王室进行综合研究,梳理出部分召公家族的结构世系和周王室的关系,虽然各家观点不一,但基本能对克、旨为前两代匭侯达成共识。最新考古发现琉璃河遗址成组的大型墓葬,被确认为燕侯家族墓地,可辨识出至少4代燕侯家族。由此不仅可大致推断琉璃河遗址作为燕国都城的延续时间,还填补了燕侯世系空白。同时首次在城北方向发现平民墓地,DNA分析首次重建商周四代家族树,发现父系遗传主导和近亲结婚现象,填补平民社会组织研究空白,部分葬式和随葬品显示商文化影响^⑩。

燕国在西周政治军事格局中为北方屏障,与周王室和周边部族、其他封国都有互动交流,因此呈现出多元文化复杂相融的特点。

1997年考古发掘后,刘绪、赵福生认为琉璃河遗址作为燕国都城主要属西周早期,其废止年代当在早中期之交或稍晚,居址材料显示当时确有三种部族即姬姓周人、殷遗民和土著燕人在此居住,它的文化复杂,因此不能单纯用一种周文化予以概括^⑪。雷兴山将琉璃河遗址早期居址的遗存分为周文化、商文化、张家园上层文化和混合型文化四种,认为混合型文化中,商、周文化因素混合应为殷遗民文化,张家园上层文化因素与商或周因素混合应为土著燕文化^⑫。韩建业认为琉璃河遗址说明以北京为中心的西周早期燕文化,是在当地土著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大量周文化和商文化因素而形成的^⑬。印群对琉璃河遗址陶器群和葬俗研究分析,认为由商式陶簋到周式陶簋的变化折射出该文化遗存的周人及殷遗民对不同文化因素的吸收^⑭,殷遗民墓在保留了一些殷文化因素同时大量吸收了周文化因素,而周人墓在传播周文化因素的同时对殷文化因素也有一定的吸收^⑮。李竹、陈北辰认为燕国和曾国虽同属于西周王朝边缘地带的封国,对琉璃

河和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墓地出土青铜兵器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西周早期两国在军事技术上的交流以及文化上的互动和影响^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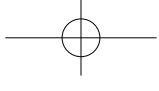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除了上述问题,有关琉璃河遗址还有各类出土器物的研究^⑰、墓葬分期和族属研究^⑱等,限于篇幅不再展开叙述。

五、几点思考

通过上述的回顾与梳理,可以看到关于北京建城起源的命题尽管提出只有三十年,但却一直是北京史研究的热点,且相关观点泾渭分明,似乎难以调和。在此我们斗胆提出几点初步思考:

第一,定位西周,回归“建城”原点。正如本文一开始的追述,三十年前那次专家论证会上确定了两点,一是将北京城市起源定位在西周,而非殷商;二是特别强调了北京城始建是“建城”,而非“建成”。这两点的确定显然是在全面考虑了文献记载、考古发现等因素下做出的。三十年后的今天,尽管新近考古发现了丰台新宫夏商双重环壕聚落遗址,其中也包含一些晚商至西周时期的遗存,但并未发现城址,可见关于北京城市起源目前定位在西周仍是恰当的。至于第二点,琉璃河遗址新发现的“太保墉匭”青铜器铭文,无疑对西周燕国在北京“建城”之举提供了铁证。

第二,定位西周,认清“褒封”与“封”的实质。根据《史记·周本纪》和《礼记·乐记》的记载,武王灭商后,褒封黄帝或尧帝的后裔于蓟,封召公奭于燕。“褒封”与“封”的区别,按照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的说法,“有土嘉之曰褒,无土建国曰封”。对于西周的分封制度而言,其核心内容无非就是两点,一是“授民授疆土”,二是“封诸侯,建藩卫”。对照何休的解释,“褒封”的蓟国有土有民,只是得了一个“蓟侯”的荣誉称号,或许还要承担一定的藩卫任务。而燕国则授民授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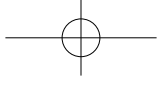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土，封邦建国。尽管蓟国比燕国早分封了近十年，但从一开始“蓟微燕盛”的局面就被确定下来。所以就“建城”这件事情来说，西周初年燕都的营建显然比蓟城更有现实的需求，分封早晚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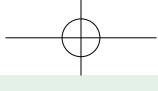
第三，定位西周，辨明城区肇始与建城肇端。立于广安门外滨河公园的“蓟城纪念柱”上所谓“北京城区，肇始斯地。其时惟周，其名曰蓟”，很显然这十六个字是以今天的北京城区作为定位而言

的。但如果我们定位西周，定位以宗室身份分封北京的燕国，定位当年“蓟微燕盛”的历史，再看看当前琉璃河燕都遗址考古发现的现实，单就北京建城起源问题，哪处城址堪当北京建城肇端，哪片区域可称当年繁盛的城区，哪里才是西周早期北京的核心功能区，其答案似乎应该是不言自明。再对比有着类似情形的西安，其建城始于并非位于今城区的西周丰镐，乃是官方及学界的主流观点。他山之玉，或可供借鉴。

- ① 陈旭：《北京建城年代考证取得成果》，《北京年鉴（1995）》，北京年鉴社，1995年，第476页。
- ② 《史学文物考古专家对商周遗址论证认定北京今年建城3040年》，《北京日报》1995年1月8日第1版。
- ③ 侯仁之：《论北京建城之始》，《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
- ④ 唐晓峰：《蓟、燕分封与北京地区早期城市地理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期。
- ⑤②③⑥ 韩光辉：《蓟聚落起源与蓟城兴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
- ⑥ 孙冬虎：《从燕都蓟城到人民首都》，《前线》2017年第2期。
- ⑦ 孙冬虎：《城之源：燕都遗址与北京城起源无关》，西城社科联公众号，2024年7月23日；孙冬虎：《易水河畔想燕都》，《北京文史》2024年第2期。
- ⑧ 王光镐：《古蓟城是北京城的真正源头》，北京日报客户端，2022年11月18日。
- ⑨ 朱祖希：《北京城源自蓟，而非燕》，《北京青年报》2024年11月8日第A11版。
- ⑩ 《纪念北京建城3040年 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竣工》，《北京日报》1995年4月23日第1版。
- ⑪ 《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开馆》，《北京日报》1995年8月22日第1版。
- ⑫②⑩ 齐心：《琉璃河商周遗址发现、发掘与研究》，《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专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63页。
- ⑬②② 日京：《“九五”国家重点科技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夏商周年代表〉与房山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考证表明：北京建城历史应追溯到西周成王元年——公元前1042年》，《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 ⑭ 刘立早：《琉璃河遗址——北京城市发展的源头》，《北京规划建设》2014年第2期。
- ⑮ 刘健、王晶、汪瑀等：《北京原点——琉璃河遗址的保护探索》，《人类居住》2022年第2期。
- ⑯ 王冬冬、王晶：《基于考古学研究的琉璃河遗址价值建构与阐释》，《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23年第4期。
- ⑰②④⑤⑧ 郭京宁：《琉璃河遗址：这里是最早的北京城实证》，《光明日报》2025年3月30日第11版。
- ⑱ 杜金鹏：《北京建城史和燕文化研究的新进展——“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史学月刊》1996年第1期。
- ⑲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183页。
- ⑳ 例如，李仲操：《燕侯克盃铭文简释》，《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任伟：《西周燕国铜器与召公封燕问题》，《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2期。
- ㉑ 杨玉生：《论召公封燕及其对燕文化的影响》，《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 ㉒④⑤ 陈平：《燕都兴废、迁徙谈》，《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 ㉓ 尹钧科：《论永定河与北京城的关系》，《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 ㉔ 于德源、富丽：《北京城市发展史》（先秦—辽金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第41页。
- ㉕ 陈平：《释“𡩺”——从陶文“𡩺”论定燕上都蓟城的位置》，《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4期。
- ㉖ 陈平：《揭开分期迷雾，寻访前期蓟城》，《北京文博文丛》2014年第2辑。
- ㉗ 岳升阳、苗水、徐海鹏：《北京古蓟城城址古地貌环境演变研究——以广义大厦工程剖面为例》，《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年第5期。



- ③② 岳升阳、马悦婷、齐乌云等:《古高梁河演变及其与古蓟城的关系》,《古地理学报》2017年第4期。
- ③③ 岳升阳:《由出土遗迹看战国西汉蓟城位置》,《北京史学》2024年春季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第3~35页。
- ③④ 赵其昌:《前期蓟城在哪里》,《京华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第22~25、32页。
- ③⑤ 鲁晓帆:《从出土唐志看古燕国蓟城方位——高元表墓志铭考释》,《收藏家》2021年第8期。
- ③⑦ 刘元章、李文贤、王树芳等:《从地质学的角度探究“蓟丘”与“前期蓟城”今之所在》,《第四纪研究》2019年第6期。
- ③⑧ 吴尘昊:《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研究综述》,《北京文博文丛》2019年第4辑。
- ③⑨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 1973—1977》,文物出版社,1995年。
- ④① 李伯谦:《北京房山董家林古城址的年代及相关问题》,《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专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72~79页。
- ④② 赵福生:《琉璃河遗址访谈录》,《北京文博》1997年第1期。
- ④③ 曹定云:《北京琉璃河出土的西周卜甲与召公卜“成周”——召公曾来燕都考》,《考古》2008年第6期。
- ④④ 施芳:《琉璃河遗址 两段铭文共证北京三千年建城史》,《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年1月10日第11版。
- ④⑤ 赵福生、柴晓明、王鑫:《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的研究》,《琉璃河遗址与燕文化研究论文集:纪念北京建城3060年》,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2页。
- ④⑥ 唐晓峰:《燕“并蓟居之”辨证》,《历史地理》2016年第2期。
- ④⑦ 王玲:《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史》,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第8、9页。
- ④⑧ 于德源、富丽:《北京城市发展史》(先秦—辽金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第44页。
- ④⑨ 韩嘉谷:《辽西青铜器窖藏和早期燕国兴衰》,《北京文博文丛》2011年第1辑。
- ⑤① 李祺瑶、陈强:《琉璃河遗址首次发现“两重城”》,《北京日报》2025年3月1日第6版。
- ⑤② 李韵、王笑妃:《勾勒三千年前北京城的样貌》,《光明日报》2025年3月2日第4版。
- ⑤③ 曲英杰:《周代燕君世系考辨》,《史林》1996年第4期。
- ⑤④ 任伟:《西周早期金文中的召公家族与燕君世系》,《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
- ⑤⑤ 朱凤瀚:《大保鼎与召公家族铜器群》,《叩问三代文明——中国出土文献与上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96~113页。
- ⑤⑥ 李宝军:《西周早期的召公家族世系——以青铜器铭文为中心的考察》,《洛阳考古》2013年第3期。
- ⑤⑦ 曹斌、康予虎、罗璇:《匭侯铜器与燕国早期世系》,《江汉考古》2016年第5期。
- ⑤⑨ 刘绪、赵福生:《琉璃河遗址西周燕文化的新认识》,《文物》1997年第4期。
- ⑥① 雷兴山:《试论西周燕文化中的殷遗民文化因素》,《北京文博》1997年第4期。
- ⑥② 韩建业:《试论北京地区夏商周时期的文化谱系》,《华夏考古》2009年第4期。
- ⑥③ 印群:《论琉璃河遗址殷遗民墓的陶簋——兼谈该遗址殷遗民文化因素之消长》,《考古学集刊18》,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55~168页。
- ⑥④ 印群:《谈琉璃河遗址殷遗民墓之随葬车马坑》,《三代考古(四)》,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75~382页。
- ⑥⑤ 李竹、陈北辰:《从琉璃河和叶家山出土青铜兵器看西周早期曾国与燕国的交流》,《大众考古》2022年第2期。
- ⑥⑥ 例如,杜金鹏:《试论北京琉璃河西周墓地出土的玉冠饰》,《文物季刊》1997年第4期;楼朋林:《琉璃河遗址2001年西周墓葬发掘简报》,《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五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第73~79页;楼朋林:《琉璃河出土的漆器与复原》,《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五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第314~320页;王鑫:《琉璃河西周墓葬出土青铜礼器》,《中国文物报》2003年2月28日第1版;张利洁、孙淑云、殷玮璋等:《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铜器的成分和金相研究》,《文物》2005年第6期;张经:《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出土父戊尊、卣与单氏诸器》,《三山五园和京西文化研究与保护利用:北京三山五园研究院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研究出版社,2014年,第154~160页;于力凡:《试析馆藏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出土的青铜车马器》,《首都博物馆论丛2015》,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第162~170页;韩冰:《试论北京琉璃河遗址出土的青玉凤鸟纹柄形器》,《东方收藏》2024年第11期等。
- ⑥⑦ 例如,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北京市文物研究所:《1995年琉璃河遗址墓葬区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6期;琉璃河考古队:《琉璃河遗址1996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6期;张剑:《试论西周燕国殷遗民的政治地位》,《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专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269~274页;冉宏林:《西周墓葬的陶簋与殷遗民——以琉璃河墓葬为主》,《四川文物》2019年第1期;陈光鑫:《周初燕国殷遗民考》,《北京史学》2023年秋季刊(总第18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第271~284页。



确定北京城市之源的历史地理依据

The Determination of Beijing's Urban Origi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孙冬虎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Sun Donghu (Institute of History,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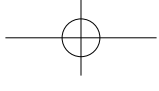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摘要: 寻找北京城市起源的决定性因素与唯一限定条件, 在于某座古代城邑与当代北京城市空间的渊源关系是否具有地理或历史地理的可能性与合理性, 而不是这座城邑诞生后与其他城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非地理”的关联。传世文献、考古发现与已有研究显示的学术逻辑与基本事理表明: (1) 北京的城市之源要以明清北京城所在的地理空间为坐标原点, 在与之局部重合或相互毗连的范围内而不是“跨流域”的其他地方去寻找。(2) 从广安门一带的古代蓟城到当代北京, 是显示城市起源与发展进程的唯一合理的历史地理轨迹。(3) 在面积广大的“北京市”辖境之内发现的古代城址, 未必一定与永定河流域的“北京城”的起源相关; 若将“北京市”或“北京地区”混同于“北京城”或“北京”, 无疑是在偷换概念。(4) 拒马河流域的董家林燕都与蓟城之间客观存在的大约八十里的空间距离, 决定了它不可能通过“缩地法”向北挪移进而取代蓟城作为“北京城市历史地理本质的代表者”的地位。(5) 周武王对尧帝或黄帝后裔的“褒封”, 证明蓟国与蓟城至晚在商代后期就已存在; 目前以西周初期武王伐纣的年份作为北京建城之始, 只是在有待传世文献和考古发现继续印证之前的权宜之计。

关键词: 北京 城市起源 蓟城 历史地理

中图分类号: K928.6 **文献标识码:** A

Abstract : The decisive factor and sole defining condition for identifying the origin of Beijing depend on wheth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certain ancient settlement and the urban space of contemporary Beijing has geographical or historical - geographical plausibility and rationality. This determination should not rely on “non-geographical” factors—such as political, economic, or cultural ties—that may have existed between that city and others after its establishment. The academic logic and fundamental principles revealed by transmitted historical documents,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and existing research are as follows: (1) The origin of Beijing should be sought within the geographical space occupied by the Ming-Qing Beijing City, as a coordinate starting point, and within areas that partially overlap with or are adjacent to it—rather than in locations “across river basins”. (2) The historical-geographical trajectory from the ancient Ji City in the vicinity of Guang'anmen to contemporary Beijing represents the sole reasonable path demonstrating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3) Ancient city sites unearthed within the extensive jurisdiction of “Beijing Municipality” are not necessarily related to the origin of “Beijing City” in the Yongding River Basin. Equating “Beijing Municipality” or “Beijing area” with “Beijing City” or simply “Beijing” is, without a doubt, a fallacy of concept substitution. (4) The approximately eighty-li spatial gap between Dongjialin, the capital of Yan in the Juma River Basin, and Ji City objectively precludes any possibility of relocating the former northward through a “land-shrinking method” to replace Ji City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essence of Beijing’s historical geography”. (5) King Wu of Zhou’s “honorary enfeoffment” of the descendants of Emperor Yao demonstrates that the Ji State and Ji City existed no later than the late Shang Dynasty. Currently, using the year of King Wu’s campaign against King Zhou in the early Western Zhou Dynasty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Beijing’s establishment is merely a provisional approach, pending further corroboration from transmitted texts and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Keywords : Beijing; Urban Origins; Ji City; Historical Geography



在梳理北京来龙去脉的基础上厘定其建城时间，甚至像每人都有生日一样明确北京建城纪念日，近年来已从北京史、历史地理、考古学者的思考变为社会公众的希望，再加上发掘区域文化、传承历史文脉的潮流推动，关于北京城市之源、建都之始的研究和宣传，一时参与者众、议论风生，出现了不少学术的或非学术的争论。有鉴于此，分析学界确定北京城市之源的历史地理依据并阐明相关问题，尽管涉及的都是些基本常识，却依然还有些意义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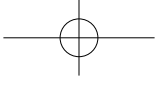
一、需要寻源的“北京城”在哪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这个“北京”所指的地理空间，是自古至今不断发展的结果。

众所周知，从明永乐元年（1403）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将准备迁都的城市改称“北京”，再到明英宗正统年间结束了北京究竟是“行在”还是“京师”的摇摆过程，这座城市的称谓和首都地位一直基本连续地保持到民国十七年（1928），此后即进入二十余年的“北平”时期。1949年9月30日闭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10月1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相继指出：“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就城市范围而言，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修建外城后，北京城墙的轮廓从“口”字形变为“凸”字形，由此固定了“城”与“乡”在古代的地理分界线。尽管明清时期驻在城里的五城兵马司等机构也在管辖城墙之外的近郊乡村，但这些地方的性质与城墙之内截然不同，最迟在晚清地图里被称为“城属”，亦即从属于北京城而不是由附郭的宛平、大兴二县管辖的区域。从明代到1949年稍后的“北京”或“北京城”，就是被城墙圈起来的这个“凸”字形的区域。

“北京”或“北京城”的范围既取决于城墙指示的边界，也是古今社会心理认同的结果。明嘉靖年间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分列中、东、西、南、北五城所辖的街巷，以此标示出“城”的范围。对于五城兵马司管辖的周边村落，则分别系于东城的东郊，西城的西郊，南城的西乡，北城的东乡、中乡、西乡之下，明确区分了何者为“城”与何为“城属”。清乾隆年间官修的《日下旧闻考》，以“京城总记”二卷、“皇城”四卷、“城市”十九卷分述北京内外城的历史人文与地理风物，四围州县则按道里远近归入“郊垌”与“京畿”诸卷，代表了古已有之的一贯认识。晚近对“北京城”的界定，仍是以城墙为标志。例如，老舍先生《四世同堂》写道：“北平虽然作了几百年的‘帝王之都’，它的四郊却并没有受过多少好处。一出城，都市立刻变成了田野。城外几乎没有什么好的道路，更没有什么工厂，而只有些菜园与不十分肥美的田；田亩中夹着许多没有树木的坟地。……一到打仗，北平的城门紧闭起来，城外的治安便差不多完全交给农民们自行维持，而农民们便把生死存亡都交给命运。”^①他们虽然在心理上觉得自己是“北平”人，但绝不会认为是“城里”人。即使1949年以后陆续拆除了城墙，区域功能与社会认同仍然决定着“城”的范围。随着建成区的拓展，又出现了“城八区”“城六区”之类的概念，但“核心城区”或“首都核心功能区”依然是以明清内外城为主体的老城区。

历史发展与社会认同决定了“北京”或“北京城”的点位，那就是以明清内外城的城墙为基本范围的区域。以此为坐标原点，这座城市的起源，只能在与之“局部重合”或“相互毗连”的区域，而不是到“相距遥远”甚至“跨流域”的某个地方去寻找。之所以如此，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是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地理问题，而不是政治、经济、文化等“非地理”的问题。



二、北京起源定于蓟城的依据

把北京的起源定在蓟城并且推定其位于今天的广安门一带，这是历史地理等相关专业依据传世文献与考古发掘得到的基本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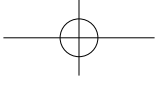
考古工作者迄今没有发现蓟城的遗址，这似乎已成为多年来讨论北京城市起源问题时的一个“软肋”。关于蓟城尚未发现遗址的问题，唐晓峰先生等早有论述。撮其要旨，此事既与历史上的永定河多次改道冲刷与泥沙淤积压埋有关，更重要的是几千年来为了应对自然环境的变迁与建筑本身的积年损坏，人们在同一个小区内进行了非止一次的拆旧建新，其间还包括金中都大规模拓展过程中对城市的根本性改造。换言之，频繁而密集的人类扰动与渐进或突然的环境变迁，虽然没有改变蓟城的空间位置，以城墙为主的有形建筑却要在塌陷与重修中反复拉锯，这就很难保证墙基的存在或轻易就被发现。在这样的条件下，今天是否发现城址不能作为蓟城存在与定位的唯一依据，还要看其他方面的佐证。

今人没找到蓟城的遗址，白云观附近可能是蓟丘的那座土丘，又在1974年的城市建设中被推平，因此也就失去了继续考古的条件。尽管如此，古人的见闻和传世文献却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一个确凿无疑的前提是，距今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北魏时代，可以看到的古代遗迹远比今天多。酈道元《水经注·漂水》写道：“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②这里明确表示，他亲眼看到的蓟城位于漂水（古永定河）流域，而且“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这个土丘是确定蓟城位置的最重要、最突出的参照点，由此可知城区的主体部分在其东南方向。乐史《太平寰宇记》征引《郡国志》说：“蓟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开十门。”^③乐史著书的年代在北宋初期的太平兴国年间，他所征引的《郡国志》至少应是唐代的文

献。北魏以后未见蓟城迁移或拓展的记录，《郡国志》显示的城市规模，应当与酈道元所见的情形一致。侯仁之先生多次撰文强调：“自春秋战国以来，历东汉、北魏至唐，蓟城城址并无变化。”^④当代考古学者根据西晋华芳墓出土的墓志等显示的城墙位置，提出了东汉至西晋时期蓟城东墙内缩、西墙外拓因而可分为“前期蓟城”与“后期蓟城”的观点。此说是否成立，仍待继续讨论。即使真正发生了东缩与西拓，前期蓟城的西半部变为后期蓟城的东半部，它的中心区域依然没有离开先秦时期的城址范围。据此看来，蓟城的位置和地理空间一直处于基本稳定的状态。

随着1956年在白云观至宣武门一带发现战国至秦汉的151座瓦井^⑤，1965—1970年又在姚家井、北线阁、白云观、海王村、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发现了65座东周至西汉时期的瓦井^⑥，结合其他证据可见，这是人口密集的城市里居民取水的遗存。符合这个区位条件的古代城邑，唯有北京的前身蓟城。这片区域正处于白云观东南，与酈道元所见蓟城位于蓟丘东南的情形完全匹配，也印证了白云观附近直至1974年还存在的土丘就是蓟丘的残留。一座城邑的出现必有所本，在先秦时期的生产力条件下也不会骤然兴衰，由此上溯到西周初年，蓟城的位置和规模亦当大体如是。蓟城的起始年代实际上并不限于西周初年，后面我们还将稍作讨论。

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同样清晰地显示着北京之源应在何处。蓟城原本是蓟国之都，西周中晚期燕国吞并蓟国并迁都至此，随后相继成为汉唐幽州、辽南京、金中都之所在。金中都经过大幅度拓展，成为蓟城旧址之上崛起的最后一座大城。元代选择在中都东北郊的风景区另建新城，为明清至当代的北京城奠定了直接基础、划定了基本范围，但与蓟城的关系并未疏远。元大都先后有中都新城、中都北城、大都北城之称，与此对应的金中都则是中都旧城、中都南城、大都南城，主观和客观上都



把大都视为中都的延续和发展。明北京是元大都的直接继承者，洪武元年（1368）徐达将北城墙向南缩进五里，只是为了顺应礼制要求，使北平府的城市规模不至于僭越国都南京。嘉靖年间增修外城后，其西南隅与金中都的东北隅重合，彼此之间兼有历史与现实的密切关联，清代以后的北京城市空间又是明北京的直接继承者。北京城区在当代大幅度扩展后，历史上蓟城所在的区域被纳入了中心城区甚至核心功能区。今人探寻北京的城市起源，所追溯的只能是“今之北京”的来龙去脉。即使以最宽泛的尺度划定它的基点与核心区域，也只能涉及东城、西城、丰台三区，而绝不至于到距此七八十里之外的某地去探源。根据历史文献和已有研究，从广安门一带的古代蓟城到当代北京，是唯一符合学理、事理与基本逻辑的一脉相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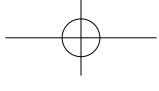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考古界迄今未见蓟城遗址，这就为研究者和爱好者留下了猜想的空间，其中以蓟城位于石景山区的某地之说最具“民间影响力”。其主要论据大略有三：酈道元所见蓟城西北隅有蓟丘，今石景山区某处正有一丘，与之相符；燕国的某座建筑，从其方位和距离推断，在今区内某地；燕国有磨室宫，区内的模式口原为磨石口，“磨石”则为“磨室”之音转，蓟城因此当在其附近。这里稍加评述，以见其非。其一，对于古今地理环境，应以运动的而不是静止的、变化的而不是固定的观点去看待。历史上永定河的频繁改道与泥沙淤埋，人类活动的反复改造，必然导致区域环境发生变化。不能因为今天的广安门一带土丘无存，就把蓟城平移到一个现在有丘的地方——比如西山东麓的石景山区某地，而置《水经注》等传世文献的记载于不顾。对《水经注》的释读，也不能主要依据晚清民国的材料了事。其二，古代方志类或文学类作品描述的地物位置不乏粗略之处，对于有传说而无实迹的形胜更难免泛泛言之。诸如燕昭王修筑的黄金台之类，其形制、地点向来言人人殊。若非经过严谨的考证使

之确凿无疑，断难作为论据使用。其三，从反映百姓生产活动的“磨石口”到谐音改字寄意的“模式口”，的确是晚近发生的地名变迁，但磨石口之“磨石”却不是宫殿名称的谐音。这是因为，所谓“磨室宫”并不存在，它是对见于古籍的“磨室宫”的误写，但凡稍具权威性的版本只作“磨室”而非“磨室”。“磨”与“磨”字形相近，但字音和字义都相去甚远，其间断无“磨室——磨石——模式”前后相继的演变过程。退一步讲，即使某个宫殿确实建在了西山山麓，也未必就位于蓟城之内或城邑附近。与此相反，选在离城远一点的地方修建别宫岂不更有休闲的味道？其他方面，毋庸再议。

三、“北京市”的考古遗址未必关涉“北京城”的起源

蓟城的遗址越是迟迟不见踪影，人们对考古的期望就越高。当代“北京市”是一个面积16410平方千米的行政区域，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发现的城址，未必一定与“北京城”或“北京”的起源有关，这是显而易见的基本逻辑。比如，“北京市”辖境之内的董家林西周燕都遗址，就与“北京城”或“北京”的起源问题毫无关联！

1962年在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附近发现西周燕都遗址，毫无疑问是北京市几十年来考古工作的重大收获，由此解开了关于燕国历史的众多疑团。早期燕国都城的位置有了确切地点，青铜器上的铭文显示首位就封的国君不是召公奭而是其长子克，其他出土器物也是燕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与社会生活的见证。但是，以不少文物考古学者为主、部分历史与文化学者相随，再加上多路媒体的宣传报道以及若干行政机构的推波助澜，董家林燕都遗址俨然被定义为“北京城”或“北京”的“起源”，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也布置了“北京从这里走来”之类的常设展览。长期苦于没有遗址为证的



北京城市起源问题，在各界专业与非专业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似乎已经因为董家林燕都遗址的发现而得到解决。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认识充满了显而易见的悖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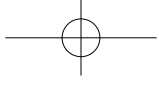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其一，自然地理学追溯河流的源头，必须遵循“江源唯远”的普遍原则，在若干条上源之中选择“流程最长”的那条涓涓细流。与此相仿，追溯北京起源，旨在尽量找到距今“年代最远”的源头，因此也就没有理由置周武王“褒封”尧帝（或黄帝）后裔的蓟国及其国都蓟城于不顾，却转而选择大约十年过后因为武王之子成王“分封”燕国才产生的董家林燕都。如果没有早就存在的“蓟都蓟城”，何来燕国迁都蓟城以及后人所谓“燕都蓟城”？

其二，只有地理或历史地理的可能性与合理性，才是寻找北京城市之源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也是唯一需要考虑的限定条件。一个聚落或一座城邑位于何地以及占有多大空间，无疑是一个地理或者历史地理的问题。以今天的北京老城区为坐标原点寻找它的起源，首先要看古今城区是否重合或者在多大程度上重合，其次才是把眼光投向与之毗连的“左邻右舍”而不是相隔百八十里的“远房亲戚”，最后的结论只能是传世文献记载、前人亲眼所见、当代考古间接证实的广安门一带的蓟城。董家林燕都与广安门蓟城之间的空间距离，是无法消除的客观存在。拒马河流域的燕都，如何搬到相距七八十里之外的古永定河流域？在地理条件这个根本性的限定因素之外，城市历史的长短已经无足轻重。极而言之，即使今天的北京是昨天刚刚出世的新城，董家林的燕都也绝不是它的起源。倘若谓予不信，那就请回答一个简单之至的问题：南北两城之间的空间距离“到底是怎么没的”？

其三，燕国迁都蓟城，燕与蓟之间的政治关联、人口流动以及文化的传播、交流、融合等，都与北京城的起源无关。蓟国的蓟城在古永定河流域诞生后，哪些人在这里活动，哪些人以此为都，哪

些文化在这里聚集，都对这座由物质组成、占有一定地域空间的“城”的最初起源没有任何影响。燕国迁都无疑把燕文化带到了蓟国故土，也改变了蓟城的政治归属，但此前的城邑起源早已成为历史，更与新主人从哪里迁来风马牛不相及，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地理问题而不是文化问题。明永乐年间朱棣从南京迁都北京，世间却绝无把南京视为北京建都之源者。与此相类，董家林燕都与蓟国之都蓟城（亦即西周中晚期以后的燕都蓟城），也是只有“人缘”却没有“地缘”关联的两座各自独立的城邑，当然更不存在以董家林燕都充当今之北京城市起源的历史逻辑。

其四，国家政区系统中的“北京市”与它的行政中心“北京”（或“北京城”），是性质不同的两个概念。在北京市十六区（原为十八区县）或泛称“北京地区”的广阔范围内发现的古代城址，是否与“北京城”（或“北京”）相关乃至干脆就是它的起源，唯一的判断标准就是彼此所占的地理空间是否重叠或毗连。换言之，“北京市”或“北京地区”的考古发现，与“北京城”或“北京”的起源没有必然联系。董家林遗址位于“北京市”辖境之内，可以称它是“北京市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古代城址”，诸如此类的定性价值判断均无可不可。但是，如果不顾它与“北京城”之间在地理空间上的遥远距离和相关的历史逻辑，仅仅因为此地处在当代“北京市”辖境之内，就将其视为解决“北京城市起源”的“考古学证据”，根据前面的讨论可知，这显然是在偷换概念而且无视学理与事理。即使仅以行政区划而言，在1958年3月之前，琉璃河镇董家林村属于“河北省通县专区房山县”，此后因为政区调整才有了“北京市”的房山县以及1986年11月更名的房山区。河北省并未因此宣扬“北京从我省房山县走来”，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里离“北京城”实在太远。已有研究早就证实，只有蓟城才是“北京城市历史地理本质的代表者，是严格意义的今北京城



的前身”。换言之，“北京城的历史地理本质的早期体现者，是蓟城，不是董家林的燕都”^⑦。当然，蓟城也是唯一的“北京城市起源”之所在。

四、确定北京建城时间的权宜之计

北京城市起源要沿着广安门内外的蓟城一脉去追寻，但因为史料与考古的不足，确定建城的具体时间并非易事。

1987年，侯仁之先生建议市领导尽早考虑北京建城之始的问题^⑧。到1995年，北京举行了纪念建城3040年的活动。宣南的滨河公园立起“蓟城纪念柱”，上刻铭文“北京城区，肇始斯地，其时惟周，其名曰蓟”，表达了学界当年的基本认识。建城的年份采纳赵光贤先生的研究结果，以西周之初“武王伐纣”为标志，时为周武王十一年，相当于公元前1045年^⑨。根据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蓟城必然要经历从原始聚落到古代城邑的渐进过程，城墙的出现尤其具有象征意义。但是，传世文献缺乏具体的建城记载，考古工作也未发现直接的佐证，因此只能将蓟城的始建年代与某个相关的重大事件联系起来，据此确定一个相对而言的年份。在这之后，夏商周断代工程又推荐以公元前1046年为武王伐纣的首选之年^⑩，比前者提早了一年。两个年份各有其学术或社会的影响，此后各方只是笼统地宣传北京有三千多年的建城史，更加具体的“生日”也就搁置待议了。

考诸古代文献，蓟城的诞生要远早于西周初年。司马迁《史记》写道，武王伐纣之后立即“褒封”上古圣王神农、黄帝、尧、舜、禹的后裔，其中褒封“帝尧之后于蓟”^⑪。东汉经学家何休解释说：“有土嘉之曰褒，无土建国曰封。”^⑫这就意味着，武王的“褒封”是对此前早已存在的殷商方国

的政治承认，意在稳定周人尚未控制的东方旧族势力所在区域；代表周人东进力量、划出某片地域新建一国的“封召公奭于燕”之类，则属于“封”或曰“分封”。蓟国既在“褒封”之列，最晚在商朝后期就应存在。如其不然，武王的“褒封”就无从谈起了。根据基本的学术逻辑，蓟国之都蓟城的始建年代至少应与蓟国的历史进程同步，北京的城市起源随之亦当上溯到商朝后期甚至更早的年代。在进一步的文献依据与考古佐证出现之前，将北京的城市起源暂且系于武王伐纣之年，只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权宜之计。

经过上述分析得到的基本结论是：北京城市之源应以明清时期内外城所在的地理空间为坐标原点，在与之局部重合或相互毗连的范围内而不是“跨流域”去寻找。传世文献、考古发现所代表的学理、事理与学术逻辑表明，从广安门一带的古代蓟城到当代北京，是显示城市起源与发展进程的唯一合理的历史地理轨迹。琉璃河镇董家林燕都遗址无疑是北京市境内的重大考古发现，但与北京城分属拒马河流域与古永定河流域，两座物质的城邑相距遥远而且缩地无术，因此它不可能成为今日北京的城市之源。若以董家林燕都发现了遗址而广安门蓟城不见遗址、燕国迁都蓟城促使区域文化南北交融、燕都遗址位于北京市辖境之内等理由宣称“北京从这里走来”，则是有意无意地将历史上北京城始于何时、位于何地这样一个历史地理问题偷换概念，悄悄改变为附着于城市之上的政治关联、人口流动、文化传播与融合等问题，因此也就导致其说悖论迭出。汉代学者对《春秋公羊传》的解释表明，周武王“褒封”的蓟国及其国都蓟城最晚在商朝后期就已存在，唯其有待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的继续印证，因此也就只能权且把北京的城市起源系于与重大历史事件关联的武王伐纣之年而已。

① 老舍:《四世同堂》,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146页。

② (北魏)酈道元撰,陈桥驿点校:《水经注》卷13《漂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72页。

③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69《幽州·蓟县》,中华书局,2007年,第1399页。

④ 侯仁之:《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文物》1959年第9期。

⑤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白云观遗址》,《考古》1963年第3期。

⑥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写作小组:《北京地区的古瓦井》,《文物》1972年第2期。

⑦ 唐晓峰:《蓟、燕分封与北京地区早期城市地理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期。

⑧ 侯仁之:《论北京建城之始》,《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

⑨ 赵光贤:《武王克商与周初年代的再探索》,《人文杂志》1987年第2期。

⑩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第48~49页。

⑪ (汉)司马迁:《史记》卷4《周本纪》,中华书局,1997年,第127页。

⑫ (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卷1《隐公元年》,《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19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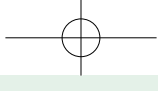
(上接20页)

① 梅宁华:《正确处理危旧房改造与文物保护的关系》,《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② 樊振和、袁超、孙紫强:《基于技术理念的旧城区既有多层住宅环境改造研究》,《工程建设与设计》2007年第5期。

③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年—2035年)》,2020年8月30日。

④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委员会:《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2017年9月29日。



永定河古河道与蓟城

The Ancient Course of the Yongding River and Ji City

岳升阳(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Yue Shengyang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摘要：北京城发端于古代蓟城，蓟城坐落于永定河冲积扇上，它的选址和成长，与永定河古河道有着紧密联系，当它创建时，在它的东北面有古高粱河，西南面有瀑水，是一座选址于古永定河渡口旁的城市。

关键词：永定河古河道 蓟城 古高粱河 瀑水 蓟丘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 The City of Beijing originated from the ancient Ji City, which was situated on the alluvial plain of the Yongding River. Its selection as a settlement and subsequent growth were closely intertwined with the ancient courses of the Yongding River. At the time of its establishment, the city was flanked by the ancient Gaoliang River to its northeast and the Lei River to its southwest, strategically positioned near a historic crossing point on the Yongding River.

Keywords : Ancient Course of the Yongding River; Ji City; Ancient Gaoliang River; Lei River; Ji Hill

一、问题的提出

70多年前，侯仁之先生在英国留学时就试图回答北京城起源与永定河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蓟城的选址与永定河渡口和太行山东麓古代大道关系密切，蓟城是建立在永定河渡口上的城市。为了人们便于理解永定河渡口与蓟城的关系，他在讲课时举了一个生动的假设：有兄弟三人沿太行山东麓大道北行，去北方做生意，渡过永定河后他们就要朝不同方向走了，于是约定来年一同回家。回家时在哪里集合最好呢，当然就是永定河渡口。渡口处的人聚集多了就形成了聚落，发展起城市。那时人们对永定河在北京小平原上的变迁还不很了解，侯先生只能以今天卢沟桥的永定河渡口为依据，推测蓟城与永定河的关系。可是卢沟桥与蓟城相距较远，不能直接说明它是建立在永定河渡口上的城市。为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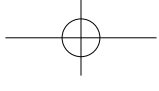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决这一矛盾，侯先生提出一个设想，即由于季节性洪水的影响，永定河渡口上不适合建设城市，于是人们选择了距渡口稍远处的一座高地，这就是蓟丘。

侯先生第一次把古代交通大道和永定河渡口与北京城的起源联系起来，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做了精辟论述，奠定了后人对北京城起源研究的基础。但他对蓟城选址具体位置的论述仍然只是推测，需要有永定河变迁研究来证明。

二、北京平原上永定河变迁研究

(一) 研究概况

这一研究开始于清人对《水经注》湿水的考证，其所依据的是文献辨析，时段为汉代以来，这项研究一直延续到近代。清代是考据学兴盛的时代，清代学者对《水经注》进行了详细考证，认为后世版



本的《水经注》中，关于蓟城南面“湿水”名称的记载是错误的，它应该称为“漂水”。这一推断存在问题，永定河确曾有“漂水”的称呼，可见诸《说文》，但那是指河流上游。在古代，同一条河流不同河段常会有不同的名称，不能简单地拿上游河道名称用于下游，对此需要仔细斟酌。对于流经蓟城地区的永定河，《汉书·地理志》称之为“治水”，曹魏戾陵遏碑文称之为“高粱河”，明版《水经注》中写作“湿水”，并没有“漂水”的记载。有鉴于此，今天的一些研究者仍使用“湿水”的名称，不用“漂水”的称呼。本文为方便论述，暂用“漂水”的名称。

早期的研究者缺乏对古代地貌的考察，在论述时或将漂水定在蓟城之南，或画在今北京城之北，都与古蓟城有一定距离，难以显示永定河古河道与蓟城的紧密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民大会堂、地铁等大型建设项目的开展，人们得以利用地层剖面研究古河道的存在，对古河道的研究逐渐深入。如周昆叔先生等对积水潭地铁工程剖面的研究，就揭示出古高粱河的河道沉积特征^①。

对北京小平原上永定河变迁的全面调查，始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开展的地震地质会战，人们从地质、地貌的分析上揭示出全新世以来永定河在北京小平原上的变迁路径，为永定河与古蓟城关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证据。

研究者通过对大量钻孔数据的分析，结合文献记载，确定了全新世时期的多条永定河故道并冠以名称，包括古清河、古高粱河、古漂水、无定河、浑河、无名河等。指出永定河由全新世初期的古清河开始，自北向南摆动，最终到达今天永定河河道的位置。

人们还提出了“古金钩河”的概念，那是位于永定河冲积扇中部，由石景山向东穿过整个北京城的古河道区域。它包含了三万多年以来不同时期的故道，分属于不同的河流摆动过程。为了更好地体

现全新世以来的永定河变迁，显示永定河与蓟城的关系，我们应将其分解开来，把其中的晚更新世晚期河道与全新世河道相区分。古金钩河的称呼只用于二、三万年前流经此地的永定河故道，而不包括全新世的永定河故道^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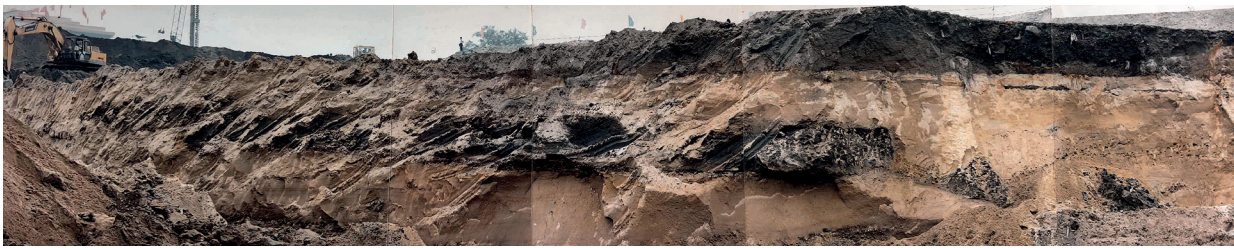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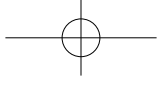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北京地区第四纪古地理研究》所绘“永定河故道图”中的古金钩河横贯北京城地下，包含了晚更新世晚期河道和全新世河道，其余皆为全新世以来的永定河故道。

《北京平原区地震影响小区划》所绘“北京平原永定河古河道分布图”中只将“古金钩河”用于石景山、老山附近的上游河道，对下游河道作了细分，反映了不同研究者对古河道的认识。

这些河道由北向南分布于北京小平原上，它们的顶点是石景山，排列起来宛如张开的折扇。北面河道年代最早，南面河道最晚，呈现由北向南的摆动。对于这一摆动过程的成因，地震地质会战的研究者将其归结为活动断裂带的影响，认为活动断裂带引起地壳形变，也就是地壳抬升或沉降，由此导致河道由北向南摆动。后来也有人认为可能还有科氏力的作用，即地球自转造成北半球河流由北向南摆动。今天我们知道这个由北向南的摆动不是单纯的依次而行，而是有多次来回摆动，只是总趋势是由北向南。对此，尹钧科先生也曾有类似的推测。造成此种摆动的直接原因应是洪水，它比缓慢的地壳形变来得更直接，更随意。在这些全新世河道中，与北京古城关系最密切的是古清河、古漂水、古高粱河和漂水。

（二）古清河

古清河位于永定河冲积扇的北缘，因其故道中后世有清河存在，故地震地质会战的研究者称其为“古清河”。古清河形成于全新世初期，地震地质会战时人们根据古清河砂砾石层中出土的7200年前古树，推测它形成于7200年前。20多年来，我



图一 国家大剧院工地出土的古高粱河砂层

们在古清河故道的砂砾石层中发现数十棵古树遗骸，对古树遗骸的碳-14测年显示，其年代在距今10000年至9000年之间，砂砾石层上面的砂层和泥炭层测年距今约5000年，由此可知古清河存在于距今10000年至5000年前^③。人们通过大量地层钻孔数据的剖面分析，确定海淀至清河一带的古清河河谷宽1.5~3.5千米，最宽处达5千米。在海淀附近，古清河故道形成比两岸低5米左右的河谷低地，低地中泉流遍布，为清代三山五园的水景园林建设提供了理想的地貌环境，五园中除香山静宜园外，都与古清河故道有关。没有这片地下水源丰富的河谷低地，就没有明代宛若江南的水乡景色，更不会有规模宏大的清代皇家园林。

（三）古漂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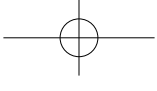
在与古清河相近的时段内，永定河也曾流淌于北京老城南面今丰台区、大兴区一带，由于这里有《水经注》记载的漂水，而河道年代早于漂水，地震地质会战的研究者称其为“古漂水”。人们根据测年，认为古漂水形成于4000多年前，故道宽度达数千米。但从今天的测年数据看，古漂水的年代有可能为距今约9000年至5000年前。和古清河一样，这数千米宽的河床是河流不断摆动形成的，水流本身的宽度并没有那么广，它和后代永定河的规模相差不会很大。可以推想，永定河在此期间不会将水流平均分配于两条河谷，它应是摆动于两河之间。

古漂水是目前研究不够的永定河故道，它的起始时期始终不清楚，本文也只能做出个大致推测。

在晚更新世晚期距今大约三、四万年至一万多年的时候，永定河也有过一次由北向南的摆动，一万多年前也曾流经北京城南一带，古漂水有可能是在其故道中的河流，是它的延续。而后期的漂水又是古漂水的延续。区分这些河流过程，有利于我们分析永定河与蓟城的关系。

（四）古高粱河

距今4000多年前，永定河的一支干流流经今天老北京城内前后三海一线，因后世有高粱河流经其故道中，人们称之为“古高粱河”，由于流经前后三海，也曾有人称之为“三海大河”。古高粱河沉积层的测年数据涵盖了由4000多年前至近2000年前的时段，在此期间，永定河已不再流经古清河，而是在古高粱河与漂水之间摆动。在距今将近2000年前的时候，永定河最终离开古高粱河向南摆动，在古高粱河所经之地留下宽阔的河谷低地，为北京城前后三海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古高粱河的河床宽数百米（图一），有的河段宽度可能达到1千米。地震地质会战时人们发现人民大会堂南面的古高粱河故道宽约600米^④，今天在白石桥附近仍可感受到河谷两岸的岸坡。《水经注》所引戾陵遏碑文记载的高粱河，可能曾经包括古高粱河河段。《水经》记载了这条河：“又东南出山，过广阳蓟县北。”^⑤此“广阳蓟县北”指的就是蓟城北，汉至魏初，广阳郡治和蓟县治都在蓟城。《水经》所记漂水指的就是流经蓟城北面的古高粱河。北魏时广阳与蓟县早已分开，《水经注》遂以为漂水先经广阳城北再



经蓟县故城南，并认为《水经》记载有误。古高粱河故道发现后，人们得以确认《水经》记载是正确的。这还可以从《水经注》关于高粱之水的记载得到佐证：“漂水又东南，高粱之水注焉，水出蓟城西北平地，泉流东注，迳燕王陵北，又东迳蓟城北，又东南流。《魏土地记》曰：‘蓟东十里有高粱之水者也。’其水又东南入漂水。”^⑥“燕王陵”当指老山汉燕王陵墓，由此东流，迳蓟城北，又东南流，迳蓟城东，最后汇入漂水，这正是古高粱河故道所经之地，高粱水是古高粱河故道中的河流，它的源头应在今石景山区一带。

（五）漂水

与古高粱河同时存在的河道有位于北京城南的漂水，它实际上是古漂水的延续，漂水形成的时间与古高粱河相仿，人们在古漂水故道中通过测年发现了距今4000多年前、2000多年前和1000多年前的古河道，即是其遗迹。关于漂水的记载见诸《水经注》卷十三“漂水”，在“过广阳蓟县北”后称：“漂水又东迳广阳县故城北，谢承《后汉书》曰：‘世祖与钊期出蓟至广阳，欲南行，即此城也，谓之小广阳。’漂水又东北迳蓟县故城南，《魏土地记》曰：‘蓟城南七里有清泉河而不经其北，盖《经》误证矣。’……漂水又东与洗马沟水合，……漂水又东迳燕王陵南，……漂水又东南，高粱之水注焉。”^⑦“过广阳蓟县北”的是上面说的古高粱河，“迳蓟县故城南”的是今人所说的漂水，两河同时存在，只是在《水经》所言的时期，主流在古高粱河，在《水经注》时期古高粱河已经改道。清泉河与漂水是永定河在古漂水故道中不同时期的河道，有时距蓟城近一些，有时又远一些，曹魏时期的清泉河就距城远一些，“清泉”一名有可能来自水头庄附近的泉水，这两条河都未超出古漂水故道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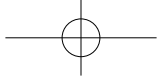
20年前，我们在白纸坊桥以南的北京外城西南

部发现2600多年前至唐代的古河道，河床砂层分布宽度超过1500米。河道的北缘在白纸坊桥以北数十米处，有可能也是古漂水的北缘。在今南护城河西南转角处，护城河底以下2.1米的砂层中，出土2600多年前的古树，应是河流洪水所致。由此沿南护城河向东，在右安门桥西200米处，护城河底以下2.9米的砂砾石层中，出土距今2500多年前的古树残段。在右安门桥西约100米处，护城河底之下2.4米处，可以看到夹有战国、西汉绳纹陶片的斜层理砾石层。在开阳桥以西500多米范围内，有唐代洪水形成的河道砂层，砂层下埋藏的河滩遗迹里有距今1200多年前的树木残骸。河道的横截面宽度为300多米，砂层中有两个唐代木船残骸以及疑似独木舟的残骸。河道的东北缘在陶然亭公园南部，河道砂层在此尖灭。由护城河西南角向北，在护城河西南角与白纸坊桥之间1500米范围内，为2000多年来的河道砂层或砂砾石层。在白纸坊桥南约290米处，一个砂层透镜体向南尖灭处，砂层中包含有北朝手捏纹瓦片，应是那个时期河道水流的南缘。在白纸坊桥南100米范围内，有多道东西向分布的河岸遗迹，出土有石驳岸、木桩、木船残骸等遗迹，时间在隋唐时期^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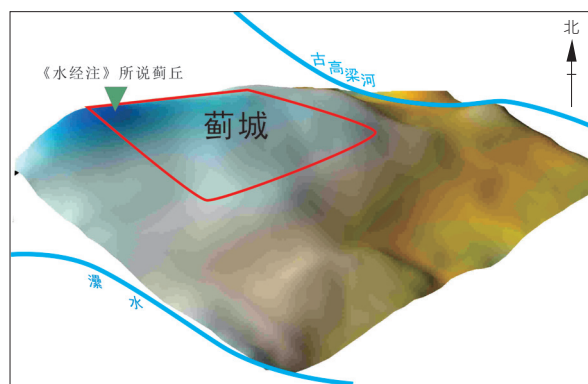
在白纸坊桥东南，建功大厦工地曾出土汉唐时期的砾石层和砂层，其中夹杂有大量这一时期的瓦砾（图二）。



图二 建功大厦出土的含有瓦砾的砂砾石层



图三 建功东里危改商住楼工地砂层中的瓦砾



图四 蓟城所在高地示意图

在白纸坊桥东200多米处白纸坊路南的建功东里工地，出土有该河道砂层，那里已是河道边缘，砂层中夹杂有大量汉代城市垃圾(图三)，包含王莽货泉钱币一枚，有可能是被洪水由北面蓟城冲来的^⑨。

这样宽广的河道规模仅靠西湖流出的洗马沟是难以实现的，应该有永定河的一支干流流经此地，至少是时而光顾此地。它决定了蓟城不可能选址于白纸坊一带地势低洼的河谷低地中，而应在南横街及其以北的高地上。

三、蓟城选址于两河之间的高地上

在这些永定河古河道两侧，受洪水和风力影响，往往会形成自然堤、高岗、沙丘的地貌，古清河、古灞水和古高粱河也不例外。这些河畔高地为聚落和城池选址提供了理想场所。在古清河故道南岸出土有位于北京大学校园内的燕园新石器晚期遗址，有海淀台地边缘分布的早期聚落遗迹。在古清河故道北岸有位于朱房的汉昌平城遗址和上地汉墓群等。在古灞水南岸黄土岗至旧宫一带的早期高地上，发现有旧宫附近的西周时期村落遗址，新宫附近距今4000年至2000年前的新宫遗址，遗址中有疑似与城池相关的环境祭祀遗址。而在灞水和古高粱河之间的高地上，则是早期蓟城选址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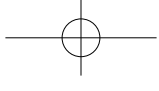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在古灞水北岸，分布着一条断断续续的带状高

地，这条带状高地西起老山、八宝山的背水一面，东至木樨地一带转向东南，结束于亦庄一带。在它的西段，即八宝山至木樨地的一段，受到晚更新世晚期和全新世初期河道的影响，其北面是地震地质会战时所称的古金钩河故道，即玉渊潭河谷低地。南面是一万多年前的永定河故道和全新世时期的古灞水河道，高地下面是隆起的前第四纪基岩。

高地中段位于木樨地至永定门一带，从广安门内广义街原义利食品厂工地出土剖面看，这段高地形成于一万年前^⑩，它的东北面为古高粱河故道，西南面为古灞水故道。受到古灞水河道下切的影响，在其西南面形成陡坎，高地与河谷的相对高差约为5~7米。高地的南段地势降低，断断续续延伸至亦庄。

古蓟城位于高地中段今广安门至宣武门一带，这里地域开阔，地势高爽，两侧临河，非常适合于筑城。为了解当地的古地貌，我们选取了数百个工程钻孔数据，把人工填土底面，也就是自然沉积地层顶面的高程数字连接起来，绘成一幅近似三维的图像(图四)，从图中可以看出，蓟城所在地是一处方圆数千平方千米的高地，它为蓟城选址创造了良好条件。高地的西北角地势最高，是《水经注》所称的蓟丘。

中国古代对都城的选址十分讲究。早在先秦时的《管子·乘马》里就说过：“凡立国都，非于大山



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管子·度地》又云：“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其意思是说，在都城选址时，必须考虑地势、河流等自然环境因素，临水的高地是理想选择，既便于用水，又利于防御。

蓟城的选址完全符合《管子》提出的标准，它选址于永定河岸边的高地上，临河而建。且处于两条河流之间，一条是古高粱河，一条是漂水，还有注入漂水的洗马沟，呈现为二水夹一城之势。这种选址方法在先秦时期具有普遍性，例如陕西榆林地区发现的众多古城址多选址于两河之间。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诸侯国都也是如此，如燕下都位于今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新郑郑韩都城在今黄水河和双洎河之间等，都是如此。蓟城也不例外，采用同样做法。

蓟城在选址上和同时期的其他诸侯城一样，是在渡口要津上建立起来的城市。而蓟城与许多诸侯国的城市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处在华北平原北端南北交往的重要交通枢纽位置，当王朝更替，政治地理格局发生变化后，它并没有因此而消亡，没有湮没于农田荒野之中，而是被后来的王朝所利用，逐渐发展起来，最终成为王朝都城。它后来由于河流改道而远离了永定河，但由古代大道系统和交通要津形成的区位优势，却深深地刻印在中国北方的大地上，影响着北京城的成长。

四、莲花池古湖泊与蓟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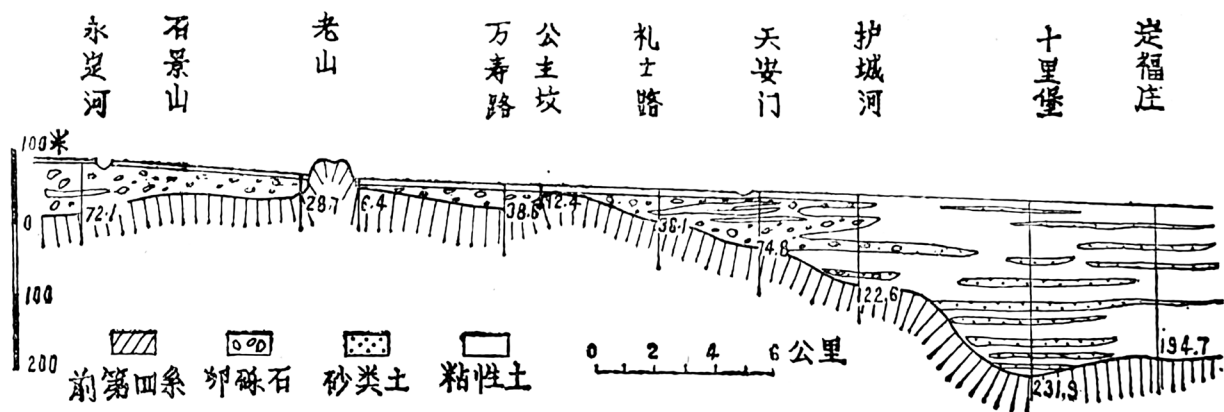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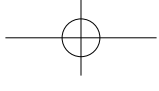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1998年春，侯仁之先生在给北京市委领导讲解北京城的历史时，使用了“从莲花池到后门桥”的题目^⑩，指出莲花池是蓟城到金中都城的水源，在北京城早期发展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莲花池位于西客站南门外西侧，东西长400多米，南北宽300多米，接近古代一里，但在北魏酈道元写《水经

注》的时期却是一处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的大湖，它处在永定河冲积扇的潜水溢出带上，是一个由泉水和河流形成的湖泊。《水经注》对其描述称：“漂水又东，与洗马沟水合，水上承蓟水，西注大湖。湖有二源，水俱出县西北平地，导源流结西湖，湖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盖燕之旧池也。绿水澄澹，川亭望远，亦为游瞩之胜所也。”^⑪西湖水向东南流，经过蓟城南门外，后世称之为莲花河，侯先生称之为莲花河水系，蓟城选址于莲花河水系。

但近几年对于莲花池与蓟城的关系也出现不同看法，有的研究者认为古代蓟丘在今天的西客站处，其依据是西客站地下的一个地质现象。原来在西客站施工时，于西客站地下数米深处出土一处隆起的早于第四纪的地层，地震地质会战称之为前第四纪基岩，也就是第四纪之前的第三系地层，工程上也有称之为第三系基岩的。它其实是一层暗红色的卵石层，在西客站北面的羊坊店、公主坟地区埋深12~15米（图五）。西客站地区地势低洼，前第四纪基岩微微隆起，接近地表，给人感觉宛如一座埋在地下的丘。于是有的研究者推想它在3000年前是出露地面的高丘，即《水经注》记载的蓟丘，古蓟城就在今天的莲花池、西客站一带。然而，这样的看法并不准确。

图五中在公主坟一带前第四系地层有一个凸起，埋深约12.4米。

1993年，北京大学徐海鹏老师等利用西客站工程，对西客站一带的地层剖面进行了详细调查，采集到多个剖面，做了大量的碳-14测年。其中莲花池古湖泊黑色沉积地层的碳-14测年数据集中于距今4000多年至2000多年之间，它表明那时的莲花池是片烟波浩渺的大湖，湖的东面到达西客站以东区域，西面到达三环路以西的吴家场小学，北面到达莲花池东路以北的原铁路小学南部，南面不详，或许到达今天广安门外大街一带。在原铁路小学工地，可以看到灰黑色湖泊沉积层向北尖灭，在临近



图五 石景山—东郊定福庄第四系地层剖面图
(图片来源:《北京地区唐山地震震害调查资料汇编》)

湖岸的灰黑色沉积地层中,出土有西汉时期的罽云母红陶片,说明那时莲花池的北岸仍在此附近。

由徐老师所记地层剖面 and 大量照片看,当地前第四纪基岩顶部距今天地面还有数米距离,处于古漂水砂层覆盖之下。其顶面被古漂水冲刷得坑凹不平,在古漂水砂层之上,有古莲花池的沉积层和覆盖其上的晚近沉积地层(图六—图八)。由此可知,在古蓟城出现的时候,前第四纪地层已隐没于地下,不可能有小丘露出地表。在3000多年前,当地已是古莲花池的湖区,蓟城不会选址于此。



图六 西客站东大坑西北壁地层
(徐海鹏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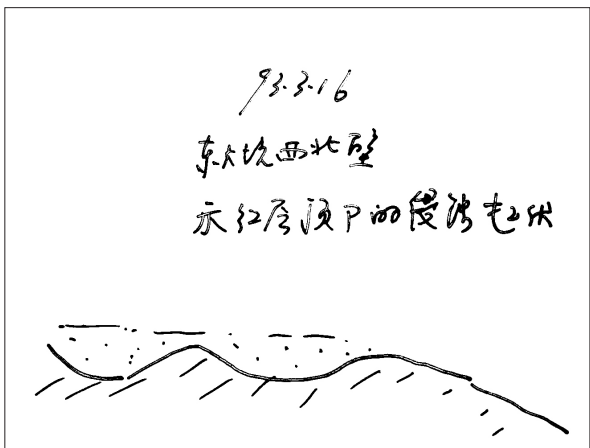
五、古蓟城的城址特征

蓟城选址于古高粱河与漂水之间,南临漂水和洗马沟,那是古高粱河与漂水同时存在的时期,但具体为何时,没有人能说清楚,因为当地发现的主要是战国以来的遗迹。我们或可明确的是,至少在战国时期蓟城已在古高粱河与漂水之间出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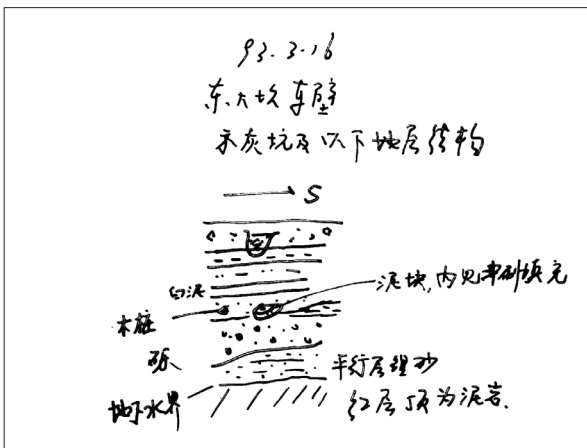
关于战国西汉蓟城在这一区域的存在依据已在他文介绍,此不赘述^⑮。多年来,在这数平方千米的区域内发现大量战国、西汉时期的陶井和其他文化遗存,分布范围由广安门外二环路两侧到南新华街附近,其中以菜市口以西的区域分布最为密集。

它是北京地区已发现面积最大的战国、西汉时期遗址,符合先秦诸侯国都和汉代郡、王国治所的规模。

但对于早期蓟城仍有许多谜团,人们在此区域内尚未发现大量战国以前的遗迹,不但西周时期的蓟城不知所在,就连春秋时期的蓟城也难确定。而且战国时期燕国诸侯墓葬也没有埋在蓟城附近,蓟城附近少有燕国时期的高等级墓葬。这给人们提供了许多想象的空间,提出不少早期蓟城位置的设想,但也都缺乏史料和考古的支持。尤其是燕国都城如何由琉璃河西周都城迁移至今天的北京城下,



图七 西客站东大坑西北壁所示红层顶部的侵蚀起伏示意图
(徐海鹏绘于照片背面,“红层”为前第四纪基岩)



图八 “红层”(前第四纪基岩)顶面至地表的沉积层特征
(徐海鹏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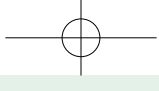
其过程更是扑朔迷离,二者之间至今存在时间上的断档,有较长的空白期。对于燕国“以蓟为国”的时间,研究者或定在西周,或定在春秋,或定在春秋战国之际,或者只是战国。其中原因之一是蓟城遗址的考古和研究比较薄弱,拿不出年代较早的考古证据,已发现的蓟城遗址年代较晚。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蓟城遗址附近陆续发现

了一些西周时期的遗迹,让人们看到解决问题的曙光,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终有一天我们会破解早期蓟城演变的谜团,永定河古河道研究可为这一探索提供环境背景依据。

感谢徐海鹏老师提供照片和资料,魏晋茹给予帮助。

- ① 周昆叔、严富华、梁秀龙等:《北京平原第四纪晚期花粉分析及其意义》,《地质科学》1978年第1期。
- ② 岳升阳、马悦婷、齐乌云等:《古高梁河演变及其与古蓟城的关系》,《古地理学报》2017年第4期。
- ③ 岳升阳、夏正楷、徐海鹏:《海淀文史·海淀古镇环境变迁》,开明出版社,2009年。
- ④ 北京市地质地形勘测处:《北京城区全新世埋藏河、湖、沟、坑的分布及演变》,北京市地震地质会战办公室编:《北京地区唐山地震震害调查资料汇编》,1978年。
- ⑤ (北魏)酈道元撰,陈桥驿点校:《水经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72页。
- ⑥⑫ (北魏)酈道元撰,陈桥驿点校:《水经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73页。
- ⑦ (北魏)酈道元撰,陈桥驿点校:《水经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72~273页。
- ⑧ 岳升阳、苗水:《北京城南的唐代古河道》,《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 ⑨ 引自勾海堂微信公众号:《白纸坊桥南的唐代古河道》——阅读大地文献(三十四),2020年5月31日。
- ⑩ 岳升阳、苗水、徐海鹏:《北京古蓟城城址古地貌环境演变研究——以广义大厦工程剖面为例》,《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年第5期。
- ⑪ 侯仁之:《从莲花池到后门桥》,《侯仁之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
- ⑬ 岳升阳:《由出土遗迹看战国西汉蓟城位置》,《北京史学》2024年第1期。



从辽南京到金中都 ——再谈北京“建都之始”^①

From Liao Nanjing to Jin Zhongdu: Revisiting the “Founding of the Capital” in Beijing

吴文涛(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Wu Wentao (Institute of History,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摘要：对于何时是北京城的“建都之始”，一直存在着争议。2003年学术界达成某种共识并由政府认可后，坊间仍有些不同的观点。本着学术研究无止境的原则，对此无可厚非且当表示欢迎。本文试从多个角度再对这一问题进行资料梳理和论点补充，通过比较分析和科学精确的尺度再次阐述以金中都作为北京都城开端的观点。

关键词：辽南京 金中都 北京城 建都之始

中图分类号：K 291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 The question of when Beijing’s “founding as a capital” began has long been a subject of debate. Although a consensus was reached in academic circles and recognized by the government in 2003, different perspectives continue to emerge. In line with the principle that academic inquiry knows no bounds, such diversity of opinions is understandable and should be welcome. This article revisits the issue by examining it from multiple angles, supplementing existing arguments with additional data, and reaffirming,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a scientifically precise framework, the view that Jin Zhongdu marks the beginning of Beijing’s history as a capital c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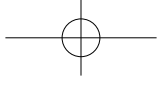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Keywords : Liao Nanjing; Jin Zhongdu; Beijing city; Founding of the Capital

北京城在历史上曾多次成为都城，如商周时期的燕都、战国时期的燕都、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一些割据政权的都城、辽朝的“五京”之一辽南京、金代的“五京”之首金中都、元朝的元大都、明清的京师等。所以关于北京的建都史，尤其是作为都城开端始于何时这个问题，也有过多种说法。而比较通俗的说法是，北京是“五朝(辽金元明清)古都”或“六朝(加北洋政府)古都”。但其实这是个把都城的标准和起始划定都模糊化的笼统说法。其所谓“都”既包含了首都也包含了陪都，把辽金时期总体上看成是北京成为都城的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是“千年古都”没有问题。但如果用更

加科学精准的尺度去衡量，通过对国都概念、定都法理、城市格局、制度、功能、属性及其后世传承和延续性等方面的深入考察，学术界还是更认同把1153年金海陵王迁都燕京作为北京国都或首都的开端。

一、关于北京“建都之始”的“都”是指国都或首都

关于北京建都之始，是辽南京？金中都？或者元大都？甚至于更早时期的蓟城？燕都？分歧的关键就在于对“都”的理解和定义。由于没有明确的



定义、内涵、外延，没有在此基础上形成统一的、类似于“准入资格”的衡量标准，因而关于北京建都起始的问题就陷入了各执一词、众说纷纭的状态。北京“定都”应该从何开始，需要首先厘清基本概念，否则就无法在同一个逻辑层面上进行比较分析。而制定这个标准，一方面须来自专业研究者遵循通用学术规范与基本学术逻辑所达成的学术共识，另一方面也要符合长期积淀且被大众认同的文化传统与社会心理。

首先，对都之概念的学术层面考察。都，本义之一是国都，在古代分为两个层次：即“帝王之都”和“诸侯之都”。“都”的本义之二是城邑。如果进一步细分，“城”与“邑”也各不相同。《左传》云：“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②《说文解字》对“都”的解释也是：“有先君之旧宗庙曰都，从邑者声。”^③在敬天法祖的古代宗族社会里，凡是有执政者所属家族的宗庙、内中供奉历代祖先牌位的城邑，叫作“都”；没有这些礼制设施的城邑，就叫作“邑”。显然，“都”就是帝国或诸侯国的政治中心。随着诸侯分封制的式微，都、都城、都邑、国都等原生或派生的概念往往不再细分；进入集权化的帝制时代后，“国都”或“都城”通常只剩下“帝都”这层含义，而诸侯之都这个概念渐渐消失。人们认同的符合传统礼制要求、具有法定地位的国都，也就是“帝都”“皇都”或“京师”，它是整个国家最高政治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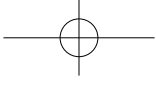
关于“陪京”或“陪都”，即指称国都以外辅助性的都城，它们都属于宽泛意义上的“都城”之列，但其法定地位只是“国都”（全国政治中心）的“附配”。

“首都”这个词出现得比较晚，清末以后才开始用“首都”称呼“京师”（即北京），其语意来源于“京师是天下首善之地也”^④。也就是说它更加突出了此前官方与民间对于国都、皇都、帝京、京师这类称呼的“首要”特征——也就是“天子之居”，

最高统治者在此理政，国家的政令从此发出，这种独一无二的政治中心地位决定了无论称呼怎样，它都是国家的最高统治中心，相当于今之“首都”。历朝历代通常所说的“定都”，所定者也正是一个政权的“首都”；即使不是统一国家的“首都”，也应当是其当世相应的政权统治区域的政治中心。

我国历史极为悠久，各民族政权的更替又很复杂，史念海先生在其《中国古都和文化》一书中以“其当世相应的政权统治区域的政治中心”为核心标准总结出：“自（夏商周）三代以下，我国共有古都217处，涉及的王朝或政权277个。……如果就狭义的古都而言，本文初步提出65处。”^⑤在数目如此众多的古都中，中国古都学会经过多次会议研讨，根据王朝或政权的统治范围、存在时长、延续性、影响力等多方因素的考察，先后形成了以“廿五史”序列为界定标准的“六大古都”说（1983）、“七大古都”说（1991）、“八大古都”说（2007）。2010年以来被中国古都学会认定并陆续出版的中国古都丛书列举了“自西周开始历朝主要的国都”有：西安、洛阳、北京、开封、郑州、成都、南京、杭州、银川、大同、苏州和赤峰^⑥。其中，被世人广泛认同和熟知的还是“八大古都”——西安、洛阳、北京、开封、郑州、成都、南京和杭州。这些是“廿五史”中纳入了中华正统谱系的王朝之都，其中既包括了大一统王朝的全国性都城，也包括了分治时期的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宋、辽、金都城。按照这一标准，就北京地区而言，黄帝后人的蓟城、西周或战国的燕都、西汉及以后的封国之都、慕容儁的蓟都、史思明的燕京、刘守光的幽州城等，都不足以视其为北京建都史的开始，只有辽、金、元的都城在本文讨论范围中。

而从“都”的概念产生及其内涵演变的分析阐述来看，无论是统计成几大古都，北京均位居我国著名古都序列的前茅，这主要是因为其突出的“国都”地位。因此，我们所说的北京建都之始的“都”



是指国都(类比于现代意义的首都),即王朝或政权的最高政治中心。

总之,随着历史发展、社会变迁,“都”或“都城”的含义日渐趋简,延续至今已经大致等同于国家的“首都”。因此,当今关于北京“建都之始”的界定,只能是这座城在历史上作为“国家首都”而不是“诸侯国都”的开端。基于历史标志性事件和时间节点的考察,这个年份只能是金海陵王颁诏正式迁都燕京并改名中都的金贞元元年(1153)。尽管当时的金朝还不是南北统一的国家,但金中都由此成为这个王朝的“首都”。

二、辽南京是铺垫,金中都是开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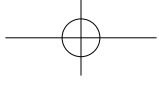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城市的发展演变的确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后朝肯定会在前朝的基础上有所继承和演进。金中都也不是横空出世的,它与辽南京的历史连接是不可切断的。正是有了从最初的诸侯分封国的都城到重要的军事藩镇、再到辽南京这样的“陪都”,历史上的北京才逐步从一个政权的区域性政治中心上升为王朝最高政治中心。前面都是积累和铺垫,到了金中都完成了转折——正式成为国都,继而开启北京的首都时代。

辽南京在辽以后的史籍中通常被称为“陪都”,是历代记录者类比中原王朝的都城体制对辽南京做出的大致定性。当代学界根据古今认同的基本逻辑与历史传承的规律,接受这一长期积累的共识,也有研究论证其符合辽代历史发展的基本史实。元人脱脱等修《辽史》,其中的“地理志”之所以首先叙述“上京道·临潢府”,就是因为这里是辽国(契丹)的“皇都”所在。契丹政权保留了浓厚的游牧民族传统,实行的是以“四时捺钵”为主的行国体制,其所建的五京与中原王朝传统意义上的都城并不相同。其最高政治中心在皇帝的捺钵地,中央的主要机构与官员都要随着皇帝的四时捺钵而不断移

动,实际上是高配版的营帐生活。而五京则类似于中央派出机构,它们各有分工,承担着不同的政治功能。其中上京临潢府,是作为祖宗的老营盘、国之根本所在,具有最高政治意义和政权象征地位,无疑是“五京之首”。《辽史·地理志》在“上京道”之后,依次有东京道、中京道、南京道、西京道诸卷,这样的排列顺序既符合五京的设置先后与由北而南的地理方位,更是上京临潢府作为“五京之首”理应享有的尊重。而南京析津府则不具备这样的政治地位,其首要的政治功能是治理南京地区的汉人,并负责宋辽边境的军事防务。

一个城市是否为“国都”(“首都”)的标准,首先应属于国家指定或者认可的“政治中心”,而不存在包含人口、经济、建筑、文化、机构等要素在内的所谓“指标体系”。往往是被选定为都城之后,才带来人口增长、经济上升、文化发展、机构增加等一系列变化,城市面貌才可能焕然一新,在古代尤其如此。也就是说,择定都城首先是统治者意志决定的(当然他们也是经过多方考察精心选择的),经过朝廷会议并正式颁布诏书、载入史册的,它是有法理依据和法定意味的。在契丹立国之初,就将临潢府确立为“皇都”,而后陆续攻下燕云十六州后才设置五京,随即将临潢府改名为上京,依旧给予其最高政治地位。作为一座都城,往往是先定都后发展,反之的“逆向判断”则并不成立。毫无疑问,辽南京的确是当时契丹境内人口数量最多、经济最繁荣、建筑最宏伟、文化最发达、机构类型最完备的城市,但它仍然不是“首都”。因为无论它的经济体量有多少、城市规模有多大,它的政治地位始终居于“皇都”临潢府之下。

其次,作为最高政治中心的必要条件还得是“天子居所”,政权最高统帅居于此,政令发于此,此地才是帝京或国都。有观点认为,契丹的皇帝也曾多次来到辽南京,尤其是统和年间的辽圣宗与萧太后经常驻跸于此,再加上它是辽五京中人口最



多、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城市，因此已在“事实上”成为国家的“首都”^⑦。契丹的皇帝曾多次来到辽南京，统和年间辽圣宗与萧太后也确实多次来到南京，主要是处理与北宋相关的军政事务，或抵御宋军北伐，或率军南下进攻北宋领地。在南北对峙、激战频繁的特殊时期，天子亲临前线，驻守南京这一地理枢纽和军事堡垒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实乃军情与外交使然。但当契丹统和二十二年（北宋景德元年）十二月（1005年1月）双方订立“澶渊之盟”实现南北和平之后，辽国皇帝很快就回到北方的老根据地地上京，而不是留在人口最多、经济文化最繁荣的南京。我们只需从《辽史》记载中简单统计一下就会发现，辽圣宗自统和二十五年（1007）离开南京，直到十八年过后的太平五年（1025）才重回此地。再加上兴宗、道宗、天祚帝3位皇帝8次经行南京，在辽朝后期的大约120年之内，即使以最宽泛的标准统计，4位皇帝在南京的时间也不足25个月，平均每年大约6天，辽南京显然不是辽朝的“天子之居”。

他们对中原的想法和目标仅限于攻城略地、获得财物和人口。且看辽太宗与其母述律太后的一段对话——述律太后说：“使汉人为胡主，可乎？”太宗曰：“不可。”太后说：“然则汝何故欲为汉主？”又说：“汝今虽得汉地，不能居也。”^⑧述律太后又对臣僚们说：“自古及今，惟闻汉来和蕃，不闻蕃去和汉。”^⑨由此可见，契丹统治者并无一统天下做中国皇帝的意识。因而，他们对已经占领的幽燕地区仍然实行“汉人治汉，契丹人治契丹”的分化策略^⑩，也就是“两面官”制，对汉族居住地区和东北契丹等族居住地区采取南北分治政策。所以当时的辽南京地区并没有大规模的契丹移民，城里和四郊主要还是汉族居民。据北宋使者路振出使辽朝的笔记《乘轺录》记载：幽州城内“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楼，大署其额……并唐时旧坊名也……居民棋布，巷端直，列肆百市，俗皆汉服，中有胡服

者，盖杂契丹、渤海妇女耳”。城中的驻军也是汉军八营，“皆黥面给粮，如汉制”^⑪。其城市格局，正如于德源先生所言，“虽然自唐中期以后，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幽州城的封闭格局已有所改变，个别商铺已越出市门，甚至深入坊里，但在辽朝统治的一百八十余年间，这座城市仍基本保持着坊里旧制形式”^⑫。也就是唐幽州城的风貌，连风俗习惯也和过去没有太大变化，仍以汉习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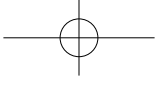
但是辽朝毕竟在这里修建了皇室宫殿，给予了“五京”名号，所以人们通常比喻辽南京为北京建都史的序幕，说明其对北京建都有前期铺垫作用。但诚如陈平先生所言：辽南京“不算正牌的‘皇都’或‘首都’，因此，……只能算是一出在金元明清四朝皇都正剧前边做导引、铺垫的‘开锣戏’”^⑬。而在辽史研究的学术圈里，主流观点更是倾向于辽五京并不等同于中原王朝的都城概念，冠以辽南京“陪都”这样的称呼也只是从中原传统概念出发的一种类比。

作为王朝政治中心的开始是由法理界定的，它有明确的时间节点。辽朝立国初年明确颁诏确定的是以临潢府为“皇都”（国都，后改称上京），金朝1153年皇帝颁诏正式迁都，是以金中都为首都，这都是其礼制国法所明确的。“陪都”辽南京不能作为当代意义上的“北京建都之始”，这个开端应当属于1153年的金中都。

三、确立金中都为北京都城开端的理由

（一）作为都城开端，具有明确的颁布诏书的时间节点和标志性的迁都事件

虽说城市的发展演变是一个渐进性的历史过程。但作为王朝政治中心的开始是由法理界定的，通常由皇帝颁布诏书予以确认和宣布，这个是有明确的时间节点而载入史册的。1153年金中都作为金朝的首都就是皇帝迁都诏书所明确的，为此金朝还



更新了年号——贞元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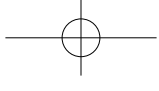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金朝统治者对于“天下”的认识与契丹人大为不同，他们欲为中国正统的观念较为明显^④，有着强烈的“居天子之正”“合天下于一”的意识。他们认为“燕京乃天地之中”。海陵王即位之后，先是在1150年削去了北京临潢府的京号，而后发动舆论造势，计划迁都燕京。天德三年（1151）四月，他在启动燕京城的扩建工程时颁布了一份诏书：“昨因绥抚南服，分置行台，时则边防未宁，法令未具，本非永计，只是从权。既而人拘道路之遥，事有岁时之滞。凡申款而待报，乃欲速而愈迟。今既庶政为和，四方无侮，用并尚书之亚省，会归机政于朝廷。又以京师粤在一隅，而方疆广于万里，以北则民清而事简，以南则地远而事繁。深虑州府申陈，或至半年而往复；闾阎疾苦，何由期月而周知？供馈困于转输，使命苦于驿顿。未可时巡于四表，莫如经营于两都。眷惟全燕，实为要会。将因宫庙而创官府之署，广阡陌以展西南之城。勿惮暂时之艰，以就得中之制。所贵两京一体，保宗社于万年；四海一家，安黎元于九府。咨尔中外，体予至怀。”^⑤这份诏书的中心意思是：因京师偏处一隅，而疆土广袤纵横万里，导致京师以北民众稀少、政事简单，京师以南则相距遥远、事务繁杂。为便于南北统筹，政令通达便捷，今考察燕京一带的形势，确属紧关节要之地。计划将那里的现有建筑改造为官府衙门，开辟道路并展拓燕京旧城，使国都定在居中的合适位置，“以就得中之制”保江山万年，百姓和睦安宁。从这份诏书中可以看出，海陵王是以“国都”目标来设计和安排迁都的。

经过两三年的规划营建，燕京城宫室苑囿告成，贞元元年（1153）三月乙卯（4月21日）海陵王遂正式颁布《迁都诏》：“改元贞元。改燕京可为中都，府曰大兴府。汴京为南京，中京为北京。”^⑥名为“中都”，取其居天地之中的意思，中都（燕京）由此成为金朝的首都。

（二）具有“首都”标准的城市建设和治理

1. 金中都的城市建设吸收了中国传统国都的营造理念，城市布局体现了承上启下和南北交融的新都城特点

金中都的建设，是仿照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的建筑格局和宫室制度，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进行的大规模扩建。海陵王在营建中都城之前曾“先遣画工写京师（汴京）宫室制度，至于阔狭、短曲画其数，授之左相张浩辈，按图以修之”^⑦；“命左右丞相张浩、张通古，左丞蔡松年，调诸路民夫筑燕京，制度如汴”^⑧。营建过程中，甚至金中都的部分建筑材料也直接来源于开封。他效仿北宋东京的一个核心，就是利用整个城市的扩建，巧妙地把皇城摆到了全城的中心位置。在辽南京，宫殿苑囿位于整个城市的西南部，延续了汉唐时期幽州城的旧格局。完颜亮在扩建金中都城时，不是将整个城市的四面均等向外扩展，而是将其东、南、西三面向外扩展，便使得原来偏于城市西南部的宫殿苑囿变成了整个城市的中心。同时，作为中原都城应该有的各种设施，如与宫殿配套的皇家园林，安葬帝王的皇家陵寝，举行各种重要礼仪活动的坛庙场所，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僚衙署等，都是参照了北宋汴京的皇城格局，从而使中都城符合了中原王朝国都的规范化标准。而后依次排开官署、内省、宗庙、学府、寺院、苑囿等，使金中都具备了布局方正、中轴对称、面朝后市、坊巷分割、状如棋盘的规划特点。尤其是，金朝人不仅把园林纳入皇城，在皇城内外国都建有园林，而且在城外风景优美的地方如玉泉山、白莲潭（今什刹海一带）、南海子等均兴建离宫别苑，这反映出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理念，在中国都城规划及建设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为后来元大都的规划提供了直接的蓝本和架构基础。总之，它一方面采纳了中原王朝城市建设的精华，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国都建造理念；另一方面，又展现北方民族的文化习俗和地域特



点，具有很强的文化包容性和融合度。

2. 金中都的城市性质和功能已明确为北半个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不仅是城市布局，从幽州城、辽南京到金中都，城市的性质也有了很大不同。金代的帝王尤其是海陵王以后的世宗、章宗等，一年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中都处理朝政，连传统的“春水秋山”习俗也改在中都城外的风景名胜进行。辽南京城对契丹人来说，是伸进中原的一块“跳板”；而金中都对女真人而言，是“天地的中心”。因此，对城市的营造有天壤之别。辽南京虽然也有皇城宫殿，但只是偏于西南一隅，城池格局一应沿袭原来蓟城和幽州的规制并无太多建树，中央衙署机构等主要仍在上京，整个官僚体系和贵族势力盘踞漠北，南京城仍是辽朝的一个军事重镇。金中都则完全按照《周礼·考工记》中汉王朝都城的标准，城市的各项功能一应俱全，符合首都的规格和地位。

金中都的地方管理体制已经不是单纯的军事机构统属，而由行政（路府州县）、司法（按察使、警巡院）、经济（都转运司及其附属机构）、城防（警备，如武卫军都指挥使司、都巡检使司、兵马司等）四大系统组成，金朝尚书省的各部还在中都设立了若干直属机构，如榷货场、交钞库、市令司等，鲜明地体现出政治中心的功能与作用。并且，在这些管理机构中，既有女真贵族，也有汉人、契丹人及其他族人担任官员，没有严格的高低等级划分。

在中都城，设有最高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下设国子学、太学、女真国子学、女真太学等学府。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都要在中都城中进行府试、会试和殿试，到时各地才子精英都齐聚中都以供朝廷选拔。此外，随着司天台、太医院、翰林院、译经所、国史院等一批文化、科技机构在中都的设立，金中都吸引、汇聚了北半个中国各民族及各领域的杰出人才，带动了教育、文化、科技、艺术等的蓬勃发展。儒学进一步向北方传播发

展，很快占据统治地位；佛教、全真道在中都地区也同样兴盛起来，各种庙宇宫观遍布城里郊外，尤其是西山一带寺庙的繁盛就是自辽金以后逐步发展而来的，而著名的“燕京八景”之说也是发源于金朝。这些，都反映着金中都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宏大气象。

3. 对后续城市发展影响深远

虽然早在先秦时期，蓟城就曾经是燕国的都城，其作为封国或者区域性政权中心的历史由来已久。但是，中间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藩镇时期，都城的格局和地位不仅没有延续发展反而被削弱。而金朝人对金中都的营建，有力地推进了民族融合的进程，从多元一体文化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体现天人合一、中正和谐之文化理念的城市格局对后世的影响以及城市的继承性、延续性来看，都为后来元明清定都北京、成为大一统王朝的首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无论是宫殿建筑、坊巷街道、水系格局、园林分布、漕运体系等等，都为后世所承接发展。

总之，从金中都开始，北京这个城市才真正成为一个政权（或者王朝）的最高政治中心。金代对中都城的营建，是围绕王朝政治中心这个核心功能的，它推进了一系列相当于首都功能建设的重要举措。主要包括：延续中原王朝统序，确定法理地位；设立中央机构，完善国家制度；规范国家礼仪，设立国家祭祀制度；实施国家行政管理；汇聚人才精英；加强文化建设；促进民族融合。在“首都”的视域下进行了规范化的城市治理。从而，使得金中都成为一座体现着多元一体、中正和谐的先进文化理念、既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又包容万象、辐射四方的中心城市。在城市建设、经济发展、文化科技、民族融合等诸多方面，显现出首都功能的日趋成熟和完备。它奠定了元、明、清都城格局的基础，使城市的性质、规模和地位有了根本改变，因而，我们把它作为中国首都、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开端。



（三）学术圈的共识

2003年10月，由北京市文物局和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共同举办了“北京建都8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大部分学者都赞同以“1153年金中都的建立作为北京建都开端”，会后出版的论文集《蓟门集——北京建都850周年论文集》就是这次会议的成果。从中可以看到，朱耀庭、王岗、黄凤岐、于德源、朱祖希、林荣贵、李秀莲等来自京内外各个史学研究机构的很多专家都明确表达了“金朝是第一个在北京建立首都的王朝”^⑩，它为元明清定都北京奠定了基础。因而，此次会议被认为是史学界基本达成共识，会议成果也被写成报告提交北京市委市政府。

除此次会议论文集展示的成果外，先后还有很多著名学者也在他们的论著中表达过类似观点。如于光度、常润华先生所著《北京通史》第四卷（金代卷）、阎崇年先生的《古都北京》、北京市文物局编（齐心先生主编）的《金中都遗珍》、王岗先生的《古都北京》、朱祖希先生的《中国历代都城最后结晶——北京城》，以及上文所引陈平先生的《古都变迁说北京》等，他们都把金中都的建立看作北京成为王朝政治中心的发端（或肇始），强调是金中都奠定了北京的首都地位。

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公元1153年城市扩建竣工，定名中都。实际上这中都城就是北京在城市发展史上开始上升为全国政治中心的起点。”^⑪2003年，为纪念北京建都850年，原宣武区政府在金中都大安殿遗址东侧修建一座高12米的“北京建都纪念阙”，基座上铭刻了侯仁之先生撰写的《北京建都记》：“北京古城肇兴于周初之分封，初为蓟。及辽代，建南京，又称燕京，为陪都。金朝继起，于贞元元年即公元1153年，迁都燕京，营建中都，此乃北京正式建都之始，其城址之中心，在今宣武区广安门南。”此纪念碑的落成及碑文的定调，可以说是反映了学界大

多数人的观点，标志着此前相关争议的基本厘清。

此后，“金中都说”被北京社科界和文物、文化部门普遍接受，在社会上也越来越得到认同。尤其是近年来，伴随着金中都考古发掘的巨大成果，金中都的城市形象和历史地位也越来越清晰而明确地从文献中走向了现实。

四、小结

纵观有关北京建都开端的各种观点，以及学者对辽金元时期北京城的历史发展及其地位作用的描述，可以发现：其实并没有什么截然冲突的“辽南京说”“金中都说”或者“元大都说”。所谓开端、起始、转折这些提法的背后是不同的“尺子”或者“门槛”，犹如转弯上高速这个过程，有人从开始拐弯时算起，有人从匝道并入高速的入口算起，有人则从收费站起点算起。对此，尹钧科先生有一段论述比较清晰地说明了辽金元时期北京城市转型发展的几个阶段：“辽耶律德光会同元年（938）建为陪都，号南京，又称燕京，是辽代五京之一，从此开始了北京向全国政治中心的过渡。金海陵王贞元元年，金都由上京会宁府正式迁于燕京，改名中都，从此北京成为封建王朝的真正首都，但尚不是全国统一政权的都城。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于金中都东北郊建筑新城；九年（1272）命名新建都城曰大都，并自上都开平迁都于此。从此，北京成为全国统一政权的首都。”^⑫我们不妨还是用上高速这个比喻来解释，辽南京时期是北京开始转弯进入匝道了；金中都时，北京并入高速路，2003年纪念金中都850周年的会议基本确定的就是从匝道并入高速的入口算起，它是转型时期的关键转折点；元大都时的北京就是进入高速公路的起点收费站了（大一统王朝的首都）。



① 笔者曾撰写《历史为什么选择金中都——简论金中都的历史地位及作用》，载于《北京史学论丛》（2015年），群言出版社，2016年。此文是从多个角度对旧文观点的补充和完善。

②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黄侃校点：《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7页。

③ （汉）许慎：《说文解字》卷12《邑部》，中华书局，1963年，第131页。

④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中华书局，1988年，第187页。

⑤ 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第178页。

⑥ 叶万松：《中国古都系列丛书》序二，王岗《古都北京》，杭州出版社，2011年，第5页。

⑦ 王光镐：《“都之始”——金中都？辽南京？》，西城社科联公众号，2024年5月8日。

⑧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4，“开运二年”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9293页。

⑨ 《旧五代史》卷137《外国列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1834页。

⑩ 宋德金：《辽朝正统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1期。

⑪ （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77《安边御寇·契丹》引路振《乘轺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011页。

⑫ 于德源：《辽南京（燕京）城坊、宫殿、苑囿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4期。

⑬ 陈平：《古都变迁说北京》，华艺出版社，2013年，第54页。

⑭ 宋德金：《正统观与金代文化》，《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

⑮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2，中华书局，1988年，第2650页。

⑯ 《金史》卷5《海陵王纪》，中华书局，1997年，第10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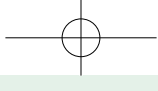
⑰ （宋）徐梦莘编：《三朝北盟会编》卷244引张棣《金虏图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750页。

⑱ （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37《京城总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88页。

⑲ 林荣贵：《金中都建制与传统的“天人合一”观》，《蓟门集——北京建都850周年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46页。

⑳ 侯仁之：《卢沟桥与北京城》，《侯仁之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第46页。

㉑ 尹钧科：《略论北京、长安、洛阳三大古都之异同》，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北京与中外古都对比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第198页。



民族交融视阈下金中都的建成

The Construction of Jin Zhongd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nic Integration

周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白鹞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

Zhou Feng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ai Yao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Ethnolog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摘要: 金中都是在金朝民族交融大背景下营建的重要都城, 选址充分考虑到燕京地区地理位置的优越性, 其地长期以来都是民族交融的重要区域。金中都建设的过程中, 广泛吸纳渤海人、女真人、燕云“汉儿”及北宋降臣担任组织管理者, 各民族工匠民夫承担工程的具体实施, 并充分吸收北宋汴京的经验, 形成了三重城垣相套、中轴线对称的都城布局。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从城市布局、建筑形制等方面进一步证实金中都民族文化交流的特性。金中都的建成不仅是各民族智慧与劳动的结晶, 也是民族交融的重要实证。

关键词: 金中都 民族交融 都城建设

中图分类号: K 291 **文献标识码:** A

Abstract : As a significant capital city constructed under the context of ethnic integration during the Jin Dynasty, the selection of Jin Zhongdu (the Mid-Capital of the Jin Dynasty) fully considered the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of the Yanjing area, which had long been a crucial region for ethnic interaction. During its construction, the Jin Dynasty extensively involved Bohai people, Jurchens, Yan-Yun “Han’er”, and surrendered officials from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s organizers and managers, with craftsmen and laborers from various ethnic groups undertaking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The construction fully absorbed the experience of the Northern Song’s Bianjing (Kaifeng), forming a capital layout characterized by triple concentric walls and a symmetrical central axis. Rece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have further confirmed the ethnic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features of Jin Zhongdu in terms of urban layout and architectural forms. The completion of Jin Zhongdu is not only a crystallization of the wisdom and labor of multiple ethnic groups but also important physical evidence of ethnic integr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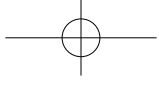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Keywords : Jin Zhongdu; Ethnic Integration; Capital Construction

北京, 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都城之一, 其建都史可追溯至金代海陵王完颜亮建成的中都。北京成为少数民族女真族所建立金朝的首都, 在北京漫长的建城史乃至建都史中占据着关键的位置。金中都之建成并非偶然, 而是在特定的历史、地理、民族等多种因素交织作用下的结果。金中都既是民族交融的产物, 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域,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

位。在民族交融视阈下深入研究金中都的建成与发展, 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北京的建都历史, 更能为探究民族交融与城市发展的交互作用提供重要的历史依据。

一、金中都建成的民族交融背景

女真人虽然是定居的以农耕为主兼营渔猎的民



族,但限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在其建立金朝前后并无城市的建设。“国初无城郭,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国相寨’‘太子庄’,后升‘皇帝寨’曰会宁府,建为上京。”^①上京是金朝建立后首先营建的城市,始建于太宗时期,负责营建的是辽降臣卢彦伦。“天会二年,知新城事。城邑初建,彦伦为经画,民居、公宇皆有法。”^②城市对于女真族来说是新生事物,其营建必然要借助外部政权与民族的人力及其他资源。所谓金初的“借才异代”现象,在城市建设上也是如此,体现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入程度。

金天会三年(1125)正月,南宋使臣许亢宗抵达正在营建中的会宁府(上京),留下了第一手记载:

次日,馆伴使副同行,马可六七里,一望平原旷野,间有居民数十百家,星罗棋布,分蹂错杂,不成伦次。更无城郭,里巷率皆背阴向阳。便于牧放,自在散居。又一二里,命撤伞,云近阙。复北行百余步,有阜宿围绕三四顷,北高丈余,云皇城也。至宿闸门,就龙台下马,行入宿闸西,西设毡帐四座,各归帐歇定……捧国书自山棚东入……其山棚左曰桃源洞,右曰紫极洞,中作大牌曰翠微宫。高五七丈,以五色彩间结山石及仙佛龙象之形,杂以松柏枝,以数人能禽鸣者吟叫山内。木建殿七间,甚壮。未结盖,以瓦仰铺及泥补之。以木为鸱吻,及屋脊用墨,下铺帷幕,榜额曰乾元殿。阶高四尺许,阶前土坛方阔数丈,名曰龙墀。两厢旋结架小苇屋,幕以青幕,以坐三节人。殿内以女真兵数十人分两壁立,各持长柄小骨朵以为仪卫。日役数千人兴筑,已架屋数千百间,未就,规模亦甚伟也。^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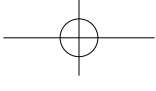
此时的金上京,尚无外城墙,居民也很少,只有“阜宿”(皇城城墙)围绕的面积大约三四顷的皇城。皇城内主要有翠微宫,宫内建有面阔七间的乾元殿。虽然尚未完工,但是见惯了繁华汴京的宋使也认为上京宫殿城池十分壮丽。而且每日有数

千人施工,已有数千间尚未盖好的房屋,其规模也较为宏大。熙宗时,继续营建上京。天眷元年(1138)四月,“命少府监卢彦伦营建宫室,止从简素”^④。“十二月癸亥,新宫成。”^⑤之后的皇统六年(1146),“春三月,上以上京会宁府旧内太狭,才如郡治,遂役五路工匠,撤而新之。规模虽仿汴京,然仅得十之二三而已”^⑥。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对金上京持续进行了考古发掘,初步揭示出这座当时东北地区最大的城市对于汴京制度的模仿借鉴。位于金上京皇城中部宫殿区内的第五宫殿址是皇城中部最后一进院落的主体建筑,整体居于中轴线偏东。“这是一座位于皇城中部宫殿区的大型楼阁式建筑,具有多层高台基、用材等第高、重檐屋顶、满覆琉璃瓦等诸多高等级宫殿建筑的形制特征。其室内外以方砖铺地,柱网结构、屋面色彩的设计营造严整有序、层次分明,彰显了金代皇家建筑设计的高超水平。主殿用减柱造,营造出大跨度的室内空间,反映出宋金时期楼阁建造技术的成熟与发展,体现出金代高等级皇家建筑独具特色的规划手法与建造逻辑,为考察金代皇家建筑形制特征、建筑技术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是女真民族汉化进程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历史演进的建筑见证。”^⑦

金上京地处东北偏远地区,随着金朝统治区域的不断扩大,尤其是灭亡北宋后,金朝的政治、经济重心逐渐南移。金上京所在位置交通不便,不利于对广大中原地区的统治,迁都成为必然之举。如果假以时日,熙宗统治时间再长一些,迁都就会在他手上而不是完颜亮手上完成。因而完颜亮登基后,随着自己地位的逐渐稳固,迁都也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燕京(今北京)地区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它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怀抱小平原,背靠大草原,处于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错地带,是中原地区通往北方、东北地区的交通枢纽。这种特



殊的地理位置，使得燕京地区在历史上一直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区域。当中原王朝统一、强大时，这里是繁荣的边疆军事重镇和民族交往中心。而当中原王朝内乱、衰落之际，这里则成为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的通道。辽南京作为辽朝五京之一，是辽朝汉地的经济、文化中心，为后来金中都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金初，出使金朝的宋使许亢宗在其《奉使行程录》中记述了燕京（辽南京）的繁华，“城周围二十七里，楼壁共四十尺，楼计九百一十座。地堑三重，城开八门。已迁徙者，寻皆归业。户口安堵，人物繁庶。大康广陌，皆有条理。州宅用契丹旧内，壮丽琼绝。城北有互市，陆海百货，萃于其中。僧居佛宇，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膏腴、蔬菰、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艺。民尚气节，秀者则力学读书，次则习骑射，耐劳苦。未割弃已前，其中人与夷狄斗，胜负不相当。城后远望，数十里间，燕然一带，回环缭绕，形势雄杰，真用武之国，四关四镇皆不及也”^⑧。后来世宗朝的大臣梁襄认为：“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本地所生，人马勇劲。亡辽虽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币。燕盖京都之选首也。”^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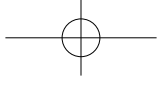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在金中都建立之前，该地区长期处于多民族杂居的状态。从早期的山戎、匈奴、乌桓、鲜卑，到隋唐五代时的突厥、奚族、粟特、回鹘、靺鞨，再到辽代的契丹、渤海等民族，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各民族在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相互交流、相互影响，民族交融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民族的文化元素不断积累、沉淀，深刻地浸透到当地的文化基因中，使该地区的文化逐渐具有了包容大气、融会贯通的特质。到辽金时期，这种民族交融的趋势愈发明显，为金中都的建成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土

壤。由于长期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燕云地区的汉人没有中原汉人那么强烈的华夷观念，对于民族之间的界限没有那么明晰，有着兼容并包的胸怀，形成了燕云地区的“汉儿”^⑩特质。金初使金的宋使马扩根据他的切身感受认为：燕云“汉人”随事俯仰，“契丹至则顺契丹，金人至则顺金人，王师至则顺王师，但营免杀戮而已”^⑪。后来的金世宗也认为“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虽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者，凡以此也”^⑫。马扩和金世宗不无偏颇的看法在今天看来也证实了该地区民族交融程度之深。

二、金中都的建成

金天德三年（1151）三月，海陵王完颜亮“诏广燕城，建宫室”^⑬。也就是在辽南京城（燕京）的基础上加以扩建，其东、西、南三面城墙各向外扩展。在新建宫殿的同时，也有沿用辽代的原有建筑的情况。“四月丙午，诏迁都燕京。辛酉，有司图上燕城宫室制度，营建阴阳五姓所宜。海陵曰：‘国家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纣居住之，虽卜善地何益。使尧、舜居之，何用卜为。’”^⑭可见，在都城营建动工之前，有着完备的规划图纸，其规划的基础是中原传统的风水学说。而中都的规划，是在完颜亮的授意下，模仿北宋的都城汴京。这一点，和金上京并无二致，充分说明了女真人对于中原文化勇于吸收利用。他在动工之前，“遣画工写京师宫室制度，至于阔狭修短曲尽其数，授之左相张浩辈，按图以修之”^⑮。所谓“京师”，就是汴京。也可以看出，汉化程度很深的完颜亮有着极强的自信心，以尧、舜自居，将国家及个人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一座都城的营建，必然要有大量的人力资源为后盾。因此，在女真族皇帝的决策下，众多出身渤



海、女真、燕云“汉儿”以及北宋汉人降臣的官员成为工程组织管理者，大量的各族工匠民夫承担了工程的具体实施，这些使得金中都成为民族交融的产物。

担任中都营建工程组织管理者的官员有张浩、陀满讹里衍、刘筈、卢彦伦、李石、苏保衡、刘枢、韩锡、翟永固、梁汉臣、孔彦舟等人。

“张浩字浩然，辽阳渤海人。本姓高，东明王之后。”^⑥张浩家族世代在辽位居显要，金太祖时他任承应御前文字。张浩精通儒家典制，在金初太祖、太宗、熙宗三朝规章制度的完善上卓有建树。营建中都时，张浩身为尚书右丞。此前，张浩有过管理大型工程的经验，“太宗将幸东京，浩提点修缮大内”^⑦。时任工部郎中的奚人伯德特离补“从张浩营缮东京宫室”^⑧。正因有组织营建东京（今辽宁省辽阳市）宫殿的经历，完颜亮任命张浩为营建中都的总负责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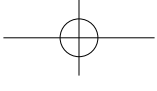
张浩之下的副手有刘筈、卢彦伦等人。“天德三年，广燕京城，营建宫室。浩与燕京留守刘筈、大名尹卢彦伦监护工作，命浩就拟差除。”^⑨刘筈是金初重臣刘彦宗的次子，出身辽代南京四大汉人家族“韩、刘、马、赵”之一的刘六符家族，在燕京世代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他当时担任燕京留守，作为地方官，参与中都的建设义不容辞。大名尹卢彦伦有着丰富的工程建设经验，因此担任张浩的副手。

由于工程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员，因此维护施工乃至社会秩序就成为工程的重要一环，完颜亮为此设置了临时性的弹压官负责治安与秩序，其人为女真人统军使陀满讹里衍。“虏主篡位以来，新修燕京大内，将复创修京师大内。其委任丞相张浩、弹压官统军陀满俄（讹）里衍，其专一提点官系内官梁大使者。”^⑩陀满讹里衍生平不详，后来“海陵遇害，陀满讹里也杀光英于汴”^⑪。陀满讹里也应该就是陀满讹里衍。而且世宗登基之初，“陀满讹里也子撒曷辇充护卫，司吏王得儿加保义校

尉，皆佩银牌，持诏书宣谕中都以南州郡”^⑫。可见，陀满讹里也父子在海陵王与世宗之间，选择了拥立世宗，并未顾及与完颜亮的君臣之义。

所谓的提点官内官梁大使就是梁琬，又名梁汉臣，原为北宋宦官，北宋亡，入金仍为宦官。有的史料将完颜亮迁都的原因归于梁琬的阴谋，“内侍梁汉臣本宋内侍，陷虏，每思报仇。乃进曰：‘燕京自古霸国，虎视中原，为万世之基，陛下可修燕京大内，时复巡幸，使中原之民望帝都近矣。’遂纳其言”^⑬。认为梁汉臣劝完颜亮迁都，其目的是企图借大兴土木来消耗金的国力，以图报仇。这实际上是高估了作为宦官的梁琬的思想与能力，而低估了完颜亮的雄才伟略。另一条史料记载梁琬比较委婉地劝完颜亮迁都，可能更接近事实真相。“一日，宫中宴闲，因问汉臣曰：‘朕栽莲二百本而俱死，何也？’汉臣曰：‘自古江南为橘，江北为枳，非种者不能，盖地势然也。上都地寒，惟燕京地暖，可栽莲。’主曰：‘依卿所请，择日而迁。’”^⑭梁琬不外乎畏惧金上京冬季的严寒，因而讽喻完颜亮南迁都城。完颜亮“差梁汉臣充修燕京大内正使，孔彦舟为副使，自天德四年起，至贞元三年毕工”^⑮。此修燕京大内正使也就是上文的专一提点官，梁琬是在张浩之下专职负责都城宫殿的工程建设。

正是因为有了营建中都宫殿的经验，之后，“及营建南京宫室，海陵数数使琬往视工役。是时，一殿之费已不可胜计，琬或言其未善，即尽撤去。虽丞相张浩亦曲意事之，与之均礼”^⑯。《金史·张浩传》也记载：“浩至汴，海陵时时使宦者梁琬来视工役，凡一殿之成，费累钜万。琬指曰：‘某处不如法式。’辄撤之。浩不能抗而与之均礼。”^⑰由梁琬在汴京的跋扈举措，可见他在负责中都宫殿的营建时也不外乎此。所谓借口“不如法式”拆毁已建成宫殿，究其原因固然因为梁琬的飞扬跋扈，但他曾任北宋的宦官，对北宋的宫殿形制了如指掌，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梁琬之举一方面造成了巨大的



浪费，但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了中都宫殿对北宋汴京宫殿照搬模仿的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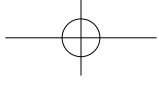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作为梁琬副手的孔彦舟同样是北宋降臣，他入金后有过工部尚书的经历，因而担任修燕京大内副使。“亮始营此都，规摹多出孔彦舟。役民夫八十万、军匠共四十万作治数年，死者不可胜计。”^⑧之后孔彦舟仍充当梁琬副手，任修汴京大内副使。

负责各项具体工程实施的还有众多官员。如世宗之舅渤海人李石，“海陵营建燕京宫室，石护役皇城端门”^⑨。李石负责的是皇城的端门也就是应天门的建设工程。苏保衡，“天德间，缮治中都，张浩举保衡分督工役”^⑩。他是云中天成县人，其父苏京曾任辽西京留守，其家族属于燕云地区的“汉儿”。苏保衡后来还参与金陵的营建。刘枢，“张浩营建燕京宫室，选枢分治工役”^⑪。他是通州三河县人，是中都地区的土著，因而能参与工程。韩锡，“天德元年，擢尚书工部员外郎，领燕都营缮”^⑫。他家原居燕京，后迁徙至蓟州渔阳县，还是不出中都的范围，因而堪称土著，再加之工部的任职，参与工程也是当仁不让。翟永固是中都良乡县县令，曾任礼部侍郎。“久之，分护燕京宫室役事。永固请写《无逸图》于殿壁，不纳。”^⑬“无逸图”是古代传统绘画题材，通常与劝诫勤勉、避免安逸相关，常见于古代宫廷或文人绘画中。翟永固此举是向海陵王劝谏之意，但并未被采纳。由此可见，中都宫殿在营建的同时，一些宫殿的墙壁上绘有壁画。

在城墙、宫殿等建设的同时，行宫园林也同样是中都营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刊布的金代苗公泽墓志记载他“又提点万春山”^⑭。提点万春山是苗公泽生平最后一个职务，正值海陵王时期，万春山很可能就是元代被称为万寿山的今北海公园一带。至元十年（1273），高丽大臣李承休在出使蒙元后所撰的《宾王录》记载：“燕之分野中都城者，大金国所都也。城之北五里所，有万寿山焉，金国章宗皇帝所筑也。”^⑮他认为万寿山是金章宗所筑明

显有误。现在学界认为北海一带为始建于金世宗时期的行宫太宁宫，先后改名为寿安宫与万宁宫。万春山很可能在金世宗时期改名为万寿山，因为金世宗的圣节（生日）为万春节，为了避讳，才将万春山更名为万寿山。万春、万寿、太宁、寿安、万宁等的含义是一致的，万春山处的行宫万宁宫应该始建于海陵王时期。苗公泽所任“提点万春山”，就是负责万春山的行宫工程建设以及之后的管理。后来，金朝设有万宁宫提举司对万宁宫进行管理，其长官为“提举，从六品”^⑯。提点万春山也就是万宁宫提举的前身。金中都建成之后的贞元二年（1154），还曾以万春山命名临时搭建的彩饰楼棚。“天眷三年□月一日，奏禀，生辰、正旦花宴，亡辽时合用山楼一座。奉敕旨，依例起盖。贞元二年正月，山楼以‘万春山’为名。”^⑰完颜亮举行“生辰、正旦花宴”的地点可能是在行宫万春山，因此将临时搭建在此地的彩楼也以万春山命名。

一座都城的营建，需要征用大量的工匠民夫，这些人有来自本地的，如负责中都规划的具体工程技术人员有人有幸留下了姓氏，但名字则不详。其人姓何，武散官至正九品下阶的进义校尉^⑱。“天德三年，展那城，或荐公于用事者。于是东阡西陌，线引棋布，其制盖皆出于公焉。”^⑲从中可以看出，何某至少参与了中都城街道的规划，其典型特征是街道横平竖直布局，有如棋盘。也可能正因为规划之功，何某才被授予正九品的小官，之前他可能就是普通的工匠。当然，何某承担的不可能是规划的全部工作，他只是在张浩领导下的庞大工程队伍中的一员。另外大量的人员要从外地征召，“其所用军民夫工匠每四月一替，近者不下千百里，远者不下数千里。近者北归，往往半岁；远者得回，动是逾年。到家不月余，又复起发。其河北人夫死损大半，其岭北、西京路夫七八千人，得归者无千余人，可见人民冤苦”^⑳。这些人，不但有汉人，“岭北、西京路”的民夫中应该有相当数量的契丹人、



奚人、渤海人等。

工程的营建还需大量熟练工种，而汴京等原北宋区域无疑是此类人员的主要来源地。“正隆间有圣旨，取汴梁诸匠氏。有木匠赵作头、铁匠杜作头，行次失路，迷至大宅乞宿。”^④所谓“正隆间”不能简单理解成正隆年间，而是指的完颜亮统治时期^⑤。“木匠赵作头、铁匠杜作头”是工匠的领头人，他们的身后无疑是大量的一般工匠。

由于工期的急迫，现场加工众多的建筑部件已经不敷使用，于是从汴京的宫殿拆用了大量构件用于中都宫殿。“汴梁宋时宫殿，凡楼观、栋宇、窗户，往往题‘燕用’二字，意必当时人匠姓名耳。及金海陵修燕都，择汴宫窗户刻镂工巧以往，始知兴废皆定数，此即先兆也。”^⑥将工匠的名字“燕用”理解为谶纬，附会成“为燕京所用”，虽然有些荒诞，但也反映了当时营建中都所用的汴京建筑构件数量之大。此外，原材料也大量调用于外地，“是时，营建燕京宫室，有司取真定府潭园材木”^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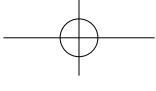
中都在充分吸收借鉴汴京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三重城垣相套：金中都分外城、皇城、宫城三重结构。外城呈方形，周长约33里。东城墙在今虎坊桥偏西处南北一线上，西城墙在丰台区凤凰嘴村所残留的城墙及其以北高楼村残城墙一线，南城墙在今金中都水关遗址与丰台区万泉寺残留城墙连线一线上，北城墙在今白云观以北东西一线。据20世纪50年代阎文儒先生的考古勘测，东城墙约长4510米，西城墙约4530米，南城墙约4750米，北城墙约4900米，周长18690米^⑧。城门共有13座，东城墙从北到南有施仁门、宣曜门、阳春门。西城墙从北到南有彰义门、颢华门、丽泽门。南城墙从西到东有端礼门、丰宜门、景风门。北城墙从西到东有会城门、通玄门、崇智门、光泰门。各城门匾额由金代著名书法家，世宗时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的王竞题写。中都外城四门的施仁

门、彰义门、端礼门、崇智门，“寓有崇尚仁、义、礼、智之意，明显可见汉文化传统的影响，而金中都南面的景风门又与唐长安城皇城景风门同名，则可见宋以前都城的影响”^⑨。“景风”直接来自儒家经典《尔雅·释天》：“春为发生，夏为长赢，秋为收成，冬为安宁。四时和为通正，谓之景风。”意思是四季和谐称为通正，这种和谐的风就叫作景风，体现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丽泽”也出自儒家经典《周易·兑卦》：“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丽”意为依附，“丽泽”指两泽相连，交相浸润，互有滋益。君子观此卦象，当与朋友相互讲习，论难讲明，使心与理相契，如同两泽之水相互滋养。后世“丽泽”常被用来形容朋友之间相互切磋、共同进步。儒家文化的因素渗透于中都建设的方方面面，是民族交融的重要体现。

中都北城墙东北的光泰门的始建时间，一直是金史学界、北京史学界讨论的一个问题。任国征先生认为：“金中都最初有十二个城门，后来为了去东北郊太宁宫新开光泰门，到了金末为了抵御蒙古又将此门关闭，使金中都再次成了十二个城门。”^⑩此前的于杰、于光度先生以及于德源先生对此都有过详细论述^⑪。任文的结论与两书相同，所用史料也未超出两书的范围。近来又有学者认为：“此处称‘十三门’，乃元好问误将后来增辟的光泰门也计算在内，估计是金末时人已十分熟悉中都十三城门，故不假思索地径以其为海陵王建城初之事，犯了无意识的错误。元朝史官修《金志》改作‘城门十三’，大概也属于类似的情况。”^⑫在没有确切史料依据的情况下，怀疑并否定八百多年前金史研究开创者元好问的记录，有些不妥。前面已经提及苗公泽曾任“提点万春山”，可证中都东北郊的行宫万春山（太宁宫）是与中都同时营建的，沟通两者之间的光泰门也必然不会迟至章宗时期才新开，而是海陵王营建中都时就已有的。

元好问的《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四《东平贾



氏千秋录后记》记载了贾洵曾在完颜亮营建中都时，负责十三个城门的建筑。“既而改内监，督燕都十三门之役。郡众聚居，病疫所起，君出已俸市医药；有物故者，又为买棺以葬之。”由此可见，中都营建时，就有十三个城门。由于当时工期紧迫，在小范围内聚集了超过120万人的民夫、军匠，生活、卫生条件极差，因此引发了瘟疫。贾洵自己出资购买医药以及棺木来治疗病人及安葬死者。这场瘟疫在《金史》中也有记载：“既而暑月，工役多疾疫。诏发燕京五百里内医者，使治疗，官给医药，全活多者与官，其次给赏，下者转运司举察以闻。”^⑤可见元好问的记载真实可信。任文又称：“完颜亮的儿子取名光英，应避讳‘光’字，金初不可能有光泰门。”这也是出于不懂金史的臆测。据《金史》卷八二《海陵诸子传·光英》记载，当时金朝对“光英”二字避讳的只是“英”字及其同音字，因而将“鹰坊”改为“驯鸷坊”，将封国号中的“英国”改为“寿国”，“应国”改为“杞国”。与金朝不同的是，南宋对“光英”二字避讳的只是“光”字及其同音字，将“光州”改为“蒋州”，“光山县”改为“期思县”，“光化军”改为“通化军”。

宫城位置居中且中轴对称：金中都的中轴线南起外城正南门丰宜门，中间贯穿整个皇城的各组宫殿，北至正北门通玄门，全长约4500米，是北京作为都城最早的一条中轴线。皇宫的正殿大安殿位于中轴线上，面阔11间，平面呈“工”字形。

街巷系统承上启下：城内道路形制交织并存，有“十”字形、“T”字形、“一”字形等，既有南北向、东西向、西南—东北斜向等不同走向，也有门内大街、顺城街、十字街路口、“一”字形坊间道路等不同功能，体现了从唐代封闭式里坊制向宋元开放式街巷过渡时期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商业布局遵循传统：遵循“前朝后市”的布局，商业中心在城北檀州街一带和城东南新开辟的一个商业区，主要以市马为主，也兼及市易其他货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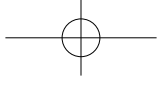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三、金中都的考古发现

20世纪90年代，在南城墙的景风门和丰宜门之间发现了金中都水关遗址。遗址残存基础部分，平面呈“〕〔”形，南北向，中都城的南城墙即横跨其上。遗址全长43.4米，其中过水涵洞即“l”部分长21.35米，宽7.7米，距今地表5.6米。北端的人水口和南端的出水口分别宽11.4米、12.8米。“该遗址底部结构是中国已发现古代都城水关遗址中体量最大的，其结构与宋代《营造法式》‘卷葺水窗’的做法基本一致，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和水关结构的重要实证。”^⑥

近年来，北京市的考古工作者对金中都遗址进行了一系列考古发掘，取得了一些重要收获，也实证了中都城的民族交融特色。

2019—2020年，在丰台区政府的积极推动下，为配合金中都城墙保护和展示工作，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和丰台区文化和旅游局对西城墙、南城墙及周边开展了两年的考古发掘工作，共计发掘面积2900平方米。此次考古工作是首次对金中都外城城墙开展考古发掘，发现城墙遗迹5处，总长约60米，最宽处24米；马面遗迹（凸出于墙体外侧的防御设施）1处，长约20米，宽约7米；护城河遗迹1处，宽约66米；城内道路2条，残长约20米和40米；出土有“官”字款砖、定窑、钧窑瓷片等遗物。“基本厘清了外城城墙的保存状况、形制结构，以及与城外护城河、城内道路的关系，首次正式确认了城墙、护城河的宽度及营建方式，完整揭露的一处马面遗迹，也是金中都考古的首次发现。”^⑦叠压在南城墙下的唐代墓葬、辽代墓葬为金中都城在唐幽州、辽南京城基础上改、扩建的史实提供了直接的考古学证据。

金中都光源里遗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内白纸坊东街以南（金中都东开阳坊）。2019年以来持续发掘，尤以2022年的发掘最为重要，此次发



现的建筑基址组群，初步判断，很可能是金代大觉寺遗址。1号基址通面阔达22米，通进深达20米。虽然只有三开间，但达到这个尺度规模的三开间殿堂仍属罕见。在目前发现的金代三开间建筑基址中，光源里1号基址规模仅小于张家口市太子城的9号基址，其规模甚至大于吉林省安图县金代长白山神庙大殿，太子城9号基址和长白山神庙大殿都是皇家建筑，这就表明光源里1号建筑的规格已是皇家御用级别。遗址发现的文物中最重要的文物是5件玉册，此次考古是全国首次在城市遗址中发现玉册，是金中都作为金代政治中心最直接的实物证据。“5件玉册中，有3件是金太祖的谥册，最先在古井里发现的玉册上，保存着6个汉字——‘津而饮马神光’，这与《大金集礼》第三卷记载皇统五年（1145）上太祖尊谥的谥文相吻合。”^①玉册的发现也证明了女真族接受汉文化的程度，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实证。

2024年考古工作者对金中都外城西南城门端礼门遗址进行了发掘。城门址由东西两侧墩台和中间的中心门道组成。墩台下面由3层规整的铺砖组成，每层铺砖厚约6厘米，在每层铺砖中间有夯土层。在三层垫砖之上是夯土台基。东西墩台之间是宽6米的中心门道。在南城墙内侧发现有东西向、宽约11米的顺城街道路遗迹，并同样发现了车辙痕迹。金中都在城门外侧设有防御设施——呈马蹄形的瓮城。瓮城城墙上发现了分布密集、排列较规整的夯窝痕迹，在瓮城内还发现了踩踏面的痕迹。瓮城外，发现一处护城河遗迹，东距瓮城西墙约11米，呈西北—东南走向，与瓮城墙走向基本吻合，说明当时护城河是环绕瓮城而过。城外除了

瓮城和护城河等防御设施，还在距离城门70米处发现了马面遗迹。端礼门是金中都首次发掘的城门遗迹，也是罕见的金中都保存结构清楚的大型建筑基址，为金中都城布局研究提供了新的坐标点^②。

小结

金中都的建成是金朝民族交融历史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其形成与发展根植于多元民族交往交流的深厚土壤。从背景来看，女真族早期都城营建即依赖辽宋降臣与其他民族各项资源。随着金朝统治重心南移，兼具地理枢纽优势与长期多民族杂居基础的燕京，成为都城选址的必然选择，燕云地区“汉儿”兼容并包的特质也为民族交融提供了文化前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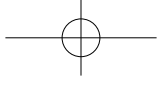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在营建过程中，金中都充分展现了多民族协作与文化融合的特质。女真人、渤海人、燕云“汉儿”及北宋降臣共同构成工程管理核心，各族工匠民夫承担具体劳作。规划上深度借鉴北宋汴京形制，形成三重城垣相套、中轴对称的布局。城门命名、建筑理念渗透儒家文化，同时兼顾行宫园林等配套建设，成为多民族智慧与劳动的结晶。

近年水关遗址、西城墙马面、光源里大觉寺遗址、端礼门遗址等考古发现进一步实证了金中都的民族交融特色，不仅厘清了都城形制、营建方式等关键问题，玉册等文物更直接印证了女真族对汉文化的吸纳。综上，金中都不仅奠定了北京建都史的关键基础，更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历史实证，为探究民族交融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核心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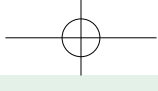
① （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33《燕京制度》，中华书局，1986年，第470页。金上京位于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金熙宗天眷元年（1138）八月，上京才正式命名，府名会宁，此前的上京（原辽上京，金初沿用，位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改为北京。但为了行文方便，一律称上京。

② 《金史》卷75《卢彦伦传》，中华书局，2020年，第1824页。

③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45～146页。



- ④ 《金史》卷4《熙宗纪》，中华书局，2020年，第80页。
- ⑤ 《金史》卷4《熙宗纪》，中华书局，2020年，第81页。
- ⑥ （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12《熙宗孝成皇帝四》，中华书局，1986年，第174页。
- ⑦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黑龙江哈尔滨阿城金上京遗址考古新发现》，《文物》2025年第6期。
- ⑧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42页。
- ⑨ 《金史》卷96《梁襄传》，中华书局，2020年，第2262页。
- ⑩ 关于燕云地区“汉儿”的研究，参见陈述：《汉儿汉子说》，《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1期；张中政：《汉儿、签军与金朝的民族等级》，《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3期；刘浦江：《说“汉人”——辽金时代民族融合的一个侧面》，《民族研究》1998年第6期。等等。
- ⑪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4页。
- ⑫ 《金史》卷83《张浩传》，中华书局，2020年，第1980～1981页。
- ⑬⑭ 《金史》卷5《海陵纪》，中华书局，2020年，第108页。
- ⑮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4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751页。
- ⑯⑰ 《金史》卷83《张浩传》，中华书局，2020年，第1980页。
- ⑱ 《金史》卷81《伯德特离补传》，中华书局，2020年，第1940页。
- ⑲ 《金史》卷83《世宗纪下》，中华书局，2020年，第202页。
- ⑳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3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654页。
- ㉑ 《金史》卷63《后妃传上·海陵后徒单氏》，中华书局，2020年，第1603页。
- ㉒ 《金史》卷86《独吉义传》，中华书局，2020年，第2038页。
- ㉓㉔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4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744页。
- ㉕ （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13《海陵炀王上》，中华书局，1986年，第186页。
- ㉖ 《金史》卷131《宦者传·梁琬》，中华书局，2020年，第2964页。
- ㉗⑤⑩ 《金史》卷83《张浩传》，中华书局，2020年，第1981页。
- ㉘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4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759页。
- ㉙ 《金史》卷86《李石传》，中华书局，2020年，第2032页。
- ㉚ 《金史》卷89《苏保衡传》，中华书局，2020年，第2095页。
- ㉛ 《金史》卷105《刘枢传》，中华书局，2020年，第2451页。
- ㉜ 《金史》卷97《韩锡传》，中华书局，2020年，第2277页。
- ㉝ 《金史》卷89《翟永固传》，中华书局，2020年，第2097页。
- ㉞ 参见周峰：《金中都都市令〈苗公泽墓志〉考释》，《云冈研究》2024年第1期。
- ㉟ 〔韩国〕林基中主编：《燕行录全集》第1册，〔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32页。
- ㊱ 《金史》卷56《百官志二》，中华书局，2020年，第1373页。
- ㊲ 任文彪点校：《大金集礼》卷40《朝会下·杂录》，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99页。
- ㊳ 有研究者误认为“进义”为名字，见李兰芳：《从丰宜门到通玄门：金中都的中轴线》，《传记文学》2025年第1期。
- ㊴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2引《赵可文集·都人进义何公墓碣》，中华书局，1956年，第2650页。“那”原文如此，应为“都”之误。
- ㊵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3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654页。
- ㊶ （宋）张从正：《儒门事亲》卷2，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9年，第35页。
- ㊷ 参见周峰：《从朔州出土金代李汝为墓志谈正隆年号问题》，《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1期。
- ㊸ （宋）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燕用》，中华书局，1988年，第258页。
- ㊹ 《金史》卷129《张仲轸传》，中华书局，2020年，第2925页。
- ㊺ 阎文儒：《金中都》，《文物》1959年第9期。
- ㊻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宋辽金元明卷》（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第195页。
- ㊼ 任国征：《金中都多少个城门？》，《光明日报》2013年8月26日第15版。
- ㊽ 参见于杰、于光度：《金中都》，北京出版社，1989年，第20～22页；于德源：《北京历代城坊·宫殿·苑囿》，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3～85页。
- ㊾ 邱靖嘉：《基于史源学考察的金中都城门问题补证》，《北京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
- ㊿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宋辽金元明卷》（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第187页。
- ①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编著：《金中都（2019～2020）城墙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23年，第211页。
- ② 李祺瑶：《发现“大觉寺”》，《北京日报》2023年11月9日第12版。
- ③ 李韵、王笑妃：《端礼门：金中都考古发现的“第一门”》，《光明日报》2024年12月2日第9版。



元大都金水河与皇城北墙 ——北京历史地理札记

The Jinshui River and the Northern Wall of the Imperial City in Yuan Dadu:
Notes o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Beijing

唐晓峰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Tang Xiaofeng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摘要: 本文基于徐苹芳等先生的元大都考古发现, 聚焦金水河在城内最后的流经位置以及与此相关的元、明皇城北垣的变化, 提出一点新的看法, 包括金水河流入太液池的方位、元皇城北垣并非一条直线、明初皇城北垣东端与玉河的关系等。

关键词: 元金水河 元大都皇城 明北京皇城 玉河

中图分类号: K928.6 **文献标识码:** A

Abstract : Drawing on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t Yuan Dadu reported by Xu Pingfang and his colleague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final course of the Jinshui River within the city and the related changes in the northern wall line of the Imperial City from the Yuan Dynasty to the Ming Dynasty. It proposes several new observations, including the orientation by which the Jinshui River entered Taiye Pond, the fact that the northern wall of the Yuan Imperial City was not a straight lin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astern end of the northern wall of the Imperial City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and the Yuhe (Jade River).

Keywords : Jinshui River (Yuan); Imperial City of Yuan Dadu; Imperial City of Ming Beijing; Yuhe (Jade River)

最近《元大都: 1964—1974年考古报告》一书出版, 此书汇集了徐苹芳等先生多年对元大都的考古研究成果, 对元大都的研究, 无疑会产生新的推动。书中的内容很多, 本文仅关注城内金水河遗迹的调查部分, 这些内容不仅为认识元金水河位置提供了新材料, 也涉及元代皇城北墙的位置及其他相关问题。

在元大都时代, 今地安门东西这一线, 是一个很特别的地带。关于这一带, 以下记载很值得注意。《元史·河渠志》: “至治三年三月, 大都河道提举司言: ‘海子南岸东西道路, 当两城要冲, 金水河浸润于其上, 海子风浪冲啮于其下, 且道狭, 不时溃陷泥泞, 车马艰于往来, 如以石砌之, 实

永久之计也。’ 泰定元年四月, 工部应副工物, 七月兴工, 八月工毕。……” 这里说的海子, 即今什刹海的前身。海子南岸的东西道路, 当然在今地安门东西大街一线。两城, 应指大都城的东、西两城区。这条道路的确是要冲, 来往于东西两城之间, 不从这里走, 要绕很大的圈子。

如果以大都城中轴线为分割东西道路的中间点, 那么《河渠志》这段话讲的是西边道路的情况, 因为海子在西城。西边这条路的确是夹在两水之间, 北侧是海子, 南侧有金水河。海子水面宽阔, 所以有风浪。金水河一路跨河跳槽进城, 保持高位, 所以是“浸润其上”。一面是冲击, 一面是浸润, 道路的确容易溃陷, 又十分泥泞, 朝廷从实际



出发，改铺了石面，才得以改善。

把这条文献记载的地段放大范围看，在金水河的南侧还应有皇城的北墙。道路、金水河、皇城北墙三者沿三条线东西延伸。它们的位置关系是，海子南边有一条东西道路，道路南侧偏西有一条金水河与之并行，金水河的南侧是皇城城墙。目前学界编绘的历史地图也都是这样表示的^①。在这个基本认识的前提下，有几个问题值得补充讨论。

一、元金水河的遗迹与测量

据徐莘芳等调查，元金水河道在大都城内最后一段的位置，位于今太平仓东口与毛家湾相会处至北海天王殿东一线。在所测元金水河遗迹全部34个地点中，第24—31点属于这个地段：

金24：太平仓胡同东口与毛家湾胡同相会处。

金25：北京四中后门（西门）内西墙下。南北岸均距地表深1.70米见生土，河宽10米。这里是东西向的河道。

金26：后库东大街（今西什库大街）北京四中东墙外。河宽10米。

金27：西大街（今爱民街）路西，杨家大院东口外。河宽15.3米。

金28：北海万佛楼北。河宽23.5米。

金29：北海九龙壁西南。河宽30米。

金30：北海天王殿西墙外。河宽28米。

金31：天王殿东墙外，河宽30米。由此注入太液池^②。

这些测量数据显示出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河水不深，南北岸地表至河床底下的生土仅1.70米，水流深度会更浅。这符合金水河独引玉泉山水的水量有限的情况。同时，这也符合金水河位置较高的情形；第二个特点，河床自西而东，至今北海公园范围内忽然展宽，这一点值得注意；第三个特点，按照所测点位，河道始终为东西向，没有在临

近太液池时出现南折的痕迹，这就与一般想象的不同了。一般想象是，金水河在到达太液池附近时，南折，并穿过萧墙之下涵洞，再汇入太液池。所以，在这里的金水河与萧墙的关系可能是另一个样子，详见后文。

笔者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刘晶女士曾经测量了上述大多地点的纬度，分别是：

金24——39°55′55″

金25——39°55′52″

金26——39°55′57″

金27——39°55′52″

金28——39°55′53″

金29——39°55′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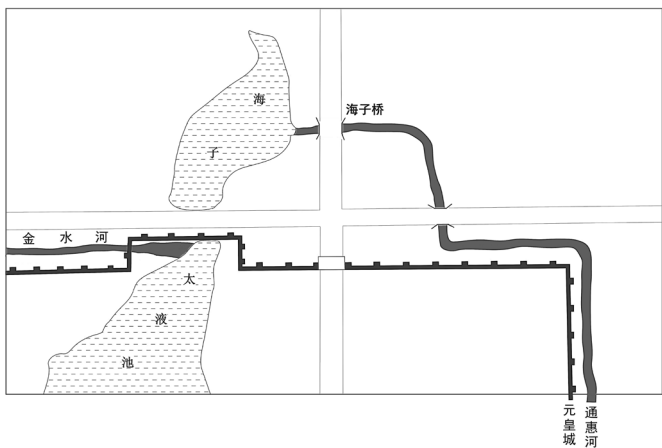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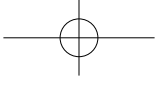
金30——（未测）

金31——（未测）

在测量上述地点纬度的同时，我们也到地安门东大街，测量了玉河在穿过大街后东折之水道的纬度，为39°55′56″。此数值与西边金水河故道的纬度相近，这应是元大都规划的有意设计，意在保持皇城北墙以及外面的水道东西对应，尽量体现大都景观的严整。

二、元代皇城北墙的位置

由于水道位置的确定，元大都皇城北墙的位置也可以大致确定了。它大致东西一线，横亘在上述探测点位（金24—27）的南侧。但有一段城垣的位置特殊，前文提到，金水河故道没有在接近太液池的地方出现南折的情况，这说明，金水河是由西向东汇入太液池的。原因可能是，这一段的皇城城墙，因为太液池水面的阻挡，不是继续向东延伸，而是北折，形成一小段南北向的墙体，金水河正是在这里穿墙而汇入太液池。墙垣北折后不远，又向东折，横过太液池北岸后，又南折，之后再东折，回到原来的纬度线。总的来看，垣墙是围着太



图一 元大都金水河与皇城北墙、太液池的位置关系
(马保春绘制)

液池北部曲折四次，绕了半圈（图一）。在蔡蕃先生的《北京古运河与城市供水研究》与岳升阳先生主编的《图说北京古城变迁史》书中^③，对于这里皇城北墙的走向就是这样画的，这有道理。元代皇城北墙走向的这个安排，显然是为迁就太液池北岸的位置。而另一方面，北墙为了让位给金水河，又不能全线跨在太液池北岸之外。直到明代，因废掉了金水河，遂把北墙全线调整到太液池之北。这很可能是明代调整皇城北墙位置的思路。另外，元代太液池的北岸可能与今日北海的北岸不同，元代偏南，所以岸上有较大空间容纳皇城北墙依东西直线横过。

三、明代皇城北垣的位置与元代不同

明朝永乐年间规划北京皇城范围的时候，基本上利用了元朝皇城的地段，但也有变化，如李宝臣先生所归纳的：“永乐朝只是南拓了南墙，北墙稍北移，东西墙基本上沿用了元代旧制。”^④本文主要关注北墙北移的事。

《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四：“今考《东海集诰命碑阴记》云：曾祖洪武初以兵籍隶燕山右护卫，挈先祖少傅始居白石桥之旁。后廓禁城，其地已入北安门之内……”白石桥位于北海之东，在今景山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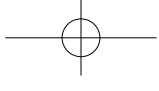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园西北角墙外，大致在景山北街与景山西街的转角处。所说的居址应在白石桥之北。明朝廓禁城，“其地已入北安门之内”（即皇城之内）后，用途会有变化。皇城北墙北移，对本文关注的地带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首先是元金水河一线归入明皇城之内。在元代道路、金水河、城垣这三条线的基础上，明皇城北垣北移，只是跨过了金水河这一线，停在了金水河与道路之间。金水河在明代因各种原因，已经失去作用，在这一段，明朝将其填平，并纳入皇城范围，其上修建各类建筑，景观面目大变。原金水河南侧的元代萧墙也了无踪迹。

在元代，金水河是太液池的特殊供水渠道，明代废金水河，太液池此处改由海子（今积水潭什刹海）供水，因此打通（恢复）海子与太液池之间的直通水道，又在通道之上建桥，以利交通。这个新建的桥，是一座新的海子桥，即西步粮桥（西压桥）。（“步粮桥”一名见于明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民国间，北平市政府整理地名，把东步粮桥改称东不压桥，西步粮桥改称西压桥。）按，海子之水与太液池之水本是天然相通的，元朝为了令太液池专用玉泉之水，须将原先相通的二海以人工隔开。至明朝，作了恢复。

在这一系列工程中，有一个特殊的处理办法。因为城墙北移，在墙垣与海子之间只剩下原来道路的宽度，空间十分局促。而这里又要维持输水涵道，上面必须建桥。为了节省空间，便采用了墙垣上桥的办法，形成墙垣压在桥上的样子。《光绪顺天府志》记载了这件事：“西步粮桥俗称西压桥，以皇城跨其上，玉河水由此入西苑。”据有关部门考察，在修筑此桥时，石桥向南延长了一段桥台和石拱墩，城墙从加宽的石拱墩上通过。后来由于拓宽道路，将桥梁南侧的石质栏杆拆除，看起来像城墙压在桥上。

既要承载城墙，又要承载道路，这座桥的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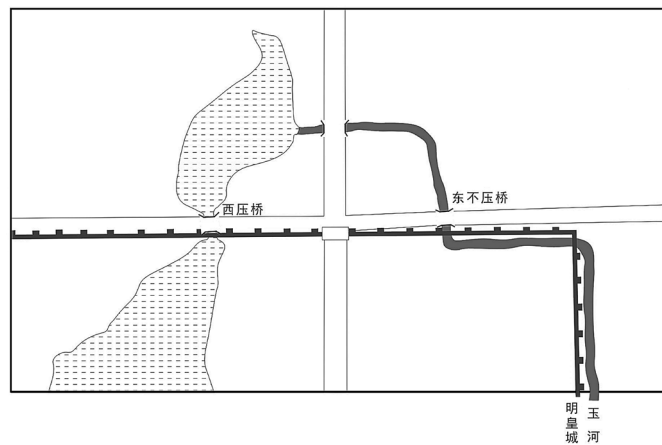
整体想必比较宽阔。北京市文物工作队1962年实地调查形成的《北海及团城勘察报告》称：“西步粮桥全长67米，宽24.8米，为单孔石拱桥，桥券宽4.4米。”^⑤对比一下，卢沟桥的桥面宽7.5米，万宁桥宽17米。万宁桥与卢沟桥的宽度是指桥面，西步粮桥的宽度是指桥基，即使折算下来，西步粮桥的宽度也是可观的。这个规模是否为明初所建，待考。20世纪50年代，此桥址仍在，看起来的确不小，坐公共汽车从桥上过，因为忽然升高又忽然下降，心会一悬，有人觉得很好玩。

四、明代皇城东北角

明代把皇城北墙调整到北面，在东端遇到一个问题。因为在元代，皇城北墙东端之外有一段通惠河（玉河），为漕运通道。明朝若把皇城北移，那段河道必归入皇城之内。这在漕运时代是不能容许的。那么明代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明朝会不会仍将这一段皇城留在河道南侧，不许河道进皇城？

几年前，就在这个地方，准确地说，在河道北面发现一段南北向的明早期皇城基址，与南部早期，即明代宣德年间之前的皇城东墙遗址对齐，显然属于早期皇城东墙的北端。这说明，当时明朝人没有将这里的皇城北墙留在水道南侧，而是跨过水道，与西边整个皇城北墙一线对齐。那么，河道归入皇城之内，会不会因漕船往来造成搅扰？不会，因为漕运的形势变了。

按皇城规划建设是在永乐年间，当时的城市与元代已大不一样。元大都的北部被放弃，积水潭的地位从城市中央变为边缘，漕运物资已经没有向这里运送的必要，城内玉河也就失去了漕船运行的意义。永乐年间曾疏浚自积水潭至张家湾的水道^⑥，但不能视作这就是漕船运行的范围，因为保持水源全线畅通与漕船实际航行范围，还不是一回事。河道水流畅通，是下游运河的需要。玉河水道虽然仍



图二 明代皇城垣东北角与玉河的位置关系
(马保春绘制)

在，但也仅为一般日常利用，包括短运、排水、浣洗、嬉戏等。退一步说，即使漕船可以在北京城新南墙水关（崇文门东）进入城内，也不需要走到万宁桥那里，至多到东华门一带就足够了。总之，在水道穿越皇城那一角，不会有漕船来往。而只要在水道出入皇城的闸口处设立障碍，便可保障皇城之内的环境（图二）。

宣德年间，皇城东墙东移约300米，将玉河圈入皇城。或以为这是要消除漕运喧嚣。据《明宣宗实录》卷九十一：“上以为东安门外缘河人居逼近黄（皇）墙，喧嚣之声，彻于大内。命行在工部改筑黄墙于河东。皇城之西有隙地甚广，豫徙缘河之人，命锦衣卫指挥、监察御史、给事中各一员，度其旧居地广狭，如旧数与地作居。凡官吏军民工匠俱给假二十日，使治居。”^⑦这里完全没有提到漕运，所谓“喧嚣之声”是来自河边密集的居民。而皇城东移之后要做的，也只是对缘河居民搬到皇城西边居住一项做安排。按说漕运事体更大，如果影响漕运，定会有更多安排，不会一个字不提。另外，所谓“缘河居民”被安置在皇城西边干燥地区，且只给20天搬家治居，说明他们不是水上或船上人家。

徐莘芳对于金水河河道遗迹的考察测量，为确

定元金水河在大都城內位置流向提供了新的资料，对地安门西大街一线为金水河流经路线增加了证据。但问题没有最终解决，金水河入城至横桥之后如何流到“海子南岸东西道路”的南侧，仍存争议。因徐先生提供了新资料，蔡蕃先生的观点更值得注意：金水河跃过横桥之后，“向东南，……过今北帽和大帽胡同（都是斜街），可能从当时的普庆寺（宝禅寺，位于今宝产胡同路北）之北流过。……金水河过崇国寺南门桥后，穿过东枪厂大坑（原来应该是水洼，后来形成不规则的胡同），再过厂桥（皇城北垣的兴圣宫北门前，对着后来的德内大街），流到‘海子南岸东西道路’的南侧。这段水道

应该是元代新开挖的。从地形和路线看，这条河道比较顺畅”^⑥。

最后，有一个遗留问题。按照徐苹芳提供的金水河遗址线路，此河与北边的道路之间似有百来米，这是否符合“金水河浸润于其上”的记载？或许可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是，浸润道路的情况并不是常态，而是夏季暴雨水涨的情形；二是，当初的道路较今天偏南，例如，21世纪初所发现的东不压桥的位置（即当时道路的位置），就在今地安门东大街街心偏南的地方^⑦。本文所言为初步读书感想，所谈问题多存争议，不妥之处，望大家指正。

① 参见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政区城市卷），文津出版社，2013年，第5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编著：《元大都：1964—1974年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24年，第6页。

②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编著：《元大都：1964—1974年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24年，第41～42页。

③ 蔡蕃：《北京古运河与城市供水研究》，北京出版社，1987年；岳升阳主编：《图说北京古城变迁史》，北京出版社，2025年。

④ 李宝臣：《北京城市发展史（明代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第7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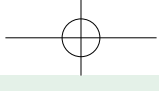
⑤ 《北京水系之北海太液池》，<https://zhuanlan.zhihu.com/p/8271185277>。

⑥ 蔡蕃：《北京古运河与城市供水研究》，北京出版社，1987年，第110页。

⑦ 《明宣宗实录》卷91，宣德七年六月甲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2081页。

⑧ 蔡蕃、姚华容：《北京金水河考》，《北京文史》2018年第3期。

⑨ 关于金水河在大都城內流经路线的不同观点，读者可参考如下论著：侯仁之：《北平金水河考》，收入氏著《我从燕京大学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03～128页；蔡蕃、姚华容：《北京金水河考》，《北京文史》2018年第3期；邓辉：《元明清北京城市形态中的河湖水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3年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编著：《元大都：1964—1974年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24年；李零、张南金：《风乎舞雩：元大都踏查记》，湖南美术出版社，2024年。



元英宗校勘大藏经有关史事考

A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Facts Concerning the Revision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Canon by
Emperor Yingzong of the Yuan Dynasty

舒小峰 (北京市政协文旅卫体和文史委员会)

Shu Xiaofeng (Cultural, Tourism, Health, Sports and History & Culture Committee of the Beiji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摘要: 元英宗至治年间(1321—1323),英宗为制作铜板大藏经,因底本“文多舛误”,遂在北京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官方校勘活动。地点集中选在元大都内的三座皇家敕建寺院:大永福寺(青塔寺)、大圣寿万安寺(白塔寺)和大庆寿寺(双塔庆寿寺)。由大永福寺首任住持法洪总领,名僧法祯、性澄(湛堂)等总督其事,征选天下名僧六十员,历时两年完成校勘并编定新目录,形成“至治版大藏经总录”。此次官修活动成果直接为天历年间刊刻的《元官藏》奠定了基础。本文通过钩沉大藏经校勘过程中的佛教文化活动,揭示了元英宗组织力量校勘大藏经的历史源流,希望对挖掘北京历史文化内涵、提升相关文物价值认知有所助益。

关键词: 元代 佛教 铜板大藏经 校勘 金书藏经

中图分类号: K 247 **文献标识码:** A

Abstract : During the Zhizhi reign period (1321–1323) of Emperor Yingzong of the Yuan Dynasty, aiming to produce a bronze-block Chinese Buddhist Canon, the emperor organized a large-scale official revision in Beijing owing to the numerous textual errors in the base texts. The work was concentrated in three imperial Buddhist temples in Dadu, namely the Dayongfu Temple (Cyan Pagoda Temple), the Dasheng Shouwan'an Temple (White Pagoda Temple), and the Daqingshou Temple (Twin Pagodas Qingshou Temple). Presided over by Fahong, the first abbot of Dayongfu Temple, and supervised by distinguished monks such as Fazhen and Xingcheng (Zhantang), the project recruited sixty eminent monks from across the country. After two years of efforts, the revision was completed and a new catalogue was compiled, forming the General Catalogue of the Zhizhi Edition Chinese Buddhist Canon. The achievements of this official compilation laid a direct foundation for the carving of the *Official Yuan Dynasty Chinese Buddhist Canon* during the Tianli reign period. By examining the Buddhist cultural activities during the revision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Can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Emperor Yingzong's organization of the canonical revision, hoping to contribute to the exploration of Beijing'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the enhancement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value of related cultural relics.

Keywords : Yuan Dynasty; Buddhism; Bronze-Block Chinese Buddhist Canon; Textual Collation; Gold-script Buddhist Can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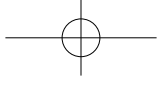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在汉文大藏经版本研究和印刷史研究中,元代铜板大藏经^①一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但由于史料缺乏,且至今未发现相关文物,因此,尚无专文研究。

论者提及元代铜板大藏经,大都引用下列两条

史料:

第一条出自明代释明河撰《补续高僧传》卷1《法祯传》:

英宗即位,将以大藏经治铜为板,而文多舛误,征选天下名僧六十员讎较。师与湛堂、西谷



三人为总督，重勘诸师所较，仍新为目录。旌赏特加。^②

第二条出自元人黄溍撰《荣禄大夫大司空大都大庆寿寺住长老佛心普惠大禅师北溪延公塔铭》（以下简称《北溪延公塔铭》）：

英宗皇帝以禅师先朝旧德，每入见必赐坐，访以道要。命于永福寺与诸尊宿校勘三岁，将镂铜为板以传，后因屑金书藏经，虑前贤撰集之书或有伪滥，复命之删定焉。^③

上述两条史料，都提到了这样一件事情：在制作铜板大藏经前，英宗曾征选60位“天下名僧”对大藏经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讎较”“校勘”和“删定”工作。

本文拟就元英宗组织力量校勘大藏经的几个问题做一考证，以求教于方家。

一、校勘大藏经的起因

元英宗校勘大藏经的直接起因是计划制作铜板大藏经。英宗即帝位于延祐七年（1320）。此前不足70年，元世祖忽必烈曾组织全国29位名僧对汉藏大藏经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校勘，成《至元法宝勘同总录》（《至元录》）^④，即大藏经总目录。英宗完全可以依据《至元录》制作铜板大藏经，但在工程开始之前却发现当时依据的版本“或有伪滥”“文多舛误”，因此，不得不增加了一个校勘的程序。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1986年夏在北京智化寺发现的元代官刻版大藏经实物^⑤中找到佐证：

智化寺发现的元代官刻版大藏经系延祐三年（1316）刊印，研究者一般称其为《延祐藏》或《不知名元官藏》。《延祐藏》“使用了金大定十八年（1178）刊竣的《金藏》经板，并改动了原板的千字文函号，从而以一部新的官版大藏经的面目流传于世”，“延祐本依据《至元录》编目”^⑥。研究者还发现，《延祐藏》与《至元法宝勘同总录》中的千字文

编号，也不尽相同^⑦。比如：《延祐藏》在《至元录》的基础上，对秘密经、大乘论和圣贤撰集部分的收经作了较大调整。研究指出：由于《延祐藏》刊成于《至元录》以后二十七年，“其间又有新译撰及拾遗典籍编入大藏，所以元代藏经的收经情况，必然会在《至元录》的基础上有所改变”^⑧。

元仁宗制作《延祐藏》之前是否曾像世祖那样组织过大规模的校勘活动，是否形成了一部新的大藏经总目，史无记载。不过从现有材料看，英宗不但对《至元录》不满意，即使对此前不久刊印的《延祐藏》也不满意。为制作出高质量的铜板大藏经，英宗组织天下名僧对大藏经又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校勘工作，这是史料记载元代继忽必烈至元间那次大规模校勘以后的第二次官方校勘，其规模甚至超过了前一次。

二、校勘大藏经的地点

据黄溍《北溪延公塔铭》介绍，元英宗组织天下名僧对《大藏经》进行校勘工作的地点在永福寺^⑨。其实从现有史料看，当年校勘大藏经的地点共有三处：大永福寺（青塔寺）、大庆寿寺、大圣寿万安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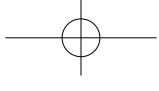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一）大永福寺（青塔寺）

黄溍《北溪延公塔铭》提到的永福寺在什么地方呢？

《日下旧闻考》引用《五城寺院册》的万历三年（1575）立《张一桂重修青塔寺碑略》记载：“青塔寺者，即胜国时敕建大永福寺也。寺在都城阜成门内，故有青浮图。稍东为白塔禅寺，相距里许。俗称青塔寺云。寺创自延祐间。”^⑩

元代史料对青塔寺的记载，是当代人记当代事，其可靠性更高：

《永乐顺天府志》引熊梦祥《析津志》：“青塔，



永福寺青琉璃。”^⑩《析津志》记载塔的行文规律是：塔名、所在寺庙、特征。故此句可理解为：青塔，位于永福寺，因覆以青琉璃而得名。熊梦祥是元末人，曾任大都路儒学提举、崇文监丞，他很可能亲眼见过位于元大都城内的永福寺有青琉璃塔。

比熊梦祥更早记载大永福寺的是元仁宗延祐年间任嘉兴祥符寺住持的僧人念常。他在其《佛祖历代通载》中明确记载：“己未^⑪，敕建大永福寺（即青塔寺）。”^⑫

根据上述元明史料，青塔寺始建于元代，其正名为大永福寺，也称为永福寺，因为寺内有一座青琉璃塔，故当时即俗称“青塔寺”。今北京市西城区白塔寺西侧有青塔胡同，即以旧有青塔寺而得名。

元代安奉前朝帝后御容的影堂（后称“神御殿”，亦称“御容殿”）多置于皇家兴建的寺院中。安奉顺宗、显宗和英宗三位帝后御容的影堂都曾设在大永福寺：

（元仁宗延祐五年十一月癸未）敕大永福寺创殿，安奉顺宗皇帝御容。^⑬

（泰定二年，1325）春正月甲辰，奉安显宗像于永福寺，给祭田百顷。^⑭

影堂所在：……英宗帝后大永福寺；……英宗影堂，藏皇帝玉册十有二牒，玉宝一钮，皇太子玉册十有二牒。凡帝后册宝，以匣匱金锁钥藏于太庙，此其分置者。^⑮

将校勘大藏经的工作放在设有历代皇帝影堂的敕建寺院，说明英宗对这次校勘工作的高度重视。

（二）大圣寿万安寺

大圣寿万安寺即今妙应寺（白塔寺），为元大都重要的敕建寺院，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英宗组织力量校勘大藏经，这里是另一个校经地点。大庆寿寺住持鲁云行兴就曾在里参与校经。黄溥撰《佛真妙辩广福圆音大禅师大都大庆寿寺住持长老鲁云兴公舍利塔铭》（下称

《鲁云兴公舍利塔铭》）称：

英宗践祚，首命召（鲁云行兴）还京师，俾于圣寿万安寺与一时高德名流校讎三藏，禅师博洽而精详，鲁鱼亥豕，多所是正，声誉籍甚。上闻而为之嘉叹不已，被旨主竹林（寺）。^⑯

（三）大庆寿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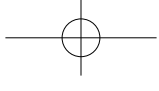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大庆寿寺又称庆寿寺，明代改称大兴隆寺，20世纪50年代初尚遗二塔，俗称“双塔庆寿寺”“双塔寺”，后因扩建西长安街而拆除。元人揭傒斯有诗《送陈讲主奉诏校经罢归余杭》，其注称：“校经庆寿寺，寺有松樾轩。”^⑰

关于这位陈讲主校经的时间，可从元人欧阳玄为揭傒斯所撰墓志铭中揭傒斯在京时间找到线索^⑱。揭傒斯于元仁宗皇庆年间（1312—1313）入京师，泰定元年（1324）离京。此后虽曾再次进京，但《元史》及其他史料皆无元廷官方在京大规模校勘大藏经的记载，故其《送陈讲主奉诏校经罢归余杭》诗中所言陈讲主在庆寿寺“奉诏校经”，当即英宗至治年间校经，而非世祖至元年间校经。

大永福寺（青塔寺）、大圣寿万安寺（白塔寺）和大庆寿寺都是元大都城内的重要皇家敕建寺院，且皆位于元大都的西南方向，距离接近，便于工作联系。显然，选择这三座寺院作为校勘大藏经的工作场所，必定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三、主持大藏经校勘工作的是大永福寺第一任住持法洪

法洪，俗姓刘，“陇西巩昌成州人”。曾任洛阳白马寺、大都西山龙泉寺住持，深得元英宗信任。他曾受命为国师八思巴撰帝师殿碑文，“文成奏御，嘉赉甚厚”。英宗即位后，授“荣禄大夫、司徒，已而进阶光禄加大司徒，刻银为印，食一品禄”。至治元年（1321）二月，“诏公住持新建大永福寺。



涖事之日，三宫赐白金，中宫复制红衣以衣之”。随后，任寿安山大昭孝寺（即今香山卧佛寺）住持。法洪去世后，元人许有壬受命为其撰写《敕赐故光禄大夫司徒释源宗主洪公碑铭》，碑铭透露了法洪与英宗组织天下名僧校勘《大藏经》的关系：

（法洪）承制总选名僧校讎三藏书，领江淮官讲凡三十所，于是贵幸莫比矣。^②

校勘大藏经是事关铜板大藏经质量的重要前期环节。英宗下决心“征选天下名僧六十员”来从事这项工作，将校勘大藏经的地点之一选定在新落成的大永福寺，又指派法洪负责“总选”参与校勘工作的名僧，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实际主持大藏经校勘工作的就是这位大永福寺首任住持法洪。

四、校勘大藏经的具体负责人是名僧法祯、湛堂和西谷三人

前引《补续高僧传》卷1《法祯传》表明，在法洪之下，具体负责《大藏经》校勘工作的是名僧法祯、湛堂和西谷三人^③。这三位僧人在校勘大藏经工作当中的身份为“总督”，任务是：在全国征选来的60位名僧对大藏经的伪滥舛误进行“讎较”“校勘”“删定”以后，由这三人负责再次勘定，并据此排定新的大藏经目录。校勘大藏经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从全国选出的60位名僧之佛学水平可想而知，而法祯、湛堂和西谷三人作为“总督”，“重勘诸师所较”，则其佛学水平又在60人之上了。

（一）法祯

据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1《法祯传》：法祯，字蒙隐，号雪涧，俗姓蒋，祖居山东定陶。靖康南渡时，徙居淮西寿春（今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幼出家，事退庵无公大讲师落发，十七岁时入讲肆，通经论大旨。后入京师，“被旨即庆寿开堂”。他曾

“五读华严大疏。两阅大藏”，多次奉诏参与佛经翻译工作，可见其佛学造诣之深。

英宗即位后，法祯于大永福寺和湛堂、西谷三人共为校正大藏经的总督，负责“重勘诸师所较，仍新为目录”。泰定、至顺年间，法祯仍居京师，因其德高望重，故“教门有大故，师必预议秉笔”。后至元二年（1336），任南城大竹林寺住持，至正十四年（1354），住持潭柘之龙泉寺（今北京门头沟区潭柘寺）时，修葺殿宇，广建精舍，自己捐资一万三千五百余贯，又集资四千四百余贯，因而使潭柘寺焕然一新。惜“未详所终”^④。

（二）湛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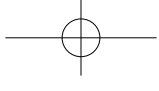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据黄潘《上天竺湛堂法师塔铭》：性澄，一名姓澄，字湛堂，别号越溪。绍兴会稽孙氏子。忽必烈至元十三年（1276）投同邑佛果寺石门殊律师出家。至元二十二年（1285）依佛鉴铈公习天台宗，谒云梦泽法师于南天竺。大德九年（1305）出住东天竺之兴元寺，至大元年（1308）迁南天竺之演福寺。

性澄湛堂在元英宗至治元年被“驿召至京师，入对明仁殿，被旨于青塔寺校正经、律、论三藏。有司供张，岁时锡予，为礼殊厚。驾幸文殊阁，引见问劳，赐食。正旦及天寿节，再朝于大明殿，赐以无量寿佛经等若干卷。校正事毕，特赐金襴袈裟，加以御用衣段”，赐号佛海大师。

此后，他于“泰定甲子（泰定元年）以还，住上天竺观音教寺”。至正二年（1342）八月二日卒，时年78岁^⑤。

（三）西谷

据《补续高僧传·法祯传》，还有一位名叫西谷的僧人，他曾和性澄湛堂、法祯一起，在大永福寺担任校正大藏经的总督。参与这样一项重要的佛事活动，且负责校正全国60位名僧的译文，西谷的佛学功底应当十分深厚。惜尚未查到其人事迹。



五、参与大藏经校勘工作的其他名僧

现在，已经无从查考当时参与校书的60位名僧的全部名单了。除法洪、法祯、性澄、西谷以外，还有四位僧人出现在史料当中：

（一）弘教慧印

据明代释镇澄《清凉山志》卷3《高僧懿行·弘教大师传》记载，元代弘教慧印曾在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于永福寺校正藏典：

元弘教，讳慧印，关西张氏子。……皇庆元年（1312），声闻远播，承诏至京，于安国寺讲经，王公缙素，罔不服化。……至治元年，从帝师受秘密之诀。二年，英宗幸台山，师陪驾，游至南台，帝命师祈嘉应。师即禅定，帝见白光若水，弥漫空际，大士影像，渺然现中。帝庆信无量，赐币及玉文殊像、七宝念珠。诏陪驾至京师，于永福寺校正藏典，令太子贵人从师受菩萨戒。事讫还山。文宗诏住承天寺，授司徒一品银印，师固辞。上使再至，师辞不起。至元三年（1337），寿六十七，示寂，火之，收舍利，建塔藏焉。^{②4}

（二）北溪智延

据黄滔《北溪延公塔铭》：智延，别号北溪，俗姓高，祖籍云州。父辈时定居彰德。“稍长，恳求出家，……师事凤林某公。”“既得度受具，出游诸方，闻汴、洛、汝、汉之间讲肆甚盛，孝严温公见地昭融，辨说无碍，往受业焉。”“凤林之歿，抗策北归。”“走京师，谒西云安公于大庆寿方丈，究教外别传之旨。一旦豁然顿悟，西云付以衣。”“仁宗皇帝在春宫，闻禅师名，俾驸马、太尉、沈王传令，以居彰德之天宁，仍即庆寿开堂演法。沈王欲便于咨叩，请以居呼奴之弘福，会西云示寂，朝廷以庆寿禅宗第一刹，非德器之重、道眼之明、力量足以荷担大事者，莫宜尸之。乃询于丛林大知识，

金谓：禅师西云上足，当补其处。”因此，仁宗命“有司具威仪，送之入寺，赐号佛心普慧大禅师”。

在北溪智延担任大庆寿寺住持期间，“上每幸庆寿，数顾而与之语，特授荣禄大夫、大司空，领临济宗事”。英宗即帝位后，“以禅师先朝旧德，每人见必赐坐，访以道要，命于永福寺与诸尊宿校勘三藏，将镂铜为板以传，后因屑金书藏经，虑前贤撰集之书或有伪滥，复命之删定焉”。

北溪智延以久居大刹，向皇帝提出退隐，后“还居于西堂”，于元统三年（1335）冬十二月二日去世，终年79岁，“分建塔于天宁及庆寿之祖塋”^{②5}。

（三）鲁云行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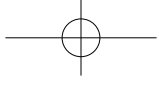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据黄滔《鲁云兴公舍利塔铭》，行兴，号鲁云，俗姓李，世居山东郛城。十岁出家，礼其乡乐闻寺僧端公受具，后入京师，谒大庆寿寺西云安公，与北溪智延为同门兄弟。住持海云寺十年，后“以省坟墓辞归郛城”。“英宗践祚，首命召（鲁云行兴）还京师，俾于圣寿万安寺与一时高德名流校讎三藏，禅师部洽而精详，鲁鱼亥豕，多所是正，声誉籍甚。上闻而为之嘉叹不已，被旨主竹林（寺）。”^{②6}后历主汝州风穴寺、赵州柏林寺、大都大庆寿寺。元统元年（1333）十二月去世，年60岁。

（四）陈讲主（岩讲主）

前引元人揭傒斯诗《送陈讲主奉诏校经罢归余杭》注称：“校经庆寿寺，寺有松樾轩。”又注云：“君始为僧，号岩讲主，门徒五百余人。后以许昌赵既明言，乃反初服。”^{②7}

校勘大藏经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程。事后，作为主持此项工程的大永福寺住持法洪在回顾这一段经历时，曾深有感触地说：

佛教法之传必资翻译，故译梵为华，或敌对名物，或唯以义，必博通经论，善两方之言始能为之。是以道安尝谓：翻译微言有五失本三不易，故



非能者不足以有为也。所以传列十科，翻译居道者，岂非以其为之难、功之大乎。予尝以诏与京邑诸公校讎藏典，历观自古翻译之家，以义译经如秦之罗什，译论唐之奘公，十数人之作，所谓禹吾无间然矣。其余或指义暧昧，或文辞疏拙。夫义之暧昧，盖译者之未尽文，或疏拙润色之失也。因思安公之言，以谓以弥天之高，尚称不易，今之译者何其易哉。自季叶以来，译场久废，能者盖寡，岂意人物凋残之际乃见公乎！观其所译可谓能者哉。^②

六、校勘大藏经的起止时间及成果

校勘大藏经的工作地点之一既在大永福寺，则其工作之启动，必于该寺建成之后。《元史》载：“（元英宗至治元年二月）壬子，……大永福寺成。”^③我们还可以从法洪地位的变化时间得到佐证。许有壬为法洪所撰《敕赐故光禄大夫大司徒释源宗主洪公碑铭》称：“（英宗）既即位，即授公荣禄大夫、司徒。已而，进阶光禄，加大司徒，刻银为印，食一品禄。”^④《元史》记载的时间更为准确：“（至治元年二月）丁卯，以僧法洪为释源宗主，授荣禄大夫、司徒。”^⑤这一时间，正是在“（元英宗至治元年二月）壬子，……大永福寺成”^③的十几天之后。正是有这样的背景，“遂诏公住持新建大永福寺”^⑥。

由此可以推知，校勘大藏经工作的启动时间当在元英宗至治元年二月丁卯之后。

校勘大藏经工作的结束时间，史无明确记载。有学者认为，由于英宗在至治三年（1323）遇害于上都，这项工作便“人亡政息”了。那么，校勘工作是否善始善终了呢？

现有史料显示，从至治三年末到泰定初年，参与校勘工作的几位关键人物都相继离开了永福寺：

先看负责主持大藏经校勘工作的法洪：

许有壬在“法洪碑铭”里记载：“会寿安山大昭

孝寺成，诏以公主之。”^⑦大昭孝寺的营建工程浩大，一直到顺帝时尚未结束，故此处所谓“成”，当指完成阶段性工程。《元史》记载，英宗极其重视营建工作，曾数次亲临大昭孝寺。“法洪碑铭”称，法洪曾在大昭孝寺以住持的身份接待过英宗及丞相东平王。因此，校勘大藏经的主持者法洪在至治三年英宗遇害之前当已离开大永福寺了。

再看负责“总督”大藏经校勘工作、“重勘诸师所校”的湛堂、法祯：

元人袁桷有《送湛师校经回杭》诗^⑧，黄溍《上天竺湛堂法师塔铭》载：湛堂于“泰定甲子以还，住上天竺观音教寺”^⑨。泰定甲子，即泰定元年。由此可知，湛堂最迟在泰定元年时已经离开大永福寺了。

法祯离开大永福寺的时间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1《法祯传》载：“泰定、至顺之交，教门有大故，师必预议秉笔。后至元丙子（1336），被两宫诏旨，主南城大竹林。”^⑩看来，在至治之后法祯也不再参与校勘大藏经之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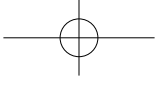
关于慧印的记载也是如此：

弘教慧印“诏陪驾至京师，于永福寺校正藏典，令太子贵人从师受菩萨戒。事讫还山”^⑪。法洪为慧印所撰《故荣禄大夫大司徒大承天护圣寺住持前五台大万圣佑国寺住持宝云普门宗主广慧妙弁树宗弘教大师印公碑铭》称，“（至治）三年夏，上遣宗室益不花太子奉御旨至五台，设华严会，赐公手诏，代上行香，加赐御酒”^⑫。可见，慧印在至治三年夏时已经回到五台山。

从校勘诸僧先后离开京师的时间看，当始于至治三年夏。这一时间正与英宗遭遇“南坡之变”的时间大体重合。

关于校勘大藏经工作的结束时间，可以从黄溍《上天竺湛堂法师塔铭》和《元史》中的信息进一步推断更准确的时间：

黄溍《上天竺湛堂法师塔铭》称：



校正事毕，特赐金襴袈裟，加以御用衣段。已给驿券将南还，俄有旨即白塔寺建水陆大会，丞相东平忠献王留升座说法，众咸悦服。事闻，宪赉尤渥，仍降玺书，加护进号佛海大师。^④

性澄湛堂在校勘大藏经工作结束后，已经“给驿券将南还”了，却突然接到皇帝旨意，要他参加在白塔寺举行的水陆大会。所以，校勘大藏经工作的结束时间必在白塔寺水陆大会之前。《元史》记载这次水陆大会的时间在至治三年夏四月：

夏四月壬戌朔，敕天下诸司命僧诵经十万部。……敕京师万安、庆寿、圣安、普庆四寺，扬子江金山寺、五台万圣祐国寺，作水陆佛事七昼夜。^④

由此可知，元英宗组织“天下名僧”校勘大藏经相对准确的起止时间应当是：至治元年二月丁卯后启动，到至治三年夏四月之壬戌前结束，为期两年。

英宗遇害、泰定改元，且不论铜板大藏经是否制作完成，大藏经的校勘工作是不是草草收场或不了了之甚至半途夭折了呢？

从现有资料看，英宗对校勘大藏经的工作十分满意，曾对参与校勘工作的一些僧人赏赐有加：

明代释如惺撰《大明高僧传》卷1《元杭州上天竺沙门释性澄传》记载：“事竣辞归，特赐金襴衣，赐号佛海大师。”^⑤黄溍在《上天竺湛堂法师塔铭》中也记载：性澄湛堂“校正事毕，特赐金襴袈裟，加以御用衣段”^⑥。柳贯《待制集》卷4《送南竺澄讲主校经后却还杭州》诗有“竣事才敷奏，疏荣亟劳还”^⑦句。这三条材料都明确称，性澄是在校勘大藏经的工作“事竣”“事毕”之后才得到赏赐并被批准“辞归”的。

法祯也得到了赏赐：“英宗即位，将以大藏经治铜为板，而文多舛误，征选天下名僧六十员讎较。师（法祯）与湛堂、西谷三人为总督，重勘诸师所较，仍新为目录，旌赏特加。”^⑧

看来，这次为期两年的大藏经校勘工作是圆满

结束了，元英宗十分满意，故有赏赐之举。

那么，60位僧人的校勘工作取得了什么成果呢？明代释明河撰《补续高僧传》卷1《法祯传》给我们传达出了关键的信息：

英宗即位，将以大藏经治铜为板，而文多舛误，征选天下名僧六十员讎较。师与湛堂、西谷三人为总督，重勘诸师所较，仍新为目录。旌赏特加。^⑧

原来，60位僧人经过对“前贤撰集之书”加以勘别、删定，“仍新为目录”。也就是说：60位僧人集经过对当时佛教典籍进行勘别以后，去伪存真，剔除了伪经典及“文多舛误”、滥竽充数的内容，并重新排定出了一份新的《大藏经》目录。这份目录，应当是在《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基础上对当时存世佛教典籍的再整理和再修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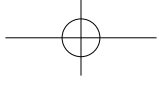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至此可以认定，元朝官方对大藏经大规模的整理和校勘共有两次：元朝官方组织并形成的大藏经总目，除《至元法宝勘同总录》之外，至少还存在另外一个版本，我们姑且称之为“至治版大藏经总录”。“至治版大藏经总录”是在《至元录》的基础上由60位高僧用时两年精心校勘后的成果，其质量当优于《至元录》。

七、关于“金书藏经”

“至治版大藏经总录”编制完成以后，是否据此“治铜为板”或“镂铜板以传”，形成铜板大藏经了呢？学界尚有争论。

在检视铜板大藏经有关线索的时候，我们发现，《元史》及很多佛教史籍当中都有这样的记载，几乎就在“至治版大藏经总录”完成的同时，即至治三年初，英宗还曾下诏征调全国僧儒赴京“金书藏经”：

（至治三年二月）丁亥，敕金书藏经二部，命拜住等总之。^⑨



(至治)三年,诏僧儒书金字藏经。⁴⁸

《元史·吴澄传》记载,英宗曾命翰林学士、太中大夫吴澄为金字藏经作序:

英宗即位,(吴澄)超迁翰林学士,进阶太中大夫。先是,有旨集善书者,粉黄金为泥,写浮屠藏经。帝在上都,使左丞速速,诏(吴)澄为序。……会帝崩而止。⁴⁹

《元史·吴澄传》所记之事,当据虞集为吴澄撰写的《故翰林学士资善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临川先生吴公行状》:

(至治三年)五月至京师,六月入院。时诏学士繖萨尔集善书者粉黄金写浮图藏经。有旨自上都来,使左丞苏埒诏先生为之序。……会上崩,不及奏而止。⁵⁰

全国又有很多名僧参与了这项工作。

第一位是念常梅屋。此人即撰《佛祖历代通载》的作者。《佛祖历代通载》卷1《华亭梅屋常禅师本传通载序》载:

至治癸亥⁵¹夏(月)乘驿赴京,缮写黄金佛经。暇日得以观光三都,游览胜概,礼五台曼殊室利,披燕金遗墟之迹,由以动司马撰书之志。出入翰相之门,讨论坟典,升诸名师堂奥,讲解经章,如司徒云麓洪公、别峰印公皆尊爱之。⁵²

《补续高僧传》卷18《念常传》亦载:

至治癸亥,乘驿赴京。得以观光三都之胜,览燕金遗墟,入五台礼曼殊。出入金门,讨论坟典,如司徒云麓洪公、别峰印公,自帝师以下,皆尊而爱之。自京而回,主姑苏万寿法席。⁵³

第二位是无印大证。《五灯全书》卷61《明州雪窦无印大证禅师》:“元至治癸亥,应诏金书大藏。英宗赐织金屈昫,南还江浙。”⁵⁴

《续灯存稿》卷11《明州雪窦无印大证禅师》:“至正⁵⁵间,诏天下名衲善书者书金字藏经,师应诏。事竣,上赐金屈昫之衣。泰定初南还。”⁵⁶

《续灯正统》卷35《宁波府雪窦无印大证禅师》:

“至治癸亥,应诏金书大藏,英宗赐织金屈昫。南还江浙。”⁵⁷

袁桷《清容居士集》有一首《送雪窦长老校经回里》诗值得注意:

翠锁松关叠叠高,坐看明月负金鳌。

已将禅板传心印,暂下绳床披毳袍。

圣谛无声机独露,经筌有碍目难逃。

尘中白发谁消得,归掩山寮听雪涛。⁵⁸

由“经筌有碍目难逃”句看来,雪窦无印大证禅师曾参与大藏经的校勘工作。那么,无印大证是否既参加了大藏经校勘工作,又参加了金书藏经工作?《续灯存稿》卷11《明州雪窦无印大证禅师》称,无印大证应诏至京书金字藏经,“事竣”后蒙赐南还,是否乃校勘大藏经事竣后蒙赐南还之误书?因资料有限,姑书于此存疑以待方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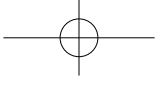
第三位是楚石梵琦。《五灯全书》卷54《嘉兴府天宁楚石梵琦禅师》:“会英宗召高僧金书大藏,师应诏入京。”⁵⁹

《释鉴稽古略续集》卷2《楚石禅师》:“会元英宗金书大藏,应选上京。”⁶⁰

《楚石梵琦禅师语录》卷20《楚石和尚行状》:“会英宗皇帝诏善书者,赴阙金书大藏经。师在选中,辞叟遂行。既至,馆于万宝坊,近崇天门。一夕睡起,闻彩楼上鼓鸣,豁然大悟。……实甲子(即泰定元年)正月十一日也。是岁东归,再参元叟于径山。”⁶¹

《补续高僧传》卷14《楚石琦禅师传》:“会英宗诏,粉黄金为泥,书大藏经。有司以师善书,选上燕都。一夕闻西城楼鼓动,汗如雨下,拊几笑曰:径山鼻孔,今日入吾手矣。因成一偈,有‘拾得红炉一点雪,却是黄河六月冰’之句。翩然南旋,再入双径。”⁶²

《楚石梵琦禅师语录》卷13《梅檀瑞像赞》注云:“至治三年岁在癸亥六月,被诏至京师,八月诣白塔寺观优填王所刻梅檀瑞像,百拜稽首而为之



赞”⁶⁵，可见，楚石梵琦于至治三年六月奉诏进京。

综上，英宗于至治三年二月决定启动金书藏经工作，念常梅屋、楚石梵琦等人于五、六月间陆续到京，开始正式缮写工作。

历史上的金书藏经，晋时即有记载，宋亦有之，至元朝尤甚，英宗特命丞相拜住等人负责此事。如此高度重视、兴师动众，却又仅制作两部，那么，这次“金书藏经”的举动，其书写范围绝不会仅仅是某部经书或某几部经书，很可能是大藏经全部。和“金书藏经”相衔接的，正是在大藏经校勘工作完成，刚刚制定了新版的大藏经目录。因此，英宗至治三年组织全国僧儒大规模“金书藏经”所依据的，一定是在永福寺刚刚校勘完成的“至治版大藏经总录”和经过校勘后的大藏经文。

元英宗为什么要组织力量“金书大藏”呢？

明初僧人无愠在洪武年间所著《山庵杂录》认为，元英宗组织金书藏经是为了超度亡宋后主、瀛国公赵昀：

合尊大师者，宋幼主瀛国公也。既归附大元，萨禅皇帝命薙发为僧，帝师躬为摩顶，授秘密戒法，精炼坚确，已多应验。至英宗朝，大师适兴吟诗云：“寄语林和靖，梅开几度华。黄金台上客，无复得还家。”谍者以其诗意在讽动江南人心，闻之于上，上收斩之，白乳流溢。上悔，出内帑黄金为泥，诏江南善书僧儒集燕京，书大藏尊经，庸助冥福。首夏驾幸上都，避暑中途遇弑，新书经未及半藏，乃已。⁶⁶

元僧念常《佛祖历代通载》载，瀛国公死于英宗至治三年四月：“是年四月，赐瀛国公合尊死于河西。”⁶⁷陈垣先生在分析发生这两件事的时间顺序后认为，京师万安、庆寿、圣安诸寺作水陆佛事与瀛国公之死有密切关系。

《元史》廿八《英宗纪》虽未载其死，然载：“至治三年四月朔，敕天下诸司，命僧诵经十万部。同月又敕京师万安、庆寿、圣安、普庆四寺，扬子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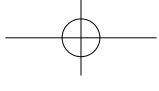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金山寺、五台万圣祐国寺，作水陆佛事七昼夜。”⁶⁸皆似与此事有关⁶⁹。

循着这一思路，我们再看金书藏经与瀛国公遇害之事就会发现：金书藏经始于至治三年二月丁亥，早于瀛国公遇害的四月：

（至治三年二月）丁亥，敕金书《藏经》二部，命拜住等总之。⁷⁰

因此，无愠《山庵杂录》因为瀛国公之死而有金书藏经之事以“庸助冥福”的说法，从时间先后顺序上看是说不通的。英宗金书藏经的最初动因显然不是瀛国公之死，而必定有其他原因。

元英宗佞佛。他即位后，除下诏动用官方力量制作铜板大藏经外，还在北京香山脚下大兴土木，营建大昭孝寺（即今卧佛寺），并于至治元年十二月决定“冶铜五十万斤作寿安山寺佛像”⁷¹。从时间上看，校勘大藏经工作结束并形成“至治版大藏经总录”的时间在至治三年夏四月之前，而决定金书藏经的时间是在至治三年二月，这两个时间几乎重合。英宗在至治元年二月为制作铜板大藏经而启动大藏经校勘工作，到十二月又决定“冶铜五十万斤作寿安山寺佛像”。在当时条件下，制作如此重量的佛像，自然会直接影响到其他使用铜的重大工程。“铜板大藏经”之不传，至今未见任何踪迹，很可能是因为元英宗连续启动铜板大藏经和寿安山寺铜佛像铸造项目后，到至治三年二月，面对即将完成的“至治版大藏经总录”和校勘整理出来的海量大藏经文字，终于发现有限的铜资源不可能同时支撑两项涉铜重大工程。英宗既不甘心将经过两年校勘终于完成的“至治版大藏经总录”束之高阁，又断不能放弃“冶铜五十万斤作寿安山寺佛像”的宏大构想，在无法兼顾两端的情况下，被迫做出舍铜板大藏经而保大昭孝寺铜佛像铸造的决定。“金书大藏”很可能就是铜板大藏经制作不成，退而求其次的无奈之举。因此可以认为，“金字藏经”是铜板大藏经的替代品，也是英宗组织“天下名僧”



校勘大藏经工作的最终应用成果。

无愠《山庵杂录》记载，由于英宗死于“南坡之变”，金书藏经一事半途而废：“（英宗）驾幸上都避暑，中途遇弑，新书经未及半藏乃已。”^①前述关于吴澄受命为金书藏经做序的两条材料也证实了这一点。《元史》记载得更清楚，金书藏经的活动最终结束于泰定二年七月：“（泰定二年秋七月）庚午，以国用不足，罢书金字《藏经》。”^②

要之，金书藏经始于英宗至治三年二月，最终结束于泰定帝泰定二年七月，历时两年多。由此看来，元英宗组织力量校勘大藏经并形成“至治版大藏经总录”的工作是善始善终了，但“金书藏经”这个铜板大藏经的替代项目最后也因为“南坡之变”而人亡政息、半途而废了。

八、关于《元官藏》

1979年，云南图书馆曾发现一部从未见于著录的元代官刻大藏经残本，学界一般称其为“元官藏”。有研究指出，该藏经是天历三年（1330）至至元二年间在大都刊刻的^③。

研究者发现：“《元官藏》的目录结构，受到《至元录》的深刻影响，并依照其框架组织《元官藏》的目录结构。在各部经典的具体组织上，《元官藏》并非严格按照《至元录》的次序组织入藏目录，而是有调整，甚至在部分部类有重大调整。”^④究其原因，“英宗时已将拟刻之藏经校订完毕，编为新录。但英宗在位仅三年被弑，嗣后泰定帝即

位，只五年而亡，雕印大藏的工作恐一直未能正式进行。但校好的底本，编定的经录，想必留存着。逮至文宗即位，再行开雕藏经，自然一切都较顺手，费时亦不需很长了”^⑤。看来，本文梳理的诸多史料是能够支持这一结论的。今天虽然没有发现元英宗铜板大藏经和“金书藏经”的实物，也没有发现“至治版大藏经总录”，但通过对云南图书馆藏《元官藏》的研究，或可窥见一些“至治版大藏经总录”的影子。

号称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达观真可曾说，“唐宋之世，大藏经板海内不下二十余副，……元板亦不下十余副”^⑥。但时至今日，可以认定的元代版本却只有《普宁藏》《延祐藏》《元官藏》等几种。元代曾两次官方组织对大藏经的大规模校勘，分别形成了《至元录》和“至治版大藏经总录”。“至治版大藏经总录”上承《至元录》和北京智化寺发现的《延祐藏》，下与金书藏经和云南发现的《元官藏》有密切关系。结合各地现已发现的元代大藏经残本，通过对这两个大藏经目录和有关文物的不断研究，或有助于深化对元代大藏经版本源流的探索。

元英宗组织校勘大藏经和金书藏经，涉及北京地区元代诸多历史遗存和文物保护单位。此前及以后的辽金和明清时期围绕大藏经所开展的诸多官方行为，也大都与北京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围绕辽金元明清时期大藏经校勘、缮写、印刷及流传展开研究，亦当对中国佛教历史及北京历史文化内涵的深入发掘整理、进一步提升对相关文物价值的认识有所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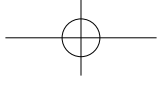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① 亦有研究者称为“铜版大藏经”。

②③④⑤（明）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1《法祯传》，《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28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8页。

③⑨（元）黄潘：《金华黄先生文集》卷41，《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1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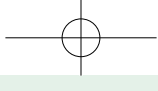
④（元）释庆吉祥等编：《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28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74页。

⑤ 许惠利：《智化寺发现元官版藏经》，《紫禁城》1987年第5期。按：此后有研究者称发现于1984年夏，如觉真：《北京智化寺〈不知名官藏〉简述》，《法音》2003年第7期；何梅：《北京智化寺元〈延祐藏〉本考》，《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4期；王丹：《智



- 化寺馆藏文物中微生物调查及防护研究》，北京博物馆学会编：《博物馆藏品保管学术论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2009年，第278页。
- ⑥⑧ 何梅：《北京智化寺元〈延祐藏〉本考》，《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4期。
- ⑦ 觉真：《北京智化寺〈不知名元官藏〉简述》，《法音》2003年第7期。
- ⑩ （清）于敏中等编：《日下旧闻考》卷52《城市·内城西城三》，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831页。
- ⑪ （明）谢杰主纂：《永乐顺天府志》卷7《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69页。另见（元）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古迹》，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17页。
- ⑫ 己未年，即延祐六年（1319）。
- ⑬ （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2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105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65页。
- ⑭ 《元史》卷26《仁宗三》，中华书局，1976年，第587页。
- ⑮ 《元史》卷29《泰定帝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653页。
- ⑯ 《元史》卷75《祭祀四》，中华书局，1976年，第1875页。
- ⑰ （元）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41，《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17页。
- ⑱⑳ （元）揭傒斯著，李梦生标校：《揭傒斯全集·诗集》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57页。
- ㉑ （元）欧阳玄：《圭斋文集》卷10，《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1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27页。
- ㉒⑳⑳⑳ （元）许有壬：《至正集》卷4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1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38页。
- ㉔ （明）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1《法祯传》，《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28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8～19页。
- ㉕ （元）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41，《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18～519页。另见（明）释如惺：《大明高僧传》卷1《元杭州上天竺沙门释性澄传》，《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28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12～213页。
- ㉖⑳ （明）释镇澄：《清凉山志》卷3《高僧懿行·弘教大师传》，中国书店，1989年，第80～81页。
- ㉗ （元）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41，《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15～516页。
- ㉘ （元）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41，《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17～518页。
- ㉙ （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2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105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60～761页。
- ㉚㉛㉜ 《元史》卷27《英宗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610页。
- ㉝⑵⑵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1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0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54页。
- ㉞⑵⑵⑵ （元）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41，《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18页。
- ㉟ 杯茗：《南山寺碑文》，《五台山研究》1997年第4期。
- ㊱⑵⑵ 《元史》卷28《英宗二》，中华书局，1976年，第630页。
- ㊲ （明）释如惺：《大明高僧传》卷1，《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28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12页。
- ㊳ （元）柳贯：《待制集》卷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1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42页。
- ㊴ 《元史》卷28《英宗二》，中华书局，1976年，第629页。
- ㊵ （明）释心泰：《佛法金汤编》卷16，《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第13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704～705页。
- ㊶ 《元史》卷171《吴澄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4012～4013页。
- ㊷ （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4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0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28页。
- ㊸ 至治癸亥，即至治三年（1323）。
- ㊹ （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1《华亭梅屋常禅师本传通载序》，《乾隆大藏经》第148册，台湾传正公司，1997年，第782页。
- ㊺ （明）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18，《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28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64页。
- ㊻ （清）霁仑超永编纂：《五灯全书》卷61，蓝吉富编纂：《禅宗全书》第2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288页。
- ㊼ 疑误，当为至治间。
- ㊽ （明）通问编纂：《续灯存稿》卷11，蓝吉富编纂：《禅宗全书》第19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257页。
- ㊾ （清）别庵性统：《续灯正统》卷35，蓝吉富编纂：《禅宗全书》第24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463页。
- ㊿ （清）霁仑超永编纂：《五灯全书》卷54，蓝吉富编纂：《禅宗全书》第2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172页。
- ① （明）释大闻辑：《释鉴稽古略续集》卷2，《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28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8页。
- ② （元）梵琦：《楚石梵琦禅师语录》卷20《楚石和尚行状》，蓝吉富编纂：《禅宗全书》第49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684页。
- ③ （明）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14，《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28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12页。
- ④ （元）梵琦：《楚石梵琦禅师语录》卷13，蓝吉富编纂：《禅宗全书》第49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605页。
- ⑤ （明）无愠：《山庵杂录》上，蓝吉富编纂：《禅宗全书》第3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86～87页。

（下转87页）



民国时期正阳门议改“共和门”之始末

The Proposal to Rename Zhengyangmen as “Gongghemen (Gate of the Republic)”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A Historical Account

郭豹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 (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Guo Bao [Beijing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Beijing Institute of Cultural Heritage)]

摘要：民国初年，围绕北京正阳门是否应改称“共和门”的争议，是一场兼具象征意义与政治内涵的社会事件。本文通过梳理1913年至1923年间相关倡议、政府回应、国会博弈及社会反响，揭示此次更名风波的来龙去脉。正阳门更名之议虽未成功，却折射出民国初期政治文化的多重张力：象征建构与现实考量的冲突、形式更新与精神实质的论辩，以及民意动员与制度程序的复杂互动。同时，提案从民间呼吁到进入国会议程的历程，亦展现了早期共和制度下政治参与的途径和局限。正阳门作为帝制时代“天子当阳”的空间象征，其未能被“共和”之名所取代的结局，成为观察民国共和政体“未完成的转型”及其内在困境的极好样本。

关键词：正阳门 共和门 北京 城门 中华民国 甘华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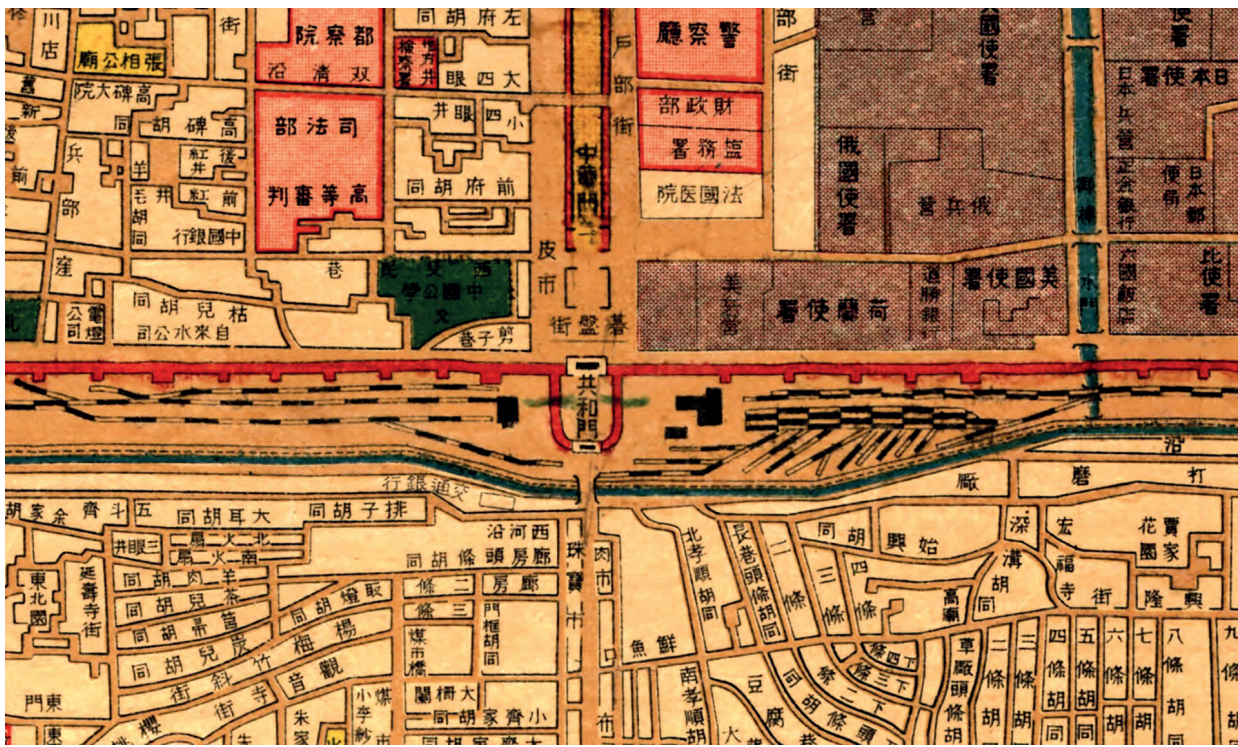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debate over whether to rename Beijing's Zhengyangmen as “Gongghemen (Gate of the Republic)” was a social event imbued with both symbolic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proposals, government responses, congressional debates, and public reactions from 1913 to 1923, unraveling the context and progression of this renaming controversy. Although the proposal to rename Zhengyangmen ultimately failed, it profoundly reflects the multiple tensions i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the conflict between symbolic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the debate over formal renewal versus substantive change, as well as the complex interaction between public opinion mobi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procedures. At the same time, the journey of the proposal—from public advocacy to inclusion in the congressional agenda—demonstrates the avenues and limitation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under the early republican system. As a spatial symbol of the imperial era, where “the emperor faces the sun”, the failure to replace Zhengyangmen with the name “Gongghemen (Gate of the Republic)” precisely serves as an excellent sample footnote for observing the “unfinished transition” and inherent dilemmas of the republican system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Keywords : Zhengyangmen; Gongghemen (Gate of the Republic); Beijing; City Gate; Republic of China; Gan Huaifu

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正阳门，是明清北京内城的正南门，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记忆与民众情感。在民国三年（1914）天津中东石印局出版的一幅北京地图上，正阳门的位置标注着“共和门”（图一）。钩沉史料可见，此处细微的标注是民国初期革故鼎新时代浪潮的印迹——当时的有识之士，曾试

图通过对重要建筑的符号性更名，从文化心理层面切割帝制记忆，构建共和认同。正阳门更名之举几经波折，最终未能实施，说明除旧布新绝非一蹴而就，而是理想、现实与权力博弈相交织的艰巨历史过程。



图一 民国三年天津中东石印局出版《北京地图》(局部)

一、倡议初起：革故鼎新的符号诉求 (1912—1913 年)

民国肇建，万象更新。1913年3月14日《大公报》刊登了一则题为《正阳门拟改共和门之交议》的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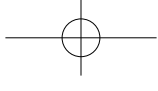
大总统于十一日曾封交国务院密封一件，令速会议具覆。经赵总理批定列入十二日星期三之议程。探其内容，系拟将正阳门改为共和门，于国会召集时实行。大致以“正阳”二字在专制时代取阳以象君之义，对于共和国制，未尽合宜，拟改为共和门以新国人耳目等因。未知如何取决。^①

此文件原文在同年3月24日的《新闻报》得以完整刊载，内容如下：

请愿改题正阳门为共和门并开放及设自由钟呈词

为请愿将京都正阳门改题共和门并永远开放、

设自由钟定准时刻，以昭信守而留纪念事。窃维革故鼎新，固在精神而不在形式。而顾名思义，凡形式在精神亦内附焉。查京都旧有正阳门一座，俗名前门，即京城之二道正门，为人民趋向政府必由之门也，标其门曰正阳门。其建自何时，姑不必深究，但察其意义，似于天子当阳、诸侯用命者近是。在君主时代，天子正南面而立，诸侯皆北面而朝之。一般人民则望尘莫及，出入有禁，备极森严，定义正名亦属确当。今者民国初建，政尚共和，允宜体察輿情，大振共和精神，湔除一切专制积习，树之风声，即于形式上表出共和目的，俾人民咸知所倾向而念念不忘，庶共和根基于以巩固。窃思此举实于国家前途有绝大关系，用是不揣冒昧，请将正阳门改题曰共和门，即请(袁)大总统题书。更设自由钟钟楼于其门楼顶上，上升国旗，四面嵌表，内制撞针接触钟部，定准时刻，即于正式国(会成立开)幕之日，经始发声，使仰视俯



听，不迷向往，当必称便。并将共和门永远开放，使一般人民自由出入，照中华门规则办理，知人民得沐共和幸福，必当更称便利，以祝我民国共和于亿万斯年也。至观听所及，耳目一新，犹其余事。惟各项设置，不无应用经费。查国务议案，曾议决于京都城内设置子午炮台，以定时计而服信用，自是最要之事。以限于经费，经久未办，何妨将前案撤回，归并此案办理，以节经费而便设置。缘此事轻而易举，以旧有之门楼添设钟楼于其上，开办经费至多不过二三元。至常年视守经费预算，当亦减轻于子午炮台支用。且子午炮台之设，系在未发（明）钟表时代之旧制，最骇听闻。今改设自由钟，命名既合于政体，而又安之于最高之地位，使遐尔逃听，皆得信用，詎非便而又便者乎？以上两项设置，皆宜标年月，拟即用正式国会成立之年月日，以作永远纪念。故宜于四月一日以前，设置齐楚，以免愆期。是否有当，谨遵约法请愿之条，恳请贵院迅赐开会，核议施行，不胜翘企待命之至。谨呈国务院国务总理。^②

由此可知，呈文主要内容包含两项：一是将正阳门改名为“共和门”并永久开放，二是在正阳门城楼顶部增建钟楼，设置“自由钟”以定时报时。其理由在于：旧称“正阳”源于帝制时代“天子当阳”之义，且该门昔日禁止平民通行，体现了森严的等级秩序。如今民国肇建，崇尚共和，理应“大振共和精神，湔除一切专制积习”，故需在形式上彰显共和精神，使民众耳濡目染，认同新制。同时，将门禁开放，便利民众通行，亦体现共和政体下人民平等的理念。此外，文中还建议以设置“自由钟”替代旧有设立子午炮台的计划——既节省经费，又能避免炮声惊扰民众，且“自由钟”之名更贴合共和宗旨。这份文件堪称一份精心设计的“共和启蒙方案”，凸显了提议者以空间符号重塑政治认同的自觉。

这一段时间的《大自由报》（3月21日）^③、《申

报》（3月22日）^④，也都全文进行了刊载，文字稍有出入。

其实，一开始提议被改为“共和门”的并不是正阳门，而是明清北京皇城的东门——东安门。1912年11月4日的《民主报》以《改建共和门》为题，刊发了一条消息：

东华门被焚后，现已会议重加修建。其形与旧东华门不同……下辟三门，上树石碑，勒“共和”纪念历史。听说估修款费七十五万两，正中门高悬“共和门”三大字。^⑤

文中的“东华门”应为“东安门”。1912年2月29日晚，北洋军第三镇统制曹錕统辖部队以索饷为名发生哗变，商民遭抢劫者四千余家，北京多处街巷及公共设施遭到严重破坏，皇城东门东安门也在兵变中被烧毁。事态平息后，东安门拟重建，并更名为“共和门”，以作纪念。1913年1月13日《亚细亚日报》所刊《东安门改为共和门》一文说得更为清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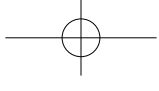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东安门兵燹被焚。近日内务部拟定重修，改为“共和门”，并将禅让诏旨额于门楣，以彰隆裕皇太后公天下之谦德。昨已令各本厂勘估，及至开标，万德厂已占优胜，择于阳历三月开工。^⑥

显然，这一方案虽具“革故”之形，但其实质侧重于“承续”，意在突显“禅让”的合法性。这种温和的方式显然无法满足革命派对“鼎新”的彻底诉求。不久之后的3月12日，《新纪元报》刊载的报道透露了一份全新的方案：

正阳门将改为共和门

共和纪念会交际科主任甘华甫（黼）君日昨呈请政府：将正阳门改为中华门，以新国人耳目；东西华门仍请照旧，以其与中华门相辅翼故耳。有谓将于正式国会开幕之日改易者，此举政府当必照准，不日即为发表矣。^⑦

新方案将更名目标从相对次要的皇城东门，骤然转向了京城中轴线南端、象征“天子当阳”的国



门正阳门。实质上是从东安门焚毁后改建的被动叙事，转向正阳门方案中主动甚至强制性的更改；不再是为“禅让”立碑纪功，而是要用“共和”的理念宣示与帝制的彻底决裂，体现了更高层次的鼎新诉求。

关于将正阳门更名为“共和门”建议的最早发起人，当时各报记载不一。1913年3月21日《大自由报》称系“公民彭懋修等数十人上书内务部”^⑧；22日的《申报》则记为“甘华黼等具书呈请国务院”^⑨；同日《顺天时报》明确写道：“正阳门改建共和门，本为甘某所提议。”^⑩综合当时的报道内容及之后持续推动此事的表现分析判断，甘华黼应为最早提议者。

甘华黼其人，史料记载有限。根据散见于报刊的信息可知，他应该是南洋华侨，思想开明，视野开阔，曾在新加坡参与创办或经营《国民日报》，因而深谙舆论与公共事务的重要性。早在1912年初，他便以黑龙江省同盟会会员身份，向孙中山呈交过中国同盟会黑龙江支部的秘密通讯处及重要会员名单^⑪。1918年1月24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发布命令，任命李焕章、甘华黼、张治中为内政部金事^⑫。内政部金事是内政部中的中级文官，主要负责行政事务的辅助与执行。从上述报道中可以得知，1912年共和纪念会成立时，甘华黼已经担任交际科主任。1913年提出正阳门更名建议时，甘华黼年仅28岁。尽管更名的提议应当与他在共和纪念会的任职经历有关，但他能敏锐洞察到通过公共空间命名来塑造共和认同、切割帝制象征的历史意义，并借助合法渠道积极推动，也足见其思想之先锋、见识之卓越、行动之务实。

二、政府回应：市政改造优先于象征更名（1913年）

政府对此提议的回应，显露出象征建构与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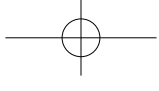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考量之间的早期张力。1913年3月20日《大公报》披露了内务部的市政改造计划：

正阳门中华门将大加改建

北京正阳门及中华门将有改建之说，近闻此事业由内务部绘图议决将东西之瓮墙、城门一律拆去。墙外之正阳商场（即俗名荷包巷）、墙内之观音、关帝两庙，亦均拆平。正阳门及箭楼存留，改为共和门，以为纪念。内门两旁各新辟一门，共为三门。东门内因碍于美国操场，难取直线。由内务部特派员张清澄君与美使馆会商，请退让经九十五英尺、宽三十四英尺之地，美使因便利交通起见，已经慨允。西门内尚须将有碍路线之铺房收买。其中华门外石栏内栽种槐柳桃杏各树草，建立石牌坊一座，刊刻共和诏旨，建铸隆裕皇太后铜像。中华门亦改建新式。中华门内朝房拆去，开辟商场招商，自建房舍，限以三层楼房、三十万元之股本。其办法大纲如此，不日即将兴筑。惟需款甚巨，不知如何筹措云。^⑬

由此可见，政府的考量已超越单纯的更名提议，而是一项规模宏大的市政改造计划。此时正阳门城楼与箭楼仍为一体，因老北京火车站开通及正阳门仅单门洞通行，导致前门地区交通严重拥堵。为此，内务部计划拆除瓮城及瓮城内关帝庙、观音庙，并增辟新门以疏导交通。同时，方案还包括对中华门前进行绿化、树立石牌坊、铸造隆裕皇太后铜像、改建中华门，并将门内朝房改建为三层楼商场等。相比之下，呈词中提出的“正阳门改题共和门”仅是整体计划中的一小部分，而“设自由钟”则完全未被纳入。

虽然没有查到明确的记载，但显然，甘华黼的《请愿改题正阳门为共和门并开放及设自由钟呈词》并未获准施行。其中，正阳门更名一事相对易行，而在城楼顶添设钟楼并安置自由钟，则需大兴土木、耗时良久。原提议要求于1913年4月1日前完工，以配合正式国会成立纪念，但呈词至3月11



日才提交国务院，加之议事程序所需时间，因此提议根本无法按期完成。

反观内务部的宏大改造计划，虽然耗资巨大，但因瓮城拆除及正阳门内两侧增辟新门能切实缓解交通拥堵，所以在时任内务总长兼京都市政督办朱启钤的主持下，于1915年6月正式动工，同年年底即告竣工。其余如中华门改建、树立铜像、开辟商场等设想，则亦未实施。

由此可见，政府的优先考量在于交通改善等实际市政需求，而符号更名被视为次要甚至“表面文章”。这种务实取向，与倡议者试图通过符号重构宣传共和精神的主张，形成了鲜明对比。

三、再起波澜：国会请愿与表决失败 (1916—1917年)

甘华黼最初的建议虽未获准，但1914年出版的北京地图上却已标注上“共和门”。1916年12月25日《顺天时报》刊载的甘华黼致参众两院请愿书，揭示了其中原委：

上参众两院请决议咨请政府将北京正阳门第一门第二门两门改为共和门民国门并永远开放请愿书

为请愿事：窃维阳以象君，故曩在帝王专制时代，有谓天子当阳、诸侯用命之说。又有以为天子南面而立，诸侯北面而朝。持是说者，大都均皆重视帝王。北京前门命名“正阳”，揆之当时命名取义之意，实系于此。华黼前于壬癸年间，曾迭以北京正阳门定名抵触国体，两次上书政府，请于国庆日将正阳门改为共和门，并永远开放，以留纪念而便交通。即在本京各报，亦莫不再四鼓吹，力表赞同。甚至本京各印刷公司，于本京地图，亦多先期改正，即以华黼所知，现今存在可备考查参证之图，尚有三四种之多。足见当时国人心理，莫不均皆注意此点。不意曩者政府诸人，均以厄于袁氏称帝之欲念久已横亘胸中，书上不报。卒之演出

八十三日之新剧，以祸害民国、涂炭生灵。但此等事虽为形式的改革，而精神所寄，亦不可不先于形式上察之。故袁氏之谋危共和，及种种称帝叛国之张本，以华黼之眼光测之，实不仅仅于毁南下就职之约，与解散国会放逐议员之时。起当其太和殿之就职，天安门之阅兵，已无异于天子南面而立诸侯北面而朝、天子当阳诸侯用命时也。华黼前在南洋新嘉坡，曾于约法恢复、国会二次开幕时，函致沪上友人，托即转电两院议员诸公，请予提议建议政府改题名称。迨及华黼内渡来京，始悉前函歧误。兹幸宪法行将告成，允为吾国数千年未有之盛典。凡属一切抵触国体、违悖共和建筑，自应一律铲除。爰特不揣冒昧，谨以愚见所及，遵依约法第七条、院法第四十六条，具书请愿。拟请钧院迅赐决议，咨请政府，即于宪法成立之日，将北京正阳门第一门改题为共和门，第二门改题为民国门，与第三门合为中华门、民国门、共和门。三门均援照中华门成例办法，于宪法公布之日，一律永远开放，以留纪念，一新国人耳目，而重中外观听，藉奠国基。是否有当，伏乞公决施行。不胜盼祷之至。此上参众议院院长、议员先生钧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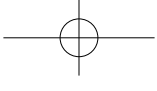
请愿者：甘华黼，现年三十一岁，住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

介绍人：参议院王正廷以下五十人。

介绍人：众议院吴景濂以下五十人。^⑭

由此可知，甘华黼曾先后两次向政府呈递请愿书，并积极借助报刊等公共舆论平台进行宣传，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反响与支持。当时甚至有地图印制公司预判该提议可能获得官方采纳，遂提前在出版的北京地图中将正阳门标注为“共和门”，1914年天津中东石印局发行的北京地图即属此例。然而，政府最终并未批准此项更名动议，而已印刷流通的地图亦难以全数回收，遂形成今天我们所见部分民国初年的地图上仍标有“共和门”字样的特殊现象。

这一请愿书不仅揭示了地图标注“共和门”的



缘由，更反映了甘华黼为推动其主张所付出的持续努力。对比1913年的初次倡议，他在1916年提出的请愿内容发生了几处显著变化，表明了其策略更趋成熟：

其一，不再提“设自由钟”。原因可能在于工程难度大，且百米外的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已设有钟楼，功能重叠。

其二，从“改题正阳门为共和门”到明确为“将北京正阳门第一门第二门两门改为共和门民国门”。为什么有这样的调整？起初，正阳门箭楼和城楼是连在一起的，统称正阳门。1915年正阳门瓮城被拆除后，箭楼、城楼分了家，甘华黼建议将二者分别更名为“共和门”与“民国门”，与此前已改称“中华门”的大清门形成南北序列，寓意“中华民国共和”。

其三，请愿理由更为丰富。除继续强调“正阳”二字象征君权、与国体抵触外，甘华黼援引舆论支持与地图改注情况，论证更名是“民意所向”；同时抨击此前政府因袁世凯有称帝意图而搁置其建议，间接导致帝制闹剧，据此反证改名对巩固共和的必要性。

其四，通过更多的渠道进行呼吁，争取更多人的支持。甘华黼不仅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向议会提交了请愿书，还在更多的报纸上大声疾呼。从1916年12月25日到31日短短一周内，除《顺天时报》外，其请愿内容相继在《申报》《益世报》《新闻报》《北京中华新报》等多家媒体上刊登，掀起了一波舆论声势。与此同时，他还竭力争取更多体制内人士的支持。与1913年仅附议数十人不同，1916年的请愿成功动员了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等五十位参议员，以及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等五十位众议员的联署，得到了国会两院关键人物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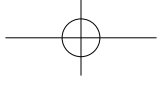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请愿书中提及“前在南洋新嘉坡，曾于约法恢复、国会二次开幕时，函致沪上友人，托即转电两

院议员诸公”一事，其具体背景如下：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次日黎元洪接任大总统职务，6月29日，黎元洪申令恢复1912年所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宣布重开国会。8月1日，参众两院议员456人在北京众议院举行开幕式，名称为国会第二次常会。当时参议院议长为王家襄，副议长王正廷；众议院议长为吴景濂，副议长陈国祥。会议决定组织宪法会议，制定宪法。这就是请愿书中提到的“约法恢复”“国会二次开幕”。

此时甘华黼还在新加坡，但他抓住这个有利时机，致信在上海创办《中华新报》的吴稚晖，托其转电国会呼吁改名。不过等他几个月后到了北京，才发现这封信因差错未能送达。9月3日，他又给吴景濂去信，祝贺其当选众议院议长的同时，恳请吴景濂支持他的建议：

刻有愚者，缘华黼前于壬癸年间，曾迭以北京正阳门定名抵触国体，先后两次上书请政府请将正阳门改为共和门并永远开放，以留纪念而便交通。不意政府诸人，均以厄于袁氏称帝之欲念久已横亘胸中，书上不报。……此等事虽为形式的改革，而精神所寄，亦不可不先于形式上察之。……逆心既着，正阳未改，天安门之阅兵，即已无异于天子当阳诸侯用命、天子南面而立诸侯北面而朝时也。设长此不改，华黼个人愚见，似觉以为未可。兹已拟就电文一通，端函请由上海中华新报吴稚晖先生分神，由沪拍发。用特录陈其原文云：北京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先生转参众两院议员诸公钧鉴：北京正阳门定名抵触国体，闭塞妨碍交通，伏乞迅赐提议，于本年国庆纪念日改建为共和门并永远开放，以新国人耳目，而重中外视听，俾留纪念、藉奠国基，实为幸甚。甘华黼自南洋新嘉坡国民日报同全体华侨，公叩上海中华新报代发。如何之处，仍乞卓裁施行，不胜感盼之至。如需依法请愿，亦希代为委托代表求付公决。是所拜祷。……计附呈已致上海各报通信一件。北京除顺天时报外，未另寄。^⑤



在甘华黼的不懈努力下,“甘华黼关于正阳门改名并开放请愿事件”终于被列入1917年1月27日下午参议院会议的日程,在总共9项日程中排在第7位,时间是从四时一分至四时五分^⑥。

据次日出版的《大公报》报道,原定下午1点召开的会议延至2点才开始,由议长王家襄主持。出席人数139人,已足法定人数。会上针对甘华黼的提案爆发了激烈争论,最终经三次表决,仍以赞成者少数被否决。具体经过在报道中也有详细描述:

甘华黼关于正阳门改名并开放请愿事件(请愿委员会提出)。委员长报告审查结果应受理。一时反对赞成两方面争论至为激烈。付表决起立者少数。有人提起疑义,反证表决此案仍不能成立。仍有人提起疑义。不得已,乃至第三次用唱号表决其结果。此案终以赞成者少数,遂打消。时届五时,即宣告延会。^⑦

历经数年之久、在报纸上广泛宣传、又说动了百余名参众两院的议员,居然在会上出现被否的结果,甘华黼非常不甘心。他在1917年2月5日的《顺天时报》发表了2000余字的长文,严厉指责议长王家襄及部分议员在表决中“舞弊乱法、取巧专权”,并呼吁民众共同声讨^⑧。

文章的题目就很长:《公民甘华黼讨参议院议长王家襄、议员苏毓芳、陈铭鉴等舞弊乱法,反对请愿改题正阳门为共和门民国门并于宪法公布之日永远开放,警告全国国民书》。文中,甘华黼对当日开会表决经过作了更加详细的描述。他说,付表决时,起立表示赞成,议长王家襄对于赞成起立人数以多报少。丁象谦、朱念祖、周震麟等议员对此提出异议,要求反证表决,起立表示反对。结果起立的人是少数。甘华黼认为,这种情况下,当然应该说明赞成的是多数,提案就应该这么通过了。但是议员陈铭鉴得知议员苏毓芳的反对失败,于是跳出来又提出异议,要求点唱表决。议长王家襄在点唱反对起立人数时,又以少报多,宣布在场149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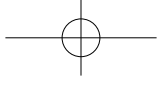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此人数与会议开始时统计的139人不符,多的10人疑为迟到),反对起立者有75人,过了半数,所以提案没有通过。甘华黼说,当时反对起立者实际只有36人。丁象谦、周震麟等非常愤激,要求投票表决。但由于开会就已经推迟了一个小时,所以此时已到下午5点,在场议员很多都提前退席了,不足法定人数。此时本应该宣布延会,但议长王家襄让附议的人起立,随后就立即宣布散会。甘华黼极为愤慨,声称请愿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赋予人民的权力。对这种合乎法定方式、尊重宪法、爱护民国、巩固共和的请愿,也通过了请愿委员会的审查,反对的议员一方面说这种请愿没有受理的必要,另一方面说如果受理了正阳门改名的请愿,以后凡有关于君主、抵触国体的地名,如奉天省、顺天府等,都要求改名的话,参议院将不胜其烦。这些人的心理,就是儿戏宪法、反对民国、仇视共和。因此,他呼吁四万万同胞共同起来声讨他们。

除了在报纸上进行声讨,抨击参议院的表决结果外,甘华黼还把翻盘的希望寄托在了众议院的表决上。

1917年2月7日《顺天时报》刊出《公民甘华黼上众议院议员诸公》一文^⑨,提到昨天众议院请愿委员会通过了正阳门改名请愿审查,准备提交院议。18日《顺天时报》又刊登《共和门民国门与众议院议员诸君注意 阅报诸君注意》,呼吁众议院的议员积极履行建议政府、反映民意的职责,切勿仿效某些参议院议员“摧残民意,取巧专横,舞弊乱法”^⑩。

尽管笔者未查获众议院表决结果的具体记载,但从后续发展来看,该案在众议院同样未能获得通过。

国会上的博弈,反映出当时围绕形式更新与精神实质的巨大分歧,生动展现了早期共和制度下政治参与的实现途径与现实局限。请愿虽能依法进入议事程序,但在务实考量与理念主张的碰撞中难以



赢得多数支持；民意动员虽形成了一定声势，但仍不敌制度框架内保守力量的阻滞。

四、余音偶响：政局变动中的短暂回响（1922—1923年）

沉寂五年之后，“共和门”这一名称再度在报章间泛起微澜。

1922年4月12日，《顺天时报》以《肃亲王灵柩抵京之沈肃——共和门前抚今怀昔，卤簿肃肃车马不前人不语》为题，刊载了肃亲王善耆灵柩返京的消息^②。善耆（1866—1922），满洲镶白旗人，皇太极长子豪格第十代孙，晚清世袭罔替和硕肃亲王。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坚决反对清帝逊位，与良弼等人组织“宗社党”，力主武力镇压革命。1912年他拒绝在清帝退位诏书上署名，随后避居旅顺，长期联络蒙古王公及日本势力策划复辟，然终未如愿。1922年2月27日善耆在旅顺郁郁而终，其灵柩于4月11日下午运抵京奉铁路正阳门东站。迎灵仪仗在站外祭棚行礼完毕后，“三时五十分行至共和门东边，正四时回至共和门南边，四时十分始过前门牌楼”。报道继而以“大有‘共和门前抚今怀昔，卤簿徐徐，征马不前人不语’之慨焉”一笔，勾勒出送葬行列在城门前徘徊凝滞的场景。值得玩味的是，“共和门”之名仅为甘华黼等人倡议，从未获官方正式命名。《顺天时报》在报道中不称“正阳门”而刻意称“共和门”，并将其与善耆——这位至死抗拒共和、顽固坚持复辟的旧王公紧密相连，隐喻着“共和门下送帝制遗老”的寓意。在“共和”二字之下，灵车缓行、人马肃然的画面，不仅暗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更是一则辛辣的历史反讽：当共和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基调，那执迷于帝制的亡灵，最终只能在这座从未被制度承认的“共和门”前，做最后的、沉默的巡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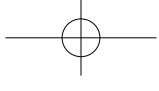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一年之后，1923年5月7日的《民国日报》再度

刊发相关新闻：“昨黎召王家襄、吴景濂、汤漪等入府谈话，拟在天安门外筑塔，刊宪法全文，并俟完成，改正阳门为共和门，发行纪念邮票印花。”^③“黎”即时任总统黎元洪，其余三人分别是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与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长汤漪。此番由总统召集三院要员商议，似已将此议推至正式议程，更名仿佛已成定局。然而政情瞬变，仅过一个多月，黎元洪便在曹锟逼迫下辞去大总统职务，王家襄亦随之去职。尽管同年10月10日曹锟就任总统并颁布《中华民国宪法》，但“共和门”之议却再无下文，悄然湮没于政局动荡之中。

综观全程，“共和门”之名自1913年由甘华黼首倡，十年间几经浮沉。1917年虽曾分别提交参众两院，却均未获通过；此后虽偶现于舆图报章，亦仅为民间自发沿用。至1923年，此议一度进入权力中枢视野，似将落实为制度性命名，却仍因政潮起伏而黯然消逝。一场持续十年的象征之争，在动荡的民国初年，终未能将“共和”二字镌刻到京城的城市之上。

五、全国背景：民国初年的改名风潮

正阳门改名之议并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置身在民国初年“革故鼎新”的普遍风潮中。伴随政体鼎革，新意识形态词汇如“共和”“自由”“民主”“平等”等以及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中山”等被广泛用于城市空间的再命名，形成了一场遍及全国的象征重构运动。1912年清帝逊位后，北京的大清门被改为中华门。同年，湖北武昌的中和门、宾阳门（大东门）、望山门分别改称起义门、共和门、纪念门，目的是“以新耳目、而资纪念”。1928年，冯玉祥主政河南时，将开封市的南门、宋门、曹门、北门、西门分别改为中山门、自由门、平等门、共和门、博爱门。同年，南京市政府也将南京



的神策、仪凤、聚宝、丰润、太平、金川、洪武等门，分别改称凯旋门、中山门、中华门、中正门、自由门、三民门、共和门。其他如街区、道路的名称更改就更为常见了。

这类命名实践不仅仅是单纯的形式更新，其实质是一种深刻的政治合法性建构。新政权试图将具有现代性意涵的语汇植入日常地理，从而在民众生活空间中建立认知关联，使“共和”“平等”“自由”等理念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可感知、可记忆的物质符号。每一处更名，都是在消解旧时代的象征，宣示和强化新秩序的正当性。

正阳门更名“共和门”的倡议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虽然没有实现，但它与其他众多更名实践一起，反映了当时社会上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争夺，向我们展现了民国初年全国性政治文化风云诡谲、波澜壮阔的图景。

六、历史意义：未竟的象征革命与时代镜像

正阳门拟改“共和门”的提议，如同一块棱镜，折射出民国初期政治文化中多重张力的交织：象征建构与现实考量之间的冲突（如工程成本与命名系统的协调）、形式更新与精神实质之间的论辩（反对者视其为表面文章，支持者强调符号作为精神载体的重要性），以及民意动员与制度程序之间复杂微妙的互动。该提议从民间呼声进入国会议程的过程，也展现了早期共和制度下政治参与的途径和局限。如果用象征政治的理论视角审视，正阳门更名之争与当时各地频现的地名更易一样，本质上是一场关于符号所有权、意义阐释权与政治合法性的争夺。

首先，更名提案本身就是一场自觉的“符号革命”。帝制时代的“正阳门”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空间符号，其命名本身就是“天子当阳”君主秩序的具象化。倡议者要求将其更名为“共和门”，

就是要斩断旧有象征的精神纽带，并将抽象的“共和”理念，嵌入到城市日常的地理名称中。这种将核心符号进行重构的努力，是新兴政治力量宣告自身合法性、引导公众政治认同的常见策略。

其次，博弈过程呈现出了象征政治实践中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矛盾。支持者坚信符号是“精神的重要载体”，认为形式革新是抵达实质认同的捷径，是一种非常高效的政治启蒙。反对者与务实派则更多着眼现实：市政建设的轻重缓急、改名所需的成本，乃至对“表面文章”的批评，都构成了符号重构必须面对的实际阻碍。这场围绕“精神优先”还是“现实优先”的拉锯，本质上是不同人对象征所能发挥的政治效用的不同判断，也再次证明了象征政治在落地时都要面对世俗化的考量。

再者，事件的发展过程也凸显了象征意义在公共领域中的流动和争夺。尽管官方最终也没有采纳“共和门”的名字，但这一称谓早已借助报刊、地图、市井闲谈渗透到了公共领域，甚至衍生出超乎倡议者本意的讽刺性用法（如1922年对肃亲王的报道）。这表明，即使有的象征没有得到制度性确认，但其符号本身已在传播过程中获得了一定的生命力，不断被使用，不断被重新阐释，乃至在戏谑中持续生成新的意涵。

最后，这场未竟的象征革命，成为观测民国共和政体“未完成的转型”的一个虽然小但是很典型的例证。它表明，一场宏大的制度变革，必然要伴随一场同样深刻却更为艰难的象征秩序的重建。正阳门未能成功更名，展现了共和理念在试图嵌入中国社会的文化肌理与空间记忆时所遭遇的顽强抵抗。这让我们看到，“共和”作为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其真正确立远非一纸宣言或一部约法所能轻易达成，而必须要经历漫长而曲折的符号斗争与社会内化的过程。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正阳门议改“共和门”的曲折历程，鲜活地记录了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

新兴力量如何试图通过占领一个标志性符号来定义新时代，又如何在理想与现实、革新与惯性的纠缠中步履艰难。正阳门依旧屹立，其门额之上始终未曾镌刻“共和”二字——这一未竟的结局提醒我们，深刻的变革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凯歌，而是

一场在制度、符号与人心之间同时展开的漫长跋涉。那些“未完成”的部分，往往最能暴露转型的深层矛盾和真实难度。它们不是历史的遗憾，而是历史留给我们最值得深思、最为宝贵的遗产。

① 《正阳门拟改共和门之交议》，《大公报（天津）》1913年3月14日第8版。

② 《请愿改题正阳门为共和门并开放及设自由钟呈词》，《新闻报》1913年3月24日第3版。

③⑧ 《呈请改正阳门之理由》，《大自由报》1913年3月21日第7版。

④⑨ 《正阳门改名之建议书》，《申报》1913年3月22日第6版。

⑤ 《改建共和门》，《民主报》1912年11月4日第10版。

⑥ 《东安门改为共和门》，《亚细亚日报》1913年1月13日第6版。

⑦ 《正阳门将改为共和门》，《新纪元报》1913年3月12日第3版。

⑩ 《改建共和门之概略》，《顺天时报》1913年3月22日第7版。

⑪ 《1912年初甘华黼呈孙中山报告中国同盟会黑龙江支部秘密通讯处及重要会员名单》，现藏广东省中山市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⑫ 《准任命李焕章等职务令（1918年1月24日）》，《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12页。

⑬ 《正阳门中华门将大加改建》，《大公报（天津）》1913年3月20日第8版。

⑭ 《上参众两院请决议咨请政府将北京正阳门第一门第二门两门改为共和门民国门并永远开放请愿书》，《顺天时报》1916年12月25日第3版。

⑮ 《甘华黼为吁请改正阳门为共和门事致吴景濂函（1916年9月3日）》，《北洋军阀史料 吴景濂卷1》，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7～58页。

⑯ 《参议院议事日程 第二期常会第三十三号》，1917年1月2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洋政府档案》第2册，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年，第103页。

⑰ 《昨日参议院之常会 正阳门改名之请愿》，《大公报（天津）》1917年1月28日第2版。

⑱ 《公民甘华黼讨参议院院长王家襄、议员苏毓芳、陈铭鉴等舞弊乱法，反对请愿改题正阳门为共和门民国门并于宪法公布之日永远开放，警告全国国民书》，《顺天时报》1917年2月5日第3版。

⑲ 《公民甘华黼上众议院议员诸公》，《顺天时报》1917年2月7日第7版。

⑳ 《共和门民国门 与众议院议员诸君注意 阅报诸君注意》，《顺天时报》1917年2月18日第2版。

㉑ 《肃亲王灵柩抵京之沈肃——共和门前抚今怀昔，卤簿肃肃车马不前人不语》，《顺天时报》1922年4月12日第7版。

㉒ 《本社专电 北京》，《民国日报》1923年5月7日第2版。

（上接77页）

⑥5 （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2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105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69页。

⑥7 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卷6，《明季滇黔佛教考》下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817页。

⑥8⑥9 《元史》卷27《英宗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61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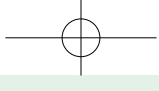
⑦0 （明）无愠：《山庵杂录》上，蓝吉富编纂：《禅宗全书》第3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87页。

⑦1 《元史》卷29《泰定帝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658页。

⑦2⑦4 童玮、方广钊、金志良：《元代官刻大藏经考证》，《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3期。

⑦3 李际宁：《近三十年新发现的佛教大藏经及其价值》，《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论文集》，2009年，第91～117页。

⑦5 （明）达观真可撰，（明）憨山德清校：《紫柏尊者全集》卷13，蓝吉富编纂：《禅宗全书》第50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384页。



考古研究

北京古代城市的规划初论

——兼论古代城市考古研究的“四层法”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Planning of Ancient Cities in Beijing: On the “Four-Level Method” in Ancient Urban Area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郭京宁(首都博物馆)

Guo Jingning (Capital Museum)

摘要：本文以北京古代城市的考古资料为切入点，通过微观、中观、宏观、区域观四个层次，考察北京古代城市的规划问题，以此了解古代城市内部、外部空间的演进过程，变化规律及其所体现的古人思想。

关键词：古代城市 规划 考古

中图分类号：K854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 Based primarily on archaeological data of ancient Beijing,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urban planning of ancient cities from four perspectives—micro, meso, macro, and regional—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of space management within and beyond ancient urban areas, as well as the ideological underpinnings reflected in their developmental patterns.

Keywords : Ancient Urban Area; Planning; Archaeology

古代城市的规划问题，是一个多学科研究的综合问题，集考古、文献、历史地理、城市规划、古代建筑等学科研究于一体。本文旨在通过方法论上的纵向不同层面，考察北京古代城市及城市间的横向情况。这种逻辑体系可以在目前的资料储备下构成完整的认知框架，也能形成嵌套式、互动式、递进式的逻辑建构，避免因学术视角的割裂、停滞、蒙蔽而产生的片面性。任何学术研究都离不开研究资料，因此，在对其开展研究之前，有必要对北京古代城市的主要发展脉络及基本情况作一番梳理。此处涉及资料，以考古发现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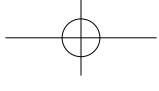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一、北京古代城市的发展

目前考古中所见北京最早的城是房山琉璃河

的西周燕都。经过60多年的考古工作，已经清楚地知道该城址至少有二道城墙和城壕，城内有宫殿区、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城外有各自划分的贵族和平民的墓葬区^①。

此后，城市这项人类走出洞穴后最伟大的创造，也选择了北京小平原。从汉蓟城到魏晋隋唐的幽州城，从辽南京到金中都，从元大都到明清北京城再到近代的北平，北京城市的躯体中有着三千多年的历史文脉。

关于西周时期的北京城，还有一种说法是，不仅有燕都，另有一座蓟城。《礼记·乐记》云：“武王克商，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蓟城的位置有今石景山古城、广安门一带、和平门至宣武门以南一带三种推测，因城外有蓟丘而得名，附近遍长蓟草。蓟城最初是蓟国都城，大约从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随着燕国日益强大而式微，加之燕都古城常苦大石河水之害，燕国遂兼并了蓟国，并把蓟城作为燕国的都城，直至公元前226年被秦国占领。《韩非子·有度篇》：“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只是西周蓟城的位置不见于考古实证，长期以来都没有得到确认。

战国时期，燕国有所谓“三都”，分别为上都（蓟城）、中都（今房山窦店古城）、下都（今河北易县燕下都），从北至南成为燕国的三个控制中枢城市。由于来自北方草原民族的军事压力较大，因此上都蓟城的军事重镇地位更为突出，并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兴起，很快发展成为“渤海之间”最大的都会。燕中都和燕下都，互为犄角，对蓟城更多地起经济补充、军事外防和交通保障的作用。此局面又为汉、唐朝所承袭。

20世纪50年代，宣武门、和平门一带发现了密集的战国水井、瓦当和夯土遗迹。陶井圈直径达130厘米，最多的一口井中有十一节。说明这一地点人口稠密，手工业发达，也有很多建筑，所以推测战国蓟城应在这里。蓟城的承续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从春秋战国至辽南京，位置一贯不变^②，另一种认为以西晋时期分界，战国蓟城的位置要比晋唐的蓟城东偏许多^③，南北城垣的位置大体不变。

燕中都窦店古城包括大城、小城两部分。大城为汉代良乡县城，沿用至北魏时期，呈长方形布局，城设六门，道路连通城门。小城位于大城内西北，为北魏良乡县城，至五代时废弃。

秦汉是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形成时期。北京现已发现明确的汉代城址22座，考古工作最全面的当为通州路县故城。根据《汉书》《后汉书》《水经注》等史料记载，设置于西汉初年的路县隶属渔阳郡。依据考古发现可知，城的整体平面近似方形，四面城墙基址长555～606米，总面积约34万平方米。

广阳城是汉代广阳国（郡）治所。已知城址近

方形，四面城长660～680米，四墙上各有一门，且东西、南北门两两对照，周长2670米。

房山蔡庄古城整体呈不规则形，南宽北窄。长220～360米，周长1250米。长沟土城周长约1720米，南宽北窄，应为西汉涿郡所辖之西乡城。清河汉城为正方形，每面城墙长约500米，通常认为是官营的专业性冶铁城址。

依据西晋幽州刺史夫人华芳墓志记载和墓中的骨尺推算，西晋蓟城西墙在今会城门以东、小马厂一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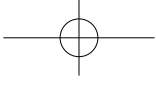
根据唐代墓志上的记载及房山云居寺的石经经文推断，唐幽州城东墙在今烂漫胡同稍偏西的地方，东墙最北端至头发胡同；北墙约在今头发胡同一线；南墙在今白纸坊东西街一带；西墙大致在今会城门村稍东一带。

辽南京城是在唐幽州城的基础上营建的，东城垣在今法源寺以东，北城垣在复兴门南，南城垣在万泉寺北，西城垣在会城门经白石桥向南延长，呈三重城垣：大城、子城（皇城）、外罗城相套的格局。

金中都城是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向东、西、南三面扩建，模仿北宋东京城，最终形成外城、皇城、宫城三城相套的模式。金中都的北边界在今长安街以南、东边界在陶然亭公园南北一线、南边界在南二环以南的位置、西边界在西三环以东的丽泽商务区一带。金中都西南部新增的坊，均为东西向互相平行的胡同，东部的新扩城区，则多为南北向平行胡同，说明金中都新设的坊与辽南京时的坊不同，已不是封闭的小方块形，而是每个胡同即为一坊。

元大都城平面形制方正，外郭城共开设十一座城门，除了北面为两座城门外，其余三面均为三座城门。城内街道笔直规整，标准统一；主要干道与城门相连接、贯通，宽度固定。

元大都的宫城与皇城位于外郭城内的南部，表现了“君人南面以治天下”的思想，居于天下之正位。皇城以北的钟鼓楼一带和积水潭周围，形成商



业活动最为繁盛的区域，符合“前朝后市”的设置。城东齐化门内设太庙，城西平则门内建社稷坛，位于皇城外的东西两侧，符合“左祖右社”的传统思想。因此，大都的整体规划很大程度上遵循了《周礼·考工记》的思想。除了“匠人营国”外，大都的总体设计还遵照了《周易》中“象天设都”“阴阳八卦”的理念。

二、四个层面的考察

规划，原本指的是古人在建筑、城市的设计、兴建、维护过程中，出于某种原因的思考、实施及结果。北京古代城址的规划内容包括城址的内部功能单元设计、空间形态、规模（古人常称之为城制）、选址（古人常称之为相地）、城之间的空间关系等，都属于宏观规划范畴。在对北京古代城市规划的考察过程中，如何选择考察视角尤为关键。因为不同的视角会运用不同的学科方法、学术理论和研究资料，最终的结论和认识也不尽相同。按照从微到宏的逻辑关系，可以从以下四个层面进行考察。

（一）从微观的层面看城内遗迹的组合关系

这个层面聚焦在城的内部。不论城址的类型、功能、规模有何区别，凡是城，必由几何中心、中轴路（线）、边界组成；凡是城，必有城内设施和城内建筑。这里的城内设施，指的是城墙、城门、道路、排水系统、公共空间等城内要素；城内建筑指的是衙署、仓库、寺庙、市场、祭祀场所、军营等功能单元。它们都是考察的重要内容。从考古发现的角度说，不同的遗迹揭示了不同的古代城市留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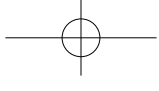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西周燕国都城城内已有道路两侧的立石带，它们被认为是道路的分界线。宫殿区、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平民生活区被进行了划分，以宫殿区作为全城规划中心的设计思想十分明确，显示出较高的空间协调关系。内城中发现水井10口，它们在

城内分散分布，间隔150～250米，可能是一个类似于如今社区之类城市模块的标识性要素，为探索燕都城市分区、闾里制度提供了线索。

汉代城市的建立是与汉代郡国并行制的地方行政管理体系相适应的，形成了有机的城市网络和以地缘政治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属于本质的变化。路县故城城内明清、辽金、汉代三个时期的道路几乎重合或叠压在中轴路上，表明主干路长期被沿用。从城内东南部的建筑遗迹及水井较多来看，此处应为居住区，可能是衙署类的场所^④。广阳城内发现了直通南北城门的干道，南门外还探出干道的延伸段。这条干道不在城的绝对几何正中，而是中部偏东。这种情况，可能与广阳城内东、北部地势较低，以致其中轴路有所偏移有关。

金中都作为北京建都之始，从北方军事重镇上升为北中国政治中心，对城的布局、功能的要求都与此前有了根本性的不同，标志着北京城市发展进入新的阶段。金中都首次将皇家宫殿置于中轴路上，凸显中轴路的地位。城的中心部位，其布局依旧保持辽南京时的坊制格局，这是营建中都时对旧居民区不曾重建的缘故。但在金中都城的扩建部分，则完全采用开放式的街巷制。所以金中都的城市布局中，混合着“巷”“坊”两种新老格局——反映着中国古代城市在形态上处于过渡时期。沿着金中都的外城墙和端礼门，考古工作找到了顺城街和门外大街。护城河的宽度达60余米，远超之前古城的壕沟宽度，其原因可能与辽金时期火器发展，需要防范更远而有效的敌方打击有关。

元大都以北海、中海作为全城的设计中心并加以改造，规划了中轴线及城内功能分区。根据文献和考古发现的结合可以推断出枢密院、中书省、御史台、太史院等机构在城内的准确位置^⑤。在建设前，先规划了排水系统，按自然地势的倾斜铺设了七条主要的排水沟。版筑法一直是土城墙的



夯筑方法。从西周时期的夯土城墙到元大都城墙夯土内加“永定柱”竖柱和“经木”横木，最后发展到明时在小砖外铺砌大砖，城墙的建材和建造方式也在进步。

城市设施是城市必不可少的组成，虽然形状、所处空间和运维方式不同，但都发挥着各自的重要功能，其核心是保障和服务城市的发展，如同齿轮上的齿，缺一不可。有了它们，城市才可以正常运转。城内建筑没有城内设施的公用性强，更多的是为统治阶层和其他阶层服务，但也同样具有组合性，包括了行政、仓储、军事、祭祀、文教、居住等方面。

（二）从中观的层面看城与环境的协同关系

这个层面聚焦在城与周边自然环境，特别是地貌的关系。任何城址在兴建之初的规划过程中，都有三个客观条件是必须要满足的：一是空间，空间是规划的先决条件，没有足够的空间，再好的规划也是纸上谈兵；二是水源，水与城的关系密切。水不仅是人类生命源泉，对整个城的运营也至关重要。城址的规划不能不考虑充足的水源；三是交通，城市从来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聚落，需要大量的物资保障，并在空间结构体系中与其他城址保持有机的联系。封闭塞道肯定不是选址的上佳，同等条件下，交通优势决定了位置的选取。历史上任何一个发展壮大起来的城市，其城址无不具有交通方面的合理性^⑥。城与自然的关系自古密不可分，古人由此形成了一套环境评估系统，即所谓的风水或堪舆理论，现在则称为城市地理学或人地关系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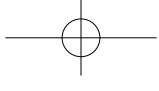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汉代之前，北京小平原东部大多为湖沼洼地^⑦，开发比较缓慢，交通上不是最佳选择，加上中国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同中原地区的交往繁多，造成人流、货流主要是南北方向，南北方向的大道在交通体系中更为重要，所以城址的选取更偏于北京小平原西侧——太行山东麓大道与西北大道、

东北大道的交汇点上。自金中都之后，城的中心位置是不断东移和北移的，经历了由西向东和由南向北的嬗递过程^⑧。现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规划选址也符合这一趋势。

究其原因，一是北京东部地区更开阔，便于新城的营建。随着城市和人口的扩张，新城的总规模越来越大。北京西部山区的地理条件和北部靠近少数民族地区的军事影响皆不利于新城选址，注定只能向东发展。例如元大都的城市规模扩大后，向金中都的西部选址显然已无法满足规划条件。二是东部的水源条件更好，特别是通惠河的开凿将老城与通州连为一体，便于利用大运河控制南方的漕运及货物，由此形成联系全国的物流网。与古代不同的是，现在北京城市所依赖的主要水源，已由单一的西部莲花池水系、高粱河水系逐渐向东部的潮白河水系转变。按照北京古代城址与水源的密切关系和水资源变化的要求，北京城的发展重心，必然向东部转移^⑨。

北京城址选址的背景，还有两点要考虑到，一是中原华夏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碰撞、对峙过程中博弈、平衡的结果。北京处于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农业文化的分界地带，城址的选择，既有军事上的考虑，也客观上促进了民族融合。如唐代广阳城，就是安抚奚族部落设立的羁縻州。二是这些城址都位于交通大道上。北京小平原有三条交通大道，一支向西北经南口直上蒙古高原，一支向东北经古北口通向松辽平原，第三支向正东经山海关入辽河平原。这三条大道的交汇枢纽，是历代都城的位置首选，也是城市网的中心。其他的小城，也在大道的周边。交通区位上的倾向意图，十分明确。

城都为南北方向。这实际上也是中原王朝历代都城规划设计上的一大特色。《周礼·天官》载：“惟王建国，辨方正位。”面南为尊。城的南北方向与北京所处北半球位置和中国人传统的宇宙观有关。为了冬季避寒、采光和夏季的通风降暑，居室设计



以面向正南为上策。南面为阳，坐北朝南，面南而居。但早期的城址并不都是正南北方向，而是存在偏角：琉璃河古城为北偏西 $7\sim 8^\circ$ ，广阳城为北偏西 1.5° ，路城最偏，整体为北偏东 13° 。实际上，元大都的中轴线也是北偏西 2° 。这种情况说明城的角度要受到其他客观条件的影响，原因可能和当时的测定技术及城周边的河流影响有关，也可能是出于堪輿观念或数术思想让古人有意而为之^⑩。燕都南的大石河、广阳城东的小清河、路城西的潞水都是制约城址角度偏移的原因。在这方面，府县之城要比国都之城更多受到地形和地势的影响。

除门头沟、东城、朝阳、丰台、石景山区外，北京其他11区内均有汉城，房山、密云两区最多，各4座^⑪。这说明汉代基层行政单位的选址位置、控制范围、资源控制程度与现在北京市区级行政单位有相似之处，古今建置的思路有相似之处。

汉蓟城处于永定河渡口的位置，是太行山东麓的要道。地理位置适中，又有险可守。《天府广记》卷一《形胜》中的描述十分形象：“幽燕自昔称雄，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盖真定以北至于永平，关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喜峰、古北、黄花镇险扼尤著。会通漕运便利，天津又通海运，诚万古帝王之都。”

元大都放弃了莲花池水系上历代相沿的旧址，而在东北部重新选择建城。因此，元大都的兴起，标志着北京中心区域城址的转移，是北京城市选址的重要转折点。

从形态上看，这些城总体的平面都近四方形^⑫，由城垣、壕沟、城外墓葬区和手工业作坊区、城郊等组成，符合平原城址的特点。之所以大多数城址呈方形，可能是继承了西周以来城址平面“崇方”的思想；另外从几何角度讲，圆形之外，最短的周边能包围最大面积的就是方形，而其他的几何图案，都会增加周边的长度，所以这种形状在建筑的工程技术上最经济。而从城市内部规划角度看，

矩形的内部单元显然是最容易的，也最容易构建模数，圆形边界会制造出大量不规则形、难以有效利用的边角料土地。

城市规划是城市发展的前提。规划深刻影响城市的形态，城市的实际发展又不断反馈、修正最初的选址决策和规划方案，并在新的发展阶段催生新的选址需求。例如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源于蒙古骑兵之扰，加筑外城，原方案外城轮廓接近正方形，使北京城仍呈内外相套的回字形，但因财力不足，只能修筑南面，从而形成了北京城的“凸”字形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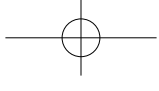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理解城市，就要首先理解它为何在此选址及怎样选址。

（三）从宏观的层面看城外功能区的服务关系

这个层面聚焦在城与城郊的空间联系性。因为城市不会独立发展，需要周边地区提供充足的物资保障、防御缓冲或后备空间。城郊往往有大量与城市活动密切相关的、无法在城内布置的建筑或设施，如寺庙、郊坛祭场、园林苑囿和各类墓地。城郊与城市紧相毗连，在行政上属于城市，是城市的组成部分。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究竟何时始有郊区，已很难稽考^⑬。从考古的发现看，蓟城、唐幽州至明清北京城的城外，都有相当规模的农田以用于粮食生产，其间有村落民居。

沧海桑田。城市发展沿革中，一些村落被圈入城内，变为新城区，或由原址区演变为新村落。如北海西岸，唐代已有龙道村，西直门南为唐代礼贤乡的刘村，元大都建成后，这两个村子也就消失了。明增筑外城后，原城外南郊的辽代海王村，变为了城内^⑭。丰台区万泉寺一带，原是金中都的西半部，元朝废弃中都后，明清以来形成了骆驼桥、三路居等村落。明初废弃元大都北部，形成了小西天、黄寺等村落。

明代之后，北京老城外的长城、大运河、三山



五园三个功能区已基本稳定。长城是“卫”，大运河是“养”，西山是“源”。相同类型和性质的遗迹集中或线性分布，形成了如今北京三条文化带。

长城文化带横贯北京北部，距城市约40～70千米，以燕山和太行山两大山脉为基底，以长城墙体为主线，由营盘、城楼、烽燧等长城附属遗迹组成，呈带状展开，作为完整军事防御体系为北京城承担了军事防卫功能。早在五代时，军都山以西称“山后”，中原政权就常驻重兵扼守关口以防范北方民族入塞。大运河文化带发自北京西北，郭守敬对西山诸泉的引水，利用了北京湾地形的微小坡度变化，经北京城内后流向北京小平原东南，通过河道、闸、桥、坝等水利工程将中国南方与北方联为一体，承担了物资保障的职能。随着大运河的开凿，明代兴建了张家湾、漷县等为漕运服务的城。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位于北京西部、南部，承担了城市休闲、涵养及营建墓地等功能，由园林、寺庙、陵寝、古道等遗迹组成。明代为谒陵驻蹕兴建了巩华城。西山的御苑行宫最早建于辽金时期，到清代三山五园的艺术水平达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最高峰。清乾隆年间，为解决济漕用水，扩西部瓮山泊为昆明湖，这是北京城市发展史上，第一个人工意义上的水库。除此之外，通州的延芳淀一带也是辽金时期重要的捺钵场所。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在较远的城外为城市服务，分别代表了北京城的防御、漕运和园林体系，体现了皇家的军事、经济和生活需要。长城文化带和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利用了北京小平原宏观的自然环境，大运河文化带既利用了宏观的自然环境，又利用了城内的微观城市环境。它们因城而兴，并随着城的发展而不断得到继承、加以演变。它们的形成既有自然地势的原因，也有因地势之利的人为规划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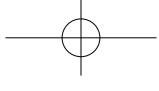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四）从区域观的层面看周边城的辅助关系

这个层面聚焦在城周边的城及相互关系。西周

时期，燕国的几次迁都表明，琉璃河古城虽然长期为燕国都城，但并未成为北京小平原的中心城市。大约在燕昭王时期，蓟城四周第一次出现了辅助城市圈，南有燕中都、燕下都，北有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治所。北京地区初步形成了以蓟城为中心的城市体系。这个体系，已经把燕山南北、长城内外统为一体。不过，这时的体系总体比较松散，稳定性差，统一性不强。蓟北的城市大多是战国中后期为军事目的而设立的军镇和与草原民族进行贸易的城市。蓟南的城市，大多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经济条件较好，起到了补充蓟城经济、联络沟通的作用。总的说来，蓟城处于统领地位，周边城市反哺蓟城，但独立性较大。

秦统一全国后，至隋唐时期，蓟城周边的城市体系重新经历了一番组合。与此前显著不同的是，由于汉唐时期总是把蓟城作为向北方草原和东北地区开发的基地，这个城市由此担负了特别繁重的军事任务。相比之前的军事战争大多是区域性的，自汉唐之后蓟城的战争往往牵动中央^⑤。所以蓟城政治地位大为提升，成为控制北方边境及联络东北各少数民族的军事重镇和经贸中心。在这种背景下，蓟城周围的辅助城镇规模和作用逐渐加强。西北的沮阳，北部的渔阳，东部的蓟州，南部的范阳和雄、霸、易诸州，都是蓟城的辅助城镇。它们形成的辅助城市圈比燕国时略有缩小，但更加紧凑严密。

隋唐至五代，幽州周围的城市体系更加完善，布局更为合理，已有现在北京周边天津、河北城市的缩影。这个城市体系中心是幽州，外围有两圈重要城镇。第一圈是檀、顺、涿、潞、妫、蓟诸州，距北京50～100千米之间，这些城市在政治上很少有独立性，经常直接依附幽州；第二圈是平、沧、瀛、莫、涿鹿、蔚州等城，大约处于距北京150～200千米的圆周上。这些城市与幽州联系密切，但又有一定的独立性，如同太阳系的行星以太



阳为核心围绕，但又分别自转一样。两重城市圈，既对幽州拱卫，更是辅助，以各自的资源和经济实力对幽州的发展起到支撑、补充作用。

辽代设五京，本身就是辽朝既相对独立又互有联系的城镇体系。幽州升为陪都，曰南京，其周围城市圈向外扩展，妫州改为可汗州，并在涿鹿设奉圣州，在今宣化附近设归化州，从而使上谷地区形成一条东、西相连的坚固防线，更加有力地保障幽燕地区的安全。大致金代后，第一圈城市变为中都郊区，第二圈城镇重新组合，并出现几个更大的辅助城市，形成一个完整的首都城市圈。金中都得到这些辅助城市的支援后，经济实力大大加强了，在中国北方城市化的进程中位居前列。

元建大都，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北京的重要性凸显，国内资源源源不断流入北京。明代兴建了巩华城、宛平城等卫星城。北京周围的首都城市圈稳定成形。北京与这些城市相辅相成，共存共生。

北京与周边城市的关系发展趋势是城市间的结构体系由不规则不稳定到严密，北京的核心作用愈来愈强。特别是北京成为首都后，各城市间出现明显的分工，从不同角度辅助首都的发展。这种分工既有各自资源的自然选择，也有城市长期发展过程中优胜劣汰的结果，还有政治决定的原因。

三、并非结语

以上从四个层面考察北京古代城市的规划。四个层面也是研究古代城市规划问题的四个维度，共同构成了一个分析框架或研究视角的谱系，由小到大，从局部到整体，自内而外，呈递进关系。它们的视野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体现了古人处理城市内部、外部空间的演进过程及其变化规律时所体现的思想。这提示人们，在研究古代城市规划问题时，既要大处着眼，又要小处着手；既要观全局，又要察细部；既要思内部，又要量外部，从大、

中、小三方面辩证考虑，综合发力。单从一个层面考察，都有可能造成视角的孤立或片面。最终通过古代城市的实例探寻古人的规划思想、制度与社会文化背景。

以往的学术史中，第一、二个研究层面有徐苹芳、赵正之、侯仁之等先生的研究；第四个层面有王玲先生对古代北京周边城市群的研究；第三个层面则较少有人研究。

这四个层面不同，但都体现了古人对于城址的明确的主观性规划的思想。四个研究层面并不是平行关系、互不交叉的，不同层面之间往往有一定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如城外的功能区在服务中心城的同时，也会服务周边的城市群；城址的选址规划也制约着城的内部格局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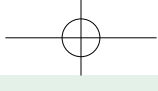
四个层面所考察到的城址的规划、规划思想、形成思想的背景，实际上是理解城市形态变化和发展进程的另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就不在本文探讨的范围内了。

要说明的是，四个层面的研究不是静态的，要建立或依附在对北京古代城市的历史性演变动态过程的考察上，和北京古代城市的三个发展阶段或历史时期相结合，做到时空统一、横纵统一：第一个阶段是汉代之前的北方城市、第二个阶段是汉唐之际的北方军事重镇、第三个阶段是金代以来的首都城市。之所以要有分期观念，是因为城市的物质形式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对城市形态的研究不能与这一历史事实相脱离^⑥。不同阶段城市的地位和功能都不同，会影响到四个层面的研究结论。

以上从四层法研究北京的古代城市规划，算是北京古代城市研究方法上的一次解读或尝试。不过，不得不说，四个层面的研究最后到底能有多深入，起到多大的作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依赖于考古的成果。除北京外，四层法在研究其他地区古代城市考古和规划问题中也会有相当的借鉴意义。这也许是本文的另一层意义之所在。



- ①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封疆授土 太保墉燕——琉璃河遗址考古新发现》,《中国文物报》2025年1月24日。
- ② 侯仁之:《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文物》1959年第9期;于德源、富丽:《北京城市发展史(先秦——辽金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
- ③ 赵其昌:《蓟城的探索》,《北京史研究(一)》,北京燕山出版社,1986年。
- ④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路县故城城址考古勘探报告》,科学出版社,2025年。
- ⑤ 徐苹芳:《中国城市考古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 ⑥ 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11页。
- ⑦ 邢嘉明、李宝田:《京津地区自然环境演变及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环境变迁研究》(第一辑),海洋出版社,1984年,第12页。
- ⑧ 清初统治者曾经动议在京东另筑新城。
- ⑨ 于德源先生提出这一观点是笔者见到的最早提出这一论点的。见于德源:《北京城史三议》,《环境变迁研究》(第二、三合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第59页。
- ⑩ 武廷海先生认为元大都的偏角是元大内的龟背形地块形态与古道走向决定的。见武廷海:《藏春:元大都规画》,商务印书馆,2024年,第77页。
- ⑪ 周正义主编:《北京地区汉代城址调查与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
- ⑫ 也有研究者认为琉璃河古城采用的是横长方形的城圈(见陈筱:《中国古代的理想城市——从古代都城看〈考工记〉营国制度的渊源与实践》,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76页),但因城南部被大石河水冲毁,尚没有明确的实证。
- ⑬ 侯仁之主编:《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435页。
- ⑭ 以上唐代墓志拓片见《市文物局资料信息中心藏北京地区出土墓志拓片目录(一)》,《北京文博》1996年第1期。
- ⑮ 王玲:《北京与周边城市关系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年,第29页。
- ⑯ 巫鸿:《战国城市研究中的方法问题》,《礼仪中的美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91页。



北京的商文明

——刘家河墓葬的多元文化因素分析

Shang Civilization in Beijing: Research on the Multi-ethnic Characteristics of Liujiahe Cemetery

袁广阔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Yuan Guangkuo (School of History,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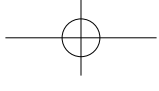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摘要: 刘家河商墓的年代介于郑州白家庄期与殷墟一期之间,正处于商王朝“祖乙迁邢”这一重大政治变迁时期。该墓葬的发现,不仅将商文化直接控制或强力影响的北界推进至燕山南麓的北京地区,也揭示了商文明向北方扩展过程中的文化互动。从出土器物来看,刘家河墓葬呈现出文化融合特征,青铜礼器组合在器型、纹饰及礼制规范上与中原核心区高度一致,尤其是兽面纹、夔龙纹等典型商式纹饰的运用,表明墓主对商礼制体系的认同,印证了“商文化统治下的北方方国”的政治隶属关系。与此同时,金耳环、臂钏等饰品则带有明显的北方草原文化风格,反映了当地土著传统的延续。刘家河商墓不仅是商文化北扩的证据,更是中原与北方文化动态融合的典型代表,标志着一种兼具多元文化特征的地方性文明形态在京津地区的形成。

关键词: 平谷刘家河 商文明 燕国

中图分类号: K878.8 **文献标识码:** A

Abstract : The Liujiahe Shang cemetery dates back to a period between the Baijiazhuang phase at Zhengzhou and Phase I of Yinxu, coinciding with the major political transition marked by the Shang King Zuyi's relocation to Xing area. The discovery of this cemetery not only pushes the northern boundary of the region directly controlled or strongly influenced by Shang culture to the southern foothills of the Yanshan Mountains in the Beijing area, but also illuminates the cultural interactions involved in the Shang civilization's northward expansion. The grave goods from Liujiahe cemetery exhibit clear signs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The assemblage of bronze ritual vessel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the Central Plains core region in terms of vessel types, decorations, and ritual norms. The use of typical Shang motifs—such as *taotie* and *kui*-dragon patterns—demonstrates the tomb occupant's adherence to the Shang ritual system and confirms the political affiliation of “northern polities under Shang cultural domination”. At the same time, ornaments such as gold earrings and bracelets display distinct stylistic traits of the northern steppe cultures, reflecting the persistence of local indigenous traditions. The Liujiahe Shang cemetery thus serves not only as evidence of the northern expansion of Shang culture, but also as a representative case of dynamic cultural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he northern regions. It marks the emergence of a localized cultural formation with multi-ethnic characteristics in the Beijing-Tianjin area.

Keywords : Pinggu Liujiahe; Shang Civilization; Yan Sta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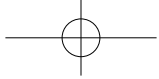
一、刘家河墓葬概况与早期研究

1977年8月,北京市平谷县(今平谷区)南独乐河乡刘家河村的村民在村东一处池塘南岸取土时,意外挖出了一批造型精美、纹饰考究的青铜器。这一发现迅速引起当地文物部门的重视,当年的北京市文物管理处与平谷县文教局随即组织专业人员赶赴现场,展开勘查和清理工作。经过发掘,考古人员确认这批青铜器出自一座商代墓葬,并清理出墓室结构及丰富的随葬品。墓葬为南北向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由于早年当地村民挖水塘和植树,墓葬北半部早已被破坏,仅存南半部。墓口距地表深约0.3米,东西宽约2.6米,残长约2.15米(发掘者推测该墓南北全长在4米以上),墓深0.9米。墓内设有椁室,椁室外围有二层台,显示出较高的墓葬等级。尽管墓葬部分损毁,但残存部分仍出土了40余件珍贵文物。其中,青铜礼器集中摆放在南部二层台上,包括鼎、鬲、爵、斚等典型商代礼器。椁室内则发现了更具北方特色的遗物,如金耳环、金臂钏等黄金饰品,以及玉钺、玉璜、铁刃铜钺和青铜泡饰等。这些器物反映了墓主人的身份地位^①。根据墓葬的形制结构和随葬器物,考古学家判断其为商代大型墓葬。刘家河商墓的发现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填补了北京地区商代考古的空白,为研究这一地区商代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燕国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在北京乃至整个河北地区,如此高等级的商代墓葬极为罕见,因此迅速吸引了考古学界的广泛关注。学者围绕墓葬的年代、性质、文化归属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观点。关于墓葬的年代,有学者提出应根据墓中同出器物的最晚者(如铜爵)来判断,认为刘家河商墓的年代应偏晚,如《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一书将其定为殷墟早期^②。李伯谦判断其为“大坨头类型的第5段,称其绝对年代不会晚到商代晚期”^③。关于墓葬的文化属性,发

掘者根据墓中所出青铜礼器与中原商系青铜器形制相似,认为它属于商文化的墓葬。据此,有学者指出,刘家河墓葬的发现标志商人势力已到达燕山南麓。也有学者不以为然,并指出,刘家河墓葬中出土的金耳环、金臂钏等遗物具有典型的北方土著特色;结合后来又在墓葬所在地发现的土著文化遗址,韩嘉谷先生认为刘家河墓葬应属于和商朝相对立的北方阵容^④。关于墓主人的族属和身份问题,多数学者认为刘家河墓葬所在地在商代时期存在一个重要的方国,墓主人生前应是显赫的贵族^⑤。文献记载,京津地区在西周封燕之前已有燕、蓟的说法,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刘家河墓葬与“燕”或“蓟”关系密切,如邹衡先生推断它同燕亳应该是有联系的,也有可能两者就是一回事^⑥。近年来,商代考古又有新发现和研究进展,本文依据新的考古发现对平谷刘家河商墓的年代、性质以及出现背景等问题谈谈看法。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二、关于墓葬年代判定

关于刘家河商墓的年代,目前不少学者认为可早到商代白家庄期,不晚于殷墟文化第一期。如发掘者认为:“相当于郑州二里岗上层,即商代中期,约与藁城台西村的商代铜器群相差不远,其下限年代不会晚于殷墟文化第一期。”^⑦郑州商城的发掘者杨育彬指出:“就青铜器发展而言,在郑州二里岗文化与安阳殷墟文化之间,应该有一个过渡期,其青铜器既接近于二里岗上层商文化,又与成熟的殷墟文化有某些差别,这一阶段大约相当于河亶甲居相、祖乙迁邢、南庚迁奄至盘庚之初。北京平谷刘家河墓葬应涵盖其中。大致锁定在商代二里岗文化晚段与殷墟文化一期之间,或稍前或稍后而已。”^⑧近年来,随着学界对商代墓葬分期的研究更加深入,这为重新判断刘家河商墓的年代提供了重要参考。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图一 白家庄墓地
C8M2出土青铜器
1. 鼎 (C8M2:4)
2. 爵 (C8M2:8)
3. 斚 (C8M2:7)
4. 盘 (C8M2:3)
5. 鬯 (C8M2:1)

第一，刘家河商代墓葬的年代判定，可通过与郑州商城白家庄期青铜器的系统对比得以确认。该墓葬出土的16件青铜礼器涵盖食器、酒器、水器三大类，具体包括鼎、鬲、甗、爵、卣、盘等典型器型。除青铜甗未见于郑州白家庄期遗存外，其余器类均存在明确的对应关系。

在器型与纹饰方面，刘家河青铜器表现出与白家庄期（图一）高度相似的特征。方鼎，形制近于郑州二里岗白家庄期方鼎，均为方形腹，饰饕餮纹；圆鼎与郑州铭功路出土圆鼎形制相近，唯腹部略浅；其中一件兽面纹圆鼎底部铸有阳文“鼈”徽，与郑州白家庄所出青铜尊的龟徽相呼应。鬲，整体风格接近郑州张寨南街铜鬲，均为双耳、三袋足，但刘家河鬲腹部更浅；甗与白家庄期甗基本一致，仅口部增设小环耳；斚形制近似郑州南顺街斚，但腹部略浅，柱头增大且间距加宽；封顶盃与郑州东里路出土的盃完全相同；卣的风格类同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出土的同类器；盘形制与郑州白家庄青铜盘高度接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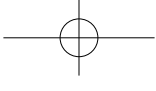
这一系列对比表明，刘家河商墓青铜器群在主体特征上与郑州白家庄期遗存基本同步，仅在局部细

节上略有演变，为墓葬年代的判定提供了坚实依据。

第二，刘家河青铜器与殷墟一期青铜器相比，存在相似一面的器类较少，主要有爵、鬯、甗等。爵的腹部为圆形，装饰有兽面，与殷墟一期的青铜爵风格相似。鬯肩部有三个大卷角羊头，腹部装饰饕餮纹，与殷墟一期同类器如出一辙。郑州二里岗期和白家庄期铜器中没有发现甗，殷墟一期中发现有甗，刘家河发现的甗与殷墟一期的甗风格相似。

第三，从青铜装饰及铸造工艺角度比较。如苏荣誉从器物装饰因素及铸造工艺角度比较后认为：“刘家河墓葬器物没有晚于殷墟早期者，有些的年代及于早商。盘本身纹饰简率，没有底纹和上层纹饰，断为中商颇为合理。而首度在盘口沿装饰圆雕鸟，无论在二里头还是郑州商城青铜器中，均不见以鸟为饰者。相反在南方风格青铜器上，圆雕鸟既作为纯粹装饰，抑或作为盖钮，甚至作为扉棱的替代或者扉棱的开头，案例多多，可以认为平谷刘家河这件盘是南方制作、扩散出去的产品。”^⑨

第四，从特殊器物如铁刃铜钺、金箔制品等也可以证明其时代。平谷刘家河商墓出土的铁刃铜钺与藁城台西 M112 的铁刃铜钺，是商代早期冶金技



术的重要实证。两件器物的年代关系也是一个证明。如形制与工艺方面，两件铜钺均以陨铁为刃部材料，采用“铁包铜”的复合工艺，表明商代早期对陨铁特性的认知及加工技术已趋成熟。刘家河铜钺虽形制略窄（残长8.4厘米，栏宽5厘米），但其直内、梯形器身及圆穿设计，与台西铜钺表现出明显的文化、技术与地域性特征；两处遗址均属早于殷墟一期的商代前期遗存。刘家河商墓属二里岗上层至殷墟过渡阶段，台西 M112亦属二里岗文化白家庄期晚段。两处遗址均位于河北省境内（平谷属京津冀交界，藁城位于冀中），地理相近暗示可能存在同时期的分配或技术传播。而圆雕立鸟青铜盘具有南方风格，表明此类器物非本地独立生产，或由位于都邑的中心作坊统一制作后分配至地方贵族。刘家河商代墓出土有金箔残片，与其时代接近的郑州商城宫殿区和最近发现的书院街出土黄金面罩的大墓以及藁城台西遗址也出土了同类器物，可见早期金箔目前所见均出于商文化区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区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刘家河墓葬不仅与商文化关系密切，而且时代也与二里岗文化的白家庄期接近。

因此，刘家河商代墓葬出土的青铜器既有郑州商代白家庄期的特征，也有殷墟一期的器类，明显属于两者之间的过渡期。发掘者的结论“刘家河商代墓葬出土的青铜器相当于郑州二里岗上层，即商代中期，约与藁城台西村的商代铜器群相差不远”^⑥的认识基本准确。

三、祖乙迁邢的北疆经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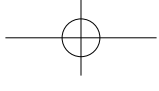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商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重要的王朝国家，其政治中心曾经历多次迁徙。这些迁都事件不仅反映了商王朝内部的政治变动，也体现了商文化向周边地区的扩展与影响。在商王河亶甲和祖乙统治时期，都城先后迁至相地和邢地，这一系列政治中心

的转移为研究商文化的地域传播提供了重要线索。

关于刘家河商墓的历史背景，我们认为其出现与祖乙迁邢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相关。从考古年代来看，刘家河商墓的年代介于郑州白家庄期和殷墟一期之间。这一时段商墓在京津地区的出现，需要结合商王朝的政治变迁来理解。文献记载可以确认这一时期正值“祖乙迁邢”的关键阶段。因此，刘家河商墓的发现可作为商文化向北方地区的扩展结果。

祖乙所迁邢都位于河北邢台地区，距离刘家河商墓所在的北京地区不远，都邑在邢，北京必定是其要控制的战略要地。邢在甲骨文写作“井”，历史文献中关于商周之邢的记载主要有祖乙邢都、井方、西周邢国。关于商代邢都、西周邢国的具体位置，学界历来争议不断，主要有河北邢台说和河南温县邢丘说两种观点。李学勤、唐云明在对1977年发现的河北元氏青铜器铭文考释、铜器断代的基础上，认为邢国始封在邢台^⑦。邹衡认为祖乙邢都很有可能就在今天的邢台市^⑧。可以说商代井方国和西周邢国的地望均在邢台，西周邢国应是继承商代地名而来。邢台地区的考古工作也印证了这一看法。截至目前，考古工作者在邢台市区及市郊发掘了南大郭、曹演庄、贾村、东先贤、尹郭、西关外等大量的商周遗址，出土了丰富的商周文化遗存。

早商文化晚期，商代遗址及聚落群在豫北、冀中、冀南地区大量出现。早商二里岗时期，郑州商城处于核心地位，以商城为中心的商城聚落群十分繁荣。这一时期晋南豫西聚落群、盘龙城聚落群开始形成，在陕西关中地区也发现有以老牛坡遗址为核心的商代聚落群；黄河以北典型的早商遗址仅有辉县孟庄一例，新乡以北没有发现。早商白家庄时期，郑州和洛阳地区的商代聚落群继续巩固和持续发展，聚落群的整体布局并无明显变化。到了早商文化晚期，聚落群的分布开始偏重北、东两个方向，其他地方则出现衰败现象。这是商王朝经营重



心往东北方转移的生动反映。这一时期，太行山东麓、河北中南部出现很多早商遗址，黄河以北地区不仅在新乡潞王坟发现商代遗址，在安阳、濮阳甚至河北省境内的藁城台西、北龙宫都发现有商代文化遗存。特别重要的是，在北京附近也发现多处商代遗存，如蔚县庄窠、前堡、四十里坡、涑水富位等。同时，在河北地区形成了以邢台为核心的河北聚落群。

商代早期，商王朝先后以郑州地区的亳、隰（荥阳小双桥遗址）为都城。到了早期晚段，为了加深对北方地区的控制，祖乙将都城北迁到邢台地区。在此背景下，河北和京津一带开始出现大量的商代文化遗存，刘家河商墓的发现便是最直接的反映。从刘家河商墓的规模、随葬器物来看，它的等级很高，应该是高等级的贵族墓葬。燕国是两周时期的一个重要诸侯国，它得名于召公封燕，这在《史记》《左传》等文献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关于西周燕国的地望，由于北京琉璃河遗址的重大发现，学界基本上都同意它就是召公封燕的燕国。实际上，在召公封燕之前，北京地区还存在一个子姓燕国，西周燕国正是在子姓燕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从历史文献和考古两方面都能佐证。《左传·昭公九年》云：“及武王克商，薄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这里的“燕亳”就是召公封燕之前的子姓燕国。因此，祖乙迁邢后，为了控制京津地区，拱卫中央王朝，在京津地区分封了一个子姓燕国，是商王朝统治下的方国，而刘家河商墓很有可能就是燕国的一位高等级贵族的墓葬。

四、商文化对北方地区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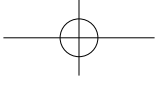
杜金鹏认为刘家河商墓的发现标志商人势力在这一时期已到达燕山南麓^⑮。也有学者认为此墓“与商文化具有统一性和延续性”^⑯。但同时，由于

墓中同出的金耳环、金臂钏等遗物具有典型北方土著特色，有人认为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标志性饰物。墓葬中中原文化与北方土著文化同时存在，如郑振香注意到“此地区大概已接近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边缘，所以受到来自不同地区商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影响较明显”^⑮。刘家河墓葬应是中原商文化与北方土著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特殊文化。如杨建华认为“刘家河墓葬，反映出商文化与当地文化已经融合为一种非此非彼的新的文化类型。代表了移居北方的商代贵族与当地文化融合的青铜文化，是商文化对北方地区影响最早的一个例子，它向我们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商文化与这一地区的关系年代久远，并十分密切”^⑯。

从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及其他遗存来看，商文明对北京地区的影响呈现出多层次、动态融合的特点，既体现了中原商文化的强势扩张，也反映了北方土著文化的适应性互动，最终形成了一种兼具多元文化特征的地方性文明形态。刘家河墓葬中出土的青铜礼器（如鼎、鬲、爵、罍等）在器型、纹饰和组合关系上均与中原商文化核心区保持高度一致性，尤其是兽面纹、夔龙纹等典型商式纹饰的运用，表明墓主人对商礼制体系的认同。学者提出的“商文化统治下的北方方国”观点，正基于此类遗存所反映的政治隶属关系。墓葬所在地位于燕山南麓，这一发现将商文化直接控制或强力影响的北界推进至北京周边。

刘家河青铜礼器群以鼎、鬲、觚等典型商器组合为核心，证明商代礼制体系已通过技术传播实现对边疆地区的文化整合。而金耳环、臂钏等贵金属饰品呈现的草原风格，则反映了当地族群在接受中原礼制的同时，仍保持着北方文化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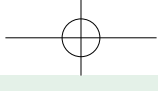
刘家河商墓出土文物是多元文明互动的重要见证。遗址所处燕山南麓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观察多个文化系统交汇的焦点：青铜器代表的中原商文化、金器反映的欧亚草原文化，以及陶器显示的夏



家店下层文化因素在此共存。这种多元性证明北京地区在商代已是文明交流的重要地区。商文明通过礼器体系、铸造技术的传播，重塑了当地的社会权力表达方式；而土著文化元素的存续与创新，则催生出具有地域特色的文明形态。这一过程不仅拓展了商文化的空间范围，也为后来周代燕国的建立奠定了文化基础，其影响甚至延续至青铜时代晚期。

刘家河墓葬恰是观察早期中国“多元一体”文明格局形成机制的珍贵样本。这一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商代北方边域的认识，北京地区不是文明传播的终点站，而是多种文化碰撞创新的激扬舞台。它既证明商文明强大的辐射力，也揭示了边缘地带对核心文化的反哺作用。

-
- ①⑩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平谷县发现商代墓葬》，《文物》1977年第11期。
-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40页。
- ③ 李伯谦：《论夏家店下层文化》，《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62页。
- ④ 韩嘉谷：《谈平谷刘家河青铜文化遗存》，《北京平谷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13页。
- ⑤ 黄尚明：《青铜面具再探》，《襄樊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
- ⑥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二版），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50页。
- ⑦ 梅宁华、陶信成：《北京文物精粹大系·青铜器卷》，北京出版社，2002年，第18页。
- ⑧ 杨育彬：《平谷刘家河商代铜器墓的几点思考》，《北京平谷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98页。
- ⑨ 苏荣誉：《论圆雕鸟饰沿的青铜盘——兼论青铜装饰因素的中断与续接的铸工因素》，《青铜器与金文》第十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第140～161页。
- ⑪ 李学勤、唐云明：《元氏青铜器与西周的邢国》，《考古》1979年第1期。
- ⑫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二版），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93页。
- ⑬ 杜金鹏：《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与商代燕国》，《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专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214页。
- ⑭ 孟宪武：《平谷商代青铜器与中原青铜器对比研究》，《北京平谷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32页。
- ⑮ 郑振香：《商文化与北方地区古文化的关系》，《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专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360页。
- ⑯ 杨建华：《燕山南北商周之际青铜器遗存的分群研究》，《考古学报》2002年第2期。



平谷刘家河商墓出土铜盘内壁纹饰研究

Study on the Inner Wall Decorations of the Bronze Plates Unearthed in the Shang Dynasty Tombs at Liujiahe, Pinggu District

戟征[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Ji Zheng [Beijing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Beijing Institute of Cultural Heritage)]

摘要：铜盘是商代的盥洗类礼器之一，其纹饰多具有特殊含义。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了两件铜盘，内壁饰有龟纹、鱼纹和涡纹。以往研究对Ⅰ式盘的纹饰关注较少，多以Ⅱ式盘的龟纹和鱼纹作为研究对象与同时期出土铜盘的纹饰进行比较，认为龟和鱼均为水中生物，因此饰于盘内。本文在重新解读刘家河铜盘内壁纹饰的基础上，认为Ⅰ式盘的涡纹与Ⅱ式盘的龟纹可能与“浴日”和“洛书”的传说有关。Ⅰ式盘的“鸟首鱼尾纹”实为“燕纹”，是商代燕部族族徽形象的重要来源。

关键词：铜盘 纹饰 商代 刘家河墓

中图分类号：K876.41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 Bronze plates were among the ritual vessels for washing during the Shang Dynasty, their decorations often bearing special meanings. Two bronze plates were unearthed in the Shang Dynasty tombs at Liujiahe, Pinggu District, with interior walls decorated with tortoise designs, fish patterns, and whorl patterns. Previous studies have paid scant attention to the decoration of Type I bronze plates, often focusing on the tortoise designs and fish patterns of Type II bronze plates. These were compared them with the decorations on bronze plates unearthed from the same period, considering that both turtles and fish are aquatic creatures, and therefore were decorated inside the bronze plate. This paper based 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decorations on the interior walls of the Liujiahe bronze plates, this article perceived that the whorl patterns on Type I bronze plates and the tortoise designs on Type II bronze plates may be related to the legends of “Yu Ri” and “Luo Shu”. The “bird-headed fish-tailed pattern” on Type I bronze plates is actually a “swallow pattern”, representing an important source for the tribal emblem of the Yan tribal during the Shang Dynas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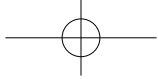
Keywords : Bronze Plates; Decorations; Shang Dynasty; Tombs at Liujiahe

1977年8月，北京市平谷县南独乐河公社刘家河大队社员在村外取土时，发现了一批青铜器。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和平谷县文教局文化组共同进行了勘查，认为这是一座商代中期的墓葬。墓葬位于该村南侧水塘南岸的塘坡上，北部因早年挖水塘及岸边植树已被破坏，仅存南部。经过现场调查访问及进一步清理，估计该墓东西宽2.6米，可能是南北向，似有二层台。在墓室东南角和西南角的二层台上各有一件铜盘，报告称Ⅰ式盘和Ⅱ式盘^①。本文

将就这两件铜盘的内壁纹饰进行讨论。

一、功能、造型与纹饰特征

铜盘是商周时期盥洗类礼器之一。《说文解字》：“槃，承槃也。木般声。鑿，古文从金。盘，籀文从皿。”^②段玉裁注云：“承槃者，承水器也。”^③根据文献记载，盘和匜是配套使用的，这种观点也得到了诸多学者认可^④。另有观点认为盘和盃、匱等



图一 刘家河出土铜盘

1. I 式盘 2. II 式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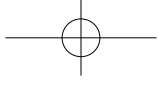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器物在商周时期的不同阶段组合使用^⑤。

商代铜盘多出土于墓葬或窖穴中，造型为敞口，弧腹，圈足，部分圈足上有方形或十字形镂空，少数腹部有与圈足十字形镂空对应的竖管状系，外壁腹部饰兽面纹、雷纹、弦纹等纹饰，内壁饰龟纹、鸟纹、龙纹、虎纹、鱼纹、涡纹等纹饰，内壁纹饰主要有龟鱼纹、涡鱼纹、虎鱼鸟纹等组合方式。

平谷刘家河商墓出土两件铜盘，其中 I 式盘高 9.5、口径 25.5 厘米。窄沿外折，内壁凹圆，平底，矮圈足。盘外壁有弦纹二周，盘内壁有鸟首鱼尾纹三组，中心有圆涡纹，界以连珠纹（图一，1）。出土时，盂置于盘上，盘底部尚留有盂三足痕迹。II 式盘高 20.5、口径 38.8 厘米。宽沿外折，内壁凹圆，盘内中心有用涡纹及连珠纹组成的龟形图案，内有鱼纹三组，盘沿左右对立两鸟形柱，鸟首相背（图一，2）^⑥。这两件铜盘，尺寸和纹饰差异较大。从尺寸上看，I 式盘明显小于商代常见的铜盘尺寸，口径约 II 式盘的三分之二，高度约 II 式盘的二分之一。从纹饰上看，I 式盘盘心饰圆涡纹，圆涡纹中间为一个圆圈，外侧由 5 条海浪线作顺时针状围合而成。圆涡纹外侧为一圈连珠纹。腹部顺

时针排列 3 个鸟首鱼尾纹，鸟首近椭圆形，圈状单眼，嘴呈“八”字形，外翻后内勾。身较窄长，背中部饰“9”字纹，后部饰两条弧线。两侧为对称两翼，燕尾。II 式盘盘心饰龟纹，俯卧状，龟头部与两鱼之间对应，呈弧边三角形，点状双眼，眼后部饰雷纹，短颈，颈上饰四个圈，一条中线纵贯头颈部。龟背近圆形，由内向外分别为涡纹、连珠纹、雷纹。涡纹中间为一个圆圈，外侧由 7 条海浪线作顺时针状围合而成。四肢短小，与龟背相连，饰雷纹。尾部不详。腹部顺时针排列 3 个鱼纹，鱼头部呈弧边三角形，圈点状双眼，弧形鳃。身呈梭形，有一条通脊线，背饰雷纹。身上侧有一鳍，下侧前后各有一鳍，燕尾。3 条鱼头尾部的部分花纹略有差异^⑦。鱼纹呈顺时针方向排列。

刘家河商墓出土的 I 式盘为鸟首鱼尾纹和涡纹组合，II 式盘为龟鱼纹组合，这种带有龟、涡、鱼三种纹饰的铜盘还出土于殷墟、晋陕高原和陕南地区，另有部分铜盘出土地点不详。其中仅两件盘心饰涡纹，一为 1980 年陕西城固出土^⑧，二为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出土的“涡纹中柱盂”^⑨，该盂因样式更接近于盘，故在此一并讨论。



二、纹饰含义

以往研究对平谷刘家河 I 式盘的纹饰关注较少,多以 II 式盘的鱼纹和口沿上鸟形柱作为研究对象。程瑞秀认为平谷刘家河商代中期墓中 II 式盘内壁为一种特殊的鱼纹,呈双目侧身形,鳞为对称的云纹,为鱼纹中罕见者^⑧。曹淑琴认为 I 式盘中的涡纹与 II 式盘中龟背部的涡纹可能与“易”字有关^⑨。刘正通过对 II 式盘龟纹的解读,认为洛书信仰和商周青铜器纹饰及其神话信仰有重大关系^⑩。但刘正未注意到,宋代王黼撰写的《宣和博古图》中就已经提出龟鱼纹洗中的负龟形象与洛书传说有关的观点。王丹认为在水器盘内刻画水生动物龟、鱼的形象是商周时各地普遍的审美趋向,而不是个别现象的出现^⑪。朱凤瀚认为其中一件(原报告作 I 式)鱼纹作侧视形,单脊鳍、腹鳍构图亦甚简。但另一件盘(原报告作 II 式)内壁所饰鱼纹,其双目绘于一侧,双目间有一道横线中分鱼体为二,似是在试图用平面手法表现立体,与饕餮纹相近,但其鳍部、尾部又均作侧视状,显得通体不协调,鳞作云纹,构图较为别致^⑫。张懋镕将 II 式盘口沿上的两只鸟形柱当作一种纹饰的分类标准^⑬。周向雨认为 II 式盘中的龟纹为鳖纹,并将该盘的鱼纹按照两鳍进行分类^⑭。考虑纹饰拓片与实物会有差异,因此周向雨用鱼鳍数量对鱼纹分类的做法欠妥。除以上研究特意指出平谷刘家河 II 式盘纹饰差异外,其余有关商周铜器纹饰的研究,均将刘家河商墓铜盘内壁纹饰按照铜器纹饰分类标准阐述其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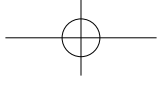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刘家河商墓出土 I 式盘的纹饰为涡鱼纹组合,涡纹样式与城固 1980 年出土的一件铜盘相似,均在涡纹外附带一圈连珠纹。鱼纹则与商代铜盘内壁所饰鱼纹差异明显,报告中称之为“鸟首鱼尾纹”。II 式盘的纹饰为龟鱼纹组合,龟背部为三重装饰,鱼背宽厚满饰雷纹,比商代铜盘内壁纹饰的龟鱼纹复杂,样式接近于同时期的兽面纹。此外,

该盘造型独特之处是在口沿上对置了两个鸟形柱。两盘中内壁所饰鱼纹的数量与多数商代鱼纹铜盘一致,都是 3 个。小屯 M232 出土铜盘的鱼纹数量为 6 个^⑮,《邨中片羽》中收录的铜盘鱼纹的数量为 9 个^⑯,均为 3 的倍数。比较特殊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铜盘,鱼纹数量为 4 个。此外,平谷刘家河商墓出土的两件铜盘内壁鱼纹均为顺时针排列,这也与商代同类型鱼纹盘内的纹饰排列方向一致。

一般情况,铜容器纹饰多饰于器表,内壁则为族徽或铭文。盘作为一种比较独特的铜容器,不仅器表有纹饰,大多在其内壁也有独特的纹饰,这也是盘区别于其他铜容器的显著特征之一。平谷刘家河出土铜盘内壁饰有龟纹、涡纹和鱼纹三种纹饰,其中龟纹和鱼纹属动物纹饰,按张光直对铜器所饰动物纹饰的划分方法,应属“与自然界中存在的动物的关系可以明显看出来的”^⑰。涡纹则属于一种抽象的纹饰,即火纹,代表太阳。这三种纹饰有不同的含义。

龟自古就被认为是一种灵物。《礼记·礼运》中记载:“何为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⑱其甲壳被用来占卜,充作人神联系的媒介物。由于龟也是水生动物,故龟纹也常饰于水器盘之内底,与鱼等水生动物组合^⑲。殷族更认为它是具有一种很大的神化权力的东西^⑳。青铜器上最早的龟纹出现在二里岗上层文化早期郑州白家庄 M2 出土的铜鬲颈上,在其颈部饰有三个龟形图铭,腹部有四瓣形纹饰^㉑。平谷刘家河商墓出土的两件铜鼎中,一件的内腹部也铸有凸线鳖纹,袁广阔认为刘家河商代墓葬出土的青铜器既有郑州商代白家庄期的特征,也有殷墟一期的特征,明显属于两者之间的过渡期,这在爵、觚等器物上表现得最为明显^㉒。由此推及平谷刘家河出土铜盘的纹饰也应该属于同时期年代较早的。

火纹旧称圆涡纹、涡纹或囫纹。《周礼·考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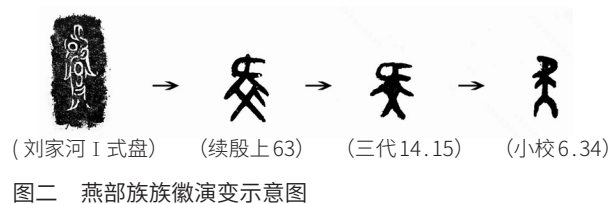
记》有“火以圜”的记载。火纹是太阳的标志，因此它的特征是圆形的，中间略有突起，沿边有四到八道旋转的弧线，表示光焰的流动^⑤。在二里头文化期已发现单个的火纹，只有形而没有转的弧线，比较原始。商代二里冈时期和殷墟时期的火纹大都在罍腹和罍柱上^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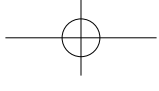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鱼纹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就是彩陶上的主要纹饰，进入青铜时代后，铜器上的鱼纹主要流行于殷代，西周时甚少见，在春秋器中仍可见到。通常饰于盘内，作为龙、龟等纹饰的辅助纹饰^⑦。因盘为盛水之器，可见器物的造型和器物的装饰是密切结合的^⑧。平谷刘家河商墓Ⅱ式盘将鱼纹“一分为二”的表示方法可能与张光直先生所述的“殷礼中的二分现象”有关^⑨。

龟鱼纹组合常见于盘内，大概因这两种动物纹饰均为水生，而盘是盛水用的盥洗器，所以自然而然就组合在一起。涡纹表火，是太阳的标志，将涡纹置于盘心或盘心龟背之上，如将太阳置于水中。刘家河出土的两件铜盘均将表示太阳的涡纹置于盘心或盘心的龟背上，这种情况还见于殷墟武官村 M259^⑩、清涧解家沟等地 1962 年和 1982 年出土的盘内^⑪，其意难测。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出土的涡纹中柱盂内的涡纹形象对理解将太阳置于水中的含义具有一定启发。该涡纹未在盂底，而是由一根铜柱托至高空，似从盘底升起。《淮南子·天文训》记载：“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⑫如涡纹是太阳的标志，将太阳置于盘中，可能与“浴日”传说有关。此外，在《宣和博古图》中收录了两件龟鱼纹洗（即龟鱼纹盘），其中一件的说明为：“昔者河出图，龙载之，洛出书，龟载之。以河出于天，而龙天类也；洛出于地，而龟地属也。且介虫三百六十，龟为之长，是谓四灵。昔人以断吉凶，别是非，莫不本于此，故于是饰之洗而法象焉。盖取其负图之状，此《易》所谓‘天生神物，圣人则之’，故伏羲氏体之而画八卦也。因

其所饰而寓以微意，乃尚象之义。”王黼认为盘中的负龟形象，是“龟负洛书”之意。北京 1980 年拣选的铜盘^⑬、国家博物馆馆藏的铜盘^⑭以及《支那古铜精华》^⑮收录的铜盘的盘心均饰龟纹，背上有 4 个圆圈；清涧解家沟 1977 年出土铜盘的龟背中心为 1 个圆圈，外围等距离分布为 6 个圆圈^⑯。这种龟背无涡纹，仅饰圆圈的龟纹，看作是“龟负星图”更符合“洛书”的传说。需要说明的是，目前所见传世和出土的铜盘内均未发现《宣和博古图》中收录的龟鱼纹洗的“负龟”图案。

关于刘家河商墓出土Ⅰ式盘内的鱼纹，报告中称之为“鸟首鱼尾纹”，应是作者观察到了其与Ⅱ式盘中的鱼纹存在明显差异。《说文解字》记载：“鱼，水虫也，象形，鱼尾与燕尾相似，凡鱼之属皆从鱼。”^⑰因此，“鸟首鱼尾纹”即“鸟首燕尾纹”，也就是“燕纹”。如果将这个纹饰头上尾下放置，就会发现该纹饰与目前认为的殷商时期“燕”部族的族徽非常相似。虽然许多学者已经指出“象形性较强的早期铜器铭文”不全都是族徽^⑱，但的确有部分族徽是从早期的象形图案中产生的。大多数动物类族徽应有其原形，这类具有共识性的象形图案，能够代表一群人的同一种精神信仰。葛英会对燕部族族徽的演化过程进行了推理，认为“鷁”应是“燕”字的来源^⑲。假如刘家河Ⅰ式盘中的“鸟首鱼尾纹”就是“燕纹”，那么这种纹饰应与燕部族有密切关系，是燕部族族徽演化中的重要一环（图二）。在铜盘中用燕纹代替常用的鱼纹，可能是燕部族的族民认为燕纹能够起到与鱼纹同样的作用。张光直认为青铜彝器是巫觋打通天地所用配备的一





部分,而其上所象的动物纹样也有助于这个目的^⑥。这种顺时针旋转的排列方式或是开启某个神秘空间的大门。

三、墓葬的年代与文化属性

关于刘家河墓葬的年代,发掘者认为其年代属于商代中期^④,郭大顺^②、靳枫毅^③认同此观点。邹衡认为刘家河墓葬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最晚者(如铜爵)相当于商代后期第五段第Ⅸ组^④,即其所划分的殷墟文化第二期。李伯谦认为刘家河墓葬属于大坨头类型的第5段,不会晚到商代晚期^⑤。郑绍宗认为其属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⑥。金家广认为其年代相当于早、晚商之际^⑦。陈旭认为其年代处于二里岗下层与殷墟早期之间^⑧。韩建业将刘家河商墓归为围坊三期文化,相当于殷墟文化阶段,对应晚商时期^⑨。杨育彬认为在郑州二里岗文化与殷墟文化之间,应该有一个过渡期,其青铜器既接近于二里岗期上层商文化,又与成熟的殷墟文化有某些差别,这一阶段大约相当于河亶甲居相、祖乙迁邢、南庚迁奄至盘庚之初^⑩,袁广阔也持此观点^⑪。综上,虽然不同学者对刘家河墓葬年代的认识略有差异,但大体在商代二里岗文化晚期至殷墟一期之间。

目前学界对刘家河墓葬的文化属性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认为该墓葬属于商文化,或属于受商人控制的北方方国。其二认为该墓葬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或夏家店下层至西周封燕之前的土著文化。其三认为该墓葬属于围坊三期文化。除殷墟外,同类

型铜盘多出土于晋陕高原、陕南和北京地区,这些地区均超出了商文化直接的控制范围。2022年,在郑州商都遗址书院街墓地高等级墓葬M2中出土了铜盘、金覆面等器物,与刘家河墓葬出土的铜盘与金箔等器物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刘家河墓葬中出土的臂钏等器物又彰显了燕山南北草原文化因素的特点。

四、总结

本文通过对平谷刘家河商墓出土铜盘内壁纹饰的分析,发现至少自商代中期起,燕山南麓地区就与商王朝产生了紧密联系。这不仅体现了商文化的巨大影响,而且彰显了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活力。此外,从各地出土的同类型铜盘来看,陕北和晋西等商王朝版图的相邻区域均与其有紧密联系。

目前来看,商代出土铜盘的墓葬等级普遍较高。刘家河商墓出土的铜盘数量与妇好墓一致,虽然两者出土的铜盘内壁纹饰差异较大,但通过出土铜盘的数量就足以证明刘家河商墓的等级,至少是一座高等级贵族墓葬,甚至可能达到本地区王墓的级别。此外,根据I式盘中“鸟首鱼尾纹”为“燕纹”的解读,可以推断刘家河商墓与商代燕部族有紧密的关系。《左传》记载:“及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⑫袁广阔认为祖乙迁邢后,为了控制京津地区,拱卫中央王朝,在京津地区分封了一个子姓燕国,而刘家河商墓很有可能就是燕国的一位高等级贵族的墓葬^⑬。

①⑥④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平谷县发现商代墓葬》,《文物》1977年第11期。

② (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122页。

③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60页。

④ 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66页;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46页;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79~280页。

⑤ 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65~266页。

⑦ 原拓片下侧仅见后鳍,本文作者根据高清照片对原拓片头部与鱼鳍进行了修改。

⑧ 王寿芝:《陕西城固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文博》1988年第6期;李伯谦主编:《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15),科学出版社、龙门书局,2018年,第32页。

⑨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市博物馆:《郑州新发现商代窖藏青铜器》,《文物》1983年第3期。

⑩ 程瑞秀:《青铜器上写实动物纹的艺术风格与时代特征》,《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五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第124~136页。

⑪ 曹淑琴:《刘家河商墓铜盘与“易”字铭探讨》,《北京平谷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00~204页。

⑫ 刘正:《刘家河出土商代青铜礼器研究》,《北京平谷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33~236页。

⑬ 王丹:《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⑭⑳ 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95页;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69~570页。

⑮ 张懋镛主编:《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盘卷)》,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75页。

⑯ 周向雨:《商周青铜器写实性动物纹初步研究》,《苏州文博论丛》,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24~32页。

⑰ 石璋如:《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三,南组墓葬附北组墓补遗》,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3年,第30页。

⑱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47页。

⑲④⑩ 张光直:《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

⑳ (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第614页。

㉑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70页;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95页。

㉒⑳ 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17页。

㉓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㉔⑤⑩ 袁广阔:《对北京平谷刘家河商墓的几点认识》,《中国文物报》2019年12月29日第6版。

㉕⑳ 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38~339页;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商周青铜器纹饰》,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33页。

㉖ 张光直:《殷礼中的二分现象》,《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清华学报社,1965年,第353~370页。

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考古队:《殷墟259、260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㉘ 戴应新:《陕北清涧、米脂、佳县出土古代铜器》,《考古》1980年第1期;高雪:《陕西清涧县又发现青铜器》,《考古》1984年第8期。

㉙ 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第233~234页。

㉚ 程长新:《北京发现商龟鱼纹盘及春秋宋公差戈》,《文物》1981年第8期。

㉛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青铜器卷(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326~327页。

㉜ 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66页。

㉝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68页。

㉞ (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242页。

㉟ 何景成:《商周青铜器族氏铭文研究》,齐鲁书社,2009年,第15页。

㊱ 葛英会:《燕国的部族及部族联合》,《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一辑,燕山出版社,1983年,第1~18页。

㊲ 郭大顺:《试论魏营子类型》,《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79~98页。

㊳ 靳枫毅、郁金城:《北京地区出土青铜器概论》,《北京文物精粹大系·青铜器卷》,北京出版社,2002年,第16~25页。

㊴ 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253~293页。

㊵ 李伯谦:《论夏家店下层文化》,《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50~170页。

㊶ 郑绍宗:《夏商时期河北古代文化的初步分析》,《考古学文化论集(四)》,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115~16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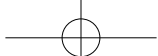
㊷ 金家广:《燕文明探微——从燕南花边鬲遗存谈起》,《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专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202~210页。

㊸ 陈旭:《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铜器墓的年代》,《北京平谷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33~236页。

㊹ 韩建业:《北京先秦考古》,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104页。

㊺ 杨育彬:《平谷刘家河商代铜器墓的几点思考》,《北京平谷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97~199页。

㊻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第1308页。



琉璃河奭器组铭“燕侯宫”初探

A Preliminary Research of the Yanhou Palace in the Huan's Bronzes Group Inscriptions of the Liulihe Site

陈光鑫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Chen Guangxin (Institute of History,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摘要:“商周宫、庙不分”说几成定论,“燕侯宫”首次现世于奭器组铭,对此说提出挑战。奭器组铭中“燕侯宫”是为在位燕侯所建的宫室,主要功能是居住、宴请。有些以往归入祭祀功能的“某宫”,可能是为在世者所修,如“周公宫”等。“燕侯宫”铭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商周时期诸侯国宫寝制度的认识。

关键词: 奭器组铭 燕侯宫 诸侯国 金文 宫寝制度

中图分类号: K877.2 **文献标识码:** A

Abstract : The assertion that palaces and temples were not distinguished in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has almost become a definitive conclusion. The first appearance of Yanhou Palace in the inscriptions of the Huan's bronzes challenges this view. Yanhou Palace refers to the palace built for the incumbent prince of the Yan State, primarily serving as a residence and venue for banquets. Some previously categorized as palaces for sacrificial purposes, such as Zhougong Palace, may have been constructed for the living, not for posthumous rituals. The Yanhou Palace inscription further enriche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alace and residential systems of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among the feudal states.

Keywords : The Huan's Bronzes Group Inscriptions; Yanhou Palace; Feudal States; Bronze Inscriptions; Palace and Residence Syste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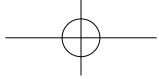
2021年北京房山琉璃河M1902出土“奭器组合”(图一),包括青铜鼎1、尊1、卣1、觯1和爵1,铭文基本相同,以卣为例,铭文4行24字,释文:“太保奭燕^①, 饫饗燕侯宫, 太保赐作册奭贝, 用作父辛宝尊彝。庚。”

据了解,铭文基本可以通读,记载了太保在燕筑城,并在燕侯宫举行宴会,器主作册奭受到太保赏赐,故作器祭祀亡父^②。“燕侯宫”在西周金文中第一次出现,尚未引起足够重视。那么,是否如后世皇宫中乾清宫、慈宁宫一样,“燕侯宫”是燕侯居住的场所?还是有什么其他含义?对了解商周时期特别是诸侯国的宫室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不揣浅陋,谈一些想法,请方家指正。

一、“宫、庙不分说”

现代汉语中,多称文化活动或娱乐场所为“宫”,如民族宫、文化宫等。在古代,“宫”最常见的意思就是房屋的通称,古书中多有记载,如《尔雅·释宫》曰:“宫谓之室,室谓之宫。”^③《说文解字》也说:“宫,室也”^④,《易·困》记:“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不祥也。”^⑤《韩非子·难二》记:“景公过晏子曰:‘子宫小,近市,请徙子家豫章之圃。’”^⑥《史记·五帝本纪》曰:“象乃止舜宫居,鼓其琴。”唐人张守节《正义》说:“宫即室也。”^⑦

后来,宫又成为帝王住所的专称,正如唐人陆德明所说:“宫,古者贵贱同称宫,秦汉以来王者



图一 北京房山琉璃河 M1902 出土“奭器组合”器型及铭文拓片
(转引自 2025 年 4 月 26 日“光明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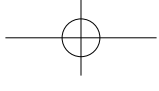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所居称宫焉。”^⑧李白就曾写道：“萧萧长门宫，昔是今已非。”^⑨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个我们不太熟悉的义项就是把宗庙也称“宫”，唐代韩愈就曾写道：“松柏一迳趋灵宫”^⑩，所谓“灵宫”就是岳庙^⑪。元末明初小说《水浒全传》也有：“便就睦州宫观净处，扬起长幡，修设超度九幽拔罪好事。”^⑫这一用法其实历史很悠久，可追溯到商周时期，《诗·召南·采芣》曰：“公侯之宫”，毛传：“宫，庙也。”《诗·大雅·云汉》曰：“自郊徂宫”，郑玄笺：“宫，宗庙也。”那么，奭器组铭“燕侯宫”是在位燕侯的住所，还是祭祀过世燕侯的宗庙呢？

奭器组铭为西周早期青铜器组合，而多数学者认为商周时期，宫、庙是不分的。郑玄提出：“明堂、宗庙、路寝同制。”^⑬郑玄虽分寝、庙与明堂，但同制之下，差别几可忽略，正如王国维所言：“古者，寝、庙之分盖不甚严，庙之四宫，后王亦寝处焉，则其有室也必矣。”^⑭在寝、庙不分的前提下，唐兰又提出：“‘宫’是总名，是整所房子，外面有围墙包起来的，‘庙’和‘寝’都在‘宫’内，

‘庙’是室而有东西厢的，在前，寝是有室而无东西厢的，在后。”^⑮所以，西周金文中，“某宫”又称“某庙”。

当然，在传世文献和西周金文中，可以找到例子证明这一观点。《左传·昭公二十二年》：“单子逆王于庄宫以归，王子还夜取王以如庄宫。”又昭公二十三年：“王子朝入于王城”，“郕罗纳诸庄宫”。王国维指出：“庄公，庄王之庙。”^⑯其根据是《礼记·礼运》言：“天子适诸侯，必舍其祖庙。”此观点于文献可征，《国语·周语》就记载：“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内史兴赐晋文公命。上卿逆于境，晋侯郊劳，馆诸宗庙。”又《仪礼·聘礼》：“卿馆于大夫，大夫馆于士，士馆于工商。”郑玄注：“馆者必于庙。不于敌者之庙，为太尊也。”王国维总结说：“以此观之，祖庙可以舍国宾，亦可以自处矣。”^⑰

西周金文中也有例证，如师兑簋（《铭图》5324）：“王在周，格康庙”^⑱，“格”可理解为去、到等意思，王在周，到康庙去。又南宫柳鼎（《铭图》2463）：“王在康庙”，意思是王在康庙，那么，



“康庙”如何理解呢？师遽方彝（《铭图》13544）：“王在周康寝，饗礼。”学者认为，“周康寝”就是师兑簋、南宫柳鼎的“康庙”，这样看来，“寝”就是“庙”^⑨。

尽管在“康宫问题”上，郭沫若与唐兰存在分歧，但在宫、寝、庙的关系上，观点是一致的。郭沫若认为：“京宫、康宫均宗庙之名。”^⑩唐兰也认为，京宫是周王的祖庙，康宫是康王之庙^⑪，似已成定论！只有少数学者不同意此说，如陈梦家认为，“宫、寝、室、家等是生人所住的地方，庙、宗、宗室等是人们设为先祖鬼神之位的地方”^⑫。免器组铭中出现“燕侯宫”，为这个问题的继续讨论提供了新的空间。

二、在位燕侯之宫

判断燕侯宫的性质，关键一点是“燕侯”到底指过世燕侯，还是在位燕侯。

“燕侯”称谓可总结为“某（国名）侯”，首先要与“某（非国名）侯”区分开，因为后者多存在指过世之侯的情况，如朱凤瀚先生指出：“畿外封国中生称‘侯’者，死后亦有以‘某（非国名）侯’为称者，如晋侯燮父，据《史记·晋世家》，其子宁族为武侯，武侯子服人为成侯……诸晋侯死后所称此类‘某侯’，即谥号。其中‘成侯’‘历侯’之称，已有天马一曲村晋侯墓地出土的铜器铭文证实。”^⑬唐兰曾提到的“某宫”之“某”当是某位已过世周王的名号，在诸侯国中，可适用于“某（非国名）侯”之“某（非国名）宫”的组合。所以，要把如“燕侯”这种“某（国名）侯”称谓方式与“某（非国名）侯”区分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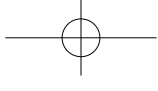
此外，“某（国名）侯”表示对被任命作某国侯的官员称谓。多数学者认为“侯”在西周时期是一种职官，“侯”本义是指“斥侯”，“为王斥侯的武官”^⑭见于殷甲骨刻辞，如“贞，王惠侯告比征夷。

贞，王勿惠侯告比”（《合集》6460正）^⑮。又“甲午，王卜，贞，作余酒，朕口余步比侯喜征人方”（《合集》36483）。《尚书·酒诰》追述殷商历史时说到：“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侯”确实是一个古老的称谓。

武王克商后，吸收殷王朝灭亡教训，周公推动大规模分封，通过封建亲戚实现地方管理^⑯，《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云：“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⑰同书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语：“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无专文武之功，且为后人之迷败倾覆而溺入于难，则振救之。”^⑱朱凤瀚指出，周初“侯”的性质是“驻在边地保卫王国、有较强武力的武官”^⑲。如大孟鼎（《铭图》2514）：“唯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这样说来，“燕侯”当然是指燕国在位的侯。

从目前发现带有“燕侯”字样的西周金文看，尚不见称过世国君为“燕侯”者。如西周早期的燕侯旨鼎（《铭图》01716）：“燕侯旨作父辛尊。”铭文记载名旨的燕侯为过世的父亲父辛作器，显然旨是在世的燕侯，燕侯旨还曾到宗周向周王述职，燕侯旨鼎（《铭图》2203）记：“燕侯旨初见事于宗周，王赏旨贝廿朋”，还受到周王的赏赐，新近见于著录的燕侯旨卣（《铭图》20874）铭文，记载燕侯旨为姊妹作媵器，类似铭文中，燕侯作为器主^⑳，显然都是生称。

在其他西周金文中，燕侯虽不是器主，但从上下文看，多可看出燕侯是生称。西周早期圉鼎（《铭图》2019）记：“休朕公君，燕侯赐圉贝”，器主受到燕侯赏赐，此燕侯当然是在位燕侯。虢鼎（《铭图》2290）记载：“燕侯令虢诒太保于宗周”，器主虢受燕侯之命到宗周侍奉召公，燕侯显然是在位国君。伯矩鬲（《铭图》2908）记载器主受到燕侯赏赐，类似铭文中，多是器主受到燕侯赏赐，作器



纪念^③，器主作为受赐对象，燕侯作为赏赐方，显然也是生称。

诸侯国国君去世后，常称“某(国名)公”，如鲁侯伯禽死后被尊称“鲁公”，称“文考鲁公”^④。据晋公盆(《铭图》6274)，唐叔虞死后被尊称为“皇祖唐公”，晋侯燮父死后被尊称为“晋公”^⑤，从吾鬲(《铭图》2766)、滕侯簋(《铭图》4487)看，第一代滕侯(文王子叔绣)死后被尊称“滕公”。燕侯去世后，是否称“燕公”，还有待更多材料验证。

奭器组铭中“燕侯宫”铭文虽然首次发现，但从以往发现的西周金文看，此“燕侯”当指在位燕侯无疑，那么，不存在为祭祀过世燕侯而建造宫之可能。“燕侯宫”是为在位燕侯建造的居住、宴请之所。那么，如何理解“宫、庙不分说”与“燕侯宫”的关系呢？

三、生者之宫与逝者之宫

《礼记·礼运》曰：“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先民为遮风挡雨而建宫，所以宫的首要功能还是居住。从金文、传世文献看，周代确实存在专为生者建造之宫，称为“某宫”，“某”为人名，“宫”则相当于后世之府邸。

西周中期师秦宫鼎(《铭图》2368)铭曰：“王口口于师秦宫，王格于享庙……”，或认为“师秦宫”是人名，但根据金文惯例，多称“师某”或“师某父”，如猷盘(《铭图》14531)铭曰：“王格师聃父宫”，“师聃父”与“师秦”显然一样，都是修饰“宫”的，故“师秦”为人名无疑，“师秦宫”当为师秦之宫。另四件同铭大师虘簋(《铭图》05280、05281、05282、05283)，铭曰：“王在周师量宫，王格太室”，唐兰认为“周师”是都邑名称，那么“量宫”如“录宫”“田宫”一样为周王离宫的名称^⑥。西周金文中确实常见“某师”作为地名，需要注意的是，地名中的“师”多写作“官”，而用作人名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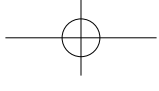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两种写法方可通用，守宫盘(《铭图》14529)铭曰：“王在周周师光守宫……守宫对扬周师釐”，“王在周”之“周”下有重文符号，说明下文“师”与前“在周”不可连读为“在周师”，此“周师”显然是人名。所以，这里我们对大师虘簋铭相关部分提出新的读法，西周中期牧簋(《铭图》5403)铭曰：“王在周，在师汙父宫，格太室”，可见周有师汙父宫，金文中常见“王在周”，“周”与“师量宫”是两个地名，可理解为“周之师量宫”，与师秦宫鼎之文例，“师量宫”为师量之宫，“师量”为人名，显然是生称^⑦。同此，师鬯鼎(《铭图》2481)、师俞簋盖(《铭图》5330)、谏簋(《铭图》5336)铭中“王在周师录宫”，可理解为“周之师录宫”，过去读为“永师”之“田宫”，今可读为“王在永，师田宫”。这就可以理解豆闭簋(《铭图》5326)铭曰：“王格于师戏太室”，即“师戏宫”之“太室”。

或怀疑上述两铭中“宫”前之“师秦”“师量”是否为生称，可再举一例以说明。现藏美国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之庚嬴卣(《铭图》13337)，铭曰：“王格于庚嬴宫，王蔑庚嬴历……庚嬴对扬王休，用作厥文姑宝尊彝……”，器主为庚嬴，从“庚嬴对扬王休”一句看，庚嬴为生称，无疑！故“庚嬴宫”即为庚嬴之宫，王来到庚嬴之府邸，并嘉奖庚嬴。可证上述“师秦”“师量”存在生称的可能。

除“某(人名)宫”外，还有“某(官名+人名)宫”的用法。西周中期鲜钟(《铭图》15415)记：“王在成周司土廐宫”，位于成周的司土廐宫，“司土”是官名，相当于后世之“司徒”，“廐”为司土之私名，此宫当为在位司徒之府邸，周王在此宫下榻，并对器主鲜进行赏赐。

值得注意的是，如同周王之宫，“某宫”中也有“太室”。西周中期师俞簋盖(《铭图》5330)铭曰：“王在周师录宫，旦，王格太室”，如上文所举豆闭簋之师戏宫中之太室。

这种用法一直到春秋时期还在使用。《左传·庄



公十九年》：“边伯之宫，近于王宫，王取之。”诸侯国中也有类似用法，《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吕、却畏逼，将焚公宫而弑晋侯。”此“公宫”显然是指在位晋侯之宫。又成公十八年：“齐侯使士华免以戈杀国佐于内宫之朝，师逃于夫人之宫”，夫人之宫即夫人之府邸。

除此之外，商周时期，还有一种用作祭祀先祖之宫，命名方式以先王谥号+宫。周公营建洛邑时，据《逸周书·作雒解》，“乃位五宫：大庙、宗宫、考宫、路寝、明堂”。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认为：“宗宫文王庙、考宫武王庙。”唐兰认为，宗宫就是仿照宗周的京宫而建的宗庙^⑥。而京宫在周人祭祀之宫中占有重要位置。西周早期令方彝（《铭图》13548）铭曰：“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宫，乙酉，用牲于康宫，咸既，用牲于王。”“尹三事四方”的明公首先就是到京宫进行祭祀，可见京宫的重要性。《吕氏春秋·古乐篇》：“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归乃荐俘馘于京太室。”“京太室”就是京宫之太室，武王自伐纣归来，首先到京宫向祖先献俘。唐兰先生认为：“京宫里所祭的是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和成王五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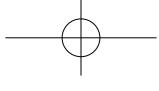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从西周金文看，历代周王都有以谥号命名的宫。吴彝：“王在周成太室。”召壶：“王格于成宫。”“成宫”可能为周成王之宫，“成太室”即为成王宫之太室。如“康宫”，依唐兰所说，为康王之宫，君夫簋：“王在周康宫，旦，格太室。”休盘：“王在周康宫，旦，王格太室。”周穆王之庙称穆宫，据唐兰先生研究，在康宫之中，袁盘：“王在周康穆宫，旦，王格太室。”穆宫之太室称穆太室，召鼎：“王在周穆王太室”，伊簋：“王在周康宫，旦，王格穆太室。”昭王之庙就称昭宫，颂鼎：“王在周康宫邵宫”，昭宫也在康宫之中。

《国语·周语》：“宣王命鲁孝公于夷宫”，韦昭注：“夷宫者，宣王祖父夷王之庙”，“夷”就是谥

号，金文攸从鼎曰：“王在周康宫彛太室。”害簋：“王在彛宫”，就是“夷宫”，周夷王之宫，也在康宫之中。《左传·昭公二十二年》“单子逆悼王于庄宫”，“盟百工于平宫”，据杜预注，庄宫和平宫就是在王城里的庄王庙和平王庙，“庄”“平”分别是二王的谥号。《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宫”，襄宫是成周周襄王的庙，可从。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类宫不仅在王朝中，在诸侯国中也多分布。西周中期师酉簋（《铭图》5346）铭曰：“王在吴，各吴太庙”，又免觶：“王在郑，丁亥，王各太室。”唐兰指出：“周王在‘吴’就格吴地的太庙，在‘郑’就格郑地的太室，可见周王宗庙是不限于宗周、成周、王城等处的。……应该就是《竹书纪年》所说‘穆王所居郑宫春宫’中的‘郑宫’，免觶的太室，也就是‘郑宫’的太室”^⑦，可从。当然，还有所谓“新宫”，就是新建之宫，如望簋：“王在康宫新宫。”

春秋时期，这种宫在诸侯国中仍大量存在。《春秋·成公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宫”，《公羊传》：“武宫者何，武公之宫也。”《春秋·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左传》解释“将禘于武公”，《礼记·明堂位》：“武公之庙，武世室也。”武宫、武世室就是武公之庙。又《春秋·定公元年》九月“立炀宫”，《左传》说：“昭公出，故季平子祷于炀公，九月立炀宫”，又《公羊传》“炀宫者何，炀公之宫也”。“炀宫”是鲁炀公之庙。《春秋·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灾”。《左传》说：“孔子在陈闻火，曰：其桓、僖乎”；《公羊传》说：“此皆毁庙也。其言灾何，复立也”，《谷梁传》说：“言及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则一也。”可见“桓宫”“僖宫”是鲁桓公和僖公的庙^⑧。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晋文公到了曲沃，说“丁未，朝于武宫”，《史记·晋世家》注引贾逵说：“文公之祖武公庙”。《左传·昭公十七年》记晋国灭陆渾事说：“宣子梦文公携荀吴而援之陆渾，故使



穆子帅师献俘于文宫”，“文宫”就是晋文公之庙。

诸侯国中祭祀先公之庙也见于金文。伯晨鼎（《铭图》2480）记载王册命伯晨为侯，继承其祖、父的职事，铭文最后说：“用作朕文考瀕公宫尊鼎”，“瀕公宫”就是器主伯晨之亡父（“文考”）之宫，此种宫的命名方式可总结为“谥号+宫”。

综上，无论在西周王朝中，还是诸侯国中，至少存在两种类型的“宫”，一种是专门用来为生人提供居住、宴请功能的宫；一种是作为宗庙，用来祭祀先祖的宫。两种功能的宫是否可以合一，则需继续讨论。

四、“燕侯宫”铭文的学术价值

如上文所说，西周时代诸侯国中，除了作为侯之祖庙的“宫”外，还存在专为生人所建之宫。奭器组铭中的“燕侯宫”是一种不同于“谥号+宫”的命名方式，而是以“国名+侯+宫”来命名，此种宫或是封国之初临时为之，或是沿袭商周礼制，后来成为定制，需要更多材料验证。

“燕侯宫”进一步明确了燕国、燕侯与召公在制度上的关系。《史记·燕召公世家》言：“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太史公为后世留下一个千古之谜，召公算不算一代燕侯？虽然学问家们提出元子就封说^⑨，直到克壘、克盂铭文现世，召公不是一代燕侯才最终确定。这一点对召公家族来说其实是一件无限荣光的事件。

令克“侯于匱”（克盂，《铭图》14789），表明至少在西周初年，在制度上，王朝卿士不可同时作畿外侯。如朱凤瀚指出：“称‘侯’是有严格制度约束的，只有受王命才可称‘侯’，并非所有畿外封君皆是‘侯’。”^⑩没有令召公亲自就封，从当时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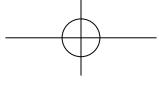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况看，显然是对召公在王朝中地位的肯定，如封鲁一般，令伯禽就封，而没有如“令唐伯侯于晋”（爻公簋，《铭图》4954）一般，命唐叔虞亲自就封。召公继续在王朝中作卿士，令召公之子克就封于燕，这在当时，对臣子而言，应该是至高荣誉，对召公家族而言，也是一件光耀门楣的盛事。

在燕地建立“燕侯宫”，而不是“召公宫”，进一步说明召公自召公，燕侯自燕侯，在礼仪制度上，肯定燕国及燕侯的独立地位，不是召公附属，而是一代“侯”的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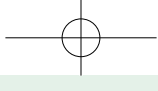
周代诸侯国的宫室制度中，生人居住之“宫”与祭祀之宫还是应该有差别。如前文所言，多数学者认为商周时期宫、庙不分。当然，也必须承认，无论王朝还是诸侯国，都存在大量“某（谥号）宫”的命名方式，这些宫当然是以祭祀过世的王或侯而修建的。

除此之外，正如唐兰所说：“我们说金文里的‘宫’大都是宗庙，一毫也没有排斥‘宫’的其他的意义。”^⑪从“燕侯宫”看，至少在西周早期，特别是诸侯国初封的特殊时期，专为生人建造宫殿应该不是特例。至少在初封时期，诸侯国中存在专门为生人建造的宫。那么，这种情况在王朝中是否存在？如令方彝（《铭图》13548）中出现的“周公宫”，存在周公居住之所的可能性，因为祭祀周公之所，金文中称为“周公宗”（它簋，《铭图》5384），二者不一定完全相同。又如尹姑鬲（《铭图》3039）曰：“王各于尹姑宗室繇林……君蔑尹姑历”，唐兰指出，尹姑是妇女，作器时还生存。“繇林”至少说明金文中“某宫”中大量存在为生人建造的建筑。

总之，奭器组铭“燕侯宫”为我们了解商周诸侯国宫寝制度，提供了重要材料，证明当时确实存在专为生人建筑的宫室。



- ① 为避免混淆,金文材料中“匱”字,本文一律写作“燕”。
- ② 王晶、曹大志、安妮娜等:《琉璃河遗址出土西周重要铭文 实证北京三千年建城史》,《中国文物报》2021年12月24日第2版。
- ③ 《尔雅》,中华书局,2016年,第37页。
- ④ (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13年,第149页。
- ⑤ 《周易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一册,艺文印书馆,2001年,第109页。
- ⑥ (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第359页。
- ⑦ 《史记》卷1《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35页。宫、室还是有细微差别,正如清儒段玉裁所说:“宫言其外之围绕,室言其内。析言则殊,统言不别也。”见(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42页。
- ⑧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626页。
- ⑨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第89页。
- ⑩⑪ (唐)韩愈著,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77、280页。
- ⑫ (明)施耐庵、(明)罗贯中:《水浒全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412页。
- ⑬ 《毛诗笺》《考工记》注、《玉藻》注均有提及。
- ⑭⑯⑰ 黄爱梅点校:《王国维手定观堂集林》,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61、62页。
- ⑱⑲⑳㉑㉒㉓㉔㉕ 唐兰:《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
- ⑱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本文简称《铭图》。本文仅标注图号,不另标注页码。
- ⑳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7页。
- ㉒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第36页。
- ㉓⑲㉔⑳ 朱凤瀚:《甲骨与青铜的王朝》,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656、655、730、653页。
- ㉔ 裘锡圭:《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田”“牧”“卫”等职官的研究——兼论“侯”“甸”“男”“卫”等几种诸侯的起源》,《裘锡圭学术文集》第5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53~168页。
- ㉕ 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99年。本文简称《合集》。
- ㉖ 程浩:《大一统视野下的西周分封制》,《历史研究》2024年第5期。
- ㉗⑲ 《春秋左传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六册,艺文印书馆,2001年,第255、903页。
- ㉘ 西周早期燕侯簋(《铭图》4440)、燕侯盂(《铭图》6207、6208、6209)、燕侯戈(《铭图》16389)、燕侯戟(《铭图》16595)等。
- ㉙ 如复尊(《铭图》11770)、亚盃(《铭图》14763)。
- ㉚ 北赵晋侯墓地 M9出土小圆鼎,李伯谦:《晋侯墓地墓主之再研究》,《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考古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 ㉛ 或可理解为师量为器主太师虢之祖先,那么,师量当已去世,可备一说,以待更多资料验证。但从金文文例看,器主与所在“某宫”之“某”不一定有联系,“某宫”就是一个场所,重点不在“某”之身份上。
- ㉜ 郑玄学说可参《毛诗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二册,艺文印书馆,2001年,第9页;唐人司马贞说见于《史记》索隐,《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1549页。



通州路县故城 J13 古木井及陶罐 与陶文研究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J13 Ancient Timber Well, Ceramic Jars and Pottery
Inscriptions at the Luxian Ancient City Site, Tongzhou

陈平[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孙勐[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Chen Ping[Beijing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Beijing Institute of Cultural Heritage)] Sun Meng [Beijing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Beijing Institute of Cultural Heritage)]

摘要: 本文据路县故城 J13 井中第 22、23 号罐的战国晚期燕国陶文,将木井的始建年代推定为了战国晚期,并结合近年路城遗址内清理的五百余座战国晚期燕墓,指出两汉通州路城战国晚期的前身,有可能就是第 22、23 号罐陶文中的“𡔷都”。据井中陶文“工”与“亭”,本文还论及了灭燕后秦在燕地施行的“亭里”和“工商食官”制度。最后,本文将井中 19 罐中多至 10 罐戳印的“临沽”陶文,据《水经·沽水注》进一步推定它有可能即秦及汉初时路城的古称“临沽”。

关键词: 通州 路县故城 J13 古木井 陶文 临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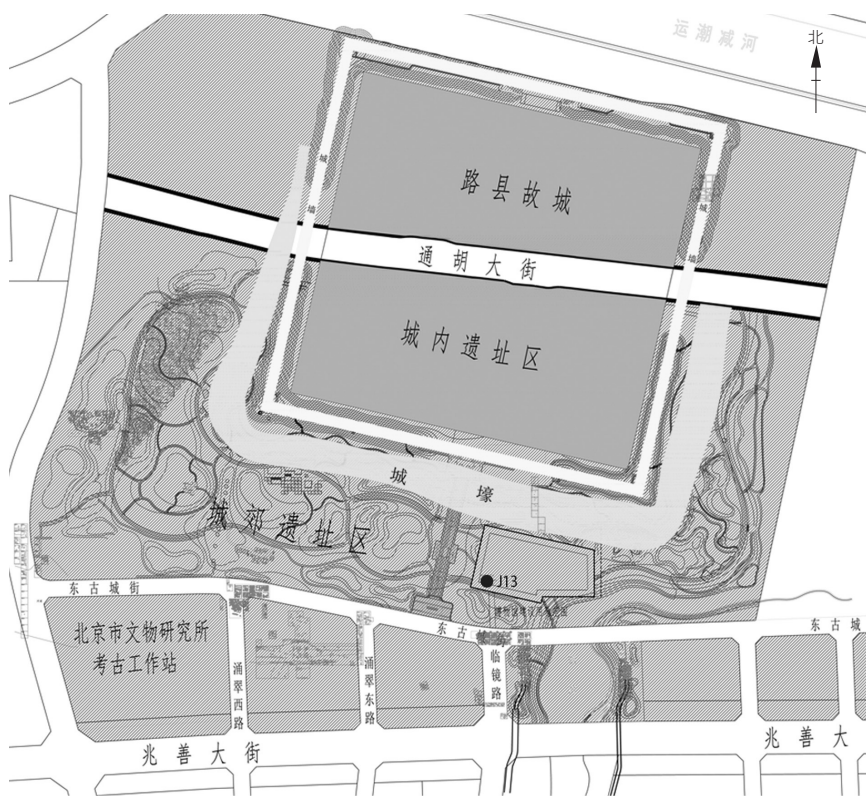
中图分类号: K877.9 **文献标识码:** A

Abstract : According to pottery inscriptions on the 22nd and 23rd jars found in a wooden well J13 from the State of Yan at the ancient city of Luxian, the construction date of the well is inferred to be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is argument is supported by recent excavations of more than 500 Yan State tombs dating to the same period at the Lucheng (路城) site.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predecessor of Lucheng in Tongzhou during the Han Dynasty might have been the “𡔷都” mentioned in the pottery inscriptions on the 22nd and 23rd jars, which date back to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paper then examines the pottery inscriptions “Gong (工)” and “Ting (亭)” found in the wooden well, discussing the “Tingli (亭里)” and “Gong Shang Si Guan (工商食官)” systems implemented by the Qin Dynasty after conquering the Yan state. Lastly, based on the chapter “Gushui Zhu” of the Commentary on the Water Classic,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Lingu (临沽)” pottery inscriptions, which appear on 10th of the 19th jars discovered in the wooden well, might represent the ancient name of “Lingu (临沽)” during the Qin and early Han Dynasty.

Keywords : Tongzhou; the Ancient City of Luxian; J13 Wooden Well; Pottery Inscription; Lingu (临沽)

路县故城保护展示工程项目,是路县故城遗址保护中的重要配套设施,位于路县故城城址外的东南部,城郊遗址区的东部。为推进该项目的建设,2019年10月8日至12月20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其占地范围内进行了考古勘探,面积13634平方米,发现水井14口、窑址2座、灰坑601座、道路遗迹2条等。2020年9月6日至10月13日,北

京市文物研究所对其进行了发掘,面积3500平方米。本文重点研讨的对象,则是该项目区中考古发掘编号为2020TLGBZJ13的一口木构水井(下文简称J13),和在该井底出土的一群泥质灰陶罐及罐外肩腹所戳印的陶文。该井北距古路城南城壕南岸88米,西距由古路城南门延伸出的中央大道60米(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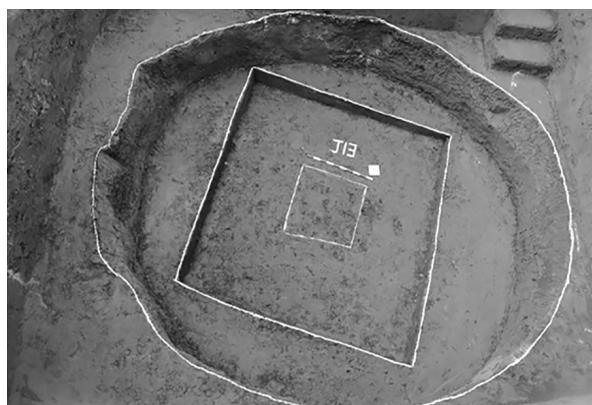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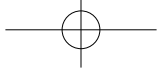
图一 路县故城保护项目区及 J13 位置图

一、J13 号井清理结果与凿建工程复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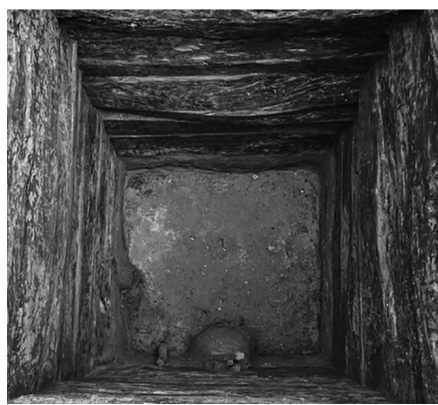
J13整体保存状况较好，开口于⑥b层下，上距地表深4.6~4.9米。上层平面为不太规则的圆形，其东西向直径为5.18米，南北向直径为4.86米，下掘0.87米后，略内缩改作长方形坑，我们姑且先称其为木井的外椁竖穴土坑。坑基本口底同形同大，上口长边左侧为3.49米，右侧为3.61米，短边北侧为3.03米，南侧为3.27米。下掘0.86米后露出中央木制井口。此木制井，上口东边长1.39米，西边长1.41米，南边长1.34米，北边长1.39米，是一个边长在1.40米左右的竖井，井深约2.13米（图二，1—3），井底与上口也基本同形同大。经清理后发现，竖井井壁用近似长方形木板以榫卯结构连接、搭建而成，每面井壁尚保存有九层木板（图三，1—3）。

井底出土器物较为丰富，包括分层叠压且有部分压碎的泥质灰陶罐19件，铁铤、木篦、瓦当各1件（图四，1—3、6）。木篦和铁铤的年代，应在战国和秦汉之际。至于二者坠落井底的原因，本文不拟作过多揣测。但对井底出土瓦当（图四，3），则需作简要说明。此瓦当为山形纹半瓦当，多见于战国晚期的燕国遗址。且该瓦当中下部主体纹饰山形纹上半圆环中，另附有半周小三角纹。附有此类半周环绕小三角纹的半瓦当，不太多见。但经我们查证，在河北易县战国晚期燕下都遗址中，就曾有多发现（图四，4、5）^①。由此可以推定，通州路城遗迹J13号木质古井的始掘年代，有可能早至战国晚期。而在古井附近，则有可能存在一处使用山形纹半瓦当盖成的战国晚期的燕国地方衙署，以及一座相当于县级的同期古城。

现在我们依据J13木井的相关发现，对这座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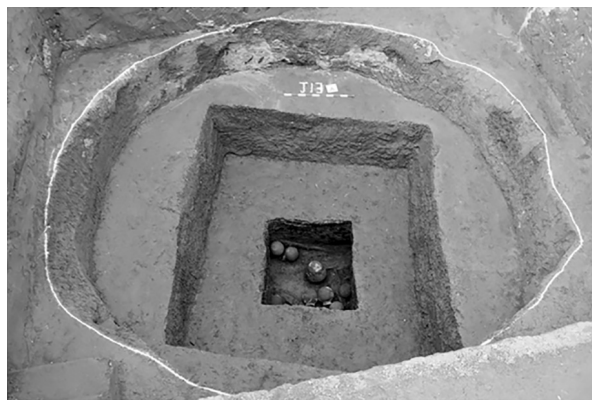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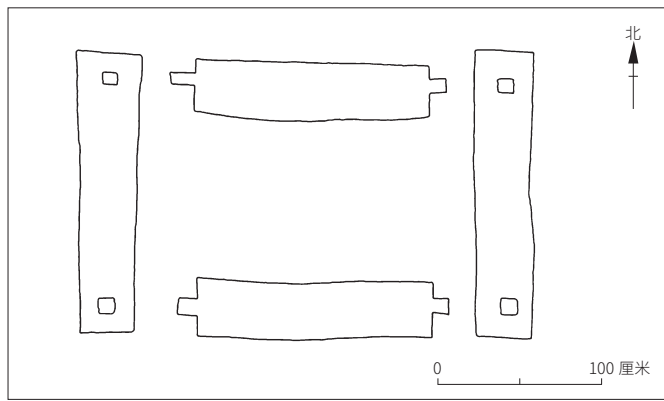
1



2



2



3



3

图二 J13井口露头、深入与井底现场

1. J13井口露头 2. J13井口深入 3. J13井底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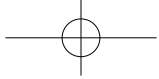
木井的凿建工程稍作复原。

考古发现的中国古井，按砌筑建材区分，大致有木井、瓦井和砖井三类。其中木井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也是最为古老的筑井形式。浙江河姆渡第二层遗迹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木构浅水

图三 J13的木质井壁

1. J13木井壁俯视 2. J13木井壁交角正视 3. J13木质榫卯井壁示意图

井，和河南汤阴白营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发现的木构深水井，是中国古代木井中最早也最为著名的两个先例^②。瓦井流行于战国秦汉时期，这类古井在1952年至1963年在北京老城区考古中曾有大量发现，并成为考古工作者探寻战国秦汉古燕都蓟城所在的一大线索^③。砖井的大量出现与使用，应是南北朝至隋唐以后的事情。这次北京通州古路城遗址中发现的古木井，从井中出土的陶罐与陶文，可以将其始建年代推定为战国晚期，它将中国古木井的凿建行用年代下延到了战国秦汉时期，殊为难得。而其凿建过程、井体架构保存完好，为我们还原中国古木井的凿建过程保留了完好的资料，更显珍贵。路城J13号井的发掘结果表明，我国古代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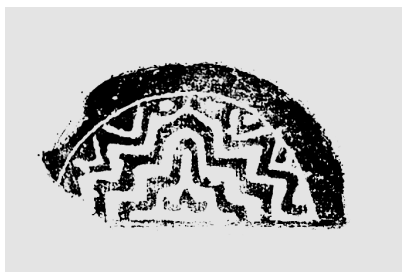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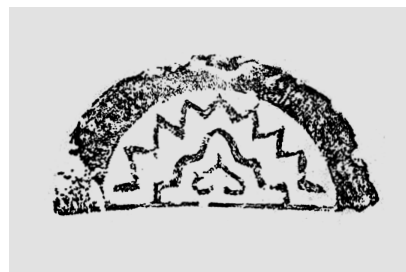
2



3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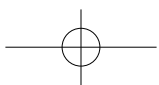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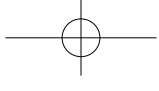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6

图四 J13出土的木篦、铁铍、瓦当与陶罐群像

1. J13出土的木篦 2. J13出土的铁铍 3. J13出土的瓦当 4. 瓦当举证1 5. 瓦当举证2 6. J13出土的陶罐群像





民凿建古木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过程：

(1) 择地选址与预制井木构件。先民对凿井的选址十分重视，造井如建房，非同儿戏。事先恐怕少不了要找阴阳师、风水师等辈，手持罗盘，检测一番，最后才能敲定。与此同时，还要找定木材，按需要的尺寸，裁截成长度和两头柱头宽窄合适的四根长方形木柱，在相应位置按规定尺寸，两纵两横凿好子母套接咬合榫卯，并套接咬合成一个个井字形木框架预制件备用(图三，1—3)。而井所以写作井形，应当正是源自此类井形木构件。

(2) 在预定井址先下掘一个大小深度合适的上层圆形坑。本次凿建的古路城 J13 号井上层不规则，圆坑上口，直径在 4.86 米至 5.18 米之间，下掘深度为 0.87 米(图二，1)。

(3) 在上层大圆坑的内环下掘一个方形或长方形的竖穴土坑，一直下掘到下及涌泉为止。所谓“下及黄泉”，说的就是如此吧！它就是本文所述古路城 J13 号井大圆坑内作左长 3.49 米、右长 3.61 米，南长 3.27 米、北长 3.03 米，深 2.99 米的木井外檐竖穴土坑。

(4) 将地底涌泉罩在预制好的井壁井形木框架中间，并由下向上层层垒叠，形成井壁。在井壁逐层上垒的同时，向井壁木框架外围回填土方，用以固定木井壁，最终完成木井构建。J13 号井由 9 层井形木框架垒叠而成，存高 2.13 米。回填的土方，可以是原先掘坑翻上来的泥土，也可以是从别处特地运来的青膏泥。从已发现的 J13 号井回填土方呈青灰色看，不排除此井所回填者含有青膏泥的可能。

从现有的考古发现看，J13 号井还有两个疑问值得思考：一是现有木井壁由口至底深度仅有 2.13 米，那么从已发现井口到古时地表的 1.5 米(0.87+0.63 米)的这段高度，到底是个什么状况？是古人曾将井形木框架一直架到了当时地表，而这段上半层木井壁遭到了晚期破坏呢？还是古人通过别的什么方式(如台阶)汲水后回到了地表呢？二

是如果是后者，那么在水井行用期间，古人是否会在大圆坑上方修盖井亭以防雨水洪涝回流入井呢？

此井可能具有居民生活汲水及陶窑用水多种用途。

关于井底出土的 19 件陶罐(图四，6)及罐上所印陶文，我们将在下面作更为详密的分析讨论。

二、对 J13 号井出土陶罐上陶印文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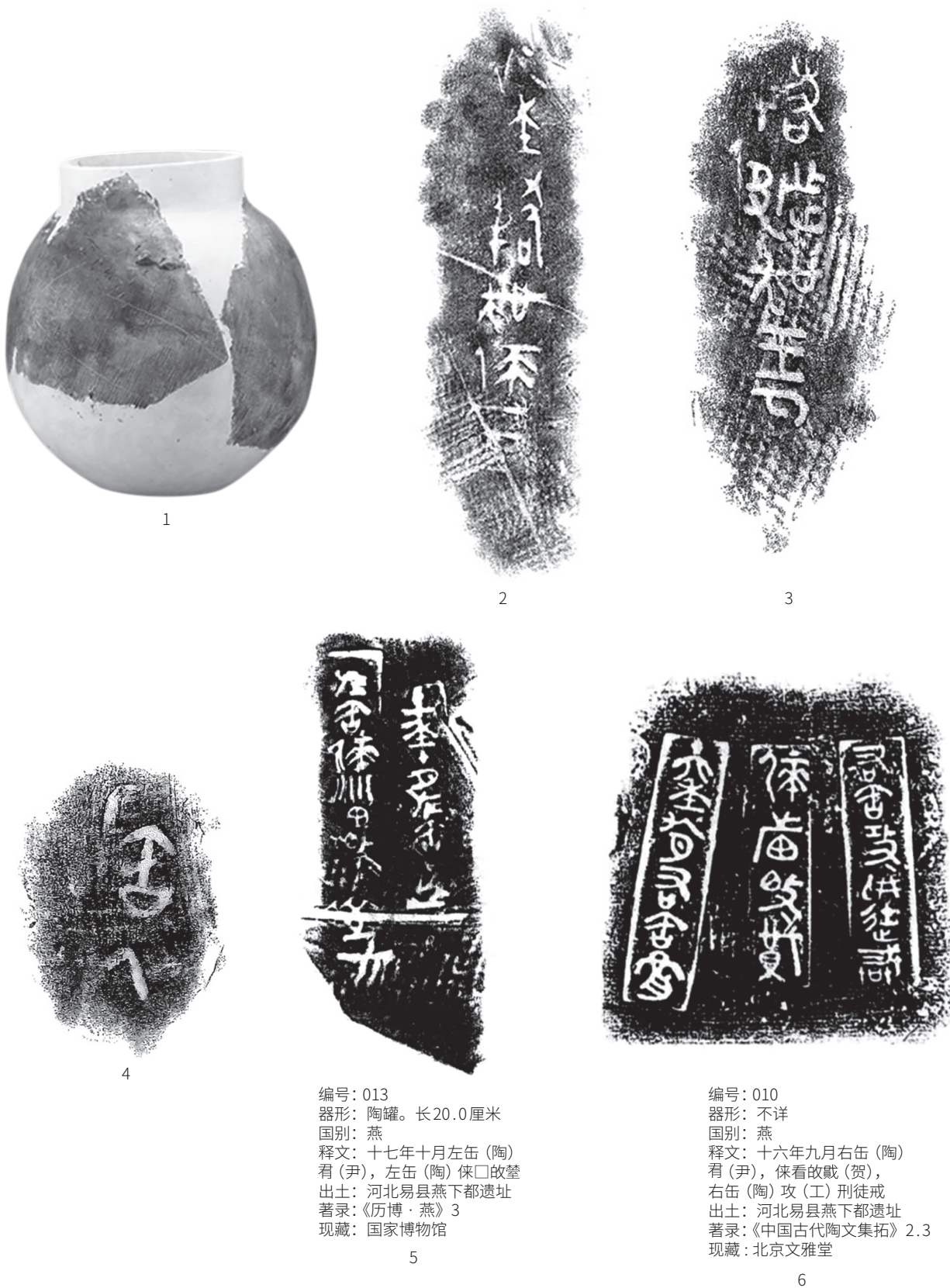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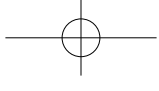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J13 井底出土 19 件陶罐中，现已查明，有 15 件在外表肩腹上戳盖有战国秦汉时期的古印文，这不仅于京津冀地区战国秦汉考古所仅见，在当代中国考古中也是罕见的。而其印文，将通州路城的建城史上推到战国晚期的古燕国统治时期，对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通州路城的建城史，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值得重视。

(一) 对第 22 号罐三条竖长条陶文的考释研究

第 22 号罐，出土时仅存数块泥质灰陶绳纹残片，陶色偏黑，片薄质硬，火候偏高。按断沿拼接后，大体能恢复成罐形(图五，1)。在恢复成形的陶罐肩腹部原残陶片上，有已被洗净可见的三则长条形陶印文 3 组(图五，2、3、4)。从字的形体笔画风格判断，应早于秦汉，具有战国晚期特色。目前所见战国晚期长条形陶文，一般多出现于战国晚期的燕、齐两国(图五，5、6)^④。通州路城之地，逼近战国燕国都城蓟城，当属战国晚期的燕国。由此可以判定，这也是一组具有明显战国晚期燕国文化特征的陶文，陶罐则是一件战国晚期燕国陶罐。

1. 第一则长条形陶印文

图五，2，是 J13 号井中第 22 号罐中第一个长条形陶印文拓本。按由上向下的顺序行文。第一字作“人”形，与第 22 号罐第三个长条印文“匚甸(陶)人”中的“人”字类同(图五，4)，隶定为“人”字或当可以。“匚甸人”，或为司掌、管理陶工之人，



图五 J13第22号罐陶文与燕国陶文比较图

1. J13-22陶罐 2. J13-22第1个陶文印拓本 3. J13-22第2个陶文印拓本 4. J13-22第3个陶文印拓本
5. 燕国陶文举例1 6. 燕国陶文举例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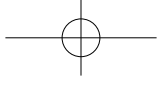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是个管理制陶工人的小吏。第二字“𡗗”形，上木下土，可释为“杜”，所述应即是此“□陶人”之私名。第三字“𡗗”形，与第22号罐第二条长条印文第一字“𡗗”字的笔划、地位相近相似(图五，3)，应当是同一个字两种表现形式。第22号罐第二条长条形印文第一字，此字左偏为“車”字。其右偏上符“𡗗”，疑为“徵”字中部字符上顶之“山”，整个右偏，亦可释为“徵”字中部字样，全字暂可释为“𡗗”。其字虽不见于字书，但它置“都”字前，作城邑之名用，却是可以确定的。第四字作“𡗗”形，此字似可释为“加”，有可能是“𡗗都”监造陶器一级小吏之名。第五字作“𡗗”形，有隶定为“𡗗”者，但未必可以确信。此字燕下都遗址出土陶文也习见，疑非人名，是否为陶工小吏之职称，亦疑而不能定。第六字因残泐难以辨认，故暂不诠释，而代之以方围“□”。以上第一组长条形陶文，由上至下可读作“人杜，𡗗加𡗗□”。此条陶文，文气严重省缺不全。从此罐第三条陶文作“□甸(陶)人”(图五，4)三字推断，本条首字“人”之上，或残缺“□甸(陶)”二字。而这种残缺，或许是由盖印此文的陶印章使用年久残断顶端一截而成。也就是说，这个印章的顶端原本是有“□甸”两字的，后来用久了，刻印上面的这两字陶章部分就断落了，便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也从另一面提供了第22号罐为什么还要加盖“□甸人”这第三条陶文的答案。

2. 第二则长条形陶印文

图五，3，是J13号井中第22号罐里的第二个长条形陶印文拓本，也是由上向下行文的格式。本条第一字“𡗗”，与第一条陶文(图五，2)第三字“𡗗”同文，亦当隶定为“𡗗”，但书写得更为朴茂圆融规范。本条陶文第二字“𡗗”，其左偏作邑，其右偏颇繁复难辨。对照罗福颐先生编著的《古玺汇编》官印部分，有与本条陶文第二字同文的字多次出现，罗先生考定为“都”字，可从。那么其右

偏应即为“都”字之左偏“者”。“都”字，《辞源》有国都、城邑、古代行政区划名等十二种解释。本条陶文第一字“𡗗”，当与第二字“都”连读为“𡗗都”，作为战国晚期燕国一城邑名来理解。“都”为战国秦汉时期习见用为城邑名称之后缀语，估计应起源于古代以“都”为名的行政区划的治所。《周礼·地官·小司徒》对“都”作释云：“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管子·度地》又解释说：“百家为里，里十为术，术十为州，州十为都，都十为霸国。”我们现在无法确认，这两种解释哪种更切合通州路城在战国晚期燕国的地位。J13号井中陶文“𡗗都”，我们认为它应与现代的县、市级城邑相当。仅在罗福颐先生编著之《古玺汇编》的“官玺”这一章，以“阴都”“阳都”等“某都”形式出现的战国秦汉“官玺”就不下三十余方^⑤。J13号井第22号罐这条陶文中的城邑名“𡗗”，有可能是两汉时期路城的前身在战国晚期燕国境内城邑的古称。

从近年通州古路城遗址的考古发现看，2016年10月至2017年8月，我们在对古路城南壕的发掘中，就曾在城壕底部清理出土过战国晚期的山云纹半瓦当2件和战国燕刀币2件。2018年，我们在古路城外东南部约1.8千米的庙上村，又曾发掘出过120余座战国燕国竖穴土坑墓。2018年至2020年，我们还在古路城外北部约距0.9千米处的后屯村旁，发掘出了战国燕国竖穴土坑墓400余座^⑥。此外，据《通州文物志》记载，当地村民曾在路县古城南侧取土时，掘出过一件战国燕国的红陶釜^⑦。综上所述，战国中晚期燕国曾在古路城建置过一座古城的可能性，确实不容低估。路城，战国时期在燕国古渔阳郡境内，而这座战国燕国古城和J13的建置上限，应当不会早于战国中期燕昭王命大将秦开却胡千里，设置渔阳、右北平、上谷、辽东、辽西五郡的公元前283年至前279年间^⑧。如果燕国当



年在此已建有城邑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路城的建城史,从西汉《汉书·地理志》的“渔阳郡路县”县城和东汉《后汉书·郡国志》的“幽州渔阳郡潞县”上提到战国晚期燕国的“𡿨都”城了。往前提的年头虽不多,前后不过百年,但跨越了战国、秦代与楚汉相争三个不同的时代,意义不可谓不重要。

本条陶文第三字左偏为“木”,右偏为“𡿨”,与第22号罐第一条陶文第四字外形完全相同,同样也应释为“加”字。第四个字,明显是个“王”字。第五个字作“𡿨”形,暂时无法辨识。但有个现象很值得注意,即该字的上面总是顶着一个大官,或是“王”,或是“大司徒长”,与他们组成一个两字构成的固定词组。笔者在罗福颐先生编著的《古玺汇编》的“官玺”一章中,就发现过这样的例证^⑨。至于这第五个字是什么字,由“王𡿨”两字组成的固定词组又是什么意思?只怕要有待后考了。我们怀疑,该字很可能是一个表示人与玺间主从关系的“之”字相近的文字,其所表是否乃他为(燕)王在“某都”督察制陶之吏,则仍待进一步探讨。

3. 第三则长条形陶印文

图五,4,是J13号井第22号罐上的第三条长条形陶文,仍是由上向下行文。它的首字疑作“𡿨”形,因其字残缺太甚,难以辨识,虽疑为“司”字残省之异形,但不能遽定,故暂以方围“口”代之。第二字可先隶定为“缶”,它其实是陶字的特殊省形。它先省去了陶字的左偏“邑”,接着又省去了其右偏匍的上偏“𠂔”,就剩了个孤零零的“缶”用来代表它的原形“陶”字,燕下都遗址出土陶文之“陶”字亦多同此例(图五,5、6)。第三字作“𡿨”形,应释为“人”。三字相连,可连读为“口陶人”,其义或为“司掌陶器制作之人”。此条陶文并无“口陶人”之名等其他信息,也属文气不完之陶文铭印。但如将这里的“口缶(陶)”,放在第一条陶文“人”字之上,连读成“口缶(陶)人杜,𡿨加俵口”,当

“司陶人杜、𡿨都俵某”讲,文气就完整通顺了不少。这或许就是我们将陶文第三条,当成陶文第一条顶部残缺的“司陶”二字的补充版的理由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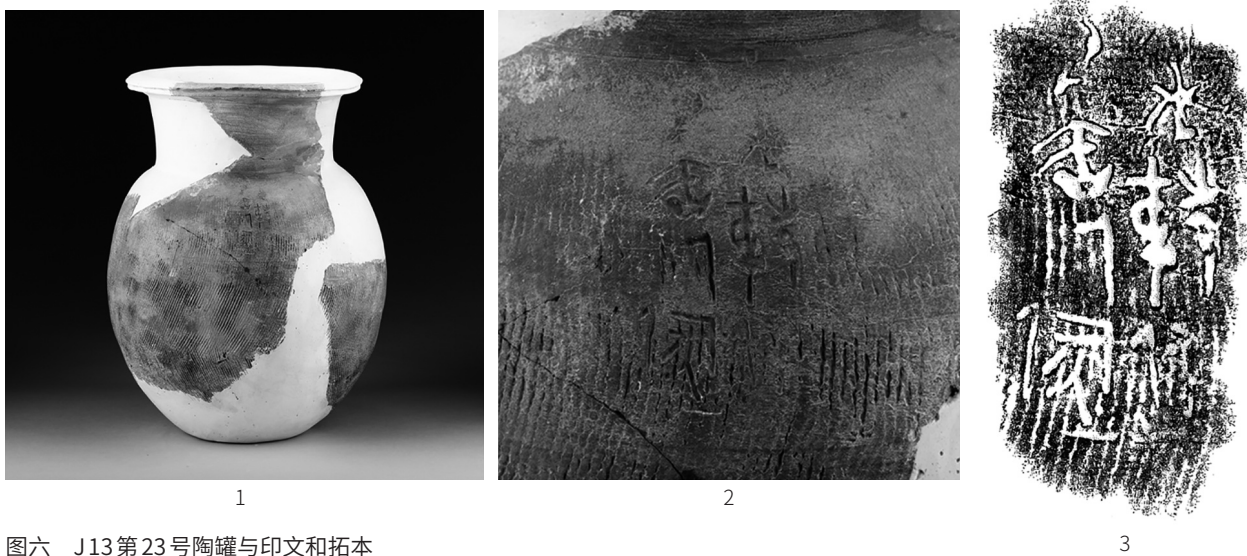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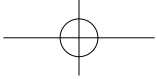
(二) 对第23号罐一条竖长条陶文的考释研究

通州路城遗址J13号井第23号陶罐,出土时仅是一块残存的陶片,饰细绳纹,陶质黑硬而薄,火候较高,与第22号罐质地纹饰基本相同,拼接修复后陶罐的形态也相近,肩腹也戳印有格式同为竖长条、字体也类同的陶文。因此,它也应同为战国晚期燕国陶罐(图六,1)。第23号罐肩腹,戳印有竖长陶文一条。图六,2,是陶罐上的陶文照片。图六,3,则是该条陶文的拓本。从图六,3该条陶文拓本看,该陶文分左右两竖行,行间应自右向左读,右行三字,左行四字,均应由上向下读。右行第一字作“𡿨”形,隶定作“杜”,作人名讲。第二字“𡿨”,字形同于第22罐第一条第三字及第二条第一字,同样也具有两种不同的释义,但均当城邑名“𡿨”讲。第三字残泐不清,无法释定,但以上下文义推定,应是“𡿨都”监督陶工官吏之名,暂以方围“口”代之。左行四字,最上第一字过于残简,暂描摹为“𡿨”。按第22号罐第三条陶文之例,似当为“司”字,但其字形有异,不敢率定,暂以方围“口”代之。第一、二、三字应连读为“口缶(陶)人”,说的应是“司陶人”。最下第四字作“𡿨”形,试释为“庶”,或为司陶人名。本条陶文气理不完,扣印其上的原陶印章似已有残缺,故呈今状耳!

以上第22、23号罐陶文中的“𡿨都”陶文所指,均是西汉路城在战国晚期燕国的城邑古称。该城恰处燕都蓟城五十余里,亦是两周燕国自三千余年前的房山琉璃河古燕都,一直延续到二千余年前经八百余年长存不灭的又一力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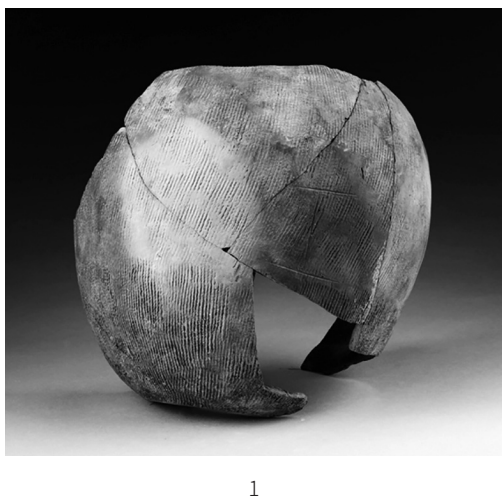
(三) 对第28号陶罐“工”字陶文的考释研究

J13号井第28号陶罐的几片残陶片与第22号、



图六 J13第23号陶罐与印文和拓本

1. J13-23 陶罐 2. J13-23 戳印文 3. J13-23 陶文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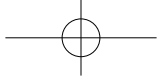


图七 J13第28号陶罐与“工”字印文

1. J13-28 陶罐 2. J13-28 陶文拓本

第23号陶罐残片一同出土于井底下层淤泥中，陶片也同样质地较薄而硬，饰细绳纹，陶色偏黑，烧制火候略高（图七，1）。应与第22、23号罐同为战国晚期燕国陶罐，但现存陶文至简，只有一个由陶工用刀棍类工具划刻上去的草率而大大的“工”字（图七，2）。由于此罐尚残缺数块陶片未能发现，故不排除在这几块残片上仍盖有字数较多的长条形陶

文的可能。陶文“工”字非印文，乃制作此罐陶工之手书刻划文，属于自报其“工匠”职称之举。其操作过程比较简率，刻写也比较草率，显示出了一些典制尚处过渡期的特色。制作年代上有可能略晚于第22号和第23号罐，但也不太可能会晚过秦令王翦攻克蓟城灭燕之年（前226年）^⑩。



1



2



3

图八 J13第10号陶罐与“亭”字印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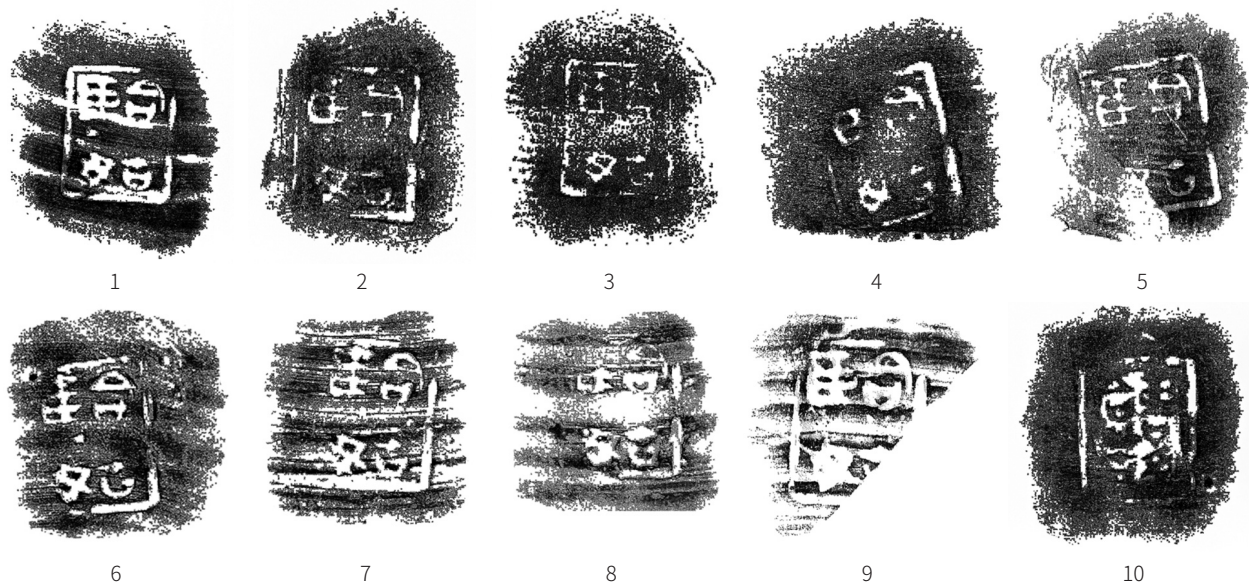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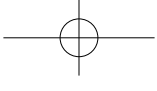
1. J13-10陶罐 2. J13-10戳印亭文 3. J13-10陶文拓本

(四)对J13号井出土第10号罐“亭”字陶文的研究

J13号井第10号罐，为典型的秦汉时期泥质灰陶，罐壁灰色纯正，罐体厚实庄重。与壁薄硬、色向黑的战国晚期燕国陶罐相比，有着明显的时代与国族差别。但罐上所饰绳纹的布局走向，又与战国晚期燕国陶罐所饰颇为相近，显示了一定的延续性、传承性。可见二者当上下承续，相距不远(图八，1)。罐肩横向盖印了一个明显具有秦小篆风格的“亭”字(图八，2、3)。虽然我们在此罐只发现了这么一个字，但却是真正的“一字千金”！它象征着古路城之地历史上一个旧国家、旧时代、旧制度的结束，和一个新国家、新时代、新制度的开始。

印文“𡩂”，可隶定为“亭”。其上部作“𡩂”，乃亭子这一建筑的象形写法，用作该字之形符。下部作“丁”，乃钉子一物的象形，可隶定为“丁”，用作此字的声符。二者相结合，成为形声字“亭”。亭，本义为建筑中亭台之亭，因自先秦时起，列国中以秦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在地区行政管理机构某一级中往往建造一“亭”作为其地标，故这一级机构便被特称为“亭”，此为“亭”的一个引申之义。本陶文之“亭”，正有此义。那么，“亭”到底

是一个什么样的古代地区行政管理机构呢？它又大约是什么时候开始设立的呢？关于这两个问题，我们要从战国到秦代的地方官吏分级制度说起。马非百先生在《秦集史》中总结说：“秦代地方制度，有郡、县两级，县以下为乡、亭。”^⑩而汉承秦制，《汉书·百官公卿表》则说：“县有丞、尉，县以下又有乡官，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皆秦制也。”亭有吏，称亭长。《史记·高祖本纪》载汉高祖刘邦在秦朝时，“及壮，试吏，为泗上亭长。”可见汉代郡、县、乡、亭之制，实上承于秦朝。而秦朝并非此制始创之期，此制之首创，必在战国中晚期之秦国，而其始作俑者，或应为孝公时为秦变法之商鞅。据《史记·商君列传》载：“(商君)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商鞅在战国中期的秦国创立推行的县乡之制，为后来秦朝的始皇帝在全国推行郡县制树立了楷模与规范。我们有理由推定：秦代在全国普遍推行的县乡亭制度，实际上在战国中期的秦孝公、商鞅主政期间就已经创建成型了。秦国的这套制度，就是秦一统六国后在中国施行了近两千年的郡、县、乡、亭、里地方五级行政管理制度。而第10号罐上的“亭”字，代表的正是亭



图九 J13 “臨姑”同文十罐上的陶文印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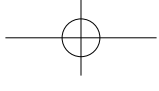
1. J13-4 陶文拓本 2. J13-5 陶文拓本 3. J13-6 陶文拓本 4. J13-9 陶文拓本 5. J13-12 陶文拓本
6. J13-17 陶文拓本 7. J13-19 陶文拓本 8. J13-20 陶文拓本 9. J13-36 陶文拓本 10. J13-7 陶文拓本

长，乃亭长之印信，它的加盖，表明该罐在制成入窑之前，曾被当地亭长验收合格，予以放行了。而“亭”字印陶罐的出现，显示了原在秦国施行的县乡亭里制，在原燕地的今通州潞城地区，已经得到了有效地推行。它所蕴含和揭示的重大历史转折，就是两周姬姓燕国在原燕地的灭亡，和嬴姓秦国对燕国旧地实施有效统治的开始。关于秦灭燕这一重大历史巨变，在《史记·秦始皇本纪》和《燕召公世家》等篇章中均有明确且一致的记载。《秦始皇本纪》曰：“（始皇）二十一年（前226年），乃益发卒诣王翦军，遂破燕太子丹军，取燕蓟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东收辽东而王之。”《燕召公世家》则曰：“（王喜）二十九年（前226年），秦攻拔我蓟，燕王亡，徙居辽东，斩丹以献秦。”蓟城，即今之北京，其时为燕国之首都。蓟城之被秦军所攻取，乃燕亡国之标志。通州古路城之地距蓟城五十余里，按欲攻通都大邑必先扫清其外围的军事原则看，作为写入后世经典著作《千字文》以“起翦颇牧”的伐燕秦军统帅王翦，必先攻取古路城之地。故今通州古路

城之地为秦所攻有，必在秦攻拔燕国首都蓟城之前，年代也应在秦始皇二十一年、燕王喜二十九年之公元前226年。而秦于今通州古路城之城乡推行秦之县乡亭里之制，亦必始于斯年。由此论之，通州古路城遗址之J13号井印有“亭”字陶文的第10号罐的制作年代，也必在秦攻拔燕都蓟城的秦始皇二十一年之后不久。

（五）对 J13 号井出土十罐同印之“臨姑”陶印文的研究

J13号井共出土陶罐19件，除上文已作过初步考释研究的第10、22、23、28四罐外，其余15罐中，有10罐的肩腹均盖印有“臨姑”二字陶文。它们分别是：罐4、5、6、9、12、17、19、20、36、7。虽然它们的字画形态微异，但它们所戳印的都是“臨姑”二字，却是相同的（图九）。这一点，毋庸置疑。这十方陶印文总体来说，都收纳于一长方格之中，用笔结体简约古拙，从书写风格上明显早于汉印，却与战国燕国陶文具有一定的承袭性。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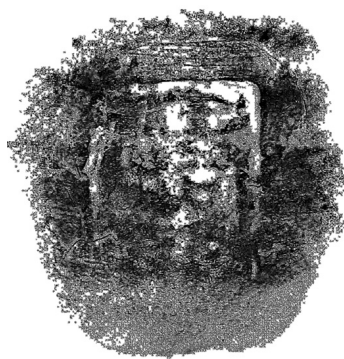
印文布局则都在方格之中，又与秦印相近。我们初步判定，它们有可能是秦灭燕至西汉初年之秦汉古印。二字方格陶文印中第一字，在这十罐的前九罐中(图九，1—9)，多书作“臨”形。其字左偏从“臣”，当隶定为“臣”。其右偏作“𠂔”形，可隶定为“𠂔”，而释为繁体“臨”字右偏“𠂔”之省形。左、右两偏合起来，整个字可释为“臨”，简体则为“临”，作临近讲。二字方格陶文印第二字，在各印中虽全、残程度各有不同，但它们均左“女”右“古”，皆为“姑”字，却是没有问题的。

第10罐J13-7号罐，它有三点与众不同(图九，10)。一是它是一方阳文印。二是它“臨”字的右偏旁，还是一个下具三口的完整的“𠂔”字，全字是个标准的“臨”字。三是陶印文中的“臨”字，左右偏旁发生了互换。本多居右的“𠂔”，换到了左边；而本多居左的“臣”，却换到了右边，而且是反书的，隶定出来作“𠂔”状，全字作“𠂔”。但只要将它翻转过来，就呈“臨”形摆在了我们面前，整个就是一个完整规范的“臨”字。我们推测，该印就是用原本就扣印有“臨姑”二字的旧陶罐残片压印上去的。

我们怀疑，这里10罐的第二字“姑”，应通“沽”。“臨姑”陶文，集中出土于两汉古路城遗址东南郭外沿之J13战国秦汉古井中十件秦汉古陶罐之上，使我们有理由推断，它很可能就是两汉路城在秦代与汉初之古称。“姑”若通“沽”，则“臨姑”就应当被理解成“臨沽”。“沽”，所指应是古沽水，又称沽河。“臨姑”者，“臨沽”也，临近沽水之城也。沽水，见于《水经注》之《沽水注》，应在汉代桑钦著《水经》之前即已有之的沽水也。《水经·沽水》云：“(沽水)南过渔阳狐奴县北，西南与湿余水(按：即今之温榆河)合，为沽河。”《酈注》则曰：“沽水又南迳潞县。为有潞，名潞河也。《魏氏土地记》曰：城西三十里，有潞河也。”^⑩由此可知，因沽水南迳潞县之旁，故路城之城在秦代则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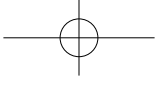
2

图一〇 J13第18号陶罐漫漶陶文印

1. J13-18戳印文 2. J13-18残陶文印拓本

名为“臨姑”，即“臨沽”。《史记·燕召公世家》有“(燕)釐公三十年(前373年)，伐败齐于林营”语，《六国年表》则将《世家》之“林营”易名为“林孤”。此“林孤”与本文“臨沽”音近，或可通假。但二者时代不同，“林孤”地望亦失据无考，故本文在此不作揣论。此外，“臨沽”之称也很可能沿用至西汉初该城易名为潞城之前。以上十罐均扣压有“臨姑”二字陶印文，充分体现了秦至汉初这一级地方行政官僚机构对当地制陶业的全面充分的管理监控。战国至秦汉小小的一座J13号井内，竟有十件与秦灭燕至汉初时代吻合、带“臨姑”二字陶文印的陶罐集中出土，这也是一个十分重要且引人深思的考古新发现。

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印有模糊不可识陶文的



第18号陶罐(图一〇),和四件无铭文陶罐。第18号罐陶文已漫漶模糊而不可识,除印文本身较浅外,表面存在污垢斑块亦是其中一个因素。但从残画反复辨识,我们认为它仍有可能是“临姑”陶印文,将来采取一些除垢措施,或能勉强辨识亦未可知。从四件无印文陶罐的正、反两面看,除右起1、2两件上口稍有部分残缺外,这四件陶罐基本保存较好。由于残缺部分均不在陶文印惯常施印部位,故这四罐还有陶文恰在残缺位置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至于这四罐为何缺失陶印文?是否因秦汉之际出现的数权力真空而导致官方对制陶业的管理废弛有关?尚有待探讨。

(六) J13号古木井陶文群所集中反映的我国古代“工商食官”制度

通州路县故城 J13 号古木井陶文群,不仅通过其中的“都”“亭”“里”等相关印文,较多反映了自战国秦汉时期以来,在我国得到长期施行的“县、乡、亭、里”地方行政逐级管理制度。陶文群中的第22、23号罐的“司甸(陶)人”及“輶都”,和第28号罐里的“工”,与第4、5、6、7、9、12、17、19、20、36号罐的“临姑”,均集中反映了我国在先秦以来曾一度长期推行过的“工商食官”制度。这项制度,在我国先秦古籍《国语》《周礼》《礼记》中,均曾有过明确的记载。《国语·晋语四》曰:“工商食官”,韦昭注云:“工,百工。商,官贾也。《周礼》府藏皆有贾人,以知物价。食官,官廩之。”^①《礼记·月令》则曰:“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②简而言之,所谓“工商食官”,就是百工商贾都要从国家

官府领取食禄,在商品生产过程中要接受官府派员的统一管理监督。这些官员,在通州路县故城 J13 木井出土陶罐所印陶文中,就体现为由燕国“輶都”官府派出的“司甸(陶)人”等监管官吏,体现为秦国与秦朝由地方一级政府管理机构派员加盖的“临姑”陶印。而“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则体现为第28号罐陶文中的“工”,尽管我们现在已找不出制作那件陶器的工匠的姓名了,但对其“劳工”之“诚”,当时的官府却是非要派员考量监督的。于是,通州路县故城 J13 号古木井所出土的全部19件寻常百姓普通生活用器陶罐上,就有14件被盖上了烙有“工商食官”印迹的陶印文。过去我们所见先秦“工商食官”印记刻铸铭文,大多体现在青铜礼器或兵器上;而今我们在通州路县故城 J13 井出土的19件陶罐的陶文中却有如此高概率的发现,战国与秦代官府对制陶业的“工商食官”之制贯彻之面面俱到、无所不至,真是令我们后人开眼,叹为观止。无论是 J13 第22、23号罐陶文所载战国晚期之“輶都”,还是罐4、5、6、7、9、12、17、19、20、36十罐同文所载秦代之“临姑”,这些与通州路城战国秦汉史密切相关的城邑,均为历代史书所不载,可补历史文献记载之不足。将古路城的历史依靠地下出土有文字记录的文物,切实上推到了战国和秦代,乃是这批陶文最具历史价值之所在。

后记:本文初稿写毕,曾三呈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审阅。李教授阅后,提出了多条重要宝贵修改意见,笔者在两次修定中亦曾多有遵从采纳,凡三稿乃成。对李零教授玉成之谊,特为此记,以志鸣谢!

①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主编:《燕下都》上册,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26、636页。

②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河南省安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汤阴白营河南龙山文化村落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3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47页。



③ 旌文冰:《北京的古陶井及古蓟城遗址》,《光明日报》1971年12月20日;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写作小组:《北京地区的古瓦井》,《文物》1972年第2期。

④ 徐在国编:《新出古陶文图录》上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74、276页。

⑤ 罗福颐主编:《古玺汇编》,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14页0082、第15页0085、0086。

⑥ 据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路县故城遗址发掘队孙勐同志告知,以上这些考古发掘资料,尚未来得及整理发表。

⑦ 北京市通州区文化委员会、通州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编:《通州文物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第16页。

⑧⑩ 陈平:《燕史记事编年会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11~212页。

⑨ 罗福颐主编:《古玺汇编》,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4页0022、第63页0361。

⑪ 马非百:《秦集史》下册《职官志》,中华书局,1982年,第490页。

⑫ 王国维校:《水经注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56页。

⑬ 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国语》下《文公修内政纳襄王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71~373页。

⑭ 《礼记正义·月令第六·孟冬之月》,(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1381页。